



# 卢森堡文选



# 卢森堡文选

## 上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师颀

负责本书编辑工作的是李宗禹、周懋庸。负责全书校订工作的是殷叙彝、李宗禹。负责人名索引工作的是苏冰焯。

**卢 森 堡 文 选**

LU SENBAO WENXUAN

上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印张 405,000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300

书号 3001·1973 定价 2.05元



## 前 言

罗莎·卢森堡(1871—1919)是波兰、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的女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著名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卢森堡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是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

卢森堡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波兰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889年流亡瑞士,1890—1893年在苏黎世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她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893年同约吉希斯等创办《工人事业》杂志。1894年参加创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到达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从此她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在德国党内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挑战,竭力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妄图摒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质。卢森堡一开始就站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在她写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部著作中,尖锐地揭露了修正主义的实质,指出伯恩斯坦提出的问题是关系到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卢森堡深刻地论证了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指出修正主义者鼓吹改良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资本主

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卢森堡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强调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部著作不仅批驳了伯恩斯坦的种种谬论，对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还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

在二十世纪初期，卢森堡还写了一系列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卡尔·马克思》等等。她针对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是限制独立思想活动的“框框”等谬论，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停滞不前不再发展的理论，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在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或者采取想摆脱马克思的思想以证明自己思想独立性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卢森堡在谈到当时有人抱怨工人运动缺乏继续发展马克思理论的人才时明确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是自己塑造它的人才，当时代对理论工作提出实际需要时，需要本身就会创造出满足这一需要的人才。卢森堡的这一论断是十分精辟的。事实证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就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在俄国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杰出的代表。卢森堡还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界当时掀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叫嚣，针锋相对地论证说，马克思对当今工人运动所作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现代工人阶级。统治阶级明白，要战胜现代工人运动，就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消灭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思想。但是，自从马克思使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在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中发生作用以后，资产阶级就提不出任何可以和马克思的理论相抗衡的理论。马克思逝世二十年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社会在马克思面前更加软弱无力，而马克思却比以往更有生气。

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卢森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途径的思想。她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满腔热忱地介绍、宣传和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她认为这次革命使国际阶级斗争超出了狭窄的议会道路，标志着革命的浪潮正从西方涌向东方。特别是在她1905年返回波兰领导波兰起义后所写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本小册子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热情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同时也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她对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创造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应当运用这一新的斗争武器来推进德国革命。列宁称赞这部著作是联系西欧斗争特点所作的“最好的叙述”，并且把卢森堡的态度同考茨基分子的态度作了鲜明的对比，认为象卢森堡这样的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马上就看出了这个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却完全不能了解这次革命的意义。

俄国1905年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围绕着群众罢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卢森堡等左派力争在德国承认和采取群众罢工这一武器，但是党和工会的某些领导人则采取回避甚至反对的立场。特别是1910年以后，德国的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取消限制工人选举权的三级选举制，德国党内斗争开始尖锐。卢森堡写了《疲劳还是斗争？》、《理论和实践》等文章揭露考茨基主张用国会内的斗争方法逐步消耗敌人力量的所谓《疲劳战略》。这实际上是议会至上主义的翻版。卢森堡坚决主张利用国会外的斗争即采用群众罢工的手段来准备群众进行革命。这场论战最后导致了卢森堡与考茨基在政治上的决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卢森堡不倦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当时她没有使用“帝

国主义”一词，而是用“世界政策”这一说法来表达帝国主义的特征。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卢森堡就一贯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行径。她不断地发表文章和演说，反对德国侵占我国胶州湾、反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等等。1911年，她还撰文热情赞扬中国辛亥革命。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均已收入本选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各列强军国主义势力普遍加强，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这一时期，卢森堡多次撰文并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危险。卢森堡指出，军国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一种疾病。她主张把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卢森堡同列宁一起，在第二国际的会议上，坚持宣传在大战爆发时，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去唤醒群众，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这一马克思主义论点对于反对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大战爆发后，卢森堡于1915年2月被捕，在狱中写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即尤尼乌斯小册子），详细地分析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同时也尖锐地谴责和揭露了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背叛行为。这本小册子尽管包含着个别理论错误（如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民族解放战争等），但是列宁仍然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6年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等组成国际派即斯巴达克派，出版了《国际》杂志和《斯巴达克书信》，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战斗性的文章。如《国际的重建》一文鲜明地宣告，第二国际在8月4日事件后在政治上已经破产，深刻地揭露了谢德曼等社会民主党右派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者，而考茨基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以隐蔽的形式为帝国主义服务。她号召清算社会民主党的错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重建国际。



1916年7月卢森堡因领导反战示威而再次被捕。

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消息，卢森堡都是在监狱中得知的。卢森堡认为俄国二月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预言这一革命将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卢森堡在狱中写的未完成的手稿《论俄国革命》热忱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高度赞扬了布尔什维克的巨大功勋。她认为这一革命不仅挽救了俄国革命，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她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她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发扬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革命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的重要性、反对官僚主义和专横独断、一国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经验等等问题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见解，有些是很有预见性的。但是由于身陷囹圄，对俄国当时严酷的阶级斗争情况不尽了解，对布尔什维克的某些政策的批评是不正确的。她关于自由的某些论点，也有一定的片面性。

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爆发。卢森堡出狱后立即投身于斗争。在这一时期，卢森堡在《国民会议》、《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领袖失灵》以及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全面地阐述了斯巴达克联盟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同时，在关于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关于必须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首创精神等问题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分析和发挥。1918年底和1919年初，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等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彻底决裂，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919年一月斗争失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一起英勇牺牲。

卢森堡一生同列宁保持着亲密的战斗友谊。他们在国际斗争中紧密合作，共同为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

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与此同时，他们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也发生过意见分歧，进行过争论。卢森堡在某些问题上也确实存在着不足甚至错误的地方。例如，她对列宁的建党思想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欠妥当的。她以民族自治的口号来抗衡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纲领，在当时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在原则上也是不正确的。列宁曾经列举过卢森堡所犯过的几个方面的错误，但是，列宁认为，这些错误从卢森堡的一生来看是次要的。列宁给予卢森堡高度评价，称赞她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代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列宁还把卢森堡和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等作了对比，认为机会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鸡”，而卢森堡“始终是一只鹰”。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列宁当时就强调指出：“不但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永远是有意义的，而且她的传记和她的全集（德国共产党人很不应该地迟迟不出版她的传记和全集，由于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只能部分地原谅他们）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列宁的这些话是十分恳切的。今天我们读卢森堡的著作，的确感到教益良深。卢森堡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对马克思主义的献身精神以及她的许多富有启示的思想，是我们永远要努力学习的。

中国革命者对卢森堡充满敬仰之情。1919年，中国报刊就曾报道过卢森堡牺牲的消息。根据目前所看到的材料，从1922年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论在革命高潮还是在革命低潮，不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纪念卢森堡的活动从未中断过。1922年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城市举行过规模相当大的纪念会。在整个二十年代，在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逝世纪念日前后，一些报刊大都刊出纪念专刊和发表纪念文章。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活动也在继续。1939年，

全国青年联合会出版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纪念这两位革命家的文章。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发表纪念两位革命家的社论。1943年，在他们牺牲二十四周年的时候，《群众》杂志还刊出一篇题为《他们的名字是德国革命——纪念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逝世二十四周年》的文章。

新中国成立前，卢森堡的个别著作在中国报刊上作过介绍。建国后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我国翻译出版了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资本积累》、《国民经济学入门》。1983年编辑出版了《卢森堡论文学》一书。但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编译出版过一部比较完整的卢森堡文选。为了比较全面地、完整地介绍卢森堡的思想，我们编译了这部《卢森堡文选》。正如列宁所教导的，我们相信，卢森堡的著作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教育我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这部文选分两卷出版。上卷包括1893—1904年期间的著作；下卷包括1905—1919年期间的著作。卢森堡的重要经济理论著作《资本积累》和《国民经济学入门》已有中译文，而且篇幅较大，我们均未收入。书信也未收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是根据1899年《莱比锡人民报》出版的文本（第一版）翻译的。1908年作者根据新的情况对第一版作了修改，出了一个新版本（第二版）。1958年我国三联书店出版的徐坚的译本是根据二版的重印本翻译的。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参考了他的译文。一版和二版的不同之处在脚注中均有说明。每卷卷末附有人名索引。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列宁斯大林

1983年12月

# 目 录

前 言	1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向 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所 作的报告	1
(1893年8月)	
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流	11
(1896年4、5月)	
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	36
(1898年10月2日)	
在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41
(1898年10月3、4日)	
党代表大会的回顾(摘录)	47
(1898年10月11日)	
一次胜利的代价	52
(1898年12月19日)	
亚当·密茨凯维支	59
(1898年12月24日)	
世界政策中的变动	66
(1899年3月13日)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70
(1898年9月—1899年4月)	

英国眼镜·····	171
(1899年5月9、10日)	
一个策略问题·····	183
(1899年7月6日)	
烂核桃·····	187
(1899年7月22日)	
致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摘录)·····	194
(1899年9月14、15、16日)	
我们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	212
(1899年9月22日)	
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217
(1899年10月11、12日)	
德雷福斯案件和米勒兰事件·····	224
——对一次“国际性征询”的答复	
(1899年)	
世界政策的成果·····	229
(1900年1月25日)	
回到亚当·斯密去!·····	232
(1900年5月)	
站在工人背后的“德意志科学”·····	243
(1900年9月)	
在190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兹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269
(1900年9月17日)	
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关于 军国主义问题的发言·····	273
(1900年9月27日)	

法国的社会主义危机 .....	279
(1901年1—2月)	
巴登的预算表决 .....	351
(1901年4月)	
关于《新时代》的政治态度 .....	361
(1901年8月)	
我们的导师的遗著 .....	364
(1901年9月17日)	
三论比利时的试验 .....	378
(1902年5月)	
我们的导师的遗著 .....	399
(1902年11月9日)	
纪念“无产阶级” .....	413
(1903年)	
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 .....	471
(1903年3月)	
卡尔·马克思 .....	478
(1903年3月)	
破灭了的希望 .....	488
(1903年10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	498
(1904年7月)	
人名索引 .....	519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  
《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  
向 1893 年苏黎世第三次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所作的报告\*

(1893年 8 月)

同志们！来自波兰的被俄国征服的那一部分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次。

华沙和罗兹的工人是从实行政治专制主义的黑暗国家和顽固的反动堡垒派遣他们的代表（同时也是我们的代表）参加这个两大陆的工人议会的。

我们向你们表示我们的兄弟般的祝贺并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在我们这里也已扎根。尽管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使用残暴的警察力量对我们进行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这面红旗已经成为波兰工人群众进行解放斗争的指路明灯。当你们在西方取得节节胜利之时，我们坚持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在东方同俄国的专制主义、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和最强大的堡垒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完全不同的政治情况迫使我们采取另一种斗争形式。我们不得不在秘密状态之下坚持不懈地进行我们

---

\* 这是罗莎·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给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编者注

的工作。我们的自由和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因此我们不能象你们那样完全放手地进行活动，目前只有在象五一节的那种个别情况下才能采取和你们相同的斗争方式。不言而喻，甚至这一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也必须有所不同。因此，你们在你们的重要和富有成果的讨论中，就是说，在你们考虑使两大陆的无产阶级达到崇高目的、即取得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的方法和道路时作出的那些决议，只有少数是适合我们情况的。

所谓会议波兰<sup>①</sup>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有十五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一运动直到四年以前都不能称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sup>②</sup>。革命的“无产阶级党”<sup>③</sup>的伟大功绩是它代表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派别并把它们联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领导这个运动直至1889年。它虽然在形式上承认《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一般原则，但是要把这些原则运用到政治情况和西欧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的新的条件之下，那的确是不容易的。这个党没有能够解决这个任务。不过同时应当看到，俄国的革命政党“民意党”的英勇斗争必然会对我们的运动产生影响。要知道，革命者同有着无限权力的独裁者的这一英勇无畏的决战，已经使整个欧洲感到十分钦佩，并且使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希望。因此，如果说波兰社会党从同俄国革命者共同进行斗争这一正确的观点出发，从而使自己深受那个党的影响，这是不足为奇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党”

---

① 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波兰王国被称为会议波兰。它一直存在到1915年，实行合一君主制，俄国沙皇也就是波兰国王。——编者注

② 1889年，社会民主党人尤利安·马赫列夫斯基和约·莱德尔在华沙建立了波兰工人联盟。1893年，这一联盟同“第二无产阶级党”的一部分一同建立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③ 1882年路德维希·瓦梭斯基建立了波兰王国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工人党，这个党被称为“第一无产阶级党”或“大无产阶级党”。1886年被镇压。

1888年马尔钦·卡斯普莎克建立了“第二无产阶级党”或称“小无产阶级党”，该党的活动至1893年为止。——编者注



的实际行动和策略同正式的纲领发生了矛盾，表现出空想的、密谋的布朗基主义。

那时的革命者认为，推翻沙皇制度是与社会革命同时发生的。那时的革命者正如他们的兄弟党“民意党”一样曾经确信，只要有一批坚决的、机警的和目标明确的密谋家，就能进行这种革命。只要求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在关键时刻发挥支持社会主义密谋家的作用。

与这一前提相应，党的鼓动工作几乎只是为了这一目的，即通过宣言和恐怖行动来激发人们的革命感情，至于提高现制度下工人群众的精神和物质水平的问题，那是很少或者根本不予考虑的。各国的工人党都把可以从当前国家夺取到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暂时让步看作最近目标，而这个党却完全没有这样做。它只限于争取某些个人，——这件事大大有助于后来的社会民主党顺利开展鼓动工作——另一方面就是激起群众对暴政和现存社会制度的仇恨。由于它处在一个专制的国家，它致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直接进行一次社会革命。这个党曾经不得不多次支持群众中自发出现的、争取经济或政治目标的骚动，尽管这些是与它的整个活动的性质相矛盾的。它也曾参加1890年的五一节活动。

但是，为了发挥它应有的重要作用并且真正体现工人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须最终同布朗基主义的传统决裂而立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基础之上。社会党人这一观点和策略上的转变是从1889年开始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种独立的社会民主运动。人们终于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于目标明确地领导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还看到，为了劳动阶级的日常利益而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斗争、为了民主政体而进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在有能力推翻现存社会以前非进不可的学校。新的组织在进行活动时始终坚持了这种

观点。

我们这里的社会民主党象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一样，曾经努力培养工人阶级当中最优秀和最有活动能力的分子，并使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但是它在这样做时的着眼点不是要造就即将发生的革命的领导人，而是要培养目标明确的鼓动家和带领工人阶级完成自己的一切任务和进行一切斗争的领袖。

波兰工人受到的剥削极为严重，物质状况恶劣，还必然会使他们不顾一切地进行经济斗争；社会民主党人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为这一斗争制定统一的计划，提供一个组织，并且努力使这一斗争具有明确的目标。

最近三年大约举行了三十次罢工，这些罢工涉及的工厂几乎都一样多。<sup>①</sup> 这些罢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本上成功的，这都是社会民主组织积极领导的结果。这个数字在西欧几乎不值一提，但在我们这里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的罢工同任何地方的罢工比起来都更加是唤醒漠不关心的群众并吸引他们去进行反抗的一个卓越手段。这是我们的第一批实际成果，它们明确无误地证实了互相声援的阶级觉悟的意义，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原则对立，揭示了政府的阶级性质，指出了同资产阶级和政府作斗争的绝对必要性。为了掌握和顺利地进行这场斗争，社会民主党必须创立相应的组织。于是职业工会建立起来了，它们追求直接的经济好处，但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宣传提供了可靠的基地。为了同样的目的还设立了图书馆和读书会。

在我们的两个主要工业中心，设立了一些有几百工人参加的

---

<sup>①</sup> 从1890年5月1日起，罢工运动规模日益扩大，华沙的金属加工和化学工业、罗兹的纺织工业、栋布罗瓦的煤炭和冶金工业以及齐拉尔多夫的织造业等等的大多数部门都参加了罢工。1892年5月5日约有8万罢工者参加了罗兹暴动，使罢工运动达到了高潮。——编者注

正规的罢工储金会。这些储金会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直接着眼于工人的日常物质利益，因此受到了最广大的阶层的拥护，而且单是它们的行政管理工作就使它们的成员持续不断地行动起来，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了进行社会主义鼓动的极好的联络点。

社会民主党以这样的方式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实际领袖，在广大群众中赢得了声望和信任。

工人采取的这种坚决态度迫使资产阶级和政府作出了某些让步；在有些地方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工作日缩短了，而政府不得不承担起劳动保护者的任务，监督极其必需的劳工保护立法的实施，从而至少消除某些地方的触目惊心的弊病；工厂视察的范围和视察人员的数目扩大了。当然，在这里也象在实行“来自上面的社会政策”的所有国家一样，主要是装饰门面，并没有采取什么彻底的措施。

由于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态度，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这一劳工保护政策一方面装模作样，为无产阶级提供微不足道的治标条件，其中大部分还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企图用粗暴的警察拳头把被剥削阶级任何独立的斗争镇压下去。根据特别的法令，罢工是被禁止的，倘若罢工还是发生了，那么警察和军队就准备前去镇压。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储金会同样是被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参加者就要被判处几年徒刑。这类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对于工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实际教训，说明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是正确的。因为任何这样的事实都十分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是个栅栏，它阻止劳动阶级的现状得到任何改善，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意图来说它同样也是个障碍。无产阶级的一切努力都必须用来冲毁这一栅栏，应当调动一切力量向沙皇政府争得一个民主的宪法。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口

号，即政治斗争，为劳动人民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斗争，在五一节那一天发出了最响亮的声音。

五一节对于我们这里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890年，就有上万工人，主要是华沙的工人，同全世界的工人一道参加了庆祝活动。最近几年，人数已经增加到两万五千到三万人，除了华沙之外，齐拉尔多夫和罗兹两个工业中心的工人也参加了庆祝活动。1892年五一节，仅仅罗兹就有八万工人停止工作，由于警察进行挑衅，节日以流血告终，以致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关注。也是在这一年，虽然党由于许多党员被逮捕而遭到严重损失，虽然政府采取狡猾的严厉控制办法和进行特务活动，还是有几千人举起了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旗帜；只是由于在几个工厂城布置了大量兵力才得以“保持平静”。

五一节的性质和意义，在我们这里和在奥地利是最为接近的；但是五一节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层更加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公开举行群众示威的唯一机会。五一节震动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使他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由于我们的处境，这件事在我们这里无法采取停工以外的其他形式。只有采取这种具体的、引人注目的示威方式，才能鼓舞人心和产生影响；它和在奥地利一样，具有一种政治示威的性质。在完全缺乏政治自由和权利的情况下，这一示威既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又提出了普选权、集会权和结社权以及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的要求。所有在这一事件中刊印的宣传材料都包括了这些要求。最后还有一点，五一节成为使我们的群众明显地看到国际声援的唯一的具體形式，它几乎是能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感到自己是强大的国际工人大军的一员并以这种身分进行活动的唯一机会。

最近四年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情况就是这样的。它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为依据，始终不渝地追求它的目标；为了实现每

一个步骤，它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有几百名同志失去了自由；在四次五一节中，有两次象在富尔米<sup>①</sup>一样，是以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而告终的。1891年，工人们象各处一样平静地严肃地举行庆祝活动，军队仍袭击了他们并且挑起一场流血斗争。去年，罗兹有八万工人同残暴的士兵正式地打了一仗，这也是由警察方面的挑衅引起的。战士队伍中几乎每一天都有同志被捕；华沙的“城堡”关进那么多的犯人，经常有人满之患。尽管要付出这样的牺牲，斗争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最近，社会民主党在国外出版了工人杂志《工人事业》，它为这场斗争提供了新的武器。

波兰王国的工人运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现象。我们的资产阶级缺乏任何历史传统，只知道拚命追求利润，而且为了争取政府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寡廉鲜耻地放弃了一切爱国的和政治的意图。由于俄国的销售市场能使资产阶级把它从波兰工人那里掠夺来的剩余价值变成现金，资产阶级就成了“王位和祭坛”的忠实支柱。它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面存在的。波兰的小资产阶级还在很早以前就具有了爱国的革命传统。它的利益同由于波兰与俄国结成政治联盟面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处于对立地位，所以它充满爱国情绪，并且渴望实现波兰的独立。但是，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一样不能独立进行活动。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唯一的采取对抗行动的成分。当然，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任何一件对抗活动也在努力争取工人阶级成为它的体现者。我们的在社会领域不自觉地代表小资产阶级理想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也在努力把工人运动导向爱国的航道。因此，最近几年这些“知识分子”进行过一些尝

---

<sup>①</sup> 富尔米是法国的一个小城市。1891年5月1日，军队在这里向游行示威者开枪打死十人，其中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和一个姑娘，打伤三十六人。——编者注

试，试图把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揉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合题。今年，他们作了第一次实际的尝试，硬要使五一节具有半爱国主义的性质，但是这一尝试在遇到社会民主党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后失败了。

爱国的方向，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的理想，都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争取过去。从前的波兰王国的三个部分的社会经济历史，已经使这几部分同三个进行吞并的大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使每一个部分具有了特殊的意图和政治利益。在世界市场商品持续过剩的情况下，今天会议波兰的大工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只是依靠它同俄国在政治上的共存，由这一共存产生了两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总的说来，俄国政府还在不断促进波兰的工业，这部分地是为了争取资本家阶级以促进俄罗斯化，部分地是为了俄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它就是通过这一阴险的政策使两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得到加强。鉴于这一经济联系符合资本主义的不可抗拒的逻辑，因此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波兰国家的意图是缺乏任何现实基础的。面对这一事实，爱国主义就成了这样一个纲领，它以制定者的主观愿望为根据，并且把发生一场欧洲战争的种种无法预料的偶然性作为实现的手段。我们的爱国者指望获得欧洲民主派的支持，但是这一支持尽管具有巨大的道义价值，却无法弥补纲领的贫乏的物质基础。

根据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的纲领是无法开展适应无产阶级需要的政治活动的，因为这个纲领没有考虑实际情况。这三个波兰国家，其中的一个享有相对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普选权；第二个享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政治权利，普选权却还有待争取；第三个完全处于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因此这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制定共同的最低政治纲领在今天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工人政党的政治活动

总是要与现存政治形式相适应的。如果今天把那个纲领当作一个政治纲领，这就等于打算放弃任何政治活动。但是工人阶级必须进行这样的政治活动，只有提出现实的要求才能争取工人阶级，也就是说，要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些要求由于有真正的、迫切的和重大的需要在今天就会引起一场实际斗争。今天对于加里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和整个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共同进行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是这样一种以现实情况为依据的政治行动。对于波森和西里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个政治纲领就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共同行动。对于俄属波兰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一纲领就是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情况相适应的、也是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口号：推翻专制制度。这一纲领既是从他们的日常经济斗争的需要产生的，也是从他们的整个社会主义意图产生的。同时，这一纲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一面把争取那些最能符合它的局部利益的政治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同时又不致受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的影响。最后，这一纲领引导工人阶级通过笔直的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使他们接近这样的时刻：随着一切压迫的彻底消除，对波兰民族的征服也将被彻底战胜，一切文化压迫的基础也将丧失。

要实现以推翻沙皇制度为最近政治任务的纲领，不能指望欧洲政治中的偶然性变化，这个纲领也不是依靠个别[人物]和没落阶级的愿望和理想而存在的。不如说，这个纲领是由这样的客观历史过程造成的：这个过程使宗法式的农民经济瓦解并从而使沙皇制度的物质条件遭到破坏，它同时又使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从而造成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

我们的工人阶级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力图争取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具有这样崇高的自觉性；他们是在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发挥作用，他们通过夺取欧洲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堡垒将

有效地促使伟大目标的实现，这些目标在今天正在用一种思想和一种感情使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同志团结起来。

发表于《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就 1889—1893 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运动的状况和过程向 1893 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没有注明出版地点和年代。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 年柏林德文版第 1 卷第 1 册第 5—13 页。

（唐春华译 殷叙彝校）



# 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 运动的新潮流

(1896年4、5月)

## 一

近年来,在所谓波兰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很有意义的转变,凡是注意观察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社会主义世界对波兰渴望自由的意图的关注,由来很久,几乎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一样长久。早在1848年,在西欧各个资产阶级政党表现出对波兰问题十分关心以后,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把波兰独立列为他们对外政策的一项要求。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把有关波兰问题的口号列入自己的对外纲领,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民族掠夺政策和民族压迫的抗议,首先是对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抗议,那时俄国是反动势力中唯一的一块坚硬的岩石,它准备扼杀欧洲的任何革命运动。但是,在立即进行一次革命的希望长时间无法实现以后,重建波兰的口号也就不那么实际了;要想使这一口号有可能得到实现,主要得依靠欧洲政治的有利转变,依靠欧洲发生一场战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资产阶级国家在国际政策方面的合作在今天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势力范围以外的。

波兰本身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在八十年代初才开始的。但

是，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对重建波兰的要求漠不关心，而且简直是敌视这一要求的；要在这里来探讨其理由，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既是针对俄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也是针对普属波兰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而言的，因为那里早在1890年以前就存在工人运动了。撇开同工人运动无关的一个国外的社会主义团体即《觉醒》<sup>①</sup>不谈，波兰的独立过去只是在一个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派别（它在波兰被称为爱国派）的纲领中存在过，——请注意，“爱国的”一词的含义不是西欧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不是指的个人对祖国的爱，而是指的一个旨在重建波兰国家的明确的政治纲领。至于这一派别和波兰本土的工人运动的关系，可以简练地用“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爱国主义！”这句话来说明。

当德国和奥地利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波兰运动<sup>②</sup>时，情况大体上没有改变。1890年，这一运动刚一出现，加里西亚的和德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就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站在完全一致的政治立场上。共同的纲领，——在德国是爱尔福特纲领，在奥国是哈因费尔德纲领——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策略，这就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关于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特殊政治任务，例如关于波兰的独立问题，是谈不到的。

当然，很快就明显地看出，有些迹象越来越严重了，这些迹象

---

① 指波兰流亡者的组织民族社会主义协会于1889—1893年在巴黎出版的《觉醒》杂志的拥护者。——编者注

②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倡议下，于1890年12月在柏林建立了波兰社会主义者联盟。1893年9月，在弗兰齐舍克·莫拉夫斯基和弗兰齐舍克·麦尔柯夫斯基的领导下，它和其他波兰社会主义团体一同组成了波兰普鲁上部分的波兰社会党，直到1903年，这个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自治的组成部分。

1892年1月在利沃夫举行了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伊格纳茨·达申斯基和扎穆伊尔·哈伊克尔等的领导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作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部分的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是能够使明确的关系因民族主义倾向而变得模糊和混乱起来的。

1891年，在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波兰代表脱离他们在各国的政治上的战友，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波兰代表团，他们对这一点的论证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结合在一起“是为了波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策”。

1892年，加里西亚社会主义者在维也纳党代表大会上认为有必要对刚刚通过投票而且也得到他们赞同的党的组织采取保留态度，他们宣布，鉴于他们邦的特殊情况以及他们对生活在奥地利以外的同胞的义务，他们同整个组织的联系不能象章程所要求的那样紧密。

1893年，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终于退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联合成一个单独的波兰社会党。他们自己宣布，他们之所以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是因为第一，要驳斥由于他们隶属于德国党而遭受的来自波兰资产阶级方面的那些诽谤，第二，要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反对政府的日尔曼化意图的言论自由。

但是，尽管如此，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态度，就其本质来说，仍然同过去一样。人们对于波兰党的上述行动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可以认为这一行动的理由是能够成立或站不住脚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一行动是出于纯粹实际的、从属性质的考虑，并没有触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即政治纲领。只要社会主义者根据一个共同纲领在同样的政治形势下进行活动，即使他们结合成不同的党组织，他们在活动中也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他们是一个唯一的整体。

但是，加里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却仍然是奥地利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个政治纲领。前者在他们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对共同的哈因费尔德纲领作丝毫改变，后者在科伦党代表大会<sup>①</sup>上由他们的代表尼库尔斯基宣布，虽然他们有

单独的组织，他们还是遵循爱尔福特纲领。在他们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1894年圣诞节在布勒斯劳举行），他们又放弃了由建党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纲领修正案，从而保留了纲领的本来面貌。

只是在最近，波兰才愈来愈明显地出现这样一种倾向：把原来的“爱国的”纲领直接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可以完全正确地把这称作社会爱国主义的倾向，人们第一次是在1893年知道有这一倾向的，它的表现形式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纲领草案（见伦敦出版的波兰杂志《黎明》1893年5月号）。但是在1895年7月，在伦敦出版了一家法文小报《波兰社会党公报》，它就已经断然宣布，加里西亚和德属波兰的党力图重建波兰。这个公报正是根据这两个党与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上完全不同这一情况回过头来说明最近几年加里西亚和德属波兰社会主义者的行动方式的：前者在1892年维也纳党代表大会上的保留态度，后者的单独组织等等。

毫无疑问，公报的武断的论点和说明是与事实——至少在形式上看——不符的，因为上述二党从来没有透露它们通过了一个崭新的纲领，甚至也没有在它们的代表大会——在这些问题上唯一有权处理的机构——上讨论过这个题目。有时它们发表过一些言论，有些模模糊糊地暗示它们有意重建波兰，但是很明显，在讨论它们是否通过一个新的党纲这一问题时，是不能把这些言论考虑在内的。

但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当前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存在这样一些倾向：它们暂时隐蔽地发展着，在一定情况下有可能使上述各党的纲领出现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正是现在伦敦公报明确表述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倾向使人们可以用崭

① 指1893年10月22—28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编者注

新的眼光来看波兰运动中以前的那些迹象，如德国的单独的波兰组织、加里西亚社会主义者的保留态度以及类似情况，那时是以十分次要的实际考虑为理由来解释这些迹象的，它们在党的报刊上始终很少引人注目。现在人们至少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似乎并不重要的迹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向的目标，同样也可以推测出把这些不同的、表面上没有联系的步骤联结起来的内在过程。

鉴于一部分波兰社会主义者的这一脱毛过程，波兰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必须用一种崭新的观点来观察它。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世界以前对波兰独立的关注是根本不必加以考虑的。在那一情况下，波兰独立只是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一个要求，现在这个问题要成为对内政策的纲领，即一部分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纲领，因此就具有一种纯粹实际的性质了。迄今一直认为，在解决波兰问题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事情是欧洲的外交——从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说，除了对这个期待中的解决办法表示它的关注以外，暂时还没有很多工作可做。现在却认为，波兰的独立要由波兰的无产阶级本身，由它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是指的通过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通过解放一切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使波兰作为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是指的在现行制度的范围内使波兰作为国家实现独立，就是说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波兰的无产阶级要把建立这一国家作为自己进行阶级斗争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正如奥地利的无产阶级要争取普选权，比利时的无产阶级要废除复数选举制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已不再是同情，而是这样了：一方面是利益问题即阶级利益，另一方面是取得成就的可能性，也就是解决任务的物质力量。

因此，对这一任务作崭新的论证也就是必要的了。过去对波兰从国际法上说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另一方面需要一道保护

墙来抵挡尼古拉一世的俄国。从推动国际无产阶级把波兰问题的口号列入自己的对外纲领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但是，从使波兰的无产阶级把这一口号列入直接实践的纲领来说，这些理由就不再是充分的了。在这里，也对社会民主党纲领中一切其他要求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所有那些思想观点都应适当地加以考虑。这就是说，首先要考虑这一要求同各个波兰国家的客观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以及同这一发展本身为无产阶级解决它的任务所提供的那些物质手段的关系。这些思想观点是唯一能够决定重建波兰是否真正符合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波兰无产阶级是否能够实现这种愿望的。波兰的报刊，还有法文的公报第一号，都多次为这一新的倾向进行论证，我们在这里无法详细探讨这些论据。只要十分笼统地指出这一论证纯粹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并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方法毫无共同之处，这就够了。对于俄属波兰来说，这一论证的立足点是把两个不存在的宪法——可能出现的独立波兰的宪法和未来的俄国的宪法——拿来对比，同时承认前者居优先地位。但是对加里西亚和普属波兰来说，关于必须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重建波兰这一点的论证是：据说这两个国家充斥着德国资本，这使身受异国资本剥削的波兰工人有“倾向于采取一种纯粹民族主义反对派的非无产阶级政策”的危险<sup>①</sup>。接受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会消除这一民族主义的危险。由此可见，在第一种情况下，用来论证整个纲领的是一种预见，在第二种情况下，却是一种担心。这类不是从实际的社会发展产生，而只是凭空捏造并且硬加在波兰无产阶级身上的“阶级利益”当然完全是一种虚构，它使实质上民族主义的纲领只是十分勉强地以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纲领的面貌出现。

---

<sup>①</sup> 公报第1号第3页。——卢森堡注

但是，即使我们不同意对纲领的这一论证，我们却要对这个问题的两个在实践上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个纲领的实现可能性以及波兰社会主义者接受这个纲领以后在鼓动中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作比较详细的探讨。

## 二

只要把波兰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概括起来，就能大致描绘出波兰社会状况的图景，这一图景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使人得出结论说，通过波兰无产阶级的行动来重建一个波兰的阶级国家是无法实现的。社会爱国者自己这样说：“波兰的贵族、波兰的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感到在狗窝里很舒服，并且开始发誓要抛弃起义的旗帜了。”<sup>①</sup>就以下这一点来说他们也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只是确认了波兰三个部分的统治阶级都忠于政府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可惜他们并没有从这一十分正确的观察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资产阶级的政治表现在这里同往常一样，是完全如实地反映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把波兰统治阶级在所有三个吞并国家中忠于政府的那一政治现象还原成他们的物质利益而表述出来，那么我们便会得出这一无可怀疑的结论：重建波兰是不可能符合它的经济发展的利益的，而波兰资产阶级正是这一发展的体现者。

例如在德国，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很早就已支持政治统一。政治统一在德国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生存条件，而且在小国分立的基础上就已经通过关税同盟为此作了准备。波兰的当前情

---

<sup>①</sup> 公报第1号第4页。——卢森堡注

况就完全不同了。波兰三个部分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它们的经济生活来说几乎是用不着加以考虑的。与此相反，波兰每个部分和与它们有关的吞并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支配着前者的整个经济，因为它已经采取现代形式了。波兰资产阶级所热中的确实也根本不是重新把波兰联合起来，而仅仅是从经济上利用由于他们从属于吞并国家而产生的那些有利条件，如俄国的广大劳动市场和保护关税政策、德国的谷物市场，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等对原料的经常需求。俄属波兰是一个拥有大工业的地区，而在加里西亚和普属波兰大土地所有者却是举足轻重的统治阶级，这一情况当然在很多方面使后者和前者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同的形式，尽管如此，所有三个波兰国家在这里涉及的决定性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加里西亚和普属波兰的容克完全象俄属波兰的大资产者一样坚决地依附于吞并国家。由此可见，如果说在德国分裂的各邦之间起作用的是经济的吸引力即所谓资本主义的向心趋势，那么波兰的经济发展恰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或者确切些说，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使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趋向同有关的吞并国家融合在一起。这一合并过程在俄属波兰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波兰的其他部分也在顺应这样的过程，虽然是很缓慢的。因此，重建波兰远远不是它的社会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直接与这一结果相矛盾的。

从上面谈到的情况已经可以看出，通过波兰无产阶级的力量来争取波兰的独立是一项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曾经承担过的任务都更加困难的任务。这里涉及的已不再是争取一定的、哪怕是很广泛的政治让步，例如俄国的宪法或者奥地利的普选权（这些让步根本不是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相矛盾的），而是相反，本身就是这一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爱国者却不是这样，他们提出来让我们的无产阶级解决的问题要困难得多。迄今



是有产阶级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建立新的国家组织，而且是把人民的各个阶级当作不自觉的工具加以利用的，而在这里却要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本身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不仅如此，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还应当违背有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强行把拚命反对移植的那些资产阶级，确切些说，他们的三个资产阶级移植到新的阶级国家，他们在这样做时也就粗暴地扭转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的既定发展方向。这就是说，为了争取波兰的独立，无产阶级不仅必须击败欧洲三个最强大的政府的暴力，而且必须强大到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也足以战胜它们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虽然无产阶级的地位是被奴役阶级的地位，但它必须取得一个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且利用它的这种统治地位，通过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有意识地重新制造一个今后压迫它的工具。

在简单地表述这个问题时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旦波兰的无产阶级已经能在尽管存在吞并国家的政府和波兰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实现重建波兰，那么他们也就能够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前面一项任务所要求的力量和阶级觉悟的程度对于完成后面那项任务来说，无疑是足够的，何况在后一情况下仅仅需要利用经济的发展，在前一情况下却必须打断这一发展。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已经就一个相似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关于发生战争时举行总罢工的争论中（这些涉及的问题要简单得多，仅仅是消极地反抗资产阶级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几次国际代表大会所发表的意见是，无产阶级在现行制度的范围内是无法使阶级国家的那些最重要的职能陷于瘫痪的。但是，如果说无产阶级根本无法阻止统治阶级进行战争并且随之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那么，他们显然更加无法违背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由自己来建立新的国家，并使现在的国家四分五裂了。因此，社会爱国者的这个纲领，无论从它实现的可能性的角度来看，无论从它的理论上的构思来看，都同样是

空想的。

### 三

一个纲领站不住脚并且在实践中无法贯彻，这并不排除在有些情况下不能至少暂时接受它。因此，在叙述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特点时，也还应当指出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活动由于接受这个纲领而必须作出的那些改变。我们说“必须”，是因为他们没有从这一方面——对这一方面加以考虑是很重要的——未考虑他们迄今的活动。迄今加里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既没有接受这一要求，也没有在鼓动中给予这一要求以某种重要的地位。上述那些倾向至多有时以一些动摇和不彻底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迄今参加选举鼓动和加里西亚的党为普选权而积极进行斗争，显然只是考虑到他们的与德国和奥地利同志共同的纲领，绝不能认为这是把波兰独立的要求付诸实践。但是，在讨论这一要求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的时候，我们绝不打算充当预言家。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只是从这一纲领本身的特征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且在每走一步时都根据已有的事实材料检验我们的结论。

主要的是，如果我们在事实上接受这一要求，这就会反过来影响组织关系。一旦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为自己制定出一个单独的政治纲领，他们就不可能隶属于整个德国和奥地利的党了。拥护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人是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例如他们援引德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建立的单独组织为例，认为这正是接受重建波兰这一要求的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和一个直接的后果，虽然这种判断事实上是与那里的社会主义者的声明相矛盾的。1892年加里西亚的同志对同奥地利的党实行组织联合所采取的保留态度，社

会爱国者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加以说明的<sup>①</sup>。

这就是说，纲领上的差别必然要使波兰社会主义者脱离德国的和奥地利的组织，一个共同的波兰纲领同样也自然会使波兰的所有三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者必然趋向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波兰党。而且后面这个结论已经得到一些事实的证明。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波兰代表组成一个单独的民族代表团，它代表一个虚构的全国性的波兰党，而且本着国际声援的精神同德国的和奥地利的波兰党进行交往。他们在这样做时忘记了，在社会主义代表们组合成“民族代表团”时，“民族”一词是按照与“国家”同样的含义来使用的，社会主义代表团并不应当代表过去的或者未来的国家，而只应当代表当前的国家。这个被引用的伦敦公报也企图给人以它是共同的统一的波兰党的机关报的印象。

由此可见，同样政治情况下的不同政党的形成和在三种不同

---

① 公报第1号第4页写道：“我们在波兰这两个部分（加里西亚和普属波兰）的朋友们要公开表现他们的分立主义倾向就不可能不冒被判叛国重罪的危险。但是他们已通过以下行动充分表示了这些倾向——至少对于他们对之讲话的那些人来说是这样的：波兰无产阶级在1893年奥地利的党代表大会上对组织问题采取保留态度；在德国建立了一个波兰社会党，它是自主的并且仅仅同德国的党实行联合（？），而不象原来那样仅仅是德国党的一个部分，它的代表在科伦党代表大会也发表了声明”。至于专门谈到后者的问题，波兰代表尼库尔斯基在科伦代表大会上只是指出他的党打算致力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波兰独立。这番话只能意味着通过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使波兰民族得到解放，绝不可能意味着这是一个直接的政治纲领。尼库尔斯基还同时宣布，波兰的党坚持爱尔福特纲领，这就证实了上面的看法。伦敦的社会爱国主义杂志《黎明》编辑部认为波兰代表尼库尔斯基的这个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发言是不正确的（我们是从该杂志的1893年第11期引用这个发言的。在德文的科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上只是摘要刊登了这一发言）。但是对我们来说，这里的问题不是这一或者那编辑部的意见，而是这个代表实际上认为应当宣布的是什么，而且首先是这样的事实：这个代表所作的发言既没有得到有权限方面的纠正，也不会得到他们的纠正，因为德国的波兰同志在他们的代表会议上既没有拒绝爱尔福特纲领，也没有通过任何一个其他的纲领。因此公报的断言也是与事实相矛盾的。——卢森堡注

情况下的一个统一政党的形成，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党派声援和同一个国家的同志之间的国际声援，这些似乎就是接受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最近的实际后果。

单是这一后果就排除了进行任何有益的政治活动的可能性。

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本来在于使国家机器民主化并且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利用这一机器，所以这个斗争就其目的和任务来说显然要与各个国家当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当前，波兰的无产阶级虽然有着共同的民族性，但实际上他们是生活在具有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的三个不同国家。波兰无产阶级的共同的政治制度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当前需要进行的政治斗争只能考虑当前的情况，因此，它在这方而必须提出三个不同的纲领，并且由三个不同的斗争组织来加以贯彻。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当前能够在共同的政治纲领下把所有三个国家的波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么显然这个纲领是不能适应其中任何一个党的，这就是说，它必须干脆无视所有三个国家的政治局势。这就同人们打算以一个共同的纲领把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整个无产阶级联合在一个统一的党中完全一样。这样一种做法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建立一个总的波兰党的计划究竟在哪一点上与这种做法有区别呢？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共同的民族因素，可是对于纲领的共同性来说这个因素是根本不必加以考虑的。

但是，如果说纲领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相适应，无视这种形势，那么制定纲领的人就必须在思想上对他们自己也会被活生生的现实所忽视这一情况作好准备。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无产阶级制定一个共同的纲领也只能使所有三个国家的波兰运动一头扎进一条共同的绝路。

确实如此。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在与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同样的政治条件下行动，却必须提出与这两个党不同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要求，即重建波兰。为了使波兰工人容易听得进这一要求，不言而喻，他们必须把波兰无产阶级的地位与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不同特点作为他们进行鼓动的出发点，努力在前者 and 后者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但是，波兰工人的阶级地位与德国和奥地利其他无产者的阶级地位毫无不同之处，因此无法在这一方面划出这条分界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突出唯一不同的东西，即**民族因素**。这样，他们将当然不得不努力常常用德国的波兰工人作为一个被征服民族的成员这一特殊地位来解释他们由于自己同德国工人的共同阶级地位而遭受的痛苦。因此，他们必须把民族压迫——这一压迫本身对于工人来说是次要的现象——抬高为主要问题。但是在奥地利，波兰人享受着民族自由，所以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直接诉诸民族的感情、诉诸历史的传统以及其他等等。

情况又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强大运动是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一切不以其民族性为转移的阶级需要的表现，鉴于这种情况，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能够坚持他们有权利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纲领的单独的党而存在，当然将不得不愈来愈明确地强调民族因素。由此可见，党要进行自我维护，它有可能被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总的潮流吞没的危险，这种情况必然会迫使他们可以说要把自己的整个鼓动民族化。除了在隐蔽阶级立场的同时强调民族因素外，他们也必须给党的一切极其重要的行动（这些行动由于共同的情况对于波兰的和非波兰的无产阶级来说必然是共同的）打上—个特殊的民族印记。社会爱国者方面的确也已经在做后面那种事情了。社会爱国者本能地坚持他们所提出的纲领的精神，例如，把1893年国会选举时波森

和西里西亚的投给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解释为一次波兰的民族示威。他们说：“如此之多的选举人已经通过他们对波兰的、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的投票表明，他们今后既不想忍受德国的统治，也不想忍受本民族的贵族和黑帮的统治。”<sup>①</sup> 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他们把德国政府方面对于波兰工人运动的警察迫害更多地归咎于民族压迫，而不是归咎于德国政府的阶级政策，因为他们把这些迫害看作是“把德国的法律应用于被征服的省份”<sup>②</sup>。

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人最近的这次党代表大会（1895年9月28日和29日在新松奇举行）的一项决议就是对我们的结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明。因为决议中说，为了表示波兰所有三个部分的波兰无产阶级的统一，决定发出一份对所有这三个部分都适用的共同的宣言书，而且责成出版公报的伦敦小组来办理此事。<sup>③</sup> 这样，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我们上面得出的那些结论已经以非常简练的方式得到证实。

加里西亚的社会主义者企图使党的主要行动，即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波兰性质，并从而在这一主要行动中使自己同整个奥地利的党区别开来。他们企图今后使五一节的活动具有一种一般的波兰性质，即与三种十分不同的政治形势无关的那样一种性质，并从而突出共同的民族因素，使不同的政治因素退居次要地位。这对于奥地利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五一节在那里的确主要具有而且必须主要具有政治性质，而且由于那里

---

① 公报第1号第7页。用不着强调这只是任意作出的解释，因为1893年整个德国的选举鼓动的确是由德国党领导的，而且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出版物中只字未提重建波兰的问题。——卢森堡注

② 公报第1号第7页。——卢森堡注

③ 见《黎明》1895年第10和11号转载的加里西亚党的机关报《前进》的报道。并见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1896年1月12日第41号上的加里西亚通讯。——卢森堡注

的群众在政治上没有权利，五一节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但是，加里西亚代表会议决定进行的这样一种五一节鼓动活动在实践中可能表现为什么样子呢？在上述的五一节文件中，要不要象在整个奥地利那样号召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且首先是争取普选权呢？显然是用不着的，因为后面这一口号对于俄属波兰和普属波兰（那一文件也是针对它们的）来说根本没有意义。要不要号召重建波兰呢？但是这一来加里西亚党在奥地利采取的就会完全是一种分立主义的政治态度了。是否最后只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呢？那样做的话，五一节就会根本失去任何政治意义！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排除这样的情况，把该项文件写成只是分别为俄属、普属和奥属波兰提出三种不同政治要求的三个独立部分的简单综合，因为，如果给五一节文件堆上一些只对其他两个波兰国家具有意义的鼓动材料，那么就会增加加里西亚的五一节鼓动的困难，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不引起代表大会注意的。不仅如此，还专门要求这本小册子特别重视所有的波兰工人共同的民族因素，<sup>①</sup>这样就在同样的程度上使加里西亚的工人同奥地利的其他无产者的紧密团结退居次要地位，使他们的共同的政治斗争受到忽视。因此，分立主义和掩盖政治上的阶级立场，这始终是制定特殊的波兰纲领这一倾向的后果。

如果想把重建波兰的要求补充到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去，那么很明显，这样做既不能在原则上也不能在实践上造

---

<sup>①</sup> 见克拉科夫《前进》关于达申斯基讲话的报道：“波兰的无产阶级懂得对五一节的意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五一节对于他们还有这样一层意义：它把他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波兰的三个部分的波兰工人在这一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他们的共同属性。因此，五一节文件必须这样来编写：它向我们强调的恰恰是节日的这一方面，因此它对所有的波兰人来说也必然是共同的！”转载于伦敦的《黎明》杂志 1895 年第 10 和 11 号。又见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1896 年 1 月 12 日。——卢森堡注

成内部的统一。不如说，这始终将只是纯粹表面上的拼凑。

社会民主党纲领上的不同要求相互之间经常是有密切的内在关系的。任何一项要求的实现都激励无产阶级更加坚决地为其他要求进行斗争。同时为实现那些要求创造客观条件。与此相反，社会爱国主义的要求同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逐步实现，德国和奥地利从而也包括它们的波兰各省的运动的的发展和加强，只能使这些国家的重建波兰的运动削弱，决不会使它加强。随着那里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日益取得更大的成果，工人阶级本身的影响日益增加，波兰的工人就会感到，为使他们获得解放而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需要愈来愈小。

同样，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的加强很少能够为实现这一意图创造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增长最终导致在现行的国家建立他们的统治，而绝不会导致这一国家的四分五裂。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使无产阶级有力量把现行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加以扬弃，用社会主义社会来代替它，却绝不是使无产阶级有力量使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作为一个政治机体的现行国家分裂。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增长总是那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同时增长的反映，另一方面，后一增长又要产生这些后果：政治上的集中、国家各个部分的紧密结合、把各个部分互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纽带的加强和增多。无产阶级只能利用资本主义的这些引起集中化的后果，使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使统一的国家民主化，但是无产阶级无法抗拒那些后果，并且使国家的各个部分重新获得独立。我们可以事先这样说，奥地利如果争取到普选权，将会激励无产阶级大大加强他们的一切阶级意图，但是决不会同时促使奥地利国家走向崩溃，不如说会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在新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



因此，重建波兰的要求不能同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要求和活动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把这一要求吸收进共同的党纲，那么，这种做法就会使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活动中经常摇摆于民族主义立场、即所谓代表波兰无产阶级特殊利益的立场和各个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的阶级立场之间，使他们在一个方面的鼓动处于同另一方面的鼓动毫无内在联系的情况。

但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会把他们的活动重点放在哪一种立场上，是放在特殊的波兰民族利益的立场，还是放在共同的阶级利益的立场，这是不难猜到的。

我们已经看到，单是波兰社会主义者处在德国党和奥地利党旁边的地位已经一定会迫使他们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但是，不仅如此，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些特殊社会条件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鉴于在波森和加里西亚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几乎可以令人想起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情况，鉴于大工业的缺乏，社会主义者主要依靠从手工业者中间争取拥护者，这些拥护者受着小资产阶级，即举足轻重的城市阶级的强烈影响。但是，加里西亚和波森的小资产阶级是纯粹民族主义传统的最后的卫道者，尽管是无能为力的卫道者。既然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活动，并且以一种单独的民族纲领同德国和奥地利的整个运动区别开来，那么他们也就无法摆脱这一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一影响将日益使他们同德国和奥地利的党共同进行的阶级斗争疏远。

德国的波兰社会党作为它退出德国组织的理由之一是那些资产阶级爱国者就它属于整个德国组织一事进行的诬蔑，这一情况证明，上述最后的结论也已经不只是预言了。<sup>①</sup>因此，当前波兰的同志在德国的单独组织有一半是作为他们在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所作出的让步而出现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象加里西

亚党代表大会那个能够说明问题的决议所做的那样，用不着涉及由于接受社会爱国主义纲领而产生的最后的结果，甚至也用不着涉及它的最初的结果。我们暂时在这里只需要谈一谈在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内部起作用的那些倾向的一个表现。

如果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策略，那么，他们自然就会从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党变成一个跟着资产阶级的调子跳舞的党。

#### 四

这就是把重建波兰的要求列入纲领的实际后果。这个纲领无论就其构思还是就其实行可能性来说都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是完全空想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中还要归结为纯粹的民族主义，但非常奇特的是，纲领的判定者却力图给它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通过在任何情况下都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重建波兰思想所表示的同情就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特别频繁地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发表的这一意见：重建波兰是欧洲民主派反对俄国反动势力即将发动的侵略的一道防线。

但是我们认为，虽然社会爱国者津津乐道这一从前的意见，他们恰恰忽视了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固然不那么合他们的口味，对于这一问题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恩格斯已经以他惯用的那种透彻的方式指出，由于现在俄国军官力量不足，由于俄国士兵的思想特点和俄国官员的素质，尤其是由于它的整个经济、特别是财政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它绝对无法对欧洲进行侵

---

① 见尼库尔斯基在科伦代表大会的发言，载于伦敦《黎明》1893年第11号上的报道，另见苏黎世的《工人之声》1895年第5号由单独组织的一个拥护者所写的社论。——卢森堡注

略，甚至于连进行一场防御战争也不可能，而且它简直可以说是处在政治破产的前夜了。<sup>①</sup>因此，现在的俄国不再是尼古拉一世的俄国了，那时必须有一道人为的防线来挡住它入侵，在它国内也根本没有表现出什么发展因素。现在在它的内部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专制政府对它无法控制，而且如果政府不懂得及时地作出让步，那么，它就会遭到“象鸡窝被地震”<sup>②</sup>破坏那样的危险。

此外，社会爱国主义的拥护者也许首先还应指出，在今天存在全面的国际交往和一切国家经济上互相依存的情况下，在欧洲同俄国之间人为的分界线是否还能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法国的事例确实已表明，俄国反动势力的手伸得很长，它也能够越过若干中间国家去扩展它的影响。

连他们对未来的波兰民主制所寄予的希望原来也是一个还根本不存在的政治银行的支票。也许能掌管这个银行的人——波兰的有产阶级——完全有可能拒绝付款，而且甚至会象法兰西共和国那样死心塌地去充当“不共戴天的敌人”即俄国沙皇政府的同盟者。

所有这些打算和希望显然完全是空中楼阁。

无论如何，不管人们对这个问题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话里至多也只能推论出他们认为重建波兰是可以想望的。但是社会爱国者忘记了：不是所有值得想望的东西都因此也是能够实现的；不是所有就其本身来说能够实现的东西，专门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能够实现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

---

① 弗·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1893年纽伦堡德文版第18—23页。——卢森堡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7页。——编者注

任何其他人曾经首先教导工人阶级说，不要把单纯的愿望，不要把单纯的争取值得想望的东西的意志当作它的一切企图的动力，而是要把社会发展的实际的物质情况看作检验它的一切企图的试金石，唯有实际的物质情况才能够决定值得想望的东西是否也有可能实现，并且使有可能实现的东西也成为历史上必然的。但是毫无疑问，在社会爱国者如此频繁地引用可能重建波兰的那些说法时，无论如何他们是**没有考虑波兰的物质发展情况以及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的**。例如恩格斯说：“如果普鲁士（在同俄国的战争中——罗·卢·）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它将受到应得的惩罚。”<sup>①</sup>可见，这里说的不是波兰无产阶级，不是它的日常的阶级斗争，而是普鲁士、欧洲外交和战争。一切认为重建波兰对欧洲是必要的人，也期望从战争中得到这个结果。现在人们愿意对这些期望有什么想法就可以有什么想法，但是不管怎样，**以下几点是清楚的**。

**第一**，这些期望尽管也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说过的，但毕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甚至根本不是党的原则；如果人们想把关于重建波兰的这些说法变成某种社会主义教条，并从而把对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责任间接地转嫁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那么他们便恰恰要冒把马克思下面的话应用到自己身上的危险，这就是：“他们从来不以具有自己的思想为荣。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人的思想的本领，**他们把别人的思想奉为信条**，并且认为他们已经把这些思想连同词句都掌握了。”<sup>②</sup>

**第二**，只要战争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并且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

---

① 弗·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1893年纽伦堡德文版第20页。——卢森堡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6页。引文中的“他们”原为沙佩尔—维利希派；着重号是卢森堡加的。——编者注

的心愿，未来战争的结果就不能为社会主义纲领提供基础。对一场未来战争所抱的希望至多能够决定战争期间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策略，却绝不能决定他们的用于日常斗争的纲领，现在甚至连这一策略也无法决定，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战争的时刻和伴随而来的一切情况。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那些话根本不能也不应该被理解成对波兰无产阶级的实际的日常纲领的指点，因为这些话只涉及对外政策中的偶然情况，并不涉及波兰的内部阶级斗争和波兰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一般说来，那些话就其来源和特点来说，更多是属于那一美好时代的，那时“波兰人和革命者——至少在民族意义上说——是同义语”<sup>①</sup>，在波兰的一次起义和另一次起义<sup>②</sup>之间国家始终处于群情激愤之中。但是现在，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早已成为过去并被人遗忘了，因为从那时以来，在俄属波兰——波兰的心脏和所有的民族起义的策源地——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即农奴制已被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大工业正在发展。可见，波兰的社会关系也被颠倒过来了。1848年波兰的“革命者”——贵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一个新的角色——资产阶级——登上了舞台，现在他担任第一小提琴手，而且在那里演奏的不是民族歌曲《波兰还没有灭亡》，而是俄国的赞歌《上帝保佑我们的沙皇》。

---

① 恩格斯的原话是：“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9页。）——编者注

② 1860至1861年的农民暴动浪潮导致了1863年1月22日在波兰王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而于1863—1864年间遭到血腥镇压。——编者注

如果说，尽管如此，三十年来已经听不到的波兰起义的号角声突然在 1893 年响起来了，并且传到了拥护社会爱国主义的人的耳中，那么，这纯粹是他们的政治听感的幻觉造成的。这样的奇迹在真实的自然界是不会发生的。其实，任何一个波兰统治阶级现在都不会想到重建波兰。而波兰的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也正是只能跟着历史车轮前进，而不能使这个车轮倒转。

还要写几句。伦敦公报的出版者（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主张社会爱国主义的纲领，而且迫使加里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接受这个纲领，他们强调，这两个党在它们的纲领中十分明确地接受了重建波兰的要求，它们只是不能公开说出来，以免犯叛国罪。<sup>①</sup>因此，这些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可说是一种在政治上的隐花植物，它们既有它们的纲领，又没有它们的纲领——这要看情况而定——而且人们总是可以以它们的名义说自己想说的话，它们却不必为此提出抗议。当然，这是很狡猾的，但是，在重大事件上的狡猾行为已经使不少人送命，因为伪装在历史市场上是行不通的。现在对波兰运动最迫切的事情正是政治态度是否鲜明的问題。因为政策上的动摇不仅给各个波兰党的纲领，而且给它们的实际生活造成了不可救药的混乱情况。对于加里西亚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混乱情况是从最近的有关五一节的决议开始的。但是对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来说，混乱情况早在他们有了单独组织的时刻就开始出现了。正是他们同德国党的关系（他们从 1893 年以来一直还未能明确解决这一关系）为这一点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当波兰的同志独立组织一个党的时候，他们同时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他们的代表尼库尔斯基出席

---

<sup>①</sup> 我们在波兰这两个部分的朋友们要公开表现他们的分立主义倾向，就不可能不冒被判叛国重罪的危险。公报第 1 号第 4 页。——卢森堡注

了科伦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一项建议，其内容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责成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国会提出一项关于在德国的波兰省分实行言论自由的法律草案。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参加德国的党代表大会，这就表示他们必须同德国党保持紧密联系。但是波兰的同志在作出决定时似乎忘记了，如果他们既要退出一个党又要留在其中，或者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样的），他们向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派遣一个代表，他却不是这个党的成员，那是可不可能的。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sup>①</sup>上也就不再有波兰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了。在布勒斯劳代表大会<sup>②</sup>时他们又决定派遣一个同志参加，并作出关于波兰运动的报告，这个同志是否具有代表身分，这从决议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在后面那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上既没有看到波兰的报告，也没有看到本应代表波兰组织的那个同志，不管他是代表也好，还是来宾也好。况且，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可能派遣一个人作为自己组织的代表——不言而喻，这是与任何关于党组织的概念相矛盾的——也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个代表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波兰的同志认为德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他们也是有约束力的话，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退出德国党，从而放弃积极参与执行这些决议的权利，从而同时也拒绝接受德国党方面对自己的支持。但是，如果这些决议对他们不是权威性的，那么他们向德国党代表大会派遣代表的做法显然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形式罢了。

可见，德国的波兰同志明确地感到有必要同德国的运动联系起来，但是，正是上述的政治态度方面的动摇现在和将来都妨碍他

---

① 指 1894 年 10 月 21—27 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美因河畔）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指 1895 年 10 月 6—12 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布勒斯劳代表大会。——编者注

们在这方面发现（或者确切些说，重新发现）对他们同德国党的关系适合的组织形式。

加里西亚的社会主义者也很快就一定会陷于一种十分相似的处境。最近的这次奥地利的党代表大会<sup>①</sup>一致确认——这正是代表大会讨论中的基调——，鉴于即将进行的选举改革，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重要的政治任务无条件地要求它建立一个严密的集中制的组织和实行统一的政策。这就是说，党在政治权利方面所取得的第一项成就的最直接后果是党的集中化和统一化。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必然会还要加强这一趋势。整个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和发展同加里西亚组织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分立倾向彼此之间就是这样直接地发生着矛盾。加里西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必然要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他们赞同布拉格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又在邦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与这一决议的性质截然抵触的五一节决议，这就已经说明他们的这种态度了。如果这两只船离得愈来愈远，那么，那些打算脚踏两只船的人的最后处境是不难料到的。

因此，结束这一切民族主义的动摇是符合波兰运动的利益的。提出一个专门的波兰的工人纲领的物质基础在德国和奥地利是不存在的，德国的民族迫害也不会提供这样的基础。相反，对于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卓有成效地为波兰工人的一切利益而斗争的唯一道路在于：他们完全站在同德国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共同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把现在的国家界限看作是历史上的一个既成事实，彻底抛弃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波兰阶级国家的空想。从波兰的社会主义者那方面说，他们只有那样做才能加速

---

<sup>①</sup> 指1896年4月5—11日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拉格代表大会。——编者注



这样的时刻的到来，那时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也将使波兰民族得到彻底解放。<sup>①</sup>

发表于《新时代》第14年卷(1895—1896)第2册第176—181、206—216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14—36页。

(唐春华译 殷叙彝校)

---

① 本文写成以后，我们在阿列曼派在巴黎出版的机关报《工人报》上看到了一个决议草案，这个决议显然是社会爱国主义派方面拟向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的，它宣布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重建波兰是必要的。在达申斯基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提到“波兰人向沙皇政府提出一次抗议”时，他显然指的是这一决议。因此，他们打算通过取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批准而鼓舞各个波兰党坚决地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列入社会爱国主义的要求。鉴于这种情况，从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出发对这一纲领作批判性的说明，看来是更加适时的了。——卢森堡注

## 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

(1898年10月2日)

在反动派从各个方面进行冰雹般的打击声中，在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最基本的权利同敌人进行的极其激烈的战斗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这决不是在风和日丽、愉快宁静的气氛下召开的一次和平的会议，这是在战场上仓卒安营扎寨、在敌人炮火下召开的一次军事谘询会议，脉搏跳动得非常激烈，气氛却象铁一般沉着冷静。

事实上，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来的最近整整十年中，我们还从未一时一刻看到过，各种政治对抗、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势力进行的斗争象今天这样尖锐。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军国主义和海上军国主义疯狂的、践踏人民利益和嘲弄人民正当要求的竞赛，德国轻率地陷入这种竞赛，给平静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封建容克对劳动人民实行掠夺，玩弄面包涨价的阴谋对付劳动人民。第三方面，所有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工人阶级的基本政治权利，向国会选举权<sup>①</sup>实行进攻。第四方面，发动一次最新的进军，狠打无产阶级的痛处——结社权<sup>②</sup>。最后，在追歼无

---

<sup>①</sup> 1897年1月22日，驻阿尔特纳第9军团司令官阿尔弗雷德·瓦德西伯爵在给威廉二世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要求实行政变废除普选权，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此后，1898年6月，在国会准备选举期间，极端反动人士的一些计划被泄露，这些计划预定同政府合作取消现行的国会选举权。——编者注

政府主义<sup>②</sup>的借口下，有计划地复活欧洲各国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神圣同盟的幽灵。我们不是那种随时嗅得出革命的黎明气息的急性病患者。但是，如果人们观察一下当前德国政治生活的全貌，那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印象：时代已经散发出殊死斗争的热烈气息，通常说来这就意味着末日的开始。敌人在疯狂地、盲目地向周围乱打一气，他们的手不过是为恐惧所支配而已。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刻，而且还面临着更重要的时刻。德国的工人阶级有了一切理由密切关注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讨论。

社会民主党方面已经充分意识到时机的重要性和自己担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党代表大会的议程，特别是到目前为止从党的各个方面提出的提案，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十分满意地指出，过去通常在这里或那里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无足轻重的、琐碎的或者同工人事业本身没有多大关系的提案，如强制种痘、退出国教会等等，这一次都完全没有出现。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出的提案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是：邦议会选举、军国主义、关税政策、殖民政策、一般策略、结社权、农业问题、劳动保护和五一节。党在向党代表大会提出愿望时仅仅考虑重大的问题，而且只是从大处着眼的。另一方面，已经提出的提案所涉及的问题已很完备，不需要再作什么补充了。对工人阶级的幸福和痛苦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都一一列入了党代表大会的议题。

---

② 内务部国务大臣阿尔图·波扎多夫斯基-魏纳伯爵于1897年12月11日向德国各邦政府发出了一个秘密通知，建议采取立法措施反对罢工权和结社权。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将这一秘密文件弄到手，于1898年1月15日在《前进报》上发表。1898年9月6日，威廉二世在奥文豪泽的一次演说中宣布了这项预定于1899年实行的法案，这就是所谓的“苦役监禁法案”。——编者注

③ 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于1898年9月10日行刺奥国皇后伊丽莎白之后，意大利政府邀请欧洲各国代表于1898年11月24日到罗马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制定共同防御无政府主义的细则。——编者注

议题中需要优先考虑的无疑有三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问题；为结社权而斗争的问题；同对待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有关的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策略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不应当花过多的时间去争论。自从汉堡代表大会<sup>①</sup>以来，已在报刊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赞成和反对的一切论据都已经充分地交流过了，所以在斯图加特的辩论中很难出现新的观点。党代表大会只需要采取明确的态度来消除误解和结束暗中摸索的情况。

关于受到威胁的结社权，在辩论中必须形成一个战役计划来保护工人阶级的这个政治上的眼珠。我们认为，如果人们不是满足于对反动派的计划发表一次或几次抗议演说，而是真想制定继续采取行动保卫结社权的实际计划，那么，议程的这一条就必须同其他两个问题即一般的劳动保护和五一节联系起来加以讨论。为了防御眼看就要发生的破坏结社权的阴谋，很可能首先在劳动保护领域采取行动，也就是要掉转矛头，从防御转向最有力的进攻，要求改善劳动保护立法，这一点是从一开始就一目了然的。另一方面，为获得八小时工作制而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即结社权受到威胁一事，必然给五一节行动以新的有力的推动。既然明年将会出现争取劳动保护和结社权的强大斗争，那么，现在除采取其他行动外，作出纪念五一节的相应决议就一定会成为对反动派的战争叫嚣的回答。

根据一切现象来看，最活跃的恐怕应当是关于最重要的第三个问题的争论，即关于我们的一般策略、特别是对待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的态度的争论。的确，有一些同志会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策略的一般原则展开争论是不容许的，做不

---

<sup>①</sup> 指1897年10月3—9日举行的汉堡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编者注

到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对党的策略原则进行争论是必要的、可能的和有利的,反对进行这种讨论的理由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如果说,党代表大会不是教会长老会议,不能去争论抽象问题,而是要研究斗争中的实际问题,那么,我们必须提醒大家,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摆脱了对党的代表大会的任务所持的这种狭隘观点而进行了纯粹原则的争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甚至已经花很长的时间进行了关于**艺术问题的辩论**<sup>①</sup>,要说它不应该花时间去进行关于基本策略问题的争论,那就是怪事了。然而我们甚至认为这种争论是直接必要的。这并不是说,好象我们以为我们的久经考验的原则受到了严重威胁,这并不是说,好象我们有些为我们的运动担忧。整个说来,“尽管有狂风暴雨,尽管有人噉噉喳喳”,运动将会沿着它的老的、正确的道路前进。但是,不能否认,最近一个时期,某些知名的同志的一些言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在某种情况下,只限于在报刊上进行讨论是不够的,因为每次都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个人意见。然而对这次提出讨论的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全党都必须表示态度,全党必须对正确的观点表示**认可**,要这样做,党代表大会就是唯一的机会。我们完全不忽视和低估进行这样一场争论在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技术上的困难还从来没有能够阻止我们讨论任何一个对党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一次也不应当如此。

另一方面,我们预期关于我们策略的基本原则的公开的、严肃的辩论会对即将到来的斗争时期产生最好的结果。无论何时,在继续不断的、时常束缚人们眼光的日常斗争中,始终是我们整个革

---

① 指 1896 年 10 月 11 日至 16 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代表大会在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文学和艺术杂志《新世界》的内容时就艺术问题进行的辩论。——编者注

命世界观的牢固基础为我们提供令人生气勃勃的养料，使我们擦亮眼睛，振奋精神。这一次重新探讨我们纲领的基础，也将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党的队伍在坚持目标、加强胜利信心、提高战斗乐趣方面获得新鲜的、强大的动力。对于我们策略的一般原则进行讨论之后，我们就又要说，巨人已经接触到他的母亲，这使他产生了新的力量。

此外，不管党的代表大会将就它的议程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它的讨论一定会产生促进工人阶级幸福和利益的结果。大量的严肃工作正等着它去完成，它将表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一使命。这次代表大会在工人阶级争取他们最后解放的伟大进军中，将再次形成一个阶段，它将为他们指明道路并且发出进行新的斗争、争取新的胜利的号令。

发表于1898年10月2日《萨克森工人报》第229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231—235页。

（李宗禹译）

## 在 1898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898 年 10 月 3、4 日)

(10 月 3 日)

海涅和其他人的发言证明,在我们党内,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对最终目的和日常斗争的关系的理解已经弄模糊了。有人说:关于最终目的在我们的党纲中有一段讲得很好,的确不应当忘记,但是这同我们的实际斗争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也许有一批同志这样想:对最终目的的冥想实际上是一个艰深的学术问题。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没有比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更加实际的问题了。因为诸位想一想:我们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究竟表现在哪里呢?真正的实际斗争分为三点:工会斗争、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和争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斗争。我们的这三种斗争形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吗?完全不是。工会运动首先就不是!请你们看看英国,那里的工会运动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有一部分成了社会主义的障碍。讲坛社会主义、民族社会联盟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同样强调社会改良。而民主化又是专门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资产阶级在我们之前早就把民主写在他们的旗帜上了。那么在日常斗争中使我们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只能是这三种形

式的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的关系。只有最终目的才构成我们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并使这一斗争成为阶级斗争。我们一定不能象海涅所说的那样，把这个最终目的理解为关于未来国家的这种或那种设想，而是要理解为在建立一个未来社会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对我们任务的这种理解同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关系非常密切，后者是我们的观点的牢固基础，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后必然要引起爆炸，引起崩溃，在这个崩溃中，我们将担任对破产了的社会进行清算的法律顾问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我们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利益充分实现这一立场的话，那么海涅在最近发表的意见就是行不通的了，他认为我们也可以在军国主义问题上作出让步；此外，康拉德·施米特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的关于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取得社会主义多数的言论，特别是伯恩斯坦关于我们一旦取得政权也不能缺少资本主义的言论也是这样的。当我读到这种言论时，我向自己说：1871年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不是这么聪明，这是多么幸运啊！否则他们就会说，孩子们，让我们躺在床上吧！我们的时刻还没有到，生产还不够集中，还不足以使我们保持政权。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不到那一场威武雄壮的戏剧，看不到英勇的斗争，而会经历另一种场面了，工人们也就不是英雄，而简直是老太婆了。我相信，关于我们如果夺取政权能否使生产社会化的讨论，关于生产是否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化的讨论，这是一个艰深的学术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努力夺取政权，这一点是永远不容怀疑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必须表现出总是能够掌握局势，它决不能在自己的任务而前退缩。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最终目的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要不顾风吹浪打使之实现。



(10月4日)

福尔马尔激烈地责备我，说我这个运动中的新兵想教训老兵。不是那么回事。本来用不着这样做，因为我坚信，老兵和我都站在一个立场上。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要教训某一个人，而在于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述一种确定的策略。我在德国的运动中还必须先获得一副肩章，这我知道。但是，我愿意站在同敌人作斗争的左翼，而不愿意站在同敌人作妥协的右翼。如果福尔马尔竟搬出这样的论据来反驳我的公正的论述，说什么你还是一个黄口小儿，我可以做你的祖父呢，我认为那就证明他快要理屈词穷了。他在论述过程中的确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而这竟出自一个老兵之口，至少是令人吃惊的。他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保护的一个能压倒人的说法，但是我可以拿马克思的另一个说法来反驳，这就是：在英国实行劳动保护几乎是意味着拯救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此外，福尔马尔说，不把工会运动当作社会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并举工联为证。难道福尔马尔一点没有听说过老工联主义和新工联主义之间的区别吗？难道他不知道老工联分子是完全站在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吗？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曾经表示希望目前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会向前发展，因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已经丧失了优势，因而工联运动必须走上新的道路，这一点难道福尔马尔不知道吗？福尔马尔把布朗基主义作为一个可怕的幽灵端出来。难道他不了解布朗基主义同社会民主党的区别吗？布朗基主义者是要少数密谋者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却是要工人阶级自己夺取政权，这一点难道他不知道吗？这就是区别所在，谁要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老兵，谁就不应当忘记这一点。第三，他硬说我热中于暴力手段。无论在我的发言中，或者在我发表

于《莱比锡人民报》上的反驳伯恩施坦的文章<sup>①</sup>中，都丝毫找不到这方面的借口。我恰恰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我说过，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唯一暴力手段是在日常斗争中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启蒙教育。如果说我的意见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那么我认为这是莫大的恭维。的确，这对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肯定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是对我们这次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所有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对于海涅同志和他的补偿政策来说就不是这样。补偿政策怎么能同夺取政权相容呢？哪里会有补偿政策呢？我们要求加强人民的权利，民主自由，资产阶级国家要求加强它的实力手段和大炮。假定最好的情况是，双方公正地签定了交换协定并且加以遵守，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东西也不过是纸上的。白尔尼<sup>②</sup>早就说过：我劝谁也不要拿德国的一部宪法做抵押，因为德国所有的宪法都是动产。要使宪法规定的自由保持固定不变的价值，必须通过斗争，而不是通过签订协定。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想从我们方面换取的东西，却是固定不变的，残酷无情的。我们批准给他们的大炮和士兵却使客观的物质力量对比向不利于我们的方面转化。不是别人，正是拉萨尔那样说过：“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宪法不存在于书面的宪法之中，而存在于那个国家的实际的力量对比之中。”<sup>③</sup>所以，补偿政策的结果总是，我们使力量对比只是在纸上有利于我们，而在客观的现实中却有利于敌人，我们使我们的地位从根本上

---

① 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

② 卡尔·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6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编者注

③ 参看拉萨尔《现在怎么办？》(《拉萨尔全集》第2卷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78页)。拉萨尔说：“宪法问题最初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力量问题；一个国家的实际的宪法只是存在于那个国家所有的现实的力量的对比中；书面的宪法只有在它准确地表达这个社会存在的实际力量对比时才有价值，才能持久……”。——编者注

受到削弱，却使敌人的地位得到加强。我要问：能否认为一个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会认真地努力夺取政权？芬德里希同志愤怒地强调说这种意向是不言而喻的<sup>①</sup>，我认为他矛头对着我来不过是错认了对象，他的这种愤怒基本上是对着海涅的；当海涅敢于说出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退让政策的时候，这种愤怒只不过是表明海涅自己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良心已经处于尖锐对立的地步了。

其次再谈谈康拉德·施米特的见解，他认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无政府状态可以通过工会斗争之类的手段来消除。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为论述纲领中关于夺取政权的必要性的条文提供理由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可以医治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灵丹妙药。无政府状态、工人阶级的可怕的痛苦、生活的缺乏保障、剥削、贫富悬殊，都在天天增长。难道能够说一个想采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人会认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必要的吗？因此，芬德里希和福尔马尔的愤怒在这里也不是针对我的，而是针对康拉德·施米特的。其次还有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这种自觉的见解：“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谁这样说，谁也就不站在必须夺取政权的立场上了。你们看，党内的一些同志已经不再站在我们运动的最终目的的立场上了，因此就有必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示这一目的；如果有什么时候必须这样做的话，那就正是今天。反动派的子弹正象冰雹般地向我们射来。这次争论必须对皇帝的最近一次演说<sup>②</sup>作出答复。我们必须象老卡托那样明确地说：“而且我认为这个国家必须摧毁”<sup>③</sup>。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

---

① 芬德里希在10月3日的发言中指责卢森堡的第一次发言是老生常谈。——编者注

② 指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9月6日在奥文豪泽的演说。参看本卷第37页注②。——编者注

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工人阶级不应当站在哲学家的颓废立场上：“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不，恰恰相反：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我们说来就是一切。

发表于《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大会会议纪录》1898年柏林德文版第99—100、117—118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236—241页。

（李宗禹译）

---

③ 罗马执政官卡托（公元前234—149）在元老院的一次演讲中说：“迦太基必须摧毁”。——编者注

## 党代表大会的回顾(摘录)

(1898年10月11日)

### 一

毫无疑问,关于策略的辩论是斯图加特大会讨论的重点,这个重点也引起了所有代表的最大的注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从党诞生时起,日常的实际斗争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直到最后也将始终如此;只要党还存在和发展着,这个问题就不会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一定要一再以新的形式出现。我们认为,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不得不再一次如此着重地探讨这一问题,正是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无可怀疑的标志。

一般策略问题象一条红线贯穿着社会民主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但是,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这是和运动的不同的历史条件完全一致的。从1868年起,也就是从党在爱森纳赫真正建立的前夕起,直到1891年为止,社会民主党内的策略争论是围绕议会政治问题进行的。那时必须同一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议会政治的极左派作斗争。只要党还没有进行有效的日常斗争的必要法律前提(首先是选举权),只要它还由于反社会党人法而丧失存在的法律基础,争论就不得不持续下去,不能通过辩论得到解决,一定要通过事实才能最终得到解决。我们也是的确是这样看到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政治选举的问题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出现

的：1871年在德累斯顿，1873年在爱森纳赫，1874年在科堡，1877年在哥达，然后在维登宫<sup>①</sup>，在哥本哈根<sup>②</sup>，在圣加仑<sup>③</sup>；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以后，这一争论于1890年在哈雷和1891年在爱尔福特发展成对“独立派”<sup>④</sup>的清算，争论也就在这里自然而然地结束了。由于重新获得了法律基础，由于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选举时取得辉煌的胜利，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对议会斗争的有效性的任何怀疑都无法存在了，而那些坚决主张进行消极性鼓动的人，必定自然而然地迅速发展到无政府主义，也就是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党在一个方面的内部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相反方向上的斗争立即开始了；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性的阳光照耀下蓬勃发展，这就带来了新的危险。在这以前党的一翼一直是倾向于轻视日常的积极斗争，倾向于消极态度的，而1890年以来，由于运动向纵深蓬勃发展，就必然要使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过高估计建设性的改良工作，产生机会主义的倾向。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时刻，在这个时刻，党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斗争——一方面反对独立派运动的残余，反对威纳尔之流，另一方面反对由福尔马尔体现的最初的机会主义迹象。那时辛格尔已经不得不出来反对福尔马尔，说他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看作一件传家宝，放进了逢到特殊的节日才打开来的银柜”。同一个辛格尔在他的上述发言中也证实——在正确认识两个极端派

---

①②③ 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外举行的三次代表大会：1880年8月20—23日在瑞士维登宫，1883年3月29日—4月2日在丹麦哥本哈根，1887年10月2—6日在瑞士圣加仑。——编者注

④ 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倾反对派“青年派”，它反对党利用合法可能性来开展活动，特别是否定党所制定的革命的议会策略。在1890年哈雷党代表大会上“青年派”遭到一致驳斥，它的主要代表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他们后来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即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别的每一派应有的意义的情况下——，他认为，福尔马尔的意见“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如果得到了党代表大会的赞同，它们对党来说就会比反对派及其代言人的观点危险得多”<sup>①</sup>。的确，如果说无政府主义理论每天都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成果即事实本身的迎头痛击，因此只有毫无头脑的人才会今天仍旧死抱住无政府主义的幻想不放，那么机会主义观点的情况却相反，表面上看来它们好象每天都被那些事实所证实，因此要驳倒这些观点，只能依靠党的明确的认识。同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对党的理论修养和策略修养所提出的要求，是与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时的情况无法相比的。我们也是的确是这样看到1891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派别一再抬头的。1892年在柏林党代表大会上，它出现了，并被当作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受到打击。<sup>②</sup>1894年在法兰克福，巴伐利亚邦议会对预算的表决<sup>③</sup>引起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机会主义派别在争论中又一次被彻底击败。1895年在布勒斯劳，追求实际效果的做法表现为农业社会主义的形式<sup>④</sup>，它碰到在实践中坚持原则性的主张就又一次遭到失败。最后，在就党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了争论之后，我们在斯图加特同机会主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和原则性的清算，因为机会主义在理论方面通过伯恩斯坦，在实践方面通过

---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198页。——编者注

② 1892年11月14—21日的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是诱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编者注

③ 在1894年6月1日，以格奥尔格·福尔马尔为首的巴伐利亚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投票赞成邦预算，从而第一次破坏了奥古斯特·倍倍尔提出的“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和一文钱”这一革命原则。——编者注

④ 在关于农业纲领的讨论中，机会主义者爱德华·大卫和麦克斯·克瓦尔克主张由资本主义国家以改良形式来援助小经营，他们称这种改良为社会主义的。他们否认走向大经营的历史趋势，从而否认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社会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编者注

海涅已经彻底成熟了。

争论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机会主义这一次也遭到了迎头痛击。党一致声明：它坚持它的最终目的，坚持取得政权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它对社会改良和不知不觉地逐渐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彼岸丝毫不抱幻想，相反，它期待着社会灾变和政治灾变，它坚定地希望表明自己日益能胜任这一任务并作为形势的支配者出现；最后，它对现存的国家不仅不进一步实行让步政策，而且要把斗争进行到底。经过争论以后，代表大会的气氛使为数不多的机会主义代表感到十分受压抑。他们起初以为可以确立一种“良好的气氛”——请看福尔马尔的第一次发言——后来他们却不得不根本放弃在一般性辩论中继续维护他们的观点了。

就这些来说，我们有一切理由对讨论的结果感到满意。但是我们也想加几句批评的话，而且是针对我们的“老人们”在这一争论中的态度。如果党的老战士从争论一开始就投入战斗，而不是相反地试图通过否决唯一合理的提案（根据这项提案，将以一项专门的议程开始关于策略的讨论，并且使它更加易于进行下去。）使争论本身无法进行，那么我们会更加高兴得多。尽管如此，争论还是展开了，但这不是由于党的领导人的态度，而是不顾党的领导人的态度才做到的。如果说也可以用对争论结局的关心来说明这一态度的话，那么，由此只会引起我们对这些老人提出新的指责，说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党的情绪，他们非常缺乏决心，不能不惜任何代价和全力以赴地抵制有害的倾向。首先听任争论自然发展，用两天时间沉着地观望“动向”，在机会主义的代言人已被迫明确发表意见时才参加进来，这时还对一些人的“过分尖锐的语调”指责一下，然后就全盘支持这些人的观点，如果党的领导人在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取这种策略，那是很糟糕的。考茨基解释说，他之所以直到现在都没有对伯恩施坦的理论发表意见，是因为他要给自己



保留在可能发生的辩论中作出结论的权利，但我们认为这也起不了什么辩解作用。二月，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伯恩施坦的文章，连最起码的编者脚注都没有加，以后，沉默了四个月；六月，他在讨论开始时对伯恩施坦的“新”观点即老的讲坛社会主义的这一新翻版恭维了几句，以后又沉默了四个月，等着党代表大会召开；最后，他在争论过程中说他想作出“结论”。我们希望，我们的专职理论家在重要的事情上总是出来发言而不是作结论，并且不要给人造成错误的和迷惑不解的印象，似乎他长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拿破仑的老近卫队总是在战斗临近结束时才投入战场，我们却习惯于看到我们的老近卫队总是在战斗开始时就站在岗位上。我们将在评论另一项议程时指出，他们的慎重已经对实践产生了不利的后果。

发表于1898年10月12日《萨克森工人报》第23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242—246页。

（唐春华译 殷叙彝校）

## 一次胜利的代价

(1898年12月19日)

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和平谈判确认了后者的胜利。<sup>①</sup>北美合众国得到了拥有约一千二百万居民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有七百万黄种人和一百万黑种人。

如果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一胜利究竟使合众国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那是很有意思的。牺牲的人数我们不去计算，这一胜利首先要用花费了多少金钱来衡量，因为金钱在今天是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最高尺度。

“缅因号”那次爆炸<sup>②</sup>以后，美国人立刻看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迅速地着手进行战争准备。首先国会在3月9日批准了一项用于“国防”的五千万美元<sup>③</sup>的拨款，而且这笔拨款不到几个星期就支付了。为建立一支拥有一百零一艘舰艇的新的机动舰队用去了一千八百万美元。在战争期间，象“哈佛号”和“耶鲁号”这样的巡洋舰每天要花二千美元，“圣路易号”和“圣保罗号”则每天各需二千五百美元。同样，海军大炮的费用也很高。一门口径

---

① 这里指美国从美西战争中扩大了它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同时在东亚取得了重要军事基地菲律宾。——编者注

② 1898年2月停泊于哈瓦那港的美国“缅因号”巡洋舰发生了爆炸，这一事件成为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的借口。——编者注

③ 1美元等于4.50马克。——卢森堡注

十三吋的大炮每发射一枚炮弹需五百六十美元，一门口径八吋的大炮发射一枚炮弹需一百三十四美元。

舰队装备的全部更新耗费了六百五十万美元以上的款项。海军上将杜威在马尼拉消灭西班牙舰队使美国人花费五十万，消灭塞尔维拉<sup>①</sup>舰队的花费也大致相同的，而西班牙在圣地亚哥在舰艇方面的损失为一千六百五十万。这些都是以美元计算的。

同时，战争刚一一开始就有十二万五千人应征入伍，因此军队预算增加到了五倍。

总的来说，美国在战争期间每天用于陆军和海军的经费为一百二十五万美元，而它在和平时期（1890—1897年）每天用于这一方面的经费则只有二十五万美元。

议会在三月批准的五千万拨款当然很快就被用完了，而且新批准的拨款一项接一项而来，因此拨款总数高达三亿六千一百七十八万八千零九十五美元。爱国的国会（在其中糖业托拉斯私下的意见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在批准拨款时是兴高采烈的。但是拨款也是必须用现金支付的。如果不是由美国人民大众来担负这一费用，那又由谁来担负呢！

用于战争的爱国借款也的确是用双重方式筹集的。首先是通过一切资本主义政府屡试不爽的那种手段即间接税。刚一宣战，啤酒税就增加了一倍，总额为三千万美元。追加的烟草税又提供了六百多万美元，新的茶叶税收入一千万美元，提高了的印花税收入九千二百万美元。总之间接税增加了一亿五千万美元。但是，大约还需要二亿，为此美国政府便求助于发放一次利息百分之三、为期二十年的公债。这笔公债也要出在“小人物”身上，因此政府拨出大量经费，大做爱国广告，并且敲锣打鼓地开展这一行动。“爱国

<sup>①</sup> 西班牙海军上将，他率领的舰队在圣地亚哥港被美国海军全部消灭。——编者注

公债”的公告发到了各个银行、各个邮局以及二万四千家报刊。“小的”猎物也没有放过。五百萬元以下的认购者所认购的数额占总额（一亿零一百万美元）的一半以上，认购者的总人数达到了三十二万的惊人数字。而在这以前，例如在克利夫兰总统任期内发行的那次公债只是由五千七百人认购的。正是在这一次，在爱国主义喧声的引诱之下，“小额存款”从最隐蔽的角落和处所里流进了国防部和海军部的保险柜。因此，这笔费用确确实实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直接掏自己的腰包来支付的。

但是，如果仅仅以进行战争所花费的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一场战争的代价，那就等于以小商贩的尺度来衡量巨大的历史事件。美国还必须为战胜西班牙付出真正的代价，而且这笔费用将大大超过最初那笔。

在美国夺得菲律宾以后，美国就不再仅仅是美洲的一个强国，而是成了世界列强之一。门罗主义这个防御性口号让位给一种进攻性的世界政策，一种在别的洲实行兼并的政策。但这意味着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发生一个根本的转变。从前它只需维护它在美洲的利益，现在由于它在亚洲、中国、澳大利亚有了利益，它就同英国、俄国、德国发生了政治冲突，卷入了一切重要的世界性事件，从而造成了进一步发生战争的危险。内部平静发展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新的一页揭开了，历史会在那上面记下根本无法预料和极其令人震惊的事件。

但是，要维护对新近夺得的领土的统治地位，美国现在就必须对本国的物质状况从根本上进行改造。以前它拥有一支小的军队（共三万人，其中步兵一万二千人，骑兵六千人，炮兵四千人，官员八千人，还有六十座炮台）和一支附属舰队（八十一艘舰艇，其总吨位为二十三万吨，十八名将军，七百零三名军官，一万二千名水兵，七百五十名见习水兵）。

现在它必须在陆地和海上大大扩大军队。在古巴和波多黎各，美国至少要有四、五万人的驻防军，在菲律宾至少也要有同样多的军队。总之，即使常备军不一定要十足地增加到二十万人，也必须要有十五万人。但是，在美国迄今的制度下是绝对无法征集这样一支军队的，因此毫无疑问，在最短的时间内它将转而效法欧洲的榜样，采用普遍兵役制和常备军，这样一来，地道的军国主义就大张旗鼓地进入美国了。

同样，美国海军也不容保持今天这样不大的规模。现在美国不得不维持它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统治。它简直是不由自主地同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进行对抗，这样它就不得不也力图很快地建立起一支第一流的舰队。这就是说，伴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它的不可分开的孩子即军国主义和海上军国主义这对孪生子女也进入美国了。美国把未来也寄托“在海上”，而那些远洋的浩瀚水面看来却是混浊不清的。

然而，战争的结果不仅会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军事组织，甚至也会影响到美国人民在国内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美国新近占领的土地要么不是作为具有同等权利的一部分并入美国。那样的话，以民主制为基础的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宗主国。但是以什么方式来实行这种统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南北战争以后最初几年的那个时期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那时南部各州受北部各州支配，受到 carpetbaggers (抢劫者)<sup>①</sup> 的无情统治。对异国的统治即使是比较人道的，也一定会对一个民主的国家产生有害的影响，它将逐步挖空那里的民主制的基础，使之让位于腐败的政治，这是无需详细加以阐述的。

要么美国就把那些新的领土并入本国，并使其在议会中拥有

---

<sup>①</sup> 这是对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从北方各州到南方担任官员的人的卑称。——编者注

具有同等权利的代表。天晓得一种如此根本不同的支流涌进美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将引起什么结果。从前的克利夫兰任内的财政部长卡莱尔在《哈珀氏》杂志上写道，那时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将怎样对付菲律宾，而是**菲律宾将怎样对付我们**？<sup>4</sup>

在后一种情况下还会产生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菲律宾居民被作为美国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来对待的话，那么就不能以任何方式拒绝他们根据宪法移居美国。但是，这样一来，劳动人民就要面临“黄祸”这个令人生畏的幽灵，菲律宾群岛的马来人和在那里定居的大量中国人将用不正当的手段同他们进行竞争。为了防止出现这一危险，曾经有过一个提案，即选择一种中间道路，仅仅确定对被征服的领土的保护关系或者类似关系，以便至少能够在理论上把它们作为“外国”对待。但是很明显，这样一种关系是个折中办法，因此仅仅是一种过渡，它必然发展到或者彻底地对它们实行统治，或者充分地给予它们平等的权利。

美国的巨大胜利也已产生了另一些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既然进入了广泛推行海上政策的时代，美国理所当然地感到有必要迅速地使与本国利益有关的两大洋沟通起来。同西班牙的战争使它清楚地看到被迫围绕整个美洲大陆环行是有害的。因此他们积极着手开凿**尼加拉瓜运河**。但是这样一来，美国就把它的极其重要的利益放在**中美**并且竭力要在那里站稳脚跟。于是在已经征服一些地方之后，又要进一步顺理成章地征服中美那些迄今独立的小的共和国。关于这一点英国已经有人看得很清楚，并且不得不听天由命地去对待要发生的事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写道：“要同事实进行争辩，不仅是发疯，而且是很危险的，而事实是，如果美国想在中美海岸实行统治，那么地理位置也是有利于它实行这种统治的。”这就是说，对西班牙的胜利不仅使美国对待世界政策的态度、而且也使**美国**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定还会有一些目

前无法预料到的进一步后果。

这样，由于美国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它就面临着外交和内政、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变革。只要看一下美国面临的、现在完全难以预料的未来，就很容易把它的胜利的代价概括为一句话：Vae Victori(胜利者有苦难言啊)！

今天美国的生存条件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战争这个政治飞跃是有过缓慢的、不引人注目的经济变化作准备的，政治关系的革命通过在这以前最近十年的平静的资本主义发展才得以实现。美国变成工业输出国了。

财政部长盖奇先生在他的三年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出口额达到二亿四千六百二十九万七千英镑，进口额却只有一亿二千三百二十一万英镑。他骄傲地证实：“在我们的贸易史上，我们的工业产品的出口额第一次超过了外国产品的进口额！”资本主义的这一飞速发展既促使美国热中于对西班牙发动兼并战争，同样，也为它提供了支付这场战争的费用财力。美国资产阶级对于它本身的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十分清楚的。

纽约的《银行家杂志》写道，进入世界市场的渴望早已要求实行 a strong foreign policy (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美国一定要成为 a world power (一个世界大国)。

即使“缅因号”那次爆炸是个偶然事件，对西班牙的战争却绝不是偶然的。美国今天的世界政策尤其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们象歌德那样认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值得灭亡的，并且密切地去注视现行制度的情况，那么，我们只能对美国发生的那些事件的过程感到满意。

历史狠狠地刺了一下自己的这匹赛马，它漂亮地向前跳跃了一大步。对于我们来说，总是宁可要生龙活虎的疾驰，而不要令人昏昏欲睡的慢跑。我们可以更加迅速地达到目的。

但是，另一半球的这一巨大变革已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引起一场飓风，它在震撼一个新的角落，如果有人根据近十年德国的统计材料就向全世界宣布资本主义制度还会存在很久，这座建筑物是建在一块几乎不可动摇的岩石上的，那么这种过分聪明的推理将显得多么滑稽可笑。这就象一只青蛙瞪大眼睛凝视着泥塘的一个角落，说地球停止转动了，因为没有一丝风吹皱池塘绿色的水面。历史的联系所表现的那一片世界恰恰要比从青蛙的“实际政治”的视野所能观察到的那部分大得多。

发表于1898年12月1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93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295—301页。

（唐春华译 殷叙彝校）



## 亚当·密茨凯维支

(1898年12月24日)

即使波兰在它的文学中除了它在12月24日这一天庆祝其百年诞辰的这位诗人<sup>①</sup>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物，它也完全有权要求在世界文学中跻身于第一流文明国家之林，在其中占有一个光荣的位置。

亚当·密茨凯维支不仅是波兰最伟大的诗人和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还是一个其名字和波兰民族史和思想史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诗人。密茨凯维支这个名字在波兰意味着整整一个时代。

瓜分<sup>②</sup>使波兰处于全新的政治环境之中，但是它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却基本上仍旧是旧贵族共和国末期的继续。贵族仍旧是统治阶级，社会的精神领袖仍旧是豪门，建立在劳役制上的农业经济仍旧是这个社会的物质基础。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尚未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在乡村，集中在贵族的世袭庄园里。

那个时期对俄属区的波兰大贵族和豪门说来却是一个非常幸

---

① 亚当·密茨凯维支(1798—1855)——波兰著名诗人。卢森堡本文写于诗人的百年诞辰纪念日。——编者注

② 波兰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瓜分。西部属普鲁士，加里西亚属奥地利。而1815年建立的波兰王国则和俄国实行合一君主制。——编者注

运的时期。大多数旧制度都保留下来了，尤其是在立陶宛还保留了农奴制。所有的官职，甚至在俄国的许多官职都任用了波兰人。当时人卡·科兹米安<sup>①</sup>说：“普遍认为，我们现在的处境在某些方面远比波兰统治时期强的多，我们拥有祖国给予我们的大部分东西，却摆脱了对农民暴动的担心和危险；我们没有波兰而又确实在波兰，我们就是波兰”。

贵族的世袭庄园依然是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豪门依然是艺术的保护者。艺术中尤其是文学依然部分是供那些“出身名门”、佩剑或身着黑袍的<sup>②</sup>附庸风雅之徒当作消遣的业余爱好，部分是宫廷文学侍从活动形式之一。

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精神生活很少从民族的过去得到启发是肯定无疑的。它的主要内容、它的全部性质不如说是模仿外国。拿破仑的法国尤其是那个时候的波兰人创作的泉源。但是当时敷衍的伪古典主义<sup>③</sup>正在法国本土高视阔步，而移植到波兰来的却只是这种伪古典主义的苍白无力的仿制品。它的特征是：圆熟呆板而空洞的形式以及毫无个性、缺乏内在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

这个社会内部一开始就孕育着一场变革。1807年拿破仑在华沙大公国废除了农奴制（没有触动劳役负担和土地关系）、颁布民法法典、建立工厂、改革农业（向轮作制过渡）、实行新的官僚行政制度、大大加重赋税和官办垄断制——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安定因素在社会内部动荡着并且为新的阶级斗争准备好了土壤。当掌握整个行政机构的豪门和资本当时的代表忠实地支持现存制度，即

---

① 卡耶坦·科兹米安(1771—1856)——波兰诗人。曾任高级官吏。古典主义的拥护者。——编者注

② 佩剑指贵族出身、黑袍指教会出身的人。——编者注

③ 法国十七世纪文学上的古典主义中的宫廷派在十八世纪走上僵化和形式主义的道路，被称为伪古典主义。宫廷贵族当时习惯在头上敷粉，因此卢森堡称之为敷粉的伪古典主义。——编者注

忠实支持俄国的时候，在大批农村贵族、尤其是没有产业的小贵族中却酿成了一个自然而然一定带有民族性质并且将过去当成理想的激烈的反对派。这就为 1831 年的起义<sup>①</sup>作了准备。

与此同时，精神生活的条件也在变化。当旧的生活准则瓦解以后，小贵族被迫寻求新的上进途径。新的官僚制度使专业知识成了谋生手段，学校、写作对于贵族具有了新的意义，波兰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贵族知识分子**。他们从事文学是把它当作职业，而不再象在豪门世界里那样把它当成业余爱好或是宫廷差事了。和这个“有天赋出身的”社会<sup>②</sup>（波兰人用语）中这两个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及意向的矛盾相一致，下级农村贵族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思潮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居统治地位的豪门的官方文学是依靠法兰西的伪古典主义的题材而维持生存的，下层贵族的反对派文学却倾向民族题材；古典派颂扬当代，民族派倾倒于昔日，昔日在他们眼中焕发着神秘的光彩，同时他们从德意志**浪漫派**那里找到了合适的形式和样本。

古典主义和浪漫派是移植进艺术领域的矛盾，这些矛盾后来在经济和政治中都趋于尖锐化，并且很快就在起义的刀光剑影之中见了分晓。现存的制度，即俄国的统治虽然在格罗霍夫和普拉加战场上取得了胜利，<sup>③</sup>它在思想的战场上却不得不处于下风。“古典作家”只能让一批索然无味的、平庸的、缺乏思想的形式雕琢匠上场比赛，而浪漫派却从社会内部一夜之间幻化出整整一群由年青的光辉天才组成的星座，晨曦中最璀璨的一颗星——伟大的

---

① 1830 年 11 月 29 日华沙的军队和人民一起发动了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起义。1831 年 9 月 7 日俄军占领华沙，起义遭到镇压。——编者注

② 指波兰贵族。——编者注

③ 波兰起义者在 1831 年 2 月 25 日和 9 月 6 日在格罗霍夫和普拉加两地同沙皇军队血战，两次均失利。——编者注

天才亚当·密茨凯维支在波兰文学的天空冉冉升起。

他是整整一代的领唱者和代言人，同他所代表的思潮相适应，他是抒情诗人，同时又是史诗作家；他既是歌唱对民族的热爱和眷恋的诗人，又是客观地描绘民族过去的画家。

他的两部主要作品《先人祭》和《塔杜施先生》为浪漫派建立了不朽的丰碑。《先人祭》中那种用波兰语言表达的强烈的激情，深刻的感情和大无畏的思想是在那个时代以前和以后都不曾有过的。诗人意识到自己对祖国的爱情具有无所不能的威力，他在书中凭着这种自觉向造物主挑战。《塔杜施先生》这部完美的杰作对于旧日贵族波兰生活所作的彩色斑斓的描绘是空前绝后的。诗人以他的朴素无华的谦虚态度认为自己写了一部体裁和歌德的《赫尔曼和窦绿苔》有些相似的作品，他开始也曾把它当作典范。对这种比较读者只能置之一笑，因为无法用歌德的这部叙事诗来和《塔杜施先生》相比，正如无法用它来和《伊利亚特》相比一样。密茨凯维支的这一主要著作，无疑是也可以和《伊利亚特》并列的，但是它还在某些方面和《堂吉珂德》有共同之处。它反映的恰恰不是荷马所描写的洋溢着健康活力、陶醉在发展极盛时期的舒适和安宁中的社会，而是一个没落的社会，一个“垂死者”的社会。因此他那带着忧伤的嘲讽，带着尖刻而又宽容的幽默的纤美笔调有如落日的霞光照耀着巨大的画面，而这并无损于古典式冷静描写中的杰出的客观性。

密茨凯维支在诗歌中的出现对于波兰社会具有启蒙的作用是不奇怪的。诗人在他的一些处女作，尤其是在他致青年的优美抒情诗中，以富于魅力的青春热情和锤击般的节奏号召他那整个一代齐心协力去“把腐朽的世界翻转过来”并把它引上新的轨道，于是诗人立刻成了整个思想运动的中心，成了受到无限崇敬的对象。自然这仅仅是指成了青年一代无限崇敬的对象，不过诗人也只属

于青年一代，正如波兰历史当时的那一瞬间也是属于青年一代一样。他的天才甚至对毗邻的俄国也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因而当他被放逐到俄国时，受到了两个首都的知识界的重视，尤其是在后来的十二月党人中，赢得了许多知心朋友。

但是当浪漫派赞颂过去的时候，现实却满不在乎地在当代的道路上前进，这条路愈来愈远离密茨凯维支的理想和学派。他们把一项从一开始就被历史注定为无法进行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由于浪漫派不断遭到现实的愈来愈猛烈的打击，因此只要它不想自暴自弃，它就只有更深地沉浸于幻想之国，进一步把现实消融在想象之中。当民族运动失败之后，浪漫派下一步必然发展到**神秘主义**。密茨凯维支也和他在艺术界的许多伙伴一样，最后停留在枯燥的、无生气的宗教的神秘教义之中。这是他们的思想方向的合乎逻辑的结局，但是同时也是这一流派的诗歌本身的破产。在起义失败之后，波兰民族主义的夜莺很快就沉默无声了。密茨凯维支大约在逝世（1855年）前二十年就已经不再创作。《塔杜施先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部完整的著作。

但是这部著作也是波兰民族主义最后一座雄伟的丰碑。在1861—1863年第二次失败<sup>①</sup>后，整个波兰社会生活由于取消自然经济和引进大工业而开始了显著的变革。波兰的整个内部和外部生活好象被魔杖一点似的在短期内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今天的波兰和密茨凯维支描写的波兰，尤其是和他所讴歌的波兰的共同之处并不比它和随便哪一个讲另一种语言的异国更多。浪漫派诗歌的背景是平原、绿色的森林和草地，浪漫派诗歌的主角是贵族，这些都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了。今天的波兰是大城市的资产阶级的波兰。而今日举行揭幕庆典的华沙的密茨凯维支纪念碑，这个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1页注<sup>②</sup>。——编者注

蒙全俄罗斯至高无上的沙皇陛下恩准、由承担波兰民族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的波兰资产阶级在工业化的、非民族主义化的华沙建立的纪念碑，它只不过是要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向世界宣告，对官方波兰社会，对资产阶级、对贵族、对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来说，民族主义已最终变成了浪漫精神，独立的政策变成了诗歌。在密茨凯维支生长、吟咏和活动的维尔纳建立了穆拉维约夫<sup>①</sup>的全身雕像，而在波兰上流社会刚刚卑躬屈膝地迎接和颂扬沙皇的华沙<sup>②</sup>却建立了密茨凯维支的全身雕像。历史把密茨凯维支的叠句改写成：“民族主义最后一位诗人就如此结束”，<sup>③</sup>这就给十二章的《塔杜施先生》添加上作为尾声的第十三章。

在今天的波兰，德意志—犹太—波兰的资产者是资本家阶级中最具国际性的和最反民族性的典型；在今天的波兰，高级贵族一部分资产阶级化了，一部分变得愚昧无知到了野蛮的程度；低级贵族一部分融化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成为农民，而农民阶层的文化水平也被压低了，在这里，有阶级觉悟的工业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阶层，它既有兴趣，从社会条件来说也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破产的民族主义的文化一面的保护者。不顾一切地引证密茨凯维支的著作来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这是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癖好。我们很不喜欢这种做法。密茨凯维支流露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却是和他一生中的那一不幸时期联系在一起，那时他的创作天才已经被宗教神秘主义的面纱遮盖了、窒息了。

因此，我们认为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已经足够成熟，可

---

①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穆拉维约夫(1796—1866)——俄国将军。1863—1865年任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总督，曾镇压立陶宛一月起义。——编者注

② 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897年8月30日到华沙巡视。——编者注

③ 《塔杜施先生》第十一章结句是“在立陶宛的最后袭击就如此结束”。参看《塔杜施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编者注

以为了伟大诗人的诗才而热爱和尊敬他，人们根本不需要用诗人的诗才枯竭时期的晦涩的、神秘的空想社会观去吸引他们。一个想革新世界的阶级的眼界是不应当如此狭窄的。密茨凯维支在他创作的全盛时期自然也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正如第一次起义的整个思想是民主主义一样。但是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当代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代表和先驱。他是贵族民主主义的最伟大和最后一个歌手，但就是以这种身份也还是波兰民族文化最伟大的体现者和代表。现在也以这样的身份而属于波兰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是把他作为这样的人、作为昔日波兰最伟大的精神遗产来接受的，工人阶级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阶级。在德国，用马克思的话说，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是古典哲学的继承人。在波兰，由于另一种历史原因，无产者是浪漫派诗歌、从而也是它的最伟大的权威亚当·密茨凯维支的继承人。

发表于1898年12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  
第298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  
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302—307页。

（周懋庸译 殷叙彝校）

## 世界政策中的变动

(1899年3月13日)

意大利想在中国升起它的旗帜，这一尝试不论成功与否，毕竟是表明东亚对所有欧洲国家的政策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证据。就连混乱不堪的、既不能生存又不愿死亡的意大利也觉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命运现在要在黄海上决定了。

事实上，中日战争不仅在亚洲的发展中，而且也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时代。自从缔结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以来，关于我们有两个东方问题、即波斯普鲁斯海峡问题和黄海问题的说法已经成了老生常谈。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东方问题——东亚的问题，似乎更正确些，因为老的君士坦丁堡问题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重大意义，中国问题代替它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在八十年代，所有受土耳其庇护的较重要的斯拉夫国家都已获得了它们的独立自主，而由于欧洲的国际政治利益，土耳其帝国的历史的解体必须停止，从那时以来土耳其问题一直所起的作用暂时结束。从维护土耳其的完整性(不受损失)成了国际的、首先是俄国外交策略的口号的那一时刻起，对于欧洲的政策来说整个老的东方问题也就成了死胡同。一方面，在波斯普鲁斯海峡集聚了所有欧洲大国的最重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同时也集中了它们之间最严重的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从某一时刻起，处于既



不能进也不能退的状态。世界政策的推动力可以说是在土耳其政府的大门口卡住了,各种矛盾既不能爆发也无法消除。

欧洲经济上衰退的时期也随着最近这一政治上风平浪静的时期到来:多年来,资本主义正象它的外交一样陷于困境。

多亏上帝保佑,在资本主义欧洲的这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衰弱的时期,发生了1895年的中日战争,可以说一下子拉开了亚洲历史的帷幕。整整一个大洲可以供受到约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洪流奔驰了。首先,欧洲的政策获得了一个新的广阔的用武之地。在这以前它曾经不得不在土耳其死死抓住一个单独的战略据点不放,但在这里,一个完整的巨大的帝国朝它敞开了。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来说,征服君士坦丁堡只具有间接的重要性,但开发中国却既给国际政策又给资本主义提供了一块取之不尽的肥沃土壤。最后,在波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上主要只有俄国、英国和奥地利参与,其他的大国不过是间接介入,而在目前大规模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它们全体包括北美联邦在内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些还没有完全死亡的国家,象意大利,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插一手。

这些日子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世界历史事件中尤其使人吃惊的是,欧洲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领这个新领域的速度是空前的。马关条约以来,整个商业的突然繁荣——试比较一下经过兵库<sup>①</sup>的贸易数字,就这一方面而言,它具有**典型性**:

中国与国之 间的贸易	1895 日元为单位	1897 日元为单位
中国和日本	19 839 469	32 262 459
中国和英国	20 686 561	30 309 669
中国和印度	10 645 534	25 310 298

---

<sup>①</sup> 指日本的重要商港神户,兵库是它的旧港的名称。——编者注

中国和美国	14 236 202	22 086 780
中国和德国	6 538 951	7 727 376

再看一看庞大的铁路建筑——目前正在建造的大约有六千公里，俄国人从北面经过满洲，英国人从东南方通过上缅甸，法国人由东京<sup>①</sup>从南面侵入，比利时人从北京到汉口，美国人从汉口到广州，德国人和英国人从天津到上海，德国人从胶州到济南，英国人从天津到牛庄和从上海到汉口，都在建造铁路——这是一幅甚至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图景。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占领大片新领土时，它们的内部痼疾也以同样高的速度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灾难是它要发展和繁荣，就必然使它内部的潜在矛盾同时发展，并且加快它自己的最终崩溃。

国际政策的这一新的用武之地首先和立刻产生的后果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国际矛盾尖锐化。这些矛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处于胶着状态的，现在它们在中国可以发展成一场无休止的斗争并且因此激化。我们近年来在欧洲经历的大规模**陆地和海上备战**的新纪元就是这一情况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国际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用武之地也同样程度地直接产生了各国间的**经济矛盾**和**竞争尖锐化**的后果。它的表现就是我们欧洲的**保护关税**的新纪元。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国际矛盾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另一个方面。通过开发中国而开辟的**军国主义**、**海上扩张主义**和**保护关税**的纪元反过来影响欧洲国家的内部社会关系，加深了反动，使政府和统治阶级为一方、劳动人民为另一方的矛盾尖锐化。亚洲新的销售市场引起的工业的迅猛发展本身又在老的欧洲国家中加速小生产者的毁灭，加速无产阶级化。这就既在政

<sup>①</sup> 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北部。——编者注

治上也在经济上给阶级斗争带来强有力的新的动力。

但是，当前的整个繁荣时期的最吸引人和最重要的是，就人们能预见的限度来说，它是最后一个繁荣时期。

随着对亚洲的瓜分和吞噬，就没有剩下可供欧洲资本主义征服的新领域了，那时世界真正被瓜分完毕了，一切地方都将有自己的主人。而新的东方问题迟早要进入老的东方问题陷于僵持的那个阶段，即欧洲的对手们一步一步地相互逼近，以致他们最终不得不在紧紧挨着时停止前进。在这期间被唤醒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势力，即高度发展的大工业和庞大的军国主义在没有新的排洪渠道的情况下，开始把整个压力加在社会的躯体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不景气的年代将持续多久，这基本上取决于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进展。因为整个地球一被资本主义包围——这将差不多随着瓜分亚洲而最终完成——，国际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一旦因此高度激化，资本主义本身就将进入穷途末日。只有在它的继承人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足以继承历史的遗产时，它才可能继续艰难地度日。

资本及其政治工具迅猛而贪婪地扑向亚洲，并在三年之内几乎霸占了半个大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空前急迫地象饿狗争夺一块骨头那样为分割最后一口丰盛的食物而彼此冲突，面对这幕世界历史的戏剧，要高谈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放慢”了，高谈什么资本主义的崩溃难以预测、甚至不可能，这实在要具有一头政治鼯鼠的盲目性，它埋头于建造自己的土丘这一纯粹的“实际工作”，对维苏威火山即将爆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发表于1899年3月13日《莱比锡人民报》第59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361—365页。

（于沪生译 殷叙彝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1898年9月—1899年4月)

## 引 言\*

本文的标题乍一看来令人感到惊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吗？或者说，它可以把构成它的最终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现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吗？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各种民主设施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即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唯一道路。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我们在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理论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在他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的、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的一组论文<sup>①</sup>中，特别是在他的《社会主

---

\* 本文以1899年《莱比锡人民报》出版的文本为基础。罗莎·卢森堡在1908年的新版本中所作的修改也包括在内。二版中补充的部分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删去的部分用六角括号( )标明。二版将“引言”改为“第一部分。”——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以下脚注中二版改动部分一律不再标明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编者)

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他表述了这种理论。这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斯坦自己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写道：“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但是，既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区别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用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修补工作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那么，伯恩斯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党内的每一个人必须弄清楚〕<sup>②</sup>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如果匆匆忙忙考察一下伯恩斯坦的理论，可能觉得这是夸大之词。难道伯恩斯坦没有不断提到社会民主党和它的目的吗？难道他自己没有一再重复并明确表示，他也同样谋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吗？难道他没有特别强调他几乎完全承认社会民主党当前的实践吗？当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理论发展和政策方面，任何新方针一开始总是以旧方针为依据，尽管新方针实质上同旧方针是直接矛盾的，新方针首先适应它所遇到的形式，说已经说过的语言。随着时间

---

① 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问题》载于1896—1897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5年卷第1册第164—171、303—311、772—783页；第2册第100—107、138—143页。——编者注

② 二版将删去的这句话改为“归根到底”。

的推移新果实才会脱去旧外壳生长起来，新方针才会获得自己的形式，自己的语言。

指望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地、彻底地表达出它的本质，指望它公开地、直率地否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那就意味着低估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谁今天还算作社会主义者而又同时又想向本世纪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宣战，那他首先必须不自觉地尊敬它，他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支撑点，并且宣称这种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发展。因此，人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伯恩施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内广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对于工人来说，没有别的侮辱和诽谤比这更大更令人愤慨了。拉萨尔曾经说过：只要科学和工人这两个社会中对立的两极结合起来，它们就会抡起自己钢铁般的双臂把一切文化障碍扫除干净。现代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就建立在理论认识上面<sup>①</sup>。

〔但是〕，认识这一点〔在目前〕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谈论的问题正是他们和他们在运动中的影响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伯恩施坦从理论上表述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不是别的，正是让那些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上风，按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不自觉的意图。社会改良和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我们必须积极地、深入地了解目前同机会主义的理论争论。只要理论认识仍然

<sup>①</sup> 参看斐迪南·拉萨尔《科学和工人》，《拉萨尔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76页。——编者注

仅仅是党内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那它就总是有走上歧路的危险。一旦广大工人群众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的、可靠的武器，那么所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所有机会主义思潮就会化为乌有。那时运动也会立于可靠的、坚实的基地上。“群众会去做。”

罗莎·卢森堡

1899年4月18日于柏林]

〔由于党内同志的多次建议，我们将《莱比锡人民报》上刊载过的两组文章（第一组：第219—225期，1898年9月21—28日；第二组：第76—78期，1899年4月4—8日）以小册子形式重印出来。罗莎·卢森堡博士同志在这些文章中对伯恩施坦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原则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批评。其中第一组文章已经售罄，这些批评应该以此形式同更广大的读者见面。我们在附录中将卢森堡同样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第42、43、44、47和48期，1899年2月20、21、22、25和26日）上关于民军和军国主义的文章也一并收入，以作为认识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必要部分。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说明，也完全同意它对伯恩施坦文章的评论。

《莱比锡人民报》]

### 出版者前言<sup>①</sup>

考虑到对早已售罄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的大量需要，我们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二版。我们相信这样做可以适应特别是最近在党内明显兴起的对理论问题的兴趣，因为这本书以简洁明瞭的形式论述了一系列具有长远意义的原则的和科学的问题。作者对这本书作了很多适时的小修改，我们征得作者的同意，除了反对

<sup>①</sup> 二版的前言。

伯恩斯坦的论文以外，还增加了作者亲笔写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论述的都是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样，读者可以在这本小册子里看到从不同方面阐述的关于工资规律、危机、工会、合作社和社会改良等问题。

## 第一部分\*

### 一 伯恩斯坦的方法<sup>①</sup>

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印在人类头脑中的反射<sup>②</sup>，那么，对于伯恩斯坦的〔最新〕理论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往往是颠倒了反射<sup>③</sup>。伯恩斯坦的理论是在施杜姆—波扎多夫斯基时代<sup>④</sup>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英国机器制造工人失败<sup>⑤</sup>之后主张由工会监督生产过程的理论，是在萨克森已经修改了宪法<sup>⑥</sup>、国会选举权遭到扼杀<sup>⑦</sup>之后主张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的理论！但是，伯恩斯坦论述的重点，在我们看来，不是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的见解，而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

---

\* 这是对伯恩斯坦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论文的评论。——卢森堡注

① 二版改为“机会主义的方法”。

②③ 二版改为“反映”。

④ 二版改为“在德国的社会改良已经长眠之后”。卡尔·施杜姆男爵为德国大工业家，德皇威廉二世的朋友，德国国家党的创造人和领袖；阿图尔·波扎多夫斯基-魏纳伯爵是1897—1907年间的内务部国务大臣和副首相。他们都激烈反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主张采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编者注

⑤ 1897年7月至1898年1月间，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约七万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举行罢工。这次罢工尽管英国和德国工人给予强大的声援，仍然遭到了失败。——编者注

⑥ 1896年3月27日萨克森实施选举邦议会下议院的反动的三级选举制。——编者注

⑦ 见本卷第36页注①。——编者注



会客观发展过程所说的话,当然,那些见解同这些话是有密切联系的。

按照伯恩施坦的看法,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的发展而发生总崩溃,看来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生产越来越分化。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的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最后,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

由此可以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斗争得出一个一般结论:它的活动的方针不是去掌握国家政治权力,而是去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不是通过一次社会政治危机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监督、逐步贯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自己看不到他的议论中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倒以为这些议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些说法,同社会民主党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总的方针曾经<sup>①</sup>是一致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如果人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他的观点的实质,那就〕很难否认,它<sup>②</sup>实际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路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如果说伯恩施坦的全部修正归结起来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比人们通常设想的要慢得多,那么,这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把一贯人们所主张的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迟一些,因而在实际上顶多能够得出斗争的速度应当放慢的结论。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伯恩施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本身,以及同

① 二版将“曾经”删去。

② 二版改为“伯恩施坦的见解”。

这个发展进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在这里把两个东西区别开来：其一，这里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二，这些思想的外部形式。

这里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由于自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起来，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不可能生存。人们把这个时机设想成是一个普遍的、震动一切的商业危机的形式，是有他的充分的<sup>①</sup>理由的，但是，虽然如此，对于那个根本思想来说，这个形式总还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东西。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产过程大踏步地走向**社会化**，这就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sup>②</sup>和**阶级觉悟**，这是即将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伯恩施坦所铲除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

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sup>③</sup>，而且也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本身。他明确地说过：“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说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想的**不止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

---

① 二版改为“一定的”。

② 二版改为“组织”。

③ 二版未加着重号。

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者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的分化。”<sup>①</sup>

如果是这样，那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究竟我们为什么能够和怎样能够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人们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在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就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即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点，伯恩施坦也是看到了的，他说：“社会主义的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溃论后——罗·卢·）决不会因此丧失丝毫说服力。因为仔细看来，我们上面列举的消除或限制旧危机的一切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全都同时也是生产和交换社会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sup>②</sup>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证明这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信用制度、交通工具的完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等等当做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现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现象消除了或者甚至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见，消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消除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一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上升到中间阶层，——就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缓和。可是，既然卡特尔、信用制度、工会等等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免于灭亡，把资本主义保存下来，——因此伯恩施坦才把它们称为

① 《新时代》（1898—1899年）第18期第555页。——卢森堡注

② 《新时代》（1897—1898年）第18期第554页。——卢森堡注

“适应工具”，——那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现为“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发端”呢？显然，这是就它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上说的。但是既然它们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资本主义<sup>①</sup>形式上，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同样程度上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这些现象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只是从概念上说是如此，而不是从历史上说是如此。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们不仅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多余的了。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灭亡在精神上的简单反射<sup>②</sup>，——因为这已经被适应工具防止了，——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说服力是以它自己赋予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

总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论据，即唯心的论据，而客观的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论据，却消失了。伯恩斯坦<sup>③</sup>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要末社会主义改造一如既往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sup>④</sup>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就是结果<sup>⑤</sup>，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论是正确的。要末“适应工具”真是这样的东西，它们会防止<sup>⑥</sup>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

① 二版未加着重号。

② 二版改为“反映”。

③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④ 二版改为“内在”。

⑤ 二版在“结果”前面加“不可避免的”。

⑥ 二版改为“‘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

够生存下去，使它的矛盾能够消除，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的结果。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归结起来是另一个；或者，伯恩施坦<sup>①</sup>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想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空想，或者，社会主义不是空想，那么“适应工具”就必然站不住脚。问题就在这里。

## 二 资本主义的适应

在伯恩施坦看来，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适应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信用制度、改善了的交通工具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

先从信用说起，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多方面的职能，但是大家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生产力<sup>②</sup>的膨胀能力<sup>③</sup>，充当交换的媒介和促进交换的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求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即私人资本的有限范围<sup>④</sup>发生冲突的地方，信用就插进来，作为用资本主义方式冲破这个界限的手段，把许多私人资本溶合成一个资本——股份公司，并让一个资本家能够支配别人的资本——工业信用。另一方面，信用作为商业信用加速了商品交换，也就是说，加速了资本回到生产的时间，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信用的这两个职能对于危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很容易看到的。既然，如大家所知道的，危机是从生产的膨胀能力和膨胀趋势<sup>⑤</sup>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那么，照上面所说的情况，信用恰恰是使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发作<sup>⑥</sup>的

---

①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② 二版改为“生产”。

③ 二版改为“扩张能力”。

④ 二版改为“规模”。

⑤ 二版改为“扩张能力和扩张趋势”。

⑥ 二版改为“爆发”。

特殊手段。首先，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程度，造成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但它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作为流通手段<sup>①</sup>把自己唤起的生产力更加彻底地摧毁掉。销路停滞的征候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在它不可缺少的地方却抛弃了交换，在它还存在的地方却证明自己不起作用和没有用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

信用对于危机的形成，除了上述两个最重要的后果外，还有许多影响。信用不仅向资本家提供了支配别人资本的技术手段，而且同时刺激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利用别人的财产，也就是说，去进行大胆的投机。它不仅作为不讲信义的流通手段<sup>②</sup>使危机尖锐化，而且也使危机容易发生和扩大，因为信用把整个流通<sup>③</sup>变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和人为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为现实的基础，因而一个小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

可见，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一般地说不外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的稳定性<sup>④</sup>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的能力<sup>⑤</sup>变成高度能够扩展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能力。因此，危机这个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互相对抗的能力<sup>⑥</sup>的周期冲击<sup>⑦</sup>，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

① 二版改为“商品交换的媒介”。

② 二版改为“商品交换的不讲信义的手段”。

③ 二版改为“交换”。

④ 二版改为“固定性”。

⑤ 二版改为“力量”。

⑥ 二版改为“力量”。

⑦ 二版改为“冲突”。

这同时也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信用一般说来怎样才能表现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呢？通过信用来达到“适应”，不论从什么方面和用什么形式来设想，它的本质显然只能是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缚住的力量解放出来。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有一种手段可以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端的话，这恰恰就是信用。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变得极度紧张，而使交换稍为遇到什么情况就陷于瘫痪。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它使生产中的资本变成社会的资本，而利润<sup>①</sup>则采取了纯粹资本利息的形式<sup>②</sup>，也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财产权名目。信用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强力剥夺许多小资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信用加剧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私有性**<sup>③</sup>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国家干预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需。

总而言之，信用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把它们引向荒谬绝伦的地步<sup>④</sup>，〔它也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不足，〕加快了它走向自己灭亡(崩溃)的速度<sup>⑤</sup>。因此，在信用方面替资本主义寻找的第一个适应手段应当是**废除信用，撤销信用**。象这样的信用，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而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革命手段。正是信用的这种革命的、超越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迷惑人们去制定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改良方案，使主张信用<sup>⑥</sup>的一些

---

① 二版改为“利润的一部分”。

② 二版改为“采取了资本利息的形式”。

③ 二版改为“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④ 二版改为“推动它们达到极端”。

⑤ 二版改为“过程”。

⑥ 二版在“主张信用”之前加了“象法国的伊萨克·贝列拉这样的”。

伟大代表，如马克思所说的，变成一半是预言家，一半是无赖<sup>①</sup>。

经过仔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个“适应手段”——**企业主联合组织**同样也是没有根据的<sup>②</sup>。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些组织通过对生产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当然，只有当卡特尔、托拉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生产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说得通过企业主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sup>③</sup>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消灭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因此，它恰恰不能成为普遍性的组织。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然而，企业主联合组织即使在它实际实现<sup>④</sup>的范围内所起的作用，也是同消除工业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的。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上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为满足国内需需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所要求的利润率要低得多。<sup>⑤</sup>结果，在国外竞争加剧，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愿望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国际制糖业目前的状况<sup>⑥</sup>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整个说来，企业主联合组织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编者注

② 二版改为“站不住脚的”。

③ 二版在“只有当卡特尔……”前面增加了一段话：“从卡特尔和托拉斯多方面的经济作用来观察它们的发展，这还是一个没有被人们研究过的现象。这还是一个问題，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学说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下述一点还是明白的”。

④ 二版改为“应用”。

⑤ 二版在这句话后加了“就是说，它的商品在国外销售时价格比国内低得多”。

⑥ 二版改为“国际制糖业的历史”。



现形式，只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一定阶段。的确是这样！归根结底，卡特尔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手段，是用来制止某些生产部门中利润率的致命下降的。但是，卡特尔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资本闲置起来，使用的方法同危机时是一样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是，这种药方和疾病就象两滴水那样相似，<sup>①</sup>只能到一定时期用来治疗小病。当销售市场开始紧缩的时候<sup>②</sup>（不可否认，这样的时机迟早会来到），把一部分资本强行闲置起来的情况就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使药物转化为疾病，使已经被这些组织大大社会化了的资本又重新变成了私人资本。尽管在销售市场上为自己寻找一个小小的地盘的可能性日益减少，每个私人资本部分宁愿凭自己的本领去碰碰运气。到那时候，这些组织必然同肥皂泡一样破灭，而让位于大大加强了自由竞争。<sup>③</sup>

因此，整个说来，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一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结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

---

① 二版改为“一模一样”。

② 二版改为“当世界市场发展极限，其地盘已被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各国占满，因而销售市场开始紧缩的时候”。

③ 二版在这里加了这样一个注：恩格斯在1894年给《资本论》第3卷写的一个脚注中说：“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1865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的被大资本家吃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7—138页）。

一切内在<sup>①</sup>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它们使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斗争推到了极端。<sup>②</sup>其次它们使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使组织起来的资本的优势力量<sup>③</sup>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因而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以最尖锐的方式加剧起来<sup>④</sup>。

最后，它们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使普遍的关税战争成为必然伴随的现象，因而使各个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sup>⑤</sup>达到极端。<sup>⑥</sup>此外，卡特尔对于生产集中和技术改进等等还有直接的、非常革命的作用。

因此，从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作用来看，卡特尔<sup>⑦</sup>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

但是，如果说，信用制度、卡特尔这一类的手段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那怎么会二十年以来没有发生普遍的商业危机呢<sup>⑧</sup>？难道这不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在主要方面实际上“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所作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吗？<sup>⑨</sup>〔我们相信，目前世界市场上的平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

---

① 二版改为“内部”。

② 二版在这句话之后增加“就象我们特别是在美国所看到的那样”。

③ 二版在这里插入“以最残酷的方式”。

④ 二版改为“达到了极端”。

⑤ 二版改为“对立”。

⑥ 二版全句改为“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推到顶端”。

⑦ 二版加了“和托拉斯”。

⑧ 二版改为“怎么会从1873年以来20年之久我们没有看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呢？”。

人们习惯于把迄今为止发生的巨大的商业危机看作是马克思用图式分析的资本主义的旧危机。这种图式的最好的证明似乎是大约十年一个生产周期。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假如人们仔细考察一下迄今发生的一切巨大的国际性危机的各自不同的原因，他们就会相信，它们全部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年老体弱的表现，倒不如说是表明它正处在幼年时期的表现。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会立刻明白，在1825年、1836年和1847年，资本主义不可能造成象马克思的图式所描绘的那种周期性的、从完全成熟状态中产生的生产力同市场界限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在大多数国家正处在襁褓之中。实际上，1825年的危机是大规模投资修筑道路、开凿运河和开设煤气厂的结果。这些事情和危机一样，主要是前十年间发生在英国。接着而来的1836—1839年的危机，同样是大量投资兴建运输工具的结果。1847年的危机，大家知道，是英国狂热地建筑铁路引起的（1844—1847年，也就是说，在三年期间，议会准许签订建筑铁路租让合同价值约达十五亿泰勒！）因此，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危机都是由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从新建立社会经济<sup>⑨</sup>、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新基础引起的。1857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欧洲工业突然开辟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

---

⑨ 二版在这句话后面增加了这样一段话：“答案紧跟着问题。伯恩斯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掉，1900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七年之后即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因此，资本主义‘适应’论早已板响亮的事实驳倒。同时这也证明，有些人只因为看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两次似乎到了‘支付日期’而没有兑现就放弃了这个理论，他们把这个理论的核心同这个理论在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表面的细节即十年一个周期混为一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60年代和70年代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危机的周期定为十年，这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这个事实并不是依据什么自然规律，而是依据同年青的资本主义的作用范围的跳跃式的扩展联系着的一系列确定的历史情况。”

⑩ 二版将“社会经济”改为“资本的经济”。

新的销售市场,而这又是因为发现了金矿,在法国尤其是因为追随英国的足迹大规模地兴建铁路(1852—1856年法国兴建了新铁路价值约十二亿五千万法郎)。最后,1873年的大危机<sup>①</sup>,大家知道,是德国和奥地利新开办大工业的直接后果,是这种大工业在1866年和1871年<sup>②</sup>的政治事变之后第一次获得迅猛发展的直接后果。

因此,到现在为止,引起商业危机的原因,每一次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范围的突然扩大,而不是因为它的活动范围的缩小,也不是因为它的力量已经用尽,所以到目前为止发生的国际性危机十年一个周期,这纯粹是表面的、偶然的現象<sup>③</sup>。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的图式,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sup>④</sup>提出的图式,之所以适用于迄今为止的危机,只是因为它揭示了一切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深刻的一般原因。<sup>⑤</sup>〔但是,整个说来,这个图式更为适合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里世界市场被设想为现实的东西。只有这样,危机才能采用那种机械的

① 1873年的公司倒闭导致了当时德国十九世纪最严重的周期性产生过剩危机,这一危机是由于1871年德国统一后在经济迅猛发展的高潮中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不成比例的发展造成的。——编者注

② 1866年6月15—8月23日奥地利为取得在德国的统治而发动的反对普鲁士的战争的失败,表明在由反动的普鲁士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战争的结局建立了南德意志联邦。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宣布成立,结束了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行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皇。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由最反动的、最富于侵略性的阶级即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编者注

③ 二版将这句话改为“至于那些国际性的危机恰恰都是十年重复一次,其本身纯粹是表面的、偶然的現象”。

④ 二版改为“第1卷和第3卷”。

⑤ 二版改为“适用于一切危机,只是因为它揭示了它们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深刻的一般原因”。在这句话之后还增加这样一段话:“而不管这些危机是十年一次、五年一次,还是交替出现,每二十年和八年一次。但是,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伯恩施坦的理论缺乏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最近的1907—1908年的危机恰恰是在有名的资本主义‘适应手段’——信用、通讯和托拉斯——最发达的国家闹得最凶”。

方式重复发生，这种危机，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中所设想的，产生于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内在的、固有的运动，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发生突然震动的外部原因引起的。如果我们想一想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达到象马克思的图式中所设想的那种发生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世界市场仍然处在发展中。德国和奥地利在七十年代才进入真正大工业生产阶段；俄国是在八十年代；法国到现在大部分还处于小规模生产阶段；巴尔干各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还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枷锁；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才同欧洲进行大规模的、经常的商品交换。因此，一方面，我们已经摆脱了到七十年代为止周期性出现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新领域进行的突然的、跳跃式的开拓，摆脱了随之而来的先前的危机，即所谓的年青的危机。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力量消耗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力同市场的框框将发生致命的周期性的冲撞，即发生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我们正处在危机不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来的阶段，而且也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而来的阶段。这种过渡时期的特征也就是二十年来一般表现出来的营业不景气过程，即短期的繁荣同长期的萧条交替出现。

但是，我们正在不停顿地接近于末日的开端即资本主义最后危机时期这一点，恰恰是从暂时规定危机还没有到来的那些现象中产生的。如果世界市场基本上已经饱和，不再可能由于突然的扩充面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又在不可遏止地大幅度提高，那么，生产力同交换的界限之间的冲突迟早就会到来，而且这种冲突由于反复发生会变得更加尖锐、更加猛烈。如果有什么东西特别适合于使我们接近这个时期，能够迅速建立世界市场，又能很快使它力量耗尽，那么这恰恰是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所依

据的那些现象——信用制度和企业主联合组织。)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自己“适应”交换这个假设<sup>①</sup>，以下述两种情况之一为前提：或者，世界市场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增长受到阻碍，以致不会超出市场的框框。前者在物理上不可能，后者违反了这一事实，即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门一步一步地前进，每天都在唤起新的生产力。

在伯恩施坦看来，还有一个现象是同上面指出过的资本主义事物发展进程相矛盾的，这就是他向我们指出的中等企业这个“几乎不可动摇的密集队伍”。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标志，即大工业的发展并不象按照“崩溃论”所应该期望的那样，起那么革命的和集中的作用。然而，他在这里做了自己错误理解的牺牲品。如果人们以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等企业就会逐步从地面上消失，那么，这实际上是把大工业的发展完全误解了。

小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进程中恰恰起着技术革命的作用<sup>②</sup>。而且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旧的、稳固的、深深扎了根的部门应用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建立一些新的、还没有被大资本所利用的生产部门。说什么资本主义中等企业的发展<sup>③</sup>是沿着直线逐步走向灭亡的，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实际发展过程在这里也是纯粹辩证的，是在矛盾中不断运动着的。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一样，也处在两种对立趋势的影响之下。一种是提高它的趋势，一种是压低它的趋势。压低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周期性地超过中等资本的生产力<sup>④</sup>，因而中等资本一再被抛到竞争之外。提高的趋

---

① 二版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般说来”。

② 二版改为“恰恰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起着技术革命的先锋作用”。

③ 二版改为“历史”。

④ 二版改为“范围”。

势表现在：现存资本的周期贬值使生产规模——就最低限度必需的资本的价值来说——在一定时候一再缩小。此外，也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新的领域。我们不能把中等企业同大资本的斗争想得和正规战争一样，在这里，军队中较弱的一方是直接数量上日益减少的。也可以说是象割草，小资本被周期性地割短，而后它很快又长高，让大资本用镰刀来再割。这两种趋势好比在玩抓皮球的游戏，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是个皮球，结果同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最后总是压低〔它的〕趋势取得胜利。但是，这不一定表现为中等企业的绝对数量减少，而是表现在：第一，在旧的工业部门中，企业所必需的<sup>①</sup>最低限度的资本额逐渐增加了；第二，小资本独立地利用新工业部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来说，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来说，社会代谢越来越快。

上面说的这一点，伯恩斯坦知道得很清楚，他本人就确认过。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这也就构成了资本主义中等企业发展<sup>②</sup>的规律本身。小资本既然是技术进步的先锋，而技术进步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生命攸关的脉搏，那么，小资本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分离的伴随现象，它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中等企业的逐步消失（在伯恩斯坦所指的统计上的绝对总数的意义上）并不象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样，表示资本主义的革命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它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了，昏昏入睡了。“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对一切新的独立形成的资本嫩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极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sup>③</sup>

① 二版改为“企业生存所必需的”。

② 二版改为“运动”。

③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册第241页。——卢森堡注

〔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手段被证明是毫无效用的，他认为是适应的征候的那些现象应当归之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 三 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否定了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道路的“崩溃论”。那么，按照“资本主义的适应论”的观点来看，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伯恩施坦的答复只是一种暗示，试图按照伯恩施坦的思想详细论述这个问题的是康拉德·施米特<sup>①</sup>。按照他的说法，“为社会改良而进行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将带来“对生产条件的日益加强的社会监督”，通过立法“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一步降到管理者的地位”，直到最后，“资本家看到自己的财产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就可以清除脆弱不堪的资本家领导和管理生产的职务”，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可以最终建立起来。

可见，工会、社会改良，还有伯恩施坦补充的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这就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

我们先从工会谈起。工会最重要的职能（伯恩施坦自己七年前<sup>②</sup>就在《新时代》上解释过，没有人比他解释得更好）<sup>③</sup>在于它是站在工人一边实现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即按照劳动力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卖劳动力的手段。工会给无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能够随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市场的行情。这种行情本身包括：一方面是由生产情况决定的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

① 1898年2月20日《前进报》学术副刊。伯恩施坦对于《前进报》上关于他的观点的评论，连一句不同意的话都没有说，因此，我们更相信应当把康拉德·施米特的说明同伯恩施坦的说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了。——卢森堡注

② 二版改为“伯恩施坦自己在1891年。”

③ 伯恩施坦《关于铁的工资规律问题》第四节，结束语。载于《新时代》1890—1891年第9年卷第1册第600—605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化<sup>①</sup>和自然繁殖造成的劳动力<sup>②</sup>的供给，最后，还有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这一切都处在工会的影响范围之外。因此，工会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工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让资本主义剥削在当时“正常”的界限内进行，但决不能取消这种剥削，哪怕是逐步地取消也做不到。

当然，康拉德·施米特把现在的工会运动看作“软弱的开始阶段”，他相信将来“工会对生产本身的调节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生产调节一词，人们只能有两种理解：第一是参与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第二是决定生产本身的范围。在这两个问题上，工会的作用会具有什么性质呢？显然，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单个〕资本家的利益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完全<sup>③</sup>一致的。正是他们的急需推动他们去改进技术。相反，单个工人的立场却是直接对立的：任何技术由于会使劳动力的价值贬值，<sup>④</sup>所以它同它直接涉及的工人的利益是矛盾的，会直接恶化工人的状况。既然工会可以参与生产的技术方面，那么很明显，它的参与只能在后一意义上，即代表直接有关的单个工人集团的利益来行动，这也就是反对革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不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来行动，因为这些利益同技术进步，也就同单个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恰恰相反，工会的行动是反动的。事实上，对于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去发生影响的企图，我们不是要到康拉德·施米特所追求的未来去寻找，而是要到工会运动的过去去寻找。这种企图标志着英国工联主义的旧阶段（到六十年代为止），那时，英国工联主义还同中世纪行会的传统联系着，典型地表现在

---

① 二版改为“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

② 二版改为“工人阶级劳动力”。

③ 二版改为“在一定范围内”。

④ 二版在这句话之后加了“使劳动更紧张，更单调，更繁重。”

它遵循“相应劳动的获得权”<sup>①</sup>这个已经过时的原则。由工会决定生产范围和商品价格的企图，倒是最近出现的新现象<sup>②</sup>。我们最近才看到有这种企图出现，而且又是在英国<sup>③</sup>。但是，这些企图按其性质和趋势同上面谈的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么，工会积极参加决定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格归结起来应当是什么呢？那就是工人同企业主结成卡特尔反对消费者，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来反对与之竞争的企业主，这些措施同普通的企业主联合组织采取的方法相比也毫不逊色。从根本上说，这已经不再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而是资本和劳动力团结一致同消费社会作斗争。从它的社会价值来看，这是一种反动的开端，不能构成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阶段，倒不如说恰恰代表了阶级斗争的反面。从它的实践价值来看，这是一种空想，稍微思索一下就可证明，它决不可能扩展到较大的和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一些部门中去。

因此，工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进行工资斗争和缩短劳动时间，也就是说，仅仅限于根据市场状况来调节资本主义剥削。至于影响生产过程，按照事物的本质来看，这仍然是工会不可能做到的。不仅如此，工会发展的整个进程的方向同康拉德·施米特设想的恰恰相反，是要使劳动市场完全脱离同其他商品市场的任何直接关系。这方面最典型的事实是，通过浮动工资表制度使劳动合同一般生产状况至少消极地直接联系起来的企图，现在已经落到事物发展的后面了，英国工联越来越躲避这种作法。<sup>④</sup>

但是，就在工会运动事实上起作用的范围之内，它也不象资本适应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完全相反！如果从社会发展较大范围着眼，我们就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就是总的说来，

---

① 维伯《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100页以下。——卢森堡注

② 二版改为“一种新现象”。

③④ 维伯《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115页以下。——卢森堡注

我们面临的不是工会运动走向强大高潮的时代，而是工会运动走向没落的时代<sup>①</sup>。如果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点，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工会斗争还会加倍困难，第一，对于劳动力来说，客观的市场情况恶化了，因为同现在的情况相比，需求增加得要慢，而供给增加得要快。第二，资本本身为了弥补世界市场上的损失会夺回<sup>②</sup>已经归工人的那部分产品。降低工资不正是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吗<sup>③</sup>！英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的第二阶段的图景。在这里，工会运动不得不日益单纯地保护既得的成果，并且连做这件事也越来越困难。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事物的一般进程。而在这一进程的另一面和同它相关联的东西<sup>④</sup>必然是政治的和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高涨。

在**社会改良**问题上，康拉德·施米特同样犯了颠倒历史前景的错误，他相信社会改良“同工会组织携起手来给资本家阶级订出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才能利用劳动力”。在这样理解社会改良的意义上，伯恩斯坦称工厂立法是一部分“社会监督”，既然是一部分“社会监督”，因而也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在谈到国家的劳动保护的地方，总是使用“社会监督”一词，他既然这样巧妙地把国家变成了社会，他也可以敢于补充一句：“这就是上升着的工人阶级”；通过这样的手法，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无辜的劳动保护条例就一变面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措施了。

这里的欺骗手法是一望而知的。今天的国家恰恰不是“上升

---

① 二版改为“不是工会运动胜利发展势力的时代，而是工会运动困难增加的时代”。

② 二版在“夺回”前加了“越来越顽固地”。

③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16页。——卢森堡注

④ 二版改为“在这一进程的背面”。

着的工人阶级”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即阶级国家**。因此，它所安排的社会改良也不是一种“社会监督”，也就是说，不是自由劳动着的社会对自己的劳动过程的监督，而是**资本的阶级组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监督**。因此，在这里，资本的利益，也就是社会改良的自然界限。当然，伯恩斯坦和康拉德·施米特在这方面现在也仅仅是看到“软弱的开始阶段”，相信将来有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无限高涨的社会改良。可是，这样一来，他就犯了同他们设想工会运动会始终高涨<sup>①</sup>一样的错误。

通过社会改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以一定的客观发展为先决条件的，这里既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展，也包括国家的发展，**这是这个理论的重点所在**。关于前者，康拉德·施米特设想的未来发展的图式是：“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他看到生产资料似乎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剥夺，就准备了一个**逐步剥夺**的理论。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必需的条件，就是把所有权分为“最高所有权”和使用权。“最高所有权”赋予“社会”，他希望它不断扩大。使用权留在资本家手中使之日益缩小为单纯的管理权<sup>②</sup>。这种想法要末是一种无害的文字游戏，不值得认真去考虑，这样，逐步剥夺论就仍然是毫无根据的。要末它是一个关于权利发展的严肃图式，那它就是完全错误的。把所有权分割为包含在其中的各种权限（康拉德·施米特在这里给“逐步剥夺”论找了个藏身之所），是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在这里，生产物在不同社会阶级中的分配是采取实物形式，并且根据身份关系<sup>③</sup>来进行。在这里，把所有权分割为各种不同的部分<sup>④</sup>，反映了

---

① 二版改为“工会运动的力量无限发展”。

② 二版改为“对他的企业的单纯管理权”。

③ 二版改为“领主和臣属之间的身份关系”。

④ 二版改为“各种不同的局部权利”。

事先决定的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组织工作。随着过渡到商品生产,随着参加社会生产过程的人们之间的一切身份联系的消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私有制)反倒巩固起来了。由于分配不再是通过身份关系,而是通过交换来实现,所以对于参加社会财富的各种权利的计算,就不再是靠分割一个共同对象的所有权,而是靠各人带到市场上来的价值。随着中世纪城市公社中商品生产的兴起,出现了权利关系的第一次突变,在所有权处于分割状态的封建权利关系的娘胎里,培植了绝对的、排他的私有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发展在继续进行<sup>①</sup>。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分配过程就越是建立在纯粹交换基础上,私有制<sup>②</sup>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和具有排他性。<sup>③</sup>当资本家还是自己领导工厂的时候,分配总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本人参加生产过程有联系。随着厂主的亲自领导日益变成多余,而且在股份公司中已成为事实,资本所有权作为在分配中提出要求的名目就完全同生产中的个人关系相脱离<sup>④</sup>,以最纯粹的、排他的形式出现。在股份资本和工业信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主义所有权才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康拉德·施米特关于历史的图式<sup>⑤</sup>,即“从所有者到单纯的管理者”,是颠倒了的实际发展。这种发展正相反,从所有者兼管理者到单纯的所有者。在这里,歌德的诗句用在康拉德·施米特身上是很恰当的:

抓在手上的,看起来恍恍惚惚,  
早已消失的,对他倒真真实实。

---

① 二版改为“继续前进”。

② 二版在“私有制”前加了“资本主义”。

③ 二版在这句话之后补了一句话:“资本所有权就越是从一个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变成纯粹占有别人劳动的权利”。

④ 二版改为“完全同个人与生产的关系相脱离”。

⑤ 二版改为“象康拉德·施米特所描绘的资本家历史发展的图式”。

从经济方面看，他的历史图式是从现代股份公司退到手工工场，甚至退到手工作坊。从法律上看也是一样，是想从资本主义世界缩到封建自然经济的蛋壳中去。

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个“社会监督”也就同康拉德·施米特看到的不一样了。今天当作“社会监督”起作用的，如劳动保护、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等，实际上同所有权的一份，同“最高所有权”毫无共同之处。它们的活动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进行限制，相反倒是对它实行保护。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如果伯恩施坦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工厂法中是否或多或少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议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汽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监督”，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

#### 四 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

在伯恩施坦看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前提是国家发展成为社会。今天的国家是阶级国家，这已经是常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命题同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的所有一切命题一样，不能固定地、绝对地去理解，而要在流动的发展中去理解。

随着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胜利，国家就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当然，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使国家的本质有了重大的改变，因为它不断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不断赋予国家新的职能，特别是经济生活方面使国家的干预和监督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为将来的国家同社会的溶合，即所谓国家职能归还社会逐渐准备了条件。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国家在向社会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保护是“社会”对于它的社会生活过程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干预，伯恩施坦也引过这句话，毫无疑问，这句话也是在

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国家的本质发生了另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属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组织<sup>①</sup>。如果国家为了社会发展的利益担负了各种具有共同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发展同整个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是相符合的。而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国家才能担负这样的职能。例如，劳动保护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来说，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样，都是同样有直接的利益。但是，这种协调只继续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为止。如果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同经济进化<sup>②</sup>的利益甚至在资本主义意义上也开始分离了。我们相信这一阶段已经到了，这一点表现在今天社会生活的两个极重要的现象上：**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起过不可缺少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在一些国家里，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大工业的兴起是不可能的<sup>③</sup>。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sup>④</sup>〔在一切最重要的国家，特别是恰恰在那些极力推行关税政策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水平几乎是一样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究竟德国向英国多出口商品还是英国向德国多出口商品，都是一样的。从这一发展的观点出发，摩尔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可以走了。而且他必须<sup>⑤</sup>走了。现在各工业部门是互相依赖的，对某些产品征收关税，就会抬高国内其他商品的生产价值，也就是说，工业发展

---

① 二版改为“一个组织”。

② 二版改为“经济进步的利益”。

③ 二版改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④ 二版在这句话后面增加了一段话：“今天，保护关税不是用来扶植年轻工业使其成长，而是用来人为地保持过时的生产形式”。

⑤ 二版“必须”加了着重号。

又受到束缚。但是，从**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是这样了。工业为了自己的**发展**不需要关税保护，但企业主却需要关税来保护他们的**销售**。这就是说，关税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对抗更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保护手段，而是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用来反对另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的斗争手段。其次，关税作为形成和征服国内市场的工业保护手段已经不再有必要了，它倒成为工业卡特尔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也就是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者同消费者的社会进行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最后，最鲜明地表现出今天关税政策特征的事实是，现在在关税政策中到处起决定作用的根本不是工业，而是农业，也就是说，关税政策已经变成**将封建利益注入资本主义形式并且用来表现封建利益**的手段了。

军国主义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是用本来可以怎样或应该怎样的眼光看历史，而是根据它事实上怎样来看历史，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和德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俄国和波兰，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从战争中获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或推动的，不管它们胜利或失败，情况都一样。只要有这样的国家，其国内还有分裂状态或者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需要克服，军国主义也就起着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革命作用。今天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同了。（军国主义已经不再有地盘为资本主义开拓了。）如果中国已经成为可怕的冲突舞台，那么，问题与其说在于为欧洲资本主义开拓中国，不如说在于把现成的**欧洲对立**移植到中国并在中国土地上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已。<sup>①</sup>今天无论在欧洲或世界其他部分，手持武器互相对抗的，

---

① 二版改为“如果世界政策已经变成可怕的冲突舞台，那么，问题与其说在于为资本主义开拓新的国家，不如说在于把现成的**欧洲对立**移植到世界其他部分并在那里暴露出来而已”。



不是一方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自然经济的国家，而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达到同样高的水平而迫使发生冲突的那些国家。对于这种发展本身来说，这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就自然只能具有致命的意义，因为它将〔在这一次完全无目的地〕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变革。但是，从资本家阶级的观点来看，事情并非如此。今天，军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正在竞争的“民族”利益反对其他民族集团的斗争手段；第二，它无论对于金融资本或工业资本都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第三，它是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国内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切利益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sup>①</sup>是毫无关系的。而最好地暴露今天军国主义的这一特殊性质的，首先是军国主义在一切国家中因竞赛而普遍高涨，即所谓受本身内在的机械动力的推动而普遍高涨。这是一、二十年前还没有的现象。其次是日益临近的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命定的性质，但同时它的原因、首先涉及的国家、争执的对象及其他详情却还完全不能确定，军国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发动机<sup>②</sup>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疾病。

在前面所说的社会发展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冲突中，国家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一样，在政策上同社会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因而它日益丧失整个社会代表的性质，在同一程度上，它日益变成纯粹的阶级国家，或者说得确切些，国家的两种特性彼此分离了，矛盾尖锐化了，日益发展成为国家本质内部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化。因为，一方面，国家的一般职能、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监督”增长了。但是，另一方面，它的阶级性质总是迫使它把它的活动重点和力量手

---

① 二版改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本身”。

② 二版改为“动力”。

段放在只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用而对社会只有消极意义的领域，即放在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上。其次，由于这种情况，它的“社会监督”也就越来越为阶级性质所渗透和支配（可以看看〔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劳动保护措施）。

上面所说的国家本质方面的变动，同伯恩斯坦当作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民主主义并不矛盾，不如说，倒是完全符合的。

康拉德·施米特说过，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甚至是社会的这种逐步社会化的直接道路。毫无疑问，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是最清楚地表明国家向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在这个限度内，它构成了走向社会主义变革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上面描述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中的那种矛盾却极其鲜明地表现在现代民主制<sup>①</sup>中。固然，从形式上看，民主制<sup>②</sup>是用来在国家组织中表现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表现的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此，就形式说是民主组织，就内容说变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一点极其明显地表现在下述事实上：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事实上的人民利益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思想就是一种盘算<sup>③</sup>，只考虑到民主的形式上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它的另一面即它的实在内容。民主制<sup>④</sup>整个说来不象伯恩斯坦所设想的那样，是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使资本主义的对立趋于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

---

① 二版改为“现代议会制”。

② 二版改为“议会制”。

③ 二版在“一种盘算”前加了“完全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作出的”。

④ 二版改为“议会制”。

的特殊手段<sup>①</sup>。

由于国家的这种客观发展，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关于“社会监督”的发展会直接带来社会主义的信条，就成了与现实日益矛盾的空话。

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逐步〔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方向〕<sup>②</sup>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改良。可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客观进程，这两者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生产过程越来越社会化，而国家对这个生产过程的干预和监督越来越广泛。但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牢固和不可侵犯<sup>③</sup>，国家监督越来越为排他的阶级利益所渗透。因此，国家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和所有权关系即资本主义的权利组织，随着发展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的**。它们向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傅立叶想用他的法伦斯泰尔<sup>④</sup>制度把地上的海水〔一下子〕变成柠檬汁，真是异想天开。但是，伯恩施坦想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高更牢固<sup>⑤</sup>。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

① 二版改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特殊手段”。

② 二版改为“以社会主义精神”。

③ 二版改为“越来越变成对别人劳动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

④ 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合作社的成员工作和居住的地方。——编者注

⑤ 二版改为“更牢固更结实”。

## 五 理论<sup>①</sup>的实际结论和一般性质

我们在第一部分<sup>②</sup>想说明，伯恩施坦的理论是要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放到唯心主义基础上去。这是涉及理论根据的问题。那么这个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又是怎样的呢？最初看来，在形式上它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迄今为止的通常的实际工作并无区别。工会、争取社会改良和政治设施民主化的斗争，这也就是通常构成社会民主党活动内容<sup>③</sup>的东西。因此，区别不在于什么，而在于怎么干。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被看作是逐步引导和教育无产阶级走向夺取政权的手段。按照伯恩施坦<sup>④</sup>的见解，既然夺取政权没有可能、没有益处，这种斗争应该只是为了取得直接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了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为了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和扩大社会监督。如果我们把直接提高工人生活这一目的撇开不谈（因为在这一点上党内的普通观点和伯恩施坦<sup>⑤</sup>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么，全部区别可以归结为：按照普通的观点，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意义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因素准备好。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它们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本身，去掉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赋予它社会主义性质，一句话，在客观的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仔细观察一下，这两种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党内普通的观点来看，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使无产阶级深信<sup>⑥</sup>，

---

①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② 二版改为“第一章”。

③ 二版改为“形式上的内容”。

④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⑤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⑥ 二版改为“无产阶级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深信”。

通过这些斗争切切实实改善<sup>①</sup> 它的状况是不可能的，最后夺取政权则是不可避免的。用伯恩施坦的观点来看，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前提出发，通过单纯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相信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社会主义化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正象我们力图说明过的那样，在事业上纯粹是妄想<sup>②</sup>。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国家制度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但是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际斗争归根结底也就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了。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伟大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它们使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sup>③</sup>。当人们把它们理解为直接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化的手段时，它们不仅丧失了它们所捏造的作用，同时也丧失了其他〔唯一可能的社会〕意义，即它们不再是教育工人阶级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sup>④</sup> 的手段了。

因此，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自己安慰自己说，即使把斗争转移到<sup>⑤</sup> 社会改良和工会斗争方面，也不会使工人运动丧失最终目的，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引出后一步，所以社会主义目的作为一种趋势也包含在运动本身之内。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理解之上的。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来说，如果在进行工会斗争和社会改良斗争之前有一个夺取政权的自觉的坚定的意图作为指路明灯的话，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如果人们把这种预先确定了的意图同运动分离，首先把社会改良当

① 二版改为“从根本上改变”。

② 二版改为“幻想”。

③ 二版改为“使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

④ 二版改为“去实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⑤ 二版改为“即使把全部斗争局限于”。

做目的本身，那么，〔事实上〕社会改良不仅不能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且还会达到相反的结果。康拉德·施米特单纯地相信所谓一发不能自止的机械运动，他以“越吃越想吃”这个简单的谚语为依据，认为工人阶级不完成社会主义变革就决不会对改良心满意足。后面的这一假设当然是对的，而且资本主义社会改良本身的缺陷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在能够创造一个链条般的连续不断的、日益发展的社会改良把今天的制度<sup>①</sup>直接引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由此得出的结论才是正确的。然而这是一种空想。这个链条按照事物的本质很快就要断了，到那时运动从这一点出发所采取的途径就会是多种多样的。

到那时，最直接最可能的结果是在策略上作一些改变，以使用一切办法实现斗争的实际成果即社会改良。一旦直接的实际结果成为主要目的，那种只对致力于夺取政权有意义的不调和的、严峻的阶级立场就会越来越变成一种消极力量<sup>②</sup>。因此，下一步就是补偿政策<sup>③</sup>和迎合迁就<sup>④</sup>的政治家的明智态度。但是，在这种条件下，运动也不可能经常保持平衡<sup>⑤</sup>。因为社会改良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始终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空壳，那么不管人们采取什么策略，下一步在逻辑上就会是对社会改良产生失望。这也就是说，对施穆勒<sup>⑥</sup>之流<sup>⑦</sup>正在停泊的避风港失望了。他们在社会改良的大海上漫游之后，已经决定让一切听天由命<sup>⑧</sup>。由此可见，社

---

① 二版改为“把今天的社会制度”。

② 二版改为“单纯的障碍”。

③ 二版改为“‘补偿政策’（用正确的德语说是贿赂政策）”。

④ 二版改为“调和让步”。

⑤ 二版改为“长久停留”。

⑥ 二版加了“教授”。

⑦ 指古斯塔夫·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和路·布伦坦诺。他们都是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会主义决不是在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作为一种趋势所固有的，它在这里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尖锐化的客观矛盾所固有的，也是工人阶级主观上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所固有的<sup>⑧</sup>。如果象伯恩施坦在他的理论中所做的那样<sup>⑩</sup>，不承认前者，又拒绝后者，那么运动<sup>⑪</sup>就会起先降低为简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并且由于本身的重力最后落到放弃阶级立场的地步。

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看伯恩施坦的理论<sup>⑫</sup>，并且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观点的一般性质是什么？那么上述那些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伯恩施坦<sup>⑬</sup>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地上的，不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道否认资本主义的矛盾的。相反，他在理论上也和马克思的观点一样，是以这种矛盾的存在为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的依据不是认为消灭这些矛盾要通过自己本身的彻底发展。这一点是他的见解<sup>⑭</sup>的一般核心，也是同迄今为止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根本分歧所在。

---

⑧ 二版在这里加了一个注：“1872年，瓦格纳、施穆勒、布伦坦诺等教授在爱森纳赫召开了一次大会，大张旗鼓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实行社会改良以保护工人阶级。这些被自由党人奥本海姆讽刺地称为‘讲坛社会主义’的先生们不久之后建立了‘社会改良同盟’。几年后，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尖锐化的时候，这些‘讲坛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以议员资格投票拥护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期限。此外，这个同盟的全部活动就是常年开大会。在会上以各种题目宣读一些学术性报告。其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著已由该同盟出版了100多部。这个同盟最后连社会改良也放弃了，而从事研究危机、卡特尔之类的问题去了。”

⑨ 二版将这句话改为“社会主义决不是在任何环境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也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

⑩ 二版改为“如果象修正主义那样”。

⑪ 二版改为“工人运动”。

⑫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理论”。

⑬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⑭ 二版改为“观点”。

他的理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他不愿意〔让〕矛盾<sup>①</sup>发展到完全成熟，通过革命的突变在矛盾的尖端消灭<sup>②</sup>矛盾，而是宁愿折断矛盾的尖端，缓和矛盾。因此，〔按照他的理论〕，危机的终止和企业主联合组织的建立应该缓和生产与交换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状况的改善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应该缓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监督的发展和民主制的发展应该缓和阶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

当然，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不是说人们等待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极端并且到那时才发生突变。相反，人们只是依靠<sup>③</sup>已经存在的<sup>④</sup>发展方向，但是要在政治斗争中使它的后果发展到极端，〔人们预见到这种发展，人们可以说是打折扣预支进一步的客观发展，并且在任何时候都站在使发展了的矛盾完全成熟的基地上，〕这是任何革命策略一般具有的本质。因此，例如对于关税和军国主义来说，社会民主党即使在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还起着革命作用的时候也要与之斗争<sup>⑤</sup>。但是，伯恩斯坦的策略根本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尖锐化上面，而是建立在矛盾的缓和上面。他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时对于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这种观点什么时候才会是正确的呢？今天的社会的一切矛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如果我们假定这种生产方式还要继续朝着迄今已知的方向发展，那么，它的一切后果必然会不可分割地同它一起向前发展，也就是说，矛盾将会尖锐化而不是缓和。因此，反过来说，矛盾的缓和是以资本主义生

---

① 二版改为“资本主义矛盾”。

② 二版未加着重号。

③ 二版改为“我们只是依据”。

④ 二版改为“已经认识的”。

⑤ 二版改为“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进行斗争，不是等到它们的反动性质完全暴露时再进行斗争”。



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遇到阻碍为前提的。总之，伯恩施坦理论的最一般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止**。

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理论也就自己对自己作了判决，而且这种判决有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方面，这个理论暴露出空想性质（显然，发展停滞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实际结论所作的说明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从资本主义事实上在迅速发展来看，这个理论暴露了它的反动性质。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是这样的，那么怎样解释，或者也可以说，怎样说明伯恩施坦理论观点的特征呢？

伯恩施坦在他对于今天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用来作为出发点的经济前提，即他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们相信在第一章中已经说清楚了。我们看到，不论信用制度还是卡特尔，都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不论危机的停止<sup>①</sup>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都不能理解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性的象征。但是，上面所说的适应论的一切细节（姑且不论它们的直接错误），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为基础的。这个理论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放在它们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机部分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的关联上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联系中割裂开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例如，对于**信用的适应作用**的理解就是这样。如果人们把信用看作是交换的一个自然发展的更高阶段，而且同资本主义交换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有联系，那就不可能把信用看作似乎是什么处于交换过程之外的机械的“适应手段”。正象不能把货币本身、商品和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样。但是，信用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有机的一环，在这一点上，它毫

<sup>①</sup> 二版改为“暂时停止”。

不亚于货币、商品和资本。在这个阶段上，它也同它们一样，既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也是一个破坏工具，因为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

对于卡特尔和完善的交通工具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伯恩施坦把危机的停止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适应”的征候，这同样表现出他的机械的、非辩证的理解方法。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经济机器中的故障，如果危机停止了，这部机器就可以正常地运转。但是，危机事实上不是平常意义上的“故障”，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故障，但没有它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进行。危机，简单说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因此它是周期地解决生产力的无限的发展能力和实现的狭小的框子<sup>①</sup>之间的矛盾的正常的方法，只要这是事实，那么，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生产“无故障”的进程中反倒存在着一种比危机本身更大的危险。这就是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它不是由生产与交换的矛盾产生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本身造成的。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有一个最危险的趋势，就是它使一切中小资本的生产成为不可能，因而限制了新的投资的形成和进步。在这同一过程中作为另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危机，由于它周期地使资本贬值，由于它使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使一部分活动中的资本停顿下来，恰恰是它反倒起了提高利润的作用，因而为生产中新的投资和新的进步开辟了场所<sup>②</sup>。所以危机好象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之火重新旺盛起来的一个手段，而危机的停止（如果不是象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在世界市场成长中的一定阶段<sup>③</sup>停止，而是根本不出现危机）就会不

---

① 二版改为“生产的无限扩展能力和销售市场的狭小的框子”。

② 二版改为“地盘”。

③ 二版改为“不仅是在世界市场成长中的一定时期”。

是象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不久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兴旺发达，而会把它直接带到泥潭中去。构成整个适应论的特色的机械的理解方法，使伯恩施坦既看不到危机的积极意义，也看不到资本的分散趋势<sup>①</sup>。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小资本的不断复活是资本主义停滞的标志，而不是事实上的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当然，有这样一个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上面所讲的一切现象实际上就象适应论<sup>②</sup>所描述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单个资本家的观点，他们了解的经济生活的各种事实是被竞争规律所歪曲了的。单个资本家首先事实上把经济整体中的每个有机组成部分看作完全独立的东西。其次，他只是从对他，即对个别资本家发生作用的那一面来看，因此把它看成单纯的“故障”或单纯的“适应手段”。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危机实际上只是故障，而危机的停止可以保证资本家延长寿命；对他来说，信用同样是他不充分的生产力“适应”市场需要的手段；对他来说，他所参加的卡特尔实际上也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论不过是单个资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论概括。但是，难道这种理解方法在理论表述上没有表现出庸俗经济学的实质和特点吗？这个学派在经济学上的一切错误，正是建立在把个别资本家眼中的竞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现象的错误理解上。例如，正象伯恩施坦把信用看作“适应手段”一样，庸俗经济学也把货币当作对市场需要的巧妙的“适应手段”，它也是从资本主义的现象本身去寻找治疗资本主义病症的解毒药，它同伯恩施坦一样，也相信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最后，归根结底，它也同伯恩施坦的理论一样，总是想缓和资本主义的矛

① 二版改为“既看不到危机是不可缺少的，也看不到中小资本周期性的不断增长的  
投资也是不可缺少的”。

② 二版“适应论”三字加了双引导。

盾,给资本主义的伤口贴膏药。换句话说,它采取的是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因此是一种空想。

因此,伯恩斯坦<sup>①</sup>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 第二部分\*

### 一 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由于这一发现,社会主义就从几千年来人类模模糊糊憧憬的“理想”变成了历史的必然。

伯恩斯坦否认在现代社会中存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论证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发展。最初,在《新时代》杂志上,他只是否认工业集中的速度,他依据的是1895年和1882年德国工业统计对比材料。而为了利用这个材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得不采用纯粹累计的和机械的方法。但是,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伯恩斯坦用他关于中等企业顽强性的论证也丝毫不能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为这个分析既没有把工业集中的一定速度即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一定期限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也没有把我们已经指出过的〔第17页<sup>②</sup>〕小资本的绝对消失或小资产阶级的消失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①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 这是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899年斯图加特版)的评论。——卢森堡注

② 参看本卷第87—89页。——编者注

伯恩施坦在书中进一步发挥自己观点的时候引证了新的证明材料，这就是**股份公司的统计材料**。他以为统计材料表明股东在不断增加，因此资本家阶级不是减少了，而相反地越来越增加了。伯恩施坦多么不熟悉这些材料，多么不懂得为了自己的利益运用这些材料，真是令人吃惊！

如果他真的想用股份公司证明什么违反马克思的工业发展规律的东西，他本来应该使用别的材料。每个了解德国股份公司历史的人都知道，平均投入每个企业的创业资本几乎是不断减少的。这种资本在1871年以前约一千零八十万马克，1871年只有四百零一万马克，1873年三百八十万马克，1883—1887年不到一百万马克，1896年只有五十六万马克，1882年六十二万马克，从那时以来，总额在一百万马克上下摆动，但它又从1895年的一百七十八万马克降到1897年上半年一百一十九万马克了。<sup>①</sup>

多么惊人的数字！伯恩施坦大概会利用这个数字制造一个由大企业退回到小企业的完全反马克思的趋势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反驳他说，如果你想用这个统计材料证明什么，那你就必须首先证明，这些统计材料指的是**同样的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小企业代替了原来的大企业，而小企业不会在当时还没有企业<sup>②</sup>或有作坊或有细小企业的地方出现。但是你是无法作这样证明的，因为大股份公司过渡到中小股份公司只能用股票业务不断渗入新的部门来解释，而且如果在开始时它只适用于少数大企业，那么现在越来越适用于中等企业，有些地方甚至适用于小企业了。（用一百马克以下建立的股份公司也出现了！）

但是，股票业务的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方面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生产社会化向前发展了**，不仅大生产社

<sup>①</sup> 见王德博尔得《政治科学手册》。——卢森堡注

<sup>②</sup> 二版改为“当时有单个资本”。

会化，中等的甚至小生产也社会化了，这也就是说，这种现象不仅不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矛盾，而且是这一理论的可以想象到的最辉煌的证明。

的确是这样！发行股票这种经济现象的内容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把许多小的货币资本联合成一个生产资本，联合成一个经济单位，另一方面，是生产同资本所有权脱离，因此，这在两重意义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然站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斯坦引证的统计材料中所说的参加一个企业的股东数目很大又说明什么呢？这只不过说明，现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象过去那样相当于一个资本所有者，而是相当于大批的、人数不断增加的资本所有者，因而“资本家”这个经济概念不再是指“人”<sup>①</sup>，今天的资本家<sup>②</sup>是一个集体，是由几百甚至几千人组成的，“资本家”这个范畴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框里变成社会范畴了，它社会化了。

既然如此，伯恩斯坦把股份公司这个经济现象恰恰反倒理解为资本的零散化<sup>③</sup>，而不是资本的集中，在马克思认为是“资本所有权扬弃”<sup>④</sup>的地方，伯恩斯坦看到的是资本所有权的扩张，这又怎么解释呢？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庸俗经济学的谬误来解释：因为伯恩斯坦理解的资本家不是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纳税单位，他理解的资本，不是一个生产整体，而是一个简单的货币财产。因此，他在英国纺线托拉斯中看到的不是一万二千三百人合为一体，而是看到整整一万二千三百个资本家，因此，在他看来，工程师舒尔采也是个资本家，

---

① 二版改为“个人”。

② 二版在“资本家”前面加了“工业”。

③ 二版改为“分散”。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编者注

因为他从食利者缪勒那里得到了“一大笔股票”作为妻子的妆奁(见54页)<sup>①</sup>,因此,在他看来,全世界密密麻麻一大片都是“资本家”。<sup>②</sup>

但是,这里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庸俗经济学的谬论只是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庸俗化的理论基础。当伯恩斯坦把资本家这个概念从生产关系搬进财产关系中去,“不谈企业主而谈人们”(第53页)的时候,他也就把社会主义从生产范围搬进财产关系范围,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搬进**贫与富**的关系中去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顺利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被带到《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作者魏特林那里去了**,只是有一个区别:魏特林正是运用正确的无产阶级本能在原始形式的这个贫富对立中**认识到阶级对立**,并且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杠杆,而伯恩斯坦则相反,他是通过化贫为富即抹杀阶级对立的办法,也就是采用小资产阶级的**手法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

当然,伯恩斯坦不仅限于收入统计材料。他还拿出了企业统计材料,而且有许多国家的,有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奥地利和美国的。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统计材料呀?这不是每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可以比较的材料,而是不同国家一个时期的材料。因此,他不

① 本文中以下罗莎·卢森堡在圆括弧内注明的页码均为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② 注意!伯恩斯坦显然认为,小股票的大量推广是社会财富已经开始把它的股票之福降于小民的证明。实际上,除了小资产者或者甚至工人以外,谁还去购买例如1分尼或20马克这样的小股票呢!很遗憾,这个假设是根据一个错误的计算得来的:用的是股票的**票面价值**,而不是**市场价值**,而这是两回事。可以举个例子。在采矿业市场上,其中就有南非边区的股票交易。其股票大部分的票面价值是1分尼(等于20马克)。但它目前的价格已经是43分尼(见3月底的行情表)。也就是说,不是20马克,而是860马克。一般情况平均都是如此。因此,“小”股份虽然听起来很民主,实际上大部分是中等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票据”,而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按票面价值能获得这种股票的人,在全部股东之中只占极小部分。——卢森堡注

是把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企业组成情况作比较(除德国外,他重复了过去1895和1882年的对比情况),而只是把不同国家的**绝对数**作比较(英国是1891年的,法国是1894年的,美国是1890年的,诸如此类)。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大企业今天事实上在工业中已经占优势,那么把依靠它的企业一起计算进去,即使在普鲁士这样先进的国家,最多只代表**生产人口的一半**”,在整个德国、英国、比利时等国,情况也是一样(84页)。

他用这种办法要证明的,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这种或那种趋势**,而只是不同企业形式或者说不同行业的**绝对力量的对比**。如果这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么这种证明所根据的理论是,决定社会意图结局的,是斗争双方的数量上的、物理上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是单纯的**暴力因素**。伯恩斯坦处处反对布朗基主义,但他在这里却犯了最严重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布朗基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派别,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可以实现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指望暴力革命,甚至是少数人的暴力革命。但是,伯恩斯坦却相反,他根据人民在数量上没有达到多数而得出了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的结论。社会民主党获得自己的最终目的既不是依靠少数人的胜利的暴力,也不是依靠多数人数量上的优势,而是依靠经济必然性和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这种必然性引导人民群众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必然性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上。

在谈到最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问题时,伯恩斯坦本人只否认大的、普遍的危机,而不否认局部的、个别国家的危机。因此,他只是否认太多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却承认存在一点无政府状态。在伯恩斯坦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用马克思的说法——就象那个怀了孩子的傻处女一样,孩子“不过是那么一点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象无政府状态这样



的事，一点和很多是同样糟糕的。如果伯恩斯坦承认有一点无政府状态，那么商品经济的机构本身就会注意使这种无政府状态强化到极大的程度——直至崩溃。但是如果伯恩斯坦在保持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希望使这一点无政府状态逐步溶化在秩序和协调之中，那么他又犯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他把交换方式看成了不以生产方式为转移的东西。〔①〕

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里暴露了他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惊人的混乱，要把它和盘托出，这里不是适当的地方。但是，有一点

① 二版删去了这里的一个脚注：“的确，伯恩斯坦对我们刊登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第一组文章的有些地方的答复是相当广泛的，不过他还是露出了自己的狼狈相。例如，他为了轻易地答复我们关于他对于危机所持的怀疑态度的批评，竟认为我们把马克思的整个危机理论变成了未来的音乐。但这是随意曲解我们的话，因为我们说的仅仅是危机的通常的机械的周期的图式，确切些说，是仅仅适合于充分发展了的世界市场的十年一次循环的危机的图式。至于谈到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内容，我们认为它是对机构（Mechanismus）的唯一科学的表述，也是对迄今发生的一切危机的内在经济原因的唯一科学表述。”

伯恩斯坦对于我们其他的批评的答复更加令人吃惊。例如，卡特尔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提供对抗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手段。因为它们（如制糖业所表明的）只是在世界市场上造成了尖锐的竞争。对于这一点伯恩斯坦回答说，这固然是对的，但是英国制糖业的尖锐竞争却有力地促进了果酱和罐头的制造（第78页）。这个回答使我们想起了奥伦多尔夫的语言自修课本第一部分的会话练习：“袖子短但是鞋子小，父亲个子高但是母亲已经睡觉了”。

我们说，信用也不可能是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适应手段”，因为它使这种无政府状态反倒更为加剧。伯恩斯坦对于我们的这个论证也用同样的逻辑回答说，信用除了有破坏性外，还有积极的“创造”性，这一点连马克思也是承认的。对于那些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上，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看到了社会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变革的一切积极出发点的人来说，关于危机的这个论据是一点也不新鲜的。这里争论的问题是，信用的这种积极的、超越资本主义范围的特性是否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地实现，信用是否象伯恩斯坦所设想的那样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象我们所指出过的那样，它本身反而蜕变为相反的东西，只会使无政府状态更加扩大。伯恩斯坦一再重复的“信用的创造能力”（这的确是整个辩论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在理论方面向来世逃避”，即向讨论范围以外的来世逃避。）

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基本问题有关，我们应当简单说明一下。

伯恩施坦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纯粹是一种抽象，在他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句很不体面的话。但是，如果劳动价值只是一种抽象，一种“思想映象”（第44页），那么，每个服了兵役、纳了税的正直的公民，都同马克思一样，有权把任何无稽之谈制造成这样一个“思想映象”，也就是制造成价值规律。“本来可以容许马克思把商品的属性忽视到这种程度，使商品终于仅仅成为一定量的简单人类劳动的化身，正象可以让柏姆—杰文斯<sup>①</sup>学派自由地把除了效用以外的商品的一切属性抽象掉一样”（第41—42页）。

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和门格尔的抽象效用都是一样的，都纯粹是抽象。可见，伯恩施坦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它不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经济中。它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现实到可以拿来剪裁、锤打、秤量和模压。马克思发现的抽象人类劳动，其发达形式不是别的，正是**货币**。这恰恰是马克思的天才的经济发现之一，而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农学派到最后的古典学派，货币的神秘的本质一直是一本不可理解的天书。

相反，倒是柏姆—杰文斯学派的抽象效用事实上只是一种思想映象，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没有思想的映象，是一种不能张扬的愚蠢，这既不能由资本主义社会负责，也不能由任何别的人类社会负责，唯一应该负责的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伯恩施坦、柏姆、杰

---

① 欧根·柏姆-巴维克（1851—1914）——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编者注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文斯和他们的一大批伙伴一样，头脑里装着这种“思想映象”，就是在货币的秘密面前再站二十年，也只能得出一种解决办法，而这又是不用他们指点任何皮鞋匠也早已知道的，货币也是一种“有效用”的东西。

可见，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一窍不通。但是，凡是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有几分了解的人，不用多说就会明白，如果没有价值规律，整个体系就完全不可理解，或者具体些说，如果不了解商品和商品交换的本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它的种种联系就必然是一个谜。

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有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象古典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自然经济<sup>①</sup>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货币分析、资本理论<sup>②</sup>以至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而也就是——这不过是另一面——**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

这一点也是衡量伯恩施坦在他的书的结尾关于“二元论”<sup>③</sup>的

---

① 二版改为“封建经济”。

② 二版在“资本理论”之后加了“、利润率学说”。

③ 二版在“二元论”之后加了（“分裂”）。

一段话的尺度。他说：“二元论”“贯穿马克思的这一整部宏伟著作”，“这种二元论是，这一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在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也就是回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罗·卢·），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第 117 页）

但是，马克思的这种“二元论”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的目前的二元论，资本和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二元论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

当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上的二元论看成“空想主义的一种残余”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张坦白的供状，说明他否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上存在的二元论，否认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说明社会主义本身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空想主义的残余”。伯恩施坦的一元论也就是永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元论，<sup>①</sup>是放弃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以便在一个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看到人类发展的终点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一元论<sup>②</sup>。

但是，如果伯恩施坦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看不到分裂即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为了至少是在形式上挽救社会主义纲领，他就不得不求救于在经济发展之外的唯心主义结构，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

可见，资本主义用以装扮自己的伯恩施坦的“合作原则”这个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最稀薄的“提炼物”，不是他的资产阶级理论

---

① 二版改为“‘一元论’即伯恩施坦的一致性也就是永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致性”。

② 二版改为“一致性”。

对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让步，而是对于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过去的让步。

## 二 经济和政治民主<sup>①</sup>

我们已经看到，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让工人分沾社会财富，变贫者为富者的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在他发表在《新时代》上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中，他让别人只看到一些几乎不可理解的暗示，而在他的书里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充分的说明；他的社会主义要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即通过工会或者象伯恩施坦所说的通过经济民主，再就是通过合作社。他想通过第一条道路抓工业利润，通过第二条道路抓商业利润。

就合作社而且首先是生产合作社而论，它们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二重物**，是在资本主义交换条件下的一种小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交换统治着生产，而且由于竞争的缘故，肆无忌惮的剥削即生产过程完全受资本利益支配成了企业的生存条件。这一点在实际上表现就是：必须尽量使劳动紧张，必须完全依据市场状况来缩短或延长劳动时间，必须完全依照销售市场的要求吸收劳动力或辞退劳动力，把他们抛到大街上去，总之，必须运用大家知道的一切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能够进行竞争。因此，在生产合作社中，工人必须服从充满矛盾的必要条件：他们必须用完全必要的专制制度来管理自己，必须对自己行使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这种矛盾也就把生产合作社引向毁灭，因为它要末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要末在工人利益居于统治地位时就得瓦解。这也是伯恩施坦本人证实过的事实，但是他理解错了，因为他跟在波特·维伯夫人<sup>②</sup>后面认为生产合作社<sup>③</sup>垮台的

---

<sup>①</sup> 二版改为“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

原因是缺乏“纪律”。这里他肤浅地称之为“纪律”的东西无非是自然发生的、绝对的资本制度，工人当然不能把这种制度用在自己身上。<sup>④</sup>

由此可见，生产合作社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下去，只有当它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消除隐藏在它内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巧妙地逃避自由竞争的规律的时候，才有可能。而它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保证自己一开始就有一个销售市场，有一批固定的消费者。作为这种辅助手段为它服务的正是消费组合。伯恩斯坦曾经探讨过为什么独立的生产合作社垮台，只有消费组合才能保证它存在下去的秘密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购销合作社（或者象奥本海默曾想起过的名称）的区别。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生产合作社的存在条件既然同消费组合的存在条件联系在一起，那就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就是生产合作社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少量的地方销售和少量的直接必需品，主要是粮食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最重要的部门，如纺织、煤炭、冶金、石油、机器、机车和造船工业一开始就排斥在消费合作社，从而也是生产合作社之外。因此，撇开生产合作社的二重性不谈外，它也根本不可能具有普遍的社会改良的性质，因为如果生产合作社普遍实行起来，它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取消世界市场，把现存的经济拆成小规模的地方性的生产和交换团体，也就是说，实质上就是要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退回到中世纪的商品经济中去。

---

② 比阿特里萨·波特·维伯(1858—1943)——悉尼·维伯的夫人。参看本卷第181页注①。——编者注

③ 二版在“生产合作社”前面加了“英国”。

④ 二版在这里加了一个脚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

但是，生产合作社即使在它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在现存社会的基础上也必然要下降为消费组合的单纯的附属品，而消费合作社则因此成了站在前面充当拟议中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代表。但是，这样一来，通过生产合作社进行的全部社会主义改良，就从反对生产资本的斗争，即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躯干的斗争，变成反对商业资本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小商业资本、中等商业资本的斗争，就是说，不过是反对资本主义躯干上的小分枝的斗争。

至于工会，在伯恩斯坦看来，它应该是反对生产资本剥削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不论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技术方法方面，工会都不能保证工人能够影响生产过程。

至于纯粹经济方面，即伯恩斯坦所说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斗争”方面，我们也已经指出过，这个斗争不是在自由的蓝色天空中进行，而是在工资规律的一定界限内进行；这一斗争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只是使这个规律得以实现。如果人们从另一个方面观察一下这件事，并且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工会的职能究竟是什么，那么，这一点也就明白了。

在伯恩斯坦看来，工会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向工业利润率实行真正的进攻，逐步把它溶解到工资率之中。但是工会根本没有能力实行反对利润的经济进攻政策，因为工会〔恰恰〕不过是劳动力对利润进攻实行的防御，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下降趋势实行的防卫，理由有两点：

第一，工会有通过自己的组织去影响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市场状况的任务，但是，由于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新商品不断涌入劳动市场，这种组织就会不断地受到破坏；第二，工会的目的是要提高生活水平，扩大工人阶级享受社会财富的份额，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份额就象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一样，注定要不断下降。要看到这最后一点，无须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

要手中拿着洛贝尔图斯<sup>①</sup>的《社会问题说明》就行了。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进程使工会斗争在两个主要经济职能方面成了一种西西法斯的工作<sup>②</sup>。但是，如果工人要得到依照当时市场行情应得的工资，如果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应当加以实现，如果要麻痹，或者更确切些说，要减轻经济发展的下降趋势的作用，那么西西法斯的工作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人们要把工会变成逐步减少利润增加工资的手段，那么首先要以两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第一是中间阶层停止无产阶级化和工人阶级停止增长；第二是劳动生产率停止提高，这两种情况，也和消费合作社经济的实现一样，都是回到大资本以前的状态。

可见，伯恩施坦提出的两种社会主义改良手段，即合作社和工会，对于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已经证明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其实伯恩施坦自己也模模糊糊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它们只是看作可以撕下一些资本主义利润并用以使工人致富的手段。但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放弃了同资本主义生产<sup>③</sup>的斗争，而把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斗争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分配。伯恩施坦一再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争取“公平的”、“较公平的”（见他的书第51页）、甚至“更加公平的”（《前进报》，1899年3月26日）的分配。

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的”分配自然也是引起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近因，至少在人民群众中是如此。因此，社会民主党为争取全部经济社会化而斗争时，它当然也要追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可是，根据马克思的考察，一定的分配不过是一定的生产方式

---

①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国家社会主义”的鼓吹者。——编者注

② 西西法斯在希腊神话中是哥林多的王，被罚在冥府运巨石到山顶，石滚下山坡，又得往上运，如此往返不息而毫无结果。——编者注

③ 二版改为“生产方式”。



的自然、合乎规律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不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框框里的分配，而是要消灭商品生产本身。一句话，社会民主党想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社会主义分配，而伯恩施坦的方法则相反，他想同资本主义的分配作斗争，并且希望通过这条道路逐步带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改良能有什么根据呢？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发展趋势吗？根本不是，因为，第一，他否认这种趋势；第二，如上所述，所希望达到的生产形式在他看来是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分配的原则。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能是经济的。在他颠倒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以及经济关系之后，他不能给他的纲领提出任何唯物主义的论据，他不得不抓住唯心主义的论据不放。

我们听到他说：“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从经济的必然性中得出呢？”“为什么要贬低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意志呢？”（《前进报》1899年3月26日）。因此，伯恩施坦实现公平分配靠的是人类的不依赖于经济必然性的君主的<sup>①</sup>意志，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既然意志本身只是一个工具，那就靠公平的理解力，总之，靠公平的观念。

好了，我们幸运地找到公平原则了，这是一匹古老的跑马，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在缺乏可靠的历史运转手段<sup>②</sup>时都骑过这匹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历史上所有的唐吉珂德们都骑着它干过伟大的改革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被打肿了的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

把贫富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把合作“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把“公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公平观念作为唯一的历史身份证——这一种社会主义，五十年前魏特林曾经

<sup>①</sup> 二版改为“自由的”。

<sup>②</sup> 二版改为“促进手段”。

主张过，并且有力得多，聪明得多，光辉得多！当然，这位天才的裁缝当时还不知道有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今天在半世纪之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撕成碎片的魏特林的〔全部〕观点竟幸运地被重新缀补起来，当作科学的最新发现献给德国无产阶级，那么这件事也要归功于一个裁缝，但决不是天才的裁缝。

\* \* \*

如果说，工会和合作社是伯恩施坦理论<sup>①</sup>的经济支柱，那么，这个理论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民主的不断向前发展。今天发生的反动在他<sup>②</sup>看来不过是“痉挛”，是暂时的，偶然的，在制定工人斗争的总方针时不必加以考虑。〔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伯恩施坦就反动的持久性在向他的朋友作出口头的和书面的保证的基础上想些什么，而在于民主和实际的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的客观联系。〕

在伯恩施坦看来<sup>③</sup>，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在他看来，正如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一样，民主制是一般历史发展的巨大的基本规律，民主制的实现必然要促进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起作用的力量。但是，这种绝对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不过是对最近二十五年到三十年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短短时期的结果作了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肤浅的生搬硬套罢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民主制在历史上的发展，同时也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政治历史，那就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

关于前者，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即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古代奴隶国家、在中世纪的城市公社中，都〔一再〕看到有民主制。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同样也遇到专制制度和受限

---

①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理论”。

②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③ 二版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例如”。

制的君主制<sup>①</sup>。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作为商品生产的形式——在城市公社中创立了〔纯粹〕民主的宪法。后来，在发展到它比较发达的形式即工场手工业的形式时，它却把君主专制当作它的适当的政治形式。最后，作为发达的工业经济，它在法国交替产生了这样一些政体：民主共和国（1793年）、拿破仑第一君主专制、复辟时期的贵族君主制（1815—1831年）、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后来又是民主共和国，又是拿破仑第三的君主制，最后第三次出现了共和国。〔从共和国方面说，它似乎正处在垂死状态。〕在德国，唯一实际的民主设施——普选权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是在政治上把各个小邦焊接起来的工具，只有这一点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意义，他们过去却满足于半封建的立宪君主制。在俄国，资本主义光辉灿烂地<sup>②</sup>在东方方式的专制制度下繁荣成长，资产阶级没有一点渴求民主的样子。在奥地利，普选权大都成了这个四分五裂的王朝的救生圈。〔第十四条<sup>③</sup>的统治证明，它与真正的民主的联系多么少。〕最后，在比利时，工人运动的民主成果——普选权毫无疑问同军国主义的软弱有关系，因而同比利时的特殊地理政治状况有关系。而且首先是这“一点儿民主”不是由<sup>④</sup>资产阶级争来的，而是反对资产阶级得来的。

由此可见，民主的不断高涨（伯恩施坦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sup>⑤</sup>都以为这是人类历史的、至少是现代历史的根本规律），仔细看来不过是空中楼阁。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之间不可能建立内在

---

① 二版改为“立宪的君主制”。

② 二版改为“长期”。

③ 指奥地利宪法第14条。这一条款规定，没有奥皇及内阁的批准，不得发布命令。其目的是便于当局利用一切手段来镇压人民起义。——编者注

④ 二版未加着重号。

⑤ 二版改为“我们的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样”。

的①绝对的联系。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形式都是国内外政治因素的总和的结果，在政治范围内，可以有一切层次，从专制君主制到最民主的②共和国。

因此，如果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范围内也不顾民主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而只注意资产阶级历史的现阶段，那么，我们会看到，就在这里，在政治形势中包含的因素，也不会导致实现伯恩施坦的计划，恰恰相反，倒是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放弃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成果。

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民主制度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在它对于小国的相互结合和现代大国的建立所必需的限度内(德国、意大利)，〔它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这时才会带来内在的有机的接合〔而且政治民主的绷带就可以取掉，不会给资产阶级社会的机体造成危险〕。

在把整个政治的和行政的国家机器从半封建或封建机构改造成资本主义机构方面，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在历史上同民主不可分离的改造今天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国家制度中的纯粹民主成分即普遍投票权③和共和制国家形式已经可以没有危险地④取消，而用不着使行政、财政和国防等等回到三月⑤以前的形式。

如果这样的自由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⑥已经成为完全多余的东西，那么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方面它已经成为直接障碍。这里有两个恰恰支配着当前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的因素需要加以考察：**世界政策和工人运动**——两者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

---

① 二版改为“普遍的”。

② 二版改为“民主”。

③ 二版改为“普选权”。

④ 二版删去了“没有危险地”。

⑤ 指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编者注

⑥ 二版改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的两个不同方面。

世界经济的形成，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的尖锐化和普遍化，使作为世界政策工具的陆海军国主义，在〔所有〕大国的对外对内生活方面都成了决定性因素。但是，既然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由于同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和经济意图有关系，毫无疑问〕是现阶段的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就理应沿着下降路线运动。〔最鲜明的例子是：西班牙战争<sup>①</sup>以来的北美同盟。在法国，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局势使战争暂时不可能发生，共和国才得以生存下去。如果发生了战争而证明法国没有为世界政策而武装起来，那么，对法国第一次在战场上的失败的答复就会是，宣布在巴黎建立君主制。〕在德国，大规模扩充军备的〔最新的〕时代（1893年）<sup>②</sup>和从占领胶州<sup>③</sup>开始奠基的世界政策立即从资产阶级民主制方面获得了两份献礼：自由主义的垮台和中央党的转变。<sup>④</sup>

如果对外政策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那么，对内政策对力求上进的工人阶级的影响也不少。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贪食奇谈”，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图要对自由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劝告无产阶级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以便把吓得要死的自由主义再从反动的耗子洞里引诱出来。但是，伯恩施坦既然认为今天消灭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前

---

① 指帝国主义第一次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美西战争。——编者注

② 二版改为“是从1893年开始的”。

③ 指1897年德国帝国主义侵占中国胶州湾事件。——编者注

④ 二版将后半句改为：“中央党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并补充了一段话：“最近的1907年的国会选举，是在殖民政策的旗帜下格斗过来的。这次选举同时也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坟墓。围绕着新的军事提案发生的争论，使德意志自由党分裂为自由联盟和自由人民党。1893年7月15日，除社会民主党外，自由人民党和中央党也投票反对军事提案。但是，中央党却竭力维护政府的反颠覆法案以及其他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措施。”

提，他自己也就最清楚地证明，正如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今天社会的内在发展趋势的一个**直接产物**，民主制在同样程度上也与这一趋势发生着矛盾。

但是，他这样一来也还证明了别的事情。当他把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作为复活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前提和条件的时候，他自己反过来也就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是多么不可能。在这里，伯恩斯坦的推理陷入了恶性循环，最后的结论“贪食”了它的第一个前提。

要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很简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蒸蒸日上的工人运动和它的最终目的面前吓破了胆，根据这一事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今天恰恰是而且能够是民主制的唯一支柱，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是民主制发展的命运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民主的生命力不是随着工人阶级放弃解放斗争的程度而增强，而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为反抗世界政策和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的反动后果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强大程度而增强；谁希望民主制强大，谁就得希望社会主义运动强大，而不是希望它削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放弃了工人运动，放弃了民主制。

〔伯恩斯坦在1899年3月26日《前进报》上对考茨基所作的“回答”的结尾宣称，他完全同意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实际部分，他只是反对这一纲领的理论部分。尽管如此，他显然相信，他还有权在党的行列中前进，因为“理论(部分)是否有一个命题同我关于发展进程的观点不再相符合”又有什么“重要”呢？这个说法在最好的情况也表明，伯恩斯坦完全不懂得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同它的一般原则的联系，用同样的话不再说明同样的事情对伯恩斯坦来说和对党来说究竟有多少。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从伯恩斯坦自

己的理论中社会民主党可以得到一个起码的认识,这就是,取消了原则基础,全部实际斗争也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目的,放弃了最终目的,运动本身也必然要灭亡。〕

### 三 夺取政权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制的命运是同工人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难道民主制的发展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使得在掌握国家权力和夺取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多余的或者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伯恩施坦用精确衡量合法改良和革命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悠然自得地秤着,使人想起了消费合作商店秤桂皮和胡椒的情景。在他看来,合法的发展过程是理智的作用,革命的发展过程是感情的作用;改良工作是缓慢的工作,而革命是历史进步的急速方法;立法是有计划的工作,而革命是自发的暴力(第183页)。

由来已久的了,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世界的一切事物中总是看到“好的”和“坏的”方面,对一切花坛都津津有味。但是,事物的实际进程很少注意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算计,从世界上一切可能的事物中精心搜集起的一堆“好的方面”稍一碰撞就会化为灰烬,这同样也是由来已久的了。实际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合法的改良和革命所起的作用,和这个或那个方法的优点和缺点相比,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据。

恰恰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合法的改良总是为上升阶级的逐步巩固服务的<sup>①</sup>,直到它感到已经成熟到足以夺取政权,推翻整个现存的权利体系,建立新的体系为止。伯恩施坦反对夺取政权,把夺

---

<sup>①</sup> 二版改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合法的改良是为……服务的”。

取政权咒骂为布朗基主义的暴力论，他的不幸就在于，把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轴承和动力的东西看作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自从阶级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以来，夺取政权<sup>①</sup>一直是一切上升阶级的目的，又是每一历史时期的起点和终点。这种情况，我们在古罗马农民同货币资本家<sup>②</sup>的长期斗争中，在中世纪城市贵族同主教的斗争和手工业者同贵族的斗争中，在近代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都可以看到。

因此，立法<sup>③</sup>和革命并不象在历史的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

而且每个时代的法制都不过是革命的产物。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而立法则是在政治方面维持生存的手段。合法的改良工作本身并不包含着自己独特的、与革命无关的动力，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它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予它的推动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具体地说，也就是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所建立的社会形态的框框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以为合法改良工作只是放宽了范围的革命，革命只是压窄了范围的改良，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是完全违背历史的。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不同的要素，不是时间长短不同，而是本质不同。历史上运用政治力量进行的革命变革，其全部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为新质，具体地说，在于从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另一个社会制度。

---

① 二版改为“恰恰夺取政权”。

② 二版加了“和贵族”。

③ 二版改为“合法的改良”。



因此，谁要是用合法改良道路来代替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把合法改良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那他事实上选择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比较温和的、稳妥的和缓慢的道路，而选择了另一目的，这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作些量的<sup>①</sup>变动。所以，从伯恩施坦<sup>②</sup>的政治观点中和他的经济理论中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

但是，上面所说的关于合法改良和革命的作用的话，也许只是对到现在为止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吧？也许，从今以后，由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形成，合法改良也可以有责任把社会从一个历史阶段引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sup>③</sup>“变成了毫无内容的空话”（第183页）了吧？

情况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社会区别于以前的阶级社会即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这正在于，现在的统治不是以“既得权利”为依据，而是以实际经济关系为依据，雇佣劳动制度不是一个权利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在我们整个的法律制度中，找不到现在的阶级统治的法律规定。如果还能找到一些痕迹的话，如奴仆制度，那么，这恰恰是封建关系的残余。

既然雇佣奴隶制度在法律上根本没有表现出来，又怎么“通过合法道路”逐步予以废除呢？想靠合法改良工作来给资本主义准备一个结局的伯恩施坦，也陷入了乌斯宾斯基所说的那个俄国巡警的处境。这位巡警在叙述他的冒险故事时说：“我一把抓住那个家

---

① 二版改为“非本质的”。

②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③ 二版在此处插入“正如伯恩施坦在他的书里所说的那样”。

伙的领子，结果怎样呢？那可恶的家伙竟没有领子！”麻烦就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共产党宣言》第17页<sup>①</sup>）。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过去阶段上，这个对立曾经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上表现出来，因此，到一定程度内，新兴的关系还可以在旧关系的框框内找到地盘。“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中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第17页<sup>②</sup>）。怎么办呢？通过在城市郊区逐步废除那一切零零碎碎的、总起来构成农奴制的权利，如徭役、选畜权、衣着权、借地继承税、人头税、强迫婚姻、遗产公享权等等。

同样，“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第17页<sup>③</sup>）。怎么办呢？通过局部地在形式上废除行会的束缚或者事实上削弱行会的束缚，通过逐步地在最必要的范围内改造行政、财政和国防制度。

因此，如果抽象地而不是历史地研究问题，那么，在以前的阶级关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设想通过纯粹合法改良的办法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即使到那时，合法改良也不是使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为夺取政权作了准备和引导。无论对于废除农奴制度来说，或者对于废除封建制度来说，真正的社会革命当时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强迫无产者接受资本奴役的，不是法律，而是贫困，是缺乏生产资料。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能够宣布生产资料属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经济的发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同上。——编者注

其次，雇佣关系内部的剥削，同样也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因为工资的高低不是由法律的途径，而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剥削这个事实本身就不是依据一种法律规定，而是依据纯粹的经济事实，这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场，它除了具有其他特性外，还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特性，就是它能生产价值，并且生产的价值比它自己消耗的<sup>①</sup>价值还多。总之，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一切基本关系是不能在资产阶级基础上用合法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的，因为这些关系既不是由资本主义的法律带来的，也不是从这些法律中获得形式的。伯恩斯坦在设计社会主义“改良”计划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不知道的也就是自己说过的东西，他在他那本书里第十页上写道：“经济动机现在在过去用种种统治关系和意识形态掩盖着的地方无拘无束地登场了”。

但是还要补充一点。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在这个制度中，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采取的形式不是使这些因素向社会主义靠近，而是和社会主义疏远了。在生产中，社会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采取什么形式呢？是股份公司、〔国有化、〕卡特尔<sup>②</sup>，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对立，劳动力的被剥削和被奴役发展到了顶点。

在国防方面，这一发展使普遍义务兵役制得到了推广，使服役期限缩短，因而在物质上向人民军队接近了。但是，这些都采取了现代军国主义的形式，在这里，人民受军事国家的统治、国家的阶级性质最显明地表现出来了。

在政治关系方面，民主的发展（只要它处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导致了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建立“人民国家”。但这采取的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形式，在这

<sup>①</sup> 二版改为“比它自己以工人生活资料的形式消耗的”。

<sup>②</sup> 二版改为“是大企业、股份公司、卡特尔”。

里，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没有被废除，倒是展开和暴露出来了。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矛盾中运动的，那么，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核从同它矛盾着的资本主义外壳中剥出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就需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伯恩斯坦当然知道另一种劝告<sup>①</sup>；如果说，民主的发展是使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而不是使它缓和，他回答我们说：那时“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给自己的工作增加困难，那它就必然要尽力阻挠社会改良和民主设施的扩大”（第71页）。不错，如果社会民主党学小资产阶级的样子，对于从历史上去选择一切好的方面，抛弃坏的方面的吃力工作还是津津有味的话。不过那时社会民主党势必也要对整个资本主义“尽力阻挠”，因为**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是它在社会民主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设下了种种障碍。实际上，资本主义在设置障碍的同时，也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唯一**可能性**。这种情况对民主制也完全适用。

如果说，民主制〔，正如我们在第45—46页<sup>②</sup>上指出过的，〕对于资产阶级已经一部分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它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首先，民主制是必要的，因为它创立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权等等），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给它充当跳板和支撑点。其次，民主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中，在为民主制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总之，民主制所以不可缺少，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唯一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当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

① 二版改为“伯恩斯坦从这里得出的当然是另一个结论。”。

② 参看本卷第123—128页。——编者注

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从**导言的每一行都看得很清楚**，他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①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框内**它的态度问题。一句话，恩格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作了指示。

马克思关于英国土地问题的著名言论则相反（伯恩施坦也同样引用过），他说：“假如对地主实行赎买，也许是最便宜的”②。这里讲的不是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前**而是**胜利之后**的态度。因为显然只有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时才谈得上对统治阶级的“赎买”。而马克思在这里作为可能性来考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的运用**，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来代替这个专政。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而伯恩施坦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使命的机关，这是他的权利。

不过，伯恩施坦纯粹是用恐惧和向人们提出警告的心情来阐述自己的理论的，无产阶级不能**过早地**取得政权呵！在这种情况下，在伯恩施坦看来，无产阶级应当让资本主义的现状维持下去，而让自己遭受可怕的失败。我们从伯恩施坦的这种恐惧中首先很明显地看到的是，一旦由于种种情况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伯恩施坦的理论只能给予无产阶级一个“实际”指示——躺着睡觉去吧！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理论也就立即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原来这是一种预先注定无产阶级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无可作为因而是消极地背

---

① 二版未加着重号。

② “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

叛自己事业的观点。

我们的整个纲领如果不能在斗争的一切场合和一切时机为我们服务，并且是通过**执行它**而不是**不执行它**为我们服务，那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张废纸。〔的确！〕如果我们的纲领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表述，那么它显然也必须表述这一发展的一切过渡阶段的基本轮廓，因而它也要能够指出①**在每个时机**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的适当行动。由此可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根本**不会有它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纲领或者被这个纲领所抛弃的时刻**。

实际上，这种情况也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由于事态的发展执掌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一刻不去或者不承担义务去采取某种②措施去实现自己的纲领，去采取某种③措施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纲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某种时刻完全不起作用，不能对它的实现作出什么指示，那么在这种主张的后面隐藏着④另一个主张，这就是，**社会主义纲领根本是任何时候都实现不了的**。

要是采取了过早的过渡措施又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包含着对社会变革的现实过程的一大堆错误认识。

由无产阶级即由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首先不是人为地产生的。它本身是以经济政治情况的一定成熟程度为前提的，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是撇开了象巴黎公社那样的情况的，那时无产阶级取得统治不是为了确定目的自觉斗争的结果，而是作为被大家遗弃了的无主的货物例外地落到了无产阶级手中。这也就是布朗基主义的国家政变同由广大的〔而且是〕有阶级觉悟的人民

---

① 二版改为“向无产阶级指出”。

②③ 二版改为“一定”。

④ 二版改为“不自觉地隐藏着”。

群众夺取政权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是由“坚决的少数”发动政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射，象从手枪里发射子弹一样，因此总是不合时宜；而后者本身只能是从已经开始的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产物，因此它本身就带着合乎时宜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的合法证书。

因此，如果说，从社会前提的角度看，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决不会“过早”发生，那么，另一方面，从政治效果即从政权的保持的角度看，它必然是“过早”发生的。使伯恩施坦睡不着觉的过早的革命，象达摩克利斯的剑<sup>①</sup>一样悬在我们头顶上，对于这把剑，任何请求和祈祷，忧虑和警告<sup>②</sup>都无济于事。这里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

第一，要想一下子通过无产阶级的一次胜利的打击来完成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设想这是可能实现的，那就意味着再次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的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根据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局的观点来看，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地”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正是为最后胜利创造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也正是这种进攻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了这个时机<sup>③</sup>。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概念本身<sup>④</sup>，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

---

① 达摩克利斯是古代意大利锡拉丘斯暴君迪奥尼修斯的一个大臣，惯用花言巧语谄媚人。一次应邀赴宴，暴君将一利剑用头发丝悬挂于其头顶，供赴宴者取笑，后来人们用“达摩克利斯的剑”一词表示有千钧一发的危险之意。——编者注

② 二版改为“恐惧”。

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

但是，既然无产阶级这样一来除了“过早地”夺取政权外，没有别的办法，换句话说，既然它必须一次夺取它<sup>⑤</sup>，以便最后持久地掌握它，那么，反对“过早”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不是别的，正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从〔伯恩斯坦理论的〕这一方面也会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伯恩斯坦<sup>⑥</sup>的放弃最终目的<sup>⑦</sup>的方针，也就是放弃整个<sup>⑧</sup>运动的方针。〔他劝告社会民主党在夺取政权时“躺着睡觉去吧”，也就等于劝告它现在去睡觉，永远去睡觉，也就是说，放弃阶级斗争。〕

#### 四 崩 溃

伯恩斯坦修正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从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的。但是，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那么，抛弃了这个基石逻辑上必然使伯恩斯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趋于崩溃。他在辩论过程中，为了保持他的第一个主张，就把社会主义阵地一个一个地放弃了。

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剥夺资本家阶级就不可能实现，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剥夺，把逐步实行“合作原则”作为工人运动的目的。

---

③ 二版将后半句改为“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

④ 二版改为“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

⑤ 二版改为“一次或数次夺取它”。

⑥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⑦ 二版改为“社会主义最终目的”。

⑧ 二版改为“社会主义”。



但是，合作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是行不通的，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着手改良商业，发展消费组合。

但是，通过消费组合来改造社会，哪怕同工会一起干，同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物质发展不相容，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但是，他关于经济发展进程的观点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不相容，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

但是，没有确定的目的和没有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进行，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阶级斗争，声明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好。

但是，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伯恩施坦就在进一步的结论中甚至否认我们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存在。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一群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四分五裂的个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也不是靠内在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而是靠外部的压力（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在政治上结合起来。

但是，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并且根本没有阶级，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未来的斗争，而且也不可能它们到现在为止的斗争，那么，社会民主党本身及其成果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或者，如果说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也只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霍亨索伦方针的偶然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的儿子，而是反动派的私生子。这样一来，由于确定不移的逻辑，伯恩施坦就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走到了《法兰克福报》和《福斯报》的立场上去了。

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社会主义批判以后，剩下的就只是寻求满足于现状了，至少在总的方面是如此。而且对于这

一点伯恩斯坦并不退缩；他发觉现在德国的反动派并不很强大，“西欧各国政治上的反动看到的不多”，“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至多是防御而不是镇压”（《前进报》，3月26日）。工人不是越来越贫穷，而是相反，他们越来越富裕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甚至在道德上也是健康的，看不到反动和压迫，——在这个所有世界最好的世界中，万事都走向最好的境界。

就这样，伯恩斯坦完全合乎逻辑地从头走到尾。开始，他为了运动放弃了最终目的，但是没有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社会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那么他的结局就必然是连运动本身也一起抛弃掉。

这样一来，伯恩斯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都崩溃了。雄伟、对称和奇美的马克思体系建筑物，在他那里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碎片，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公墓地。马克思和蒲鲁东、列奥·冯·布赫和弗兰茨·奥本海默、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和康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利特尔·冯·纽包威尔博士、赫克纳和舒尔采-格弗尼茨、拉萨尔和尤利乌斯·沃尔弗——所有这些人在伯恩斯坦体系中都作出了片断的贡献，伯恩斯坦从他们那里都学到了一些东西。毫不奇怪！他抛弃了阶级观点，就失去了政治罗盘，他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把个别事实在一个彻底的世界观中结成有机整体的精神上的结晶轴。

这个把一切可能的思想体系的残片毫无区别地混杂在一起的理论，乍一看来似乎是毫无偏见的。伯恩斯坦不愿意听到什么“党的科学”，或者正确些说，阶级的科学。也不愿意听到什么阶级的自由主义，阶级的道德。他想代表的是一般人类的、抽象的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但是，因为现实社会是由阶级组成

的，这些阶级有截然相反的利益、意图和观点，所以在社会问题上的一般人类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暂时是一种幻想，一种自我欺骗。伯恩斯坦所谓的一般人类的科学、民主和道德，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东西，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道德。

的确是这样！当他拒绝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效忠于布伦坦诺、柏姆—杰文斯、萨伊、尤利乌斯·沃尔弗的学说的时候，他除了用资产阶级的辩护词来代替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基础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当他谈论自由主义的一般人类性，把社会主义变成它的变种的时候，他除了抽去社会主义的阶级性，抽去它的历史内容，因而也就是抽去一切内容之外，除了反过来把自由主义的历史代表即资产阶级当作全人类利益的代表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当他反对在社会民主党内“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sup>①</sup>的发展力量”，攻击“轻视理想”的时候，当他起来维护理想主义和道德但同时又竭力反对复活无产阶级精神的唯一泉源即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时候，实质上，这除了向工人阶级宣传资产阶级道德的真髓，即宣传与现在制度妥协，把希望带到道德的理想世界的来世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最后，当他用利箭对准辩证法的时候，除了同正在兴起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特殊思想方法斗争以外，还能做什么呢？他反对的是这样一把剑，这把剑曾帮助无产阶级冲破黑暗，看清自己历史的未来。他反对的是这样一个精神武器，用这个武器无产阶级虽然物质上还在羁绊之下就战胜了资产阶级，因为它向资产阶级证明，资产阶级的存在是暂时的，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

<sup>①</sup> 二版在“无所不能”之后加了“(万能的)”。

因而在精神世界已经完成了革命！当伯恩施坦向辩证法告别<sup>①</sup>，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固然，但是”、“虽然，不过”、“或多或少”这些思想上的跷跷板的时候，他就完全合乎逻辑地陷入没落资产阶级由历史所决定的思想方法中去了，这种思想方法正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政治行为的一幅忠实的精神上的画像。〔卡普里维<sup>②</sup>、霍亨洛埃<sup>③</sup>、伯勒普什<sup>④</sup>、波扎多夫斯基、二月法令<sup>⑤</sup>、苦役监禁法案<sup>⑥</sup>〕目前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但是”表现得恰恰同伯恩施坦的思想方法一模一样，而伯恩施坦的思想方法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最细致和最可靠的征候。

但是，在伯恩施坦看来，连“资产阶级”一词也不是阶级表现，而是一般的社会概念。这只不过说明（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言而喻的）他已经用资产阶级的语言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语言，代替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政治、道德和思想方法。当伯恩施坦把“资产者”理解为既是资产阶级，又是无产阶级，即毫无区别地理解为一般的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一般的人同资产者，把人类社会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了。

〔如果说，在开始同伯恩施坦讨论的时候，有人还希望用社会民主党的科学兵器库里的论据来说服他，使他能够回到运动中来，那么，他现在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这种希望了。因为现在对双方来

---

① 二版改为“同辩证法分手”。

② 列奥·卡普里维（1831—1899）——1890—1894年期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编者注

③ 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埃-席林格菲尔斯特公爵（1819—1901）——1894—1900年期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编者注

④ 汉斯·海尔曼·伯勒普什——1890—1896年期间任普鲁士商业大臣。——编者注

⑤ 指1890年2月4日德皇威廉二世颁布的关于劳动保护立法的两个法令。——编者注

⑥ 参看本卷第37页注②。——编者注

说,用同样的语言已经不再表示同样的概念,用同样的概念已经不再表示同样的社会事实了。同伯恩施坦的讨论已经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站在不同的基础上。]

## 五 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伯恩施坦的书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有<sup>①</sup>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为党内<sup>②</sup>的机会主义思潮建立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

我们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如果把一些偶然的表现,如大家都知道的轮船补贴问题也算进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是,一个明显表现出来的统一的机会主义思潮却是在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垮台,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开始的。福尔马尔的国家社会主义<sup>③</sup>、巴伐利亚的预算投票<sup>④</sup>、南德的农业社会主义<sup>⑤</sup>、海涅的补偿提案<sup>⑥</sup>、最后席佩耳的关税观点和民军观点<sup>⑦</sup>,这些就是机会主义实践发展的路标。

机会主义实践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是对“理论”的敌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原

---

① 二版改为“已经有了”。

② 二版改为“在社会民主党内”。

③ 指福尔马尔鼓吹的通过国家的干预实行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1892年11月14日的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是诱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49页注③。——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49页注④。——编者注

⑥ 沃尔弗冈·海涅1898年2月10日在柏林第三选区发表演说,主张社会民主党可以为了“人民的自由”投票赞成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军事要求。这就是所谓“用大炮换取自由”的补偿政策。——编者注

⑦ 参看本文附录《民军和军国主义》。——编者注

理，无论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无论在应用的斗争手段方面，最后无论在斗争的方法方面，都给实际活动规定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那些只想追求实际成果的人就很自然地力图使自己的手脚不受束缚，也就是说，力图让我们的实际工作脱离“理论”，不依赖于理论。

但是，就是这个理论对于他们的每一个实际企图都给予迎头痛击。国家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补贴政策、补偿政策和民军问题，机会主义都遭到了失败。显然，这些思潮如果想反对我们的基本原则那就势必向理论本身，向基本原理挑战，而不是对它视而不见。它们总要试图动摇这些基本原理，并且建立自己的理论。伯恩施坦的理论正是朝着这个方面走的一个尝试。因此，我们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sup>①</sup>上看到所有的机会主义分子立刻在伯恩施坦的旗帜周围集合起来了。如果说，一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可以由我们的斗争的条件和斗争的发展加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另一方面，伯恩施坦的理论也同样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尝试，这就是它想把这些思潮用一种普遍的理论表述概括起来，找出它们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因此，伯恩施坦的理论一开始就是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耐火试验，是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科学证书。

这次试验的结果如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机会主义创立不了多少<sup>②</sup>能够经得起批评的积极理论。它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先是向马克思学说的各个基本原理进攻，最后是把整个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统统毁掉，因为这个学说是一个牢固结合的建筑。这就证明，机会主义实践的本质和基础是同马克思体系不相容的。

---

① 指 1898 年 10 月 3—8 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二版改为“稍微”。

但是，它也进一步证明，机会主义同社会主义也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的内在的趋势就是要把工人运动推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也就是说，是要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麻痹。当然，从历史上说，不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马克思体系等同起来。在马克思以前，并且同马克思无关，就有了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某种〔完全〕适合当时条件的工人阶级解放意图的理论表现。用道德上的公平观念来论证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生产方式，而是反对分配方式；把阶级对立理解为贫富对立；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企图实行“合作”原则，——我们在伯恩斯坦体系中遇到的这一切，早已存在了。这些理论在它们那个时代尽管有一切欠缺之处，但仍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真正理论，它们都是幼儿学校，无产阶级是在这些学校里学会走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条件已经导致摆脱这些理论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外，就不能再有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至少在德国是如此。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一回事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现在不再是意味着回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幼儿学校，不是的，现在这意味着回到资产阶级的已经穿破了的小便鞋里去了。

伯恩斯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我们说第一次，是因为机会主义在伯恩斯坦的体系中，无论在消极方面，即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也无无论在积极方面，即在把一切理论上的混乱东西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方面，都已经走得如此之远，已经再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由于伯恩斯坦的这本书，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也就完成了〔正象由于席佩耳对待军国主义问题的立场，机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发展完

成了一样),作出了它最后的结论。

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是能够在理论上推翻机会主义的学说,而且是唯一能够把机会主义放在党的成长过程中加以说明的学说。无产阶级为达到它的最后胜利而举行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个运动的全部特点在于,这里是世界历史上由人民群众自己并且违反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这个意志必须超越现今社会的界限,在现今社会的来世去实现。而培养这种意志又只能在同现存制度不断斗争中,在现存制度的框框里进行。广大人民群众同一个超越全部现存制度的目的结合,日常斗争同伟大的世界改造结合,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大问题,这个运动因此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在两块礁石之间前进:一边是否认群众性,一边是否认最终目的;一边是重新回到宗派主义,一边是滚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机会主义。

当然,马克思的学说在它的理论武库中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供了既反对这个极端又反对那个极端的致命的武器。可是,正因为我们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而威胁着运动的危险不是从人们的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因此,那种跳到无政府主义一边和跳到机会主义一边去的现象,不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事先一劳永逸地防止得了的;它们一旦在实践中降生,就必然只有通过运动本身才能克服,自然是只有在马克思提供的武器的帮助下才能克服。较小的一种危险,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儿麻疹,社会民主党已经把它和“独立运动”<sup>①</sup>一起克服了。较大的一种危险,即机会主义的水肿病,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在克服。

近年来,运动在广度上有了巨大的增长,斗争的条件复杂化

---

<sup>①</sup> 见本卷第48页注④。——编者注



了，斗争的任务也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这样一刻到来，这时在运动中对能否达到伟大的最终目的将发生怀疑，对运动的思想因素将产生动摇。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的，它只能是这样的，不能是别样的，动摇和畏缩的时刻，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不是出乎意外的事，倒是马克思早已看到和预言过的。马克思在半个世纪以前<sup>①</sup>写道：“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着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sup>②</sup><sup>③</sup>

就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建立之后，这段话仍然是定律<sup>④</sup>。

---

① 二版在这句话之后加了“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中”。

② 前一句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这是针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后一句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序言使用过的，是前一句的代用语（“罗陀斯”在希腊文中是岛名，也是“玫瑰花”）。——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607页。——编者注

④ 二版改为“仍然是对的”。

由于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甚至在德国也不是这样。它是一天天地**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它变成这样也是在斗争过程中进行的，而且是在不断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极端偏向的过程中进行的。而这两种偏向不过是当作过程来理解的社会民主党的运动的要素。

从这一点看来，令人吃惊的不是竟有机会主义思潮产生，倒不如说这个思潮竟如此虚弱。当机会主义只是在党的实际工作的个别场合被冲破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在它后面总有一个多少是认真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它在伯恩施坦的书里已经完整地表达出来了，每一个人都会奇怪地喊道：怎么，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踩踏过、嘲笑过、摧毁过！

机会主义说的话已经够多了，这就证明它没有东西可说了。伯恩施坦的书在党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

伯恩施坦在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同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告别的时候，还可以感谢它们，因为它们给他的变化找到了从宽发落的环境。因为只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宽宏大量才让伯恩施坦作为预先注定的而不自觉的工具出场，通过这样一个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已经将自己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将它从自己方面远远抛掷出去。

〔我们已经说过：运动**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是在克服随着它的发展必然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偏向过程中进行的。但是，克服并不意味着按上帝的意愿让一切都平安无事。**克服现在的机会主义思潮意味着摒弃它。**

伯恩施坦在结束他的那本书的时候劝告党，要党敢于表现为它实际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在我们看来，党，也就是说，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必须对这一劝

告给予回敬,也要伯恩施坦正式地表现为他实际的那个样子,即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党人。〕

## 附录：民军和军国主义\*

### 一

从党的队伍里对于我们纲领中的个别要求和我们的策略发出批评的声音,这不是第一次,但愿也不是最后一次。这件事情本身是最值得欢迎的。但是,问题首先在于是**怎样**的批评,而我们所说的**怎样**,不是指凡事都要纷纷议论一番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在党内已成为时髦,我们指的是重要得多的东西,即指批评的一般基础,指在批评中表现出来的一定的世界观。

**伊塞格里姆-席佩耳**发动的反对建立民军的要求和拥护军国主义的十字军讨伐,实际是以一整套前后一贯的社会政治世界观为基础的。

**席佩耳**维护军国主义是从这样的一般立场出发的,就是确信这种军事制度是**必要的**。他用一切可能的军事技术的、社会的和经济性质的论据来证明常备军是不可缺少的。当然,从某种立场

---

\* 本文发表于《采比锡人民报》(第42—44期和47期,1899年2月20—22日和25日),是对麦克斯·席佩耳的文章的答复。席佩耳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1898年11月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用伊塞格里姆这一笔名发表的《恩格斯相信民军吗?》,一篇是在考茨基在《新时代》上驳斥了伊塞格里姆的文章以后(考茨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民军制度》,载于《新时代》1898—1899年,第17年卷,第1册第335—342页)用席佩耳的名字发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民军制度》(《新时代》1898—1899年第19期和第20期)。

〔大家知道,引起争论的伊塞格里姆的文章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即使对于党来说,最后也将(在民军要求方面)说:“让浆糊一边去吧,我不需要这个!浆糊是锻造不了剑的!”

为了使文章第四部分容易理解,我们将在此以前刊登在同一期《采比锡人民报》上的席佩耳的答复也抄录下来。〕——卢森堡注

来看，他是对的。常备军、军国主义事实上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谁呢？对今天的统治阶级和现在的政府。但是，对于现在的政府和统治阶级来说，废除常备军，采用民军制度即实行人民武装从**他们的阶级立场**出发是不可能的、荒谬的，除了得出这样的结论外，难道还能得出别的结论吗？如果说，席佩耳自己也认为建立民军是不可能的、荒谬的，那么，这只是表示他自己在军国主义这个问题上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表示他是用资产阶级政府的或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待民军的。他的每一个论据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用武器把一切公民武装起来（这是民军制度的基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钱办这件事，“文化任务已经苦得够了”。可见，他的主张是单纯从**今天的普鲁士 - 德意志的财政经济**出发的，除了米凯尔的办法<sup>①</sup>，他根本不可能设想实行别的办法，例如对资本家阶级采用累进的形式课税，甚至在实行民军制度的条件下也是如此。

席佩耳认为青年的军事训练（民军制度的另一基石）是不适宜的，因为在他看来，军士做教官会用腐化的习气影响青年。当然，在这里他指的是**今天的普鲁士军营中的军士**，把他们简单地带到他设想的民军制度中去当青年的教官。他的这种思想方法使人生动地想起了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这位教授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照他的计算，在社会主义统治下，利息率会普遍提高。

席佩耳认为今天的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减轻”社会所承受的经济压力。考茨基用尽一切心思去猜测这位

---

<sup>①</sup> 二版改为“这样的办法”。约翰内斯·冯·米克韦尔 1890—1901 年期间任普鲁士财政大臣。他在 1891 年进行税制改革时，把所得税列为直接税务制度的中心点。根据这一制度，所得在 900 马克以下的免纳税，高于这个数目的一切所得最多课以 4% 的税。——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席佩耳怎么会想出用军国主义来“减轻”负担，并且对于每一个可能的解释都作了中肯的答复。但是，席佩耳显然不是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从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问题的。当他谈到“减轻”负担时，很显然，他想到的是**资本**。在这一点上他当然是对的：对于资本来说，军国主义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从资本的立场看来，军国主义确实是一个减轻负担的办法。席佩耳在这里是以资本利益的正确代表的身份讲话，还可以用这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公认的见证人。

下面是1899年1月12日在国会会议上的一段话：“各位先生，我认为，有人说二十亿国债完全作了非生产性的支出，一点也没有向你们提供生产性的收入，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我断定，再没有比军事支出更带有生产性的投资了！**”（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这里，速记记录记下了：“左边活跃”。发言人是冯·施杜姆男爵<sup>①</sup>。

席佩耳的所有主张的特点恰恰不在于其本身是**错误的**，而在于以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在席佩耳那里一切都是头脚颠倒的：常备军不可缺少，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有用**，民军不切实际，等等。

席佩耳在军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在一切主要方面同他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斗争问题即关税政策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十分惊人的。

首先，我们处处看到，他坚决拒绝把这种或那种立场同民主或反动问题联系起来。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sup>②</sup>说，认为自由贸易就是进步，而保护关税就是反动，这是错误的。回顾一下

---

① 卡尔·施杜姆（1835—1901）——德国的大工业资本家，社会民主党的死敌。 编者注

② 二版改为“席佩耳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

悠久而宽阔的历史就可以证明，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自由贸易家，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反动派，反过来说，一个主张保护关税的人，同时也可以<sup>①</sup>是民主制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听到的几乎是同样的话：“有**热烈拥护民军制度的人**，他们设置无穷无尽的障碍来破坏我们的工商业生活，他们想把下士的精神移植到我们的孩子的头脑中去，直到最小的班级，——这些**要比今天的军国主义坏得多**。也有**反对民军制度的人**，他们誓死反对任何这样过分传播军事倾向和军事要求的事情。”<sup>②</sup>

**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别的问题上一样，是没有**原则立场的**，他们奉行的是随机应变政策，从这一事实出发，社会民主党人席佩耳认为自己也有权和有**必要否认保护关税和军国主义的反动实质**，或者说，否认自由贸易和民军制度的进步意义，这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问题上同样采取无原则立场**。

第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和在那个问题上一样，看到的是他一面反对保护关税或者军国主义的个别祸害，一面又坚决拒绝把两个现象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与之斗争。在斯图加特，我们在席佩耳的发言中听到有必要同个别过高的关税进行斗争的意见，但是同时也听到过这样的警告：“把自己拖住了”，“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也就是说，总是到处同保护关税作斗争<sup>③</sup>。现在我们听到，席佩耳还是容许“对**具体的军事要求**进行议会斗争和宣传斗争”<sup>④</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不过他警告说，不要把“**纯粹表面的偶然东西**和（军国主义——罗·卢·）对其社会领域的十分次要

---

① 二版改为“也可能”。

② 《新时代》第19期第580—581页。——卢森堡注

③ 二版改为“不要把自己‘拖住了’，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也就是说，不要总是到处同保护关税作斗争”。

④ 《社会主义月刊》11月号第495页。——卢森堡注

的、当然也是十分偶然的反作用，当作是它的本质和核心”<sup>①</sup>。

最后，第三，这是上述两个观点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别的问题一样，对现象的最后估价完全是从已往的资产阶级发展的观点出发，就是说，从历史条件规定的进步的一面出发，完全抹杀了进一步的、未来的发展，因此也就抹杀了被研究的现象的反动的一面。在席佩耳看来，保护关税仍然是已故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看到的那个样子：是超越了德国中世纪封建经济的分裂状况的一个大进步。普遍的自由贸易在今天已经成为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超越内部经济界线的同样必要的步骤，因而各国的关税壁垒已经是一种反动，这种情况，在席佩耳看来是不存在的。

在军国主义问题上也是一样的。他仍然从一个巨大进步的观点来看待军国主义，认为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常备军，同以前的雇佣军队和封建军队比较起来，是一个大进步。但是，在席佩耳看来，发展到这里，也就停止不前了。在他看来，历史是不会超越常备军制度而进一步实现普遍义务兵役制的。

但是，席佩耳在关税问题上和军事问题上采取的这些具有特色的观点的意义何在呢？第一，它们表示用随机应变的政策代替原则立场，与此相联系<sup>②</sup>，它们表示只反对关税或军国主义的**赘瘤**<sup>③</sup>而不反对制度本身。但是，这种政策如果不是我们党最近的历史上为人们所熟知的机会主义，还能是别的什么政策呢？

伊塞格里姆—席佩耳公然拒绝构成我们政治纲领的基本论点之一的实行民军制度的要求，这是“实际政策”又一次在庆祝胜利。从党的政治观点来看，席佩耳行动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只有联

---

① 《新时代》第19期第581页。——卢森堡注

② 二版在“与此相联系”前面加了“第二，”。

③ 二版未加着重号。

系整个机会主义思潮，并从机会主义一般基础和后果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最近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的行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估价。

## 二

机会主义政策的根本标志，就是它总是要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为了工人阶级眼前的利益，而且是想象出来的利益而牺牲运动的最终目的，牺牲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席佩耳在军国主义问题上的主要论点之一，鲜明地证实上述原理对于席佩耳的政策也是不言而喻适用的<sup>①</sup>。在席佩耳看来，迫使我们坚持军国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经济理由是，通过这个制度可以在经济上“减轻”社会的负担。我们姑且不说，这个稀奇古怪的主张连最简单的经济事实都不顾。相反，为了勾画出这个思想方法的特征，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荒谬的主张是真理，军国主义事实上使“社会”“减轻了”多余的生产力的负担。

这种现象对于工人阶级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显然，通过维持常备军，把劳动后备军的一部分，把使工资降低的人的一部分解脱出来，从而可以改善劳动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只是意味着，为了减少劳动市场上的供给，为了限制竞争，第一，工人要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以税<sup>②</sup>的形式交出去，以便把他的竞争者当作士兵养活着；第二，他把这个竞争者变成一种工具，资产阶级国家利用这一工具把工人为改善自己生活状况而进行的每一个活动（起义、集会结社等）镇压下去，必要时把它们淹没在血泊中。这就是说，工人生活的这种改善就会烟消云散，而在席佩耳看来，军国主义之所以必需就是为了这种改善；第三，工人把这些竞争者变成了整个

<sup>①</sup> 二版改为“确切适用的”。

<sup>②</sup> 二版改为“间接税”。



反动派最可靠的基石<sup>①</sup>，也就是说，变成了他们自己在社会上受奴役的基石。

换句话说，由于军国主义，工人在一定数量上防止了工资的直接减少，但是为此却大大丧失了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来提高工资、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可能性。作为劳动力的卖者，他占了便宜，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在政治运动的自由方面却受了损失，归根到底，作为劳动力的卖者，他也受了损失。他消除了一个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者，结果却看到产生了一个工资奴隶制度的保护者，他防止了工资的降低，结果却既缩小了不断改善自己生活的前途，也缩小了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后解放的前途。所谓通过实行军国主义来使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减轻”负担的实际意义就在于此。在这里，和在所有机会主义政策的空想家那里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为了眼前的小小的实际利益而牺牲了社会主义阶级解放的伟大目的。而且这种利益仔细考察起来证明完全是虚幻的。

但是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席佩耳怎么会产生如此荒谬的思想，竟然也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宣布军国主义可以“减轻”负担呢？我们回想一下，从资本的立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已经说过，军国主义为资本创造了最赚钱最不可缺少的投资方式。〔的确！〕通过税收到达政府手中用来维持军国主义的那笔资金，假如仍然留在居民手中的话，就是一笔不断增长的对生活必需资料〔和享受资料〕的需求，或者，假如由国家大量地用于文化目的，同样可以造成对社会劳动相应的需求，这固然是很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这样一来，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军国主义决不会“减轻”负担。可是，从资本主义利润的观点来看，从企业主的观点来看，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对于资本家来说，对产品的一定需求是在分散的私人

---

<sup>①</sup> 二版改为“整个国家中政治上的反动派最可靠的基石”。

买主手中还是在国家手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的需求的特点是可靠，量大，价高，大都是垄断价格。这些特点使国家成为资本的最有利可图的顾客，而向国家供应产品就成了资本最光辉的业务。

但是，军事供应同例如国家用于文化目的（学校、道路等等）的支出相比是特别有利的，这是因为有不断发生的技术改造和不断增长的各种支出。因此，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利润永不枯竭的泉源，而且是越来越丰富的泉源。它使资本上升为一种社会权力，正象在克虏伯和施杜姆的企业里对抗工人的社会权力一样。军国主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经济上是完全不合理的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意味着压低他们的经济生活标准<sup>①</sup>，目的是使他们在社会上受奴役；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在经济上是最光辉的、无法代替的投资方式，正象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支柱一样。因此，当席佩耳不加思索地把这样一种军国主义宣布为经济上“减轻”负担的必要手段的时候，显然，他不仅把**社会利益**的观点同**资本利益**的观点混为一谈（正如我们在开头已经说过的，他这样也就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而且当他认为企业主的每一个经济利益必然也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时候，他也是从**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原则出发的。

这又是我们在关税问题上曾经从席佩耳那里领教过的那个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席佩耳在原则上拥护保护关税，因为他把工人**当做生产者**，想保护他们不受外国工业毁灭性的竞争的影响。在这里和在军事问题上完全一样，他只看到工人直接的经济利益，忽视了他们远大的社会利益，而这种利益是同实行自由贸易或废除常备军这样的一般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在这个问题上和在那个问

---

<sup>①</sup> 二版改为“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

题上一样，他设想的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也正是<sup>①</sup> 资本的利益，因为他相信，凡是对企业主有利的事，对工人也是有利的。为眼前的实际收获牺牲运动的最终目的，从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观点估计实际利益，——这两个基本原理既是和谐地互相结合在一起，又是一切机会主义政策的根本标志。

一个拥护这种政策的人居然设法引证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创始人的话，尽管他在军事问题上的保护人是冯·施杜姆男爵，而又十分严肃地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看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保护人，这种情况乍一看来是令人吃惊的。席佩耳自以为在关于军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理解方面同恩格斯是一致的。但是，这只不过再一次证明，在头脑中引起惊人混乱的东西，过去是消化得不好的黑格尔辩证法，现在则是消化得不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这再一次表明，不论是一般地说，辩证的思想方法，或者特殊地说，唯物的历史哲学，这两者在正确理解了的时候是多么革命，只要错误地加以理解，就会得出危险的反动结论。如果人们读一读席佩耳引证的恩格斯的话，即从《反杜林论》中摘引的关于军事制度正走向自我消灭和向民军发展的观点，那么，乍一看来，席佩耳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同党通常所持的见解究竟有什么不同，是不清楚的。我们本来就把军国主义看做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花朵<sup>②</sup>，席佩耳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军国主义会进一步发展到民军制，席佩耳也是这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分歧把席佩耳带到反动的反对民军要求的立场上去的呢？非常简单，我们和恩格斯一样，把军国主义向民军发展的内在发展倾向看做不过是消灭军国主义的条件，而席佩耳则认为未来的民军也是从今天的军国主义中自然而然地、“从内部”成长起来的。我们想利用

<sup>①</sup> 二版改为“毫无疑问是”。

<sup>②</sup> 二版改为“结果”。

推广义务兵役制和缩短服役期这些客观发展给我们提出的物质条件，通过政治斗争实现民军制度，而席佩耳却听任军国主义和伴随它而来的种种现象自己发展，把促进实行民军制度的每一项自觉的干预都斥之为幻想和“啤酒馆里的政治”<sup>①</sup>。

这样，我们得到的不是恩格斯的历史观，而是伯恩施坦的历史观。正如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然而然地、没有飞跃地、逐步地“长入”社会主义，席佩耳则认为从今天的军国主义中可以自然而然地长出民军来。伯恩施坦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观点也好，席佩耳对于军国主义的观点也好，他们都不认为，客观发展只是把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的条件交到我们手上，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自觉的干预，没有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变革或者为实现民军制度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无论社会主义或者民军制度都不能实现。因此，既然舒舒服服“长入”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是逃避有明确目的的革命斗争的一种机会主义，那么，通过这条道路也可以达到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也就成了资产阶级可怜的点缀品了。在伯恩施坦“逐步社会化”的理论中，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一切终于从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中完全消失了，社会主义变成了“社会监督”，也就是变成了无害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在席佩耳的见解中，“民军”从自由的、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武装人民（这是我们的目的），变成了按照今天短期服役的常备军制度的精神将普遍义务兵役制推广到所有一切适合服役的公民。席佩耳的观点如果用于我们政治斗争的一切目的，就会直接走向否定整个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席佩耳维护军国主义的行动是对于我们党内全部机会主义<sup>②</sup>思潮的清楚的说明，同时也是机会主义<sup>③</sup>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重要

<sup>①</sup> 意为没有实际价值的空论。——编者注

<sup>②③</sup>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步骤。我们早些时候也听到一位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海涅说过，我们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同意资本主义政府的军事要求。但是，那时这只是当作为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更高目的而作出的让步来考虑的。按照海涅的看法，大炮至少只是当做交换人民权利的交换对象来用。现在席佩耳却宣布为大炮而大炮是必需的。虽然两者的结果都一样，都是支持军国主义，但是，在海涅那里，这至少还是建立在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在席佩耳这里，干脆是从改变斗争目的出发。那里只是建议用**资产阶级策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这里却大胆地用**资产阶级的纲领**代替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在席佩耳“对民军的怀疑”中，“实际政策”已经得出了自己的最后的结论。它在反动的方向上已经无法再前进了，剩下要做的事只有把实际政策扩展到纲领的其他论点上，脱掉披在自己身上的社会民主党大衣的破片，赤裸裸的露出纳乌曼<sup>①</sup>牧师的典型面目。

### 三

〔如果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争论俱乐部，那么我们认为席佩耳事件在理论上同他争论之后已经了结了。但是，既然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进行政治斗争的党，那么对它来说，通过理论上证明席佩耳观点的错误是不解决问题的，不如说，这是第一次提出了问题。席佩耳关于民军的声明不仅仅是某种思想的表现，而且也是一个政治行动。因此，党对这一声明的回答也必然不仅是对一些观点的反驳，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动。而且这种行动也必然关系到席佩耳的见解的影响。〕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纳乌曼(1860—1919)——基督新教的神学家，国家社会联盟的创始人。——编者注

在过去几年中，一向作为社会民主党基石的所有行之有效的原理，由于来自我们自己队伍里的攻击，对它们的效用产生了动摇。爱德华·伯恩斯坦宣布，对他说来，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沃尔弗冈·海涅通过他关于补偿政策的建议表示，对他说来，社会民主党通常的**策略**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席佩耳证明，他也完全不受党的**政治纲领**的约束。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党的个别代表化为乌有。这本身就呈现了一个令人极不愉快的一般景象。不过，从党的利益的观点出发，人们也还必须将其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声明区分出来。伯恩斯坦对我们**理论上的**有效性的批评无疑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但是**实际的机会主义**对运动是无比危险的。只要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是健康的、有力的，对**最终目的**的怀疑态度就总是能够被运动扫除掉。但是，只要对**最近目的**，即实际斗争本身提出了问题，那么，整个党，包括最终目的和运动不仅是在这个或那个党的哲学家的主观想象中，而且也在客观的现实中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

席佩耳攻击的目标仅仅是我们政治纲领的一个论点。但是，从军国主义对现在的国家所起的基本作用来看，这个单个的论点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治斗争。

资本主义国家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它们的权力和统治都凝结在军国主义之中，而社会民主党是**原则上**反对军国主义的唯一的政党。因此，反过来说，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则斗争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本质**。放弃同军国主义制度的斗争**在实践上**就会导致根本否定同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我们在上一节结束时说过，机会主义剩下要做的事只有把席佩耳的立场从民军问题扩展到纲领的其他论点上，以便彻底否定社会民主党。我们在这里想到的只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的**主观的、自觉的**发展。在**客观方面**，这一发展实质上已经在席佩耳的见解中完成了。

最近在机会主义的声明中，特别是在席佩耳的行动中，还有一个方面值得重视，至少因为它有象征性的价值。这是一种玩笑般的轻松，一种泰然自若的镇静，甚至象最近发生的情况那样，是一种愉快的欢乐，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动摇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而每一个不是完全表面地了解党的事务的同志都把这些原则当作自己最亲近的东西。这种动摇至少会在每一个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良心上的严重危机。撇开别的东西，这也是我们革命水准降低、革命本能受到抑制的真实标志。这种现象本身可能是不可捉摸的、不重要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政党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党暂时主要依靠的不是实际的成果，而是思想上的成果，因此，它对自己成员的个人水平有必要提出很高的要求。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所作的调和补充，也是它的资产阶级的理解方式。

由于席佩耳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声明，党就有必要发表反对他的声明。这一对抗行动能够和必须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党的全部报刊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态度，党的各种会议也必须对问题进行这样的讨论。按照席佩耳的看法，人民的集会只不过是有机会有机会使人们向群众抛掷“口号”的骨头的场所，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的時候把政治上的“贵族老爷”选进国会，如果全党不赞成席佩耳的这一观点，那么它就不能把讨论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基本原则看作是“贵族的领地”，仅仅是为了挑选少数人，而不是为了广大党员群众。相反，只有把这种讨论带到党的广大范围里去，才能有效地防止席佩耳见解可能的传播。

但是，第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态度更为重要。党团首先有义务对席佩耳事件发表决定性的看法，一方面因为席佩耳是国会议员和党团成员，另一方面，因为他所说的问题是议会斗争的主要课题之一。我们不知道党团对于这件事是否已经做了什么事情。既

然在伊塞格里姆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作者的真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那么，党团很可能不会叉手站在一旁看着它的一个成员嘲笑它自己的活动。

而且，如果它以前没有这样做，那么在考茨基把席佩耳从他的狼窝里唤醒以后，它是能够弥补已经失去的时间的。党团对席佩耳事件是否表明立场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全党还没有了解它的立场，结果大概是一样的。社会民主党被迫在与其真正本质相违背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镶木地板上进行活动，显然是不自觉地、不自愿地采用了这种议会政治的许多习惯，而这些又是同党的民主性质不完全一致的。在我们看来，比如说，党团不仅对于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对于自己的党都是以封闭的团体出现。对前者是完全必要的，对后者则不恰当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团的议会斗争主要使用幕后操纵、互相吹捧这种枯燥无味的手段进行，它有一切理由要避开公众的视线。相反，只要是涉及到党的原则问题或者重要的策略问题，社会民主党的党团既无必要，也无理由把它们讨论的结果看作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团（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团也是一样）只有最后要在国会中达到一定的票数时，才召开党团秘密会议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它的党团所进行的议会斗争，从纯粹鼓动的观点来看要比实际活动重要得多。问题不在于党团形式上的多数决议，而在于它的讨论本身，在于澄清情况。对于党来说，了解它的代表关于国会讨论的问题是怎样想的，了解他们在国会里怎样就这些问题作为整体投票的，这至少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彻底实行民主的政党里，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决不能认为通过选举行动和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更为表面的、形式上的简略报告就可以满足。相反，党团必须尽可能地同党的群众保持活生生的、经常的联系，考虑到最近在党的国会议员中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潮，这样做尤其将成为进行自卫的当



务之急。党团对席佩耳的见解公开表明态度过去和现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党的群众，不管他们多么希望这样做，也不可能具有**物质上的可能作为整体**来出场。党团是全党指派的政治代表，它通过自己的公开的行动应当直接帮助党表明必要的立场。

最后，第三，党本身也必须对于席佩耳事件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应当在它所掌握的唯一形式——**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进行。

在斯图加特讨论伯恩斯坦论文的时候，有人说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就理论问题进行投票。现在我们在席佩耳事件中遇到的纯粹是实际问题。有人说，海涅关于补偿政策的建议只是不合时宜的未来派的音乐，党用不着去考虑它们。现在我们在席佩耳事件中看到的是现在的音乐。而且在席佩耳关于民军问题的立场中，我们已经说过，机会主义政策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后的结局，已经成熟到可以作出判决了。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党的迫切任务就是从这一发展中作出正确的结论，采取明确的、毫不含糊的立场。

党有一切理由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委托人，党的政治代表，按照职务来讲，他应当是党在斗争中的一把剑，他的行动应当是阻挡资产阶级国家进攻的堤坝。但是，如果这个堤坝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变成象浆糊做的东西一样，如果这把剑在战场上象纸做的一样一碰就断，那么党从自己方面来讲就不应当向**这种政策**呼吁：

让浆糊一边去吧，

我不需要这个！

浆糊是锻造不了剑的！]

《来比锡人民报》1899年2月24日收到席佩耳〔在读了前两篇文章<sup>①</sup>之后〕寄来的下述来信，作者要求公开发表：

<sup>①</sup> 指本文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编者注

亲爱的朋友休恩朗克：

我总是带着很大的兴趣阅读《来比锡人民报》上罗莎·卢森堡的文章，这并不是因为我始终同意文章的一切论点，而是因为我对文章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诚实的信念和引人入胜的辩证法估价很高。

这一次，我看到下面的这个从一个前提出发而得出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结论，不是不感到惊奇的：

按照席佩耳的看法，迫使我们不得不坚持军国主义制度的经济理由是，通过实行这个制度可以在经济上减轻社会的负担。席佩耳也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宣布军国主义是减轻负担……因为他是从资本和劳动利益协调的原则出发的。

结论是可敬的，只是前提是绝对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我在《新时代》上只是说，巨大的非生产支出——无论是个人用于荒唐的奢侈和古怪的蠢事也罢，是国家用于军事、俸禄和形形色色的胡闹也罢——可以减轻危机的发烧症。一个“生产过剩”的社会，如果非生产性的浪费在用于生产目的的积累的同时不再不断扩大地盘，就会经常因为这种发烧症而发生震动。很明显，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赞成浪费和非生产支出的意思，更没有从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提出要求。我不过是想指出它们“对现代社会”所起的不同于通常强调的另一种实际的作用。

在最初，我毫不怀疑，谁也不能不把我评价为一个“为这一现代社会”而斗争的战士。至于谈到社会民主党辩论的问题，我还是有一些经验，为了避免任何误会起见，我在谈到生产过剩的那一节里后来还补充了短短的一句话：

当然，这不是使我对于军国主义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更加不能容忍了。但是，就连这种从我这

方面来说是多余的防范，看来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定了！”好象人们恰恰是在同一个资产阶级妇女辩论一样。

我在指出了《来比锡人民报》的撰稿人罗莎·卢森堡的诚实以后，相信她会看到这里曾经采取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们之间为争夺无产阶级革命信念的奖章的竞争必须再一次从头开始。

你的 麦克斯·席佩耳

#### 四

如果席佩耳同志带着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从他发表的一个观点出发得出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结论”，这不过再一次证明，即使在人们没有逻辑的地方，观点也有它的逻辑。

上面提到的席佩耳的答复，首先对于他在《新时代》上表达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实行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可以“减轻”负担的思想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补充：现在，除了军国主义以外，还有“俸禄和形形色色的胡闹”和“个人荒唐的奢侈和古怪的蠢事”可以作为减轻经济负担和预防危机的手段。这样一来，关于军国主义的经济作用的特殊观点就发展成为一个一般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浪费是纠正资本主义经济的手段，而且，这个观点也证明，我们对待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冯·施杜姆男爵是不公道的，因为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把他说成是席佩耳的保护人。当施杜姆把军事支出称为最富有生产性的支出的时候，他至少考虑了军国主义在争夺销售市场和保卫“祖国工业”方面的意义。但是，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席佩耳在谈军国主义的时候，却完全忽视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作用，他认为军国主义只是年年把一定量的社会劳动耗费完的一种巧妙形式；在他看来，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就象德·于采公爵夫人<sup>①</sup>的十六条小狗一样，它们占据了一整套房间，雇用了一

些仆人，使用整间整间的狗更衣室，就这样来为资本主义经济“减轻”负担。

很可惜，席佩耳同志在他的经济和政治倾向变幻无常的过程中，每次都同过去的倾向决裂得那么彻底，以致过去的东西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否则，既然他曾经是洛贝尔图斯的门徒，他必然会想起在《致冯·基尔希曼的第四书简》（第34页以下）中的经典篇章，在那里，他从前的老师曾经驳倒过<sup>②</sup>他今天的以奢侈医治危机的理论，但是，这种理论比洛贝尔图斯要早得多。

如果说，专门通过实行军国主义来在经济上减轻负担的思想能够产生新的魅力，至少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是如此，那么，关于浪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起挽救作用的一般理论，就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一样古老。

庸俗经济学在它发展的迷途中的确提出了许多危机理论，但是，我们的席佩耳在今天所据为己有的理论，是属于最陈腐的一种，就它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机构的认识来说，它甚至还低于庸俗经济学不幸的丑角让·巴·萨伊，按照他的看法，生产过剩其实就是生产不足。

席佩耳理论的一般前提是什么呢？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同生产出来的货物总量相比，消费显得太少，因此，危机可以通过扩大社会内部消费的办法来防止，照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不是由于生产中超越销售市场界限的内在趋势，不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是由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绝对的比例失调。照这种看法，资本主义社会的货物总量可以说是一座一定数量的米山，社会应当把它咬穿。消费得越多，作为消化的剩余压在社会经济责任心上的负担越少，“减轻负担”就越多。这是一个绝对的危机

① 二版改为“巴黎的德·于采公爵夫人”。

② 二版改为“反驳过”。

理论，它同马克思的**相对的危机理论**的关系，恰恰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同马克思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关系一样。

但是，对于社会来说<sup>①</sup>，究竟谁是消费者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消费仅仅是为了使生产同时重新活跃起来，那么，米山增高了，“社会”一无所得，危机发烧症和从前一样震动着社会。只有当货物一劳永逸地被吸收掉。当它用于人们消费而人们又不再生产的时候，那时社会才会真正松一口气，危机才能被防止。

企业主辛某对于他（也就是他的工人）生产的货物不知怎么办好。幸而企业家孔某醉心于荒唐的奢侈生活，向他的窘迫万分的阶级同志买了成为累赘的商品。而孔某自己也生产有多余的货物，成为他的“负担”。幸而上面提到的那位辛某同样十分喜欢“奢侈和蠢事”，他自己也就成了忧心忡忡的孔某的热烈渴望的顾客。现在，在交易顺利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两位企业家相对愕然，他们很有兴致地喊道，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其实他们两个都疯了。那么，照席佩耳所劝告的办法去做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当然，他们双方诚心诚意地互相帮助去将一定量的货物破坏无遗。但是，噢！企业的目的不是破坏物质财富，而是把剩余价值兑现为闪闪发光的黄金。而在这种关系中，这个聪明的交易归结起来就象是两个企业各自吃完、消费完自己多余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席佩耳减轻危机的手段。威斯特华伦的煤矿大王们苦于煤的生产过剩吗？傻瓜！只要把他们的高楼大厦里烧得热些，煤炭市场就“减轻负担”了。卡拉拉的大理石矿的矿主们抱怨商业停滞吗？他们可用大理石盖马厩，大理石的“危机发烧症”马上就可以防止了。如果有一个普遍的商业危机的乌云翻滚起来，席佩耳就向资本主义喊道：“多吃些牡蛎，多喝些香槟酒，多用些穿号服的侍者，多要些舞女，

---

<sup>①</sup> 二版改为“按照这个聪明的理论，对于社会来说”。

你就得救了！”我们怕的是那些老奸巨滑的家伙会回答他说：“先生，你把我们看得比我们现在要笨得多！”

可是，这个聪明的经济学理论还可以得出有趣的社会结论和政治结论。这就是说，如果只是非生产的消费，即国家的和资产阶级的消费在经济上可以减轻负担并且是缓和危机的良药，那么，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使生产循环平稳地进行，就必须尽量扩大非生产的消费，尽量限制生产的消费，尽量扩大社会财富中归资本家和国家的部分，尽量缩小留给劳动人民的部分，尽量提高利润和税收，尽量压低工资。工人是对社会的一种经济“负担”，而于采公爵夫人的小狗则是经济上的救命恩人，这就是从席佩耳“减轻负担”论得出的结论。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理论即使在庸俗经济学理论中也是最陈腐的一个。衡量庸俗经济学的陈腐程度的尺度是什么呢？庸俗经济学的本质在于，它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不是从它的客观的联系<sup>①</sup>和它的内在本质中去观察，而是从被竞争规律搞得四分五裂的现象中去观察，不是用科学的望远镜，而是用资产阶级社会个别当事人的眼光去观察。但是，社会的图景也是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立足点而变的，这个图景会多多少少以歪曲的形式反映在经济学家的头脑里。立足点越接近真正的生产过程，观点就越接近真实。研究者越是离开生产过程，走向商品交换市场，走向被竞争完全控制的领域，那么，从这里出发看到的社会图景就越是会颠倒过来。

我们已经指出，席佩耳的危机理论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是绝对站不住脚的。这一理论归结起来无非是这样一种劝告：资本家阶级应当自己消费掉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但

---

<sup>①</sup> 二版改为“不是从它的深刻的联系”。

是，就是个别**资本主义工业家**也会对这种劝告耸耸肩膀。某个冯·施杜姆男爵<sup>①</sup>或者某个冯·海依尔要聪明得多，不会愚蠢到以为自己和自己阶级的同志们的奢侈浪费会有办法帮助克服危机。只有资本主义的商人，或者正确地说，**资本主义的小贩**，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在他看来，他的直接主顾“大人先生们”和他们的奢侈浪费就是整个经济的基石。席佩耳的理论甚至连**资本主义企业家**观点的翻版也不是，倒直接是**资本主义小贩**的观点的理论表现。

席佩耳通过军国主义“减轻”社会负担的思想，同爱德·伯恩施坦那时的见解一样，都又一次证明，正如机会主义<sup>②</sup>在政策上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立场，在经济前提上它同庸俗经济学也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席佩耳却反驳我们从他的“减轻负担”的理论得出的政治结论，说他只说过减轻**社会的**负担，没有说过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为了避免误会起见，他还明确地作了补充保证说，在他看来“这不是使军国主义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人们可以相信，席佩耳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也认为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是起败坏作用的。

那么，他提出在经济上减轻负担是为了什么呢？他在工人阶级对待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听吧，“当然，在我看来，这（经济上减轻负担——罗·卢·）不是使军国主义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但是即便我从这个立场出发，也不能同意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那种叫嚣，说非生产性的军事支出会引起经济破坏”。<sup>③</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可

① 二版改为“某个克虏伯”。

② 二版改为“修正主义”。

③ 《新时代》第20期第617页。——卢森堡注

见，席佩耳把那种认为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有破坏作用的观点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的。可见，在他看来，军国主义不是破坏，在他看来，“同意”反对军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叫嚣”，也就是说，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是荒谬的。要知道，他的整篇文章的目的恰恰是要向工人阶级证明军国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作的保证，即在他看来军国主义不是更加中意，而是更加不中意了，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纯粹是一种心理上的保证，说席佩耳不是带着愉快的心情，而是带着厌恶的心情来维护军国主义的，说他对于他的机会主义政策本身并不感到高兴，说他的良心比他的头脑好。

鉴于这个事实，我不能接受席佩耳的邀请，同他一起进行“革命无产阶级信念”的竞走。忠实不允许我同这样的人竞走，因为他背朝着出发点走进跑道的时候，他是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极不利的地位的。

发表于1898年9月21—28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19—225号；1899年4月4—8日第76—78号；2月20—22和25日第42—44号和4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369—466页。

（李宗禹译）



## 英国眼镜

(1899年5月9、10日)

### 一

在对党的报刊上就伯恩施坦的书<sup>①</sup>进行的讨论作一次总的回顾以前,我们还想逐一探讨在讨论中人们所强调的几个具体问题。这次我们研究的是英国工会运动。工人阶级的“经济权力”、“经济组织”的口号在伯恩施坦的拥护者那里起着很大的作用。沃尔特曼<sup>②</sup>博士在爱北斐特《自由报》第93号上这样写道:“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获得经济权力。”同样爱·大卫也用“通过经济组织得到解放”这一口号结束他论述伯恩施坦这本书的一组文章(《美因茨人民报》第99号)。根据这一观点,即按照伯恩施坦的理论,工会运动,(连同消费合作社)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已经指出(见《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一小册子),这种设想是由于对工会以及合作社的经济性质和经济职能完全错误的认识造成的。但是还可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用不那么抽象的形式说明这一点。

---

① 指《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编者注

② 路德维希·沃尔特曼(1871—1907)——德国反动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德国种族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之一,认为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经济斗争,1902年创办《政治人类学评论》杂志。——编者注

凡是谈到工会在未来的工人运动中将起重大作用的时候，不言而喻，**英国工会**也一定立刻就会出场，它既是人们能够获得的“经济权力”的证明，又是德国工人阶级必须努力仿效的光辉典范。但是，如果说在工人运动史上有那么一个篇章会有助于彻底打破关于工会在未来将起社会化作用并将普遍发展的信念，那么这就是英国工联主义的历史。

伯恩斯坦以英国的情况作为他的理论根据，他透过“英国眼镜”来观察世界，这种说法在党内已成为老生常谈了。如果人们只想用此来说明，伯恩斯坦在理论上的改变是由于他的流亡生活和他个人对英国的印象造成的，那么这种对于人心理上的解释也许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它对于党、对于讨论却没有多大益处。而如果有人想用“英国眼镜”的概念来说明伯恩斯坦的理论对英国适合、对英国说来是正确的，那就错了，这既不符合英国工人运动以往的历史，也不符合它的现状。

经常被强调的英国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对这些特殊性应当怎样加以解释呢？通常都是说：英国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没有军国主义、没有官僚制度、没有农民阶层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它的大部分资本是用于在外国进行剥削的，正是由于这一切，才可能有使工人运动发展起来的政治自由，有对工人运动有利的舆论倾向。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无疑英国的工人运动自从产生以来，也就是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就享有象今天这样的政治自由和舆论的好处了，因为英国社会生活的上述全部特点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有了。不过工联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情况却是完全相反的。

这一运动的最初阶段，从本世纪初直至四十年代，全部是工人联合会为争取生存权进行激烈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就象大陆国家的无产阶级曾经进行过而现在部分地仍在继续进行的斗争那样

激烈。这个“社会改良的国家”长达数十年地拒绝颁布最低限度的保障工人利益的法律。在这个“社会和平的国家”里，工人在他们的生存斗争中采取了极端的暴力手段，如举行游行示威、骚扰性罢工、谋杀、逃跑。政府则使用了至今大陆国家仍在使用的诸如逮捕、审讯并判以重刑、流放、在工人游行示威时大量投入间谍、警察和军队、阶级司法和警察专制等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来对付。总之，我们在英国工人运动的前半个世纪看到了正在成长的工人阶级及其对于社会改良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受到种种形式的残酷镇压。<sup>①</sup>当时这个国家同今天一样已经没有军国主义、没有官僚制度、没有农民阶级了，但就是这个国家却具备应有的用暴力镇压工人运动的手段。可见，如果说自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看到英国采取另一些办法对待工人阶级，那么，这并不是同它的政治生活中的那些特点有关，而是同其它情况有关，这些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出现的。

事实上在五十年代前后，英国的情况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业垄断了世界市场。直到四十年代末，英国的生产曾经不得不经历了频繁而严重的停滞，五十年代以后又开始了持续而急剧的高涨。这种高涨使得英国整个的企业主阶级也遇到了和个别厂主在经营景气时所遇到的那种处境：同工人发生争执，并象以往那样进行连绵不断的工业战争对他们已经极不合适，有秩序的环境、安定和“社会和平”已成为他们最迫切关心的事情。

于是我们看到企业主立即改变斗争的手法。同工人的争执从实力问题变成谈判、调停、让步的议题。工业的黄金时代使向工人的让步既是必然有利于繁荣经营的，又是在物质上无足轻重的，如

---

<sup>①</sup> 维伯《工会史》第50—130页。——卢森堡注

果说在最初时期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是施杜姆那样最残暴的主张严刑峻法的人，那末这个时期它的真正的代言人就是那个工厂主了，他曾经在 1860 年说过“我把罢工看作既是就购买劳动而进行的商业谈判的行动手段，又是它的必然结果”<sup>①</sup>。

另一方面，在工人运动内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这无疑是同上述情况密切有关的。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我们看到工人运动热中于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热中于包罗万象的计划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议会里他们（工人们）是梦想新的天堂和新的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热心教育的人士、社会主义者和道德学家。”<sup>②</sup> 弗兰西斯·普莱斯<sup>③</sup> 写道，在欧文学说的影响下，英国工联主义者相信，有可能通过全体雇佣工人普遍的、非政治性的联合去提高工资并缩短工时“到这样的程度，使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归他们自己所有”<sup>④</sup>。当时英国的阶级运动具体地表现为全国性工会联合会的组织（全国各业大统一工会），这一联合会在工会斗争中表明自己是相当不灵活的组织，而且不久也就垮了，但它清楚地表达了阶级和阶级整个团结起来争取共同目标的观念。在宪章运动中我们同样看到英国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目标（在这里是通过政治行动）的努力。

这一切情况在五十年代初都改变了。在宪章运动和欧文派运动失败后，工人们放弃社会主义目标而致力于仅仅是日常的要求。联合（尽管这种联合很不完全）在欧文的大统一工会<sup>⑤</sup> 中的阶级彻底瓦解成分散的、各自单独行动的工会。不是把工人阶级的解放，

① 维伯《英国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 1 卷第 196 页。——卢森堡注

② 维伯《英国工联史》第 121 页。——卢森堡注

③ 弗兰西斯·普莱斯（1771—1854）——英国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家。——编者注

④ 维伯《英国工联史》第 125 页。——卢森堡注

⑤ 即全国各业大统一工会。——编者注

而是把争取尽可能有效地经营“租约事务所”当作奋斗的目标，不是努力同现存制度进行斗争，而是谋求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舒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一言以蔽之，为争取资产阶级式生活而进行的资产阶级性斗争代替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

各工会的成就是通过这样两个途径取得的：同企业主进行直接斗争和对立法施加压力。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的这些成就都应直接归功于它们曾经赖以生存的**资产阶级基础**。关于同企业主的斗争，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在1845年就已宣布了“工会活动的一种新方法——**调解和仲裁的政策**”<sup>①</sup>。但是调解和仲裁只有以共同的基础为前提时才有可能。这样一个基础很快就具体表现为广泛推行的浮动工资表制度，而这种制度又是以企业主同工人的经济利益和谐一致为基础的。正如我们直到八十年代所见到的，只是因为企业主同工人都立足于这一共同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广泛推行集体合同、建立调解机构和仲裁法庭。但这样一来，劳动同资本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就从阶级斗争变成了买主同卖主之间的讨价还价，同任何一件商品成交时的情况一样。如果说，一方面企业主懂得了罢工在“就购买劳动而进行商业谈判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另一方面，劳动也甘愿被看作单纯的“商业谈判”的对象。

工联承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关于供求是工资唯一调节者的学说作为整个工会斗争的基础，“由此得出的理所当然的结论就是：它们巩固或者改善自身境况的力所能及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供应**”<sup>②</sup>。

于是我们看到那个时期工会斗争的手段是废除加班、限制徒工数目和向国外移民（个别部门直到八十年代还这样做）。这就是说，除第一点外，纯属行会式的方法。

① 维伯《美国工联史》第151页。——卢森堡注

② 同上，第160页。——卢森堡注

工会运动的政治方面具有同样的性质。尤其有两个观点可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英国工会会员自身的政治态度。他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曾经是而且今天大都仍旧是彻底的、纯粹的资产阶级分子——自由派的或者保守派的。其次是他们在争取劳工保护法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这决不是象德国或者其他大陆国家所进行的那种群众鼓动，而是一套十分特别的、复杂的、对资产阶级国会议员（不问其党派立场）进行劝说和施加影响、进行肮脏交易、执行没有丝毫原则性和阶级性的院外幕后政策的体系，这种政策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工人中已完整地形成。<sup>①</sup> 工会的最重大的立法成就恰恰是由于这些手段而取得的。与此完全相反，一种更有阶级觉悟的态度却成了争取实际成就的障碍，矿工联合会曾经必需与之斗争的那些困难已说明了这一点。<sup>②</sup>

同这样安排的活动有关，英国工会的建设和整个性质在本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运动的领导权从那些“非专职的热心分子和鼓动家”手里转到了“固定的、支薪的官员阶层”手中，而这些官员有时甚至是根据正规的学校考试来任命的。<sup>③</sup> 工会运动由进行阶级团结教育的活动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活动变成了交易活动，工会成为一个特别复杂的机构，一所为长期生活布置得舒适的住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整个工人界存在着“一种谨慎的、纵然有些狭隘的国务活动家思想”。

## 二

我们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中看到，从五十年代以后，英国的

---

① 维伯《英国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230页和以下各页。——卢森堡注

② 同上，第234页。——卢森堡注

③ 维伯《工会史》第163页。——卢森堡注

工人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道德上就有了共同的基础。“他们（工联领袖）虔诚地忍受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仅仅要求联合的自由，而资产阶级中比较开明的人士是愿意给他们这种自由的……他们对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的理解和对形势中实际困难的估价使他们不去做一个只会进行煽动的人……有礼貌看起来虽然是普通的小事，却不是他们的无所谓长处。他们既用词恰当，私人生活行为完全无可指责，没有任何举止使人联想到小酒店（这是值得一提的），又具有完满的自尊心和端正的品行。”<sup>①</sup>

无论工联的纯经济斗争还是它们争取劳工保护法的斗争都不象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那样由所有的工会一致地并且为了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而是分散地、由各个工会独自进行，有时相互之间还发生直接的冲突（参看达勒姆郡和诺森伯兰郡的代表在议会中反对矿工联合会<sup>②</sup>意图的行动），这不过是这种国务活动家式的个人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缺乏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缺乏阶级观点，大小工会之间、熟练工人工会同非熟练工人工会之间以及新老工会之间的矛盾使他们的共同行动——他们的全体代表大会和他们的议会委员会也必然毫无成果并陷于瓦解。<sup>③</sup>“代表许多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的代表大会从来都只能是一种松散的联盟。”<sup>④</sup>

除上述两点即工业的持续繁荣和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基础外，英国的形势还有与此有必然关系的第三个特点，即舆论对工人

---

① 维伯《工会史》第194页。——卢森堡注

② 维伯《英国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234页。——卢森堡注

③ 最近的一个证明是在加的夫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采用的表决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全部权力交给职员”，而且是少数老工会和大工会的职员（《英国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248页。）——卢森堡注

④ 同上。——卢森堡注

持友好态度。人们常常声称，促使英国舆论对工人运动表示友好并给予有力支持的，是“人所固有的同情心”，是英国资本大部分用于国外这一事实，但情况却不是这样。

持这种见解的人，只看到了舆论对工人有影响的一个方面，即它为工人提供的物质援助，他们却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即它向工人施加的精神压力。英国的舆论不是一般地对工人运动而是对特定的、现存的即已在英国形成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对在经济上、政治上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场上的运动抱亲切态度。它并不支持阶级斗争，相反，它防范阶级斗争。当发生罢工、发生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时，大家知道，舆论就专横地迫使人们去仲裁法庭，去进行仲裁审理，即使工人正好处于优势，舆论也不让斗争成为对力量的检验。如果工人不愿听从公众的呼声他们就要遭殃。英国工人由于在同企业主进行斗争时得到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支持，因而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资产阶级的**选民**，这种支持又使工人进一步成为这个社会的忠实成员。

明智的企业主和同样明智的工会会员，体面的资本家和体面的工人，胸怀宽大的、对工人友好的资产者和心胸狭窄的、带有资产者局限性的无产者相互制约，他们不过是表述同一种关系的相关概念而已，而这一关系的共同基础是本世纪中叶英国经济的特殊地位，即英国工业的**稳定**和对世界市场的独占统治。

上述情况在英国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但是从此以后，各个方面，尤其是工会在那以前的发展的基础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化。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由于俄国、德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英国的迅速衰落不仅表现为失去一个接一个的销售市场，而且也表现为一个对于资本主义各个时期的发展来说很说明问题而且很重要的现象，即它的**生产方法和贸易方法**的落后。特别是生产方法和贸易方法总是比输出和输



入统计本身更早、更可靠地表明资本主义工业的繁荣或萧条。正如一个上升国家的资本家阶级首先通过熟练的和灵巧的生产技术和贸易技术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一样（请看直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英国和当前的德国），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中落后的和拙劣的生产方法和贸易方法是首要的、无可怀疑的标志。现在，英国就处在后面这种情况。多年来在英国各领事馆的报告中，对英国商人的冷漠和生硬态度的抱怨是一个固定的题目。至于说到生产方法，由于外国的竞争和为了保护本国的国内市场，英国目前已被迫采用现代的生产技术（这在不久前还是不可能的），请看例如英国白铁工业在北美竞争的压力下当前实行的变革。<sup>①</sup>

基础动摇、商业情况不稳定、营业时常不景气使英国的资产者和工人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英国工业的普遍萧条暂时还由于国际军国主义和国际贸易对船舶建造业的需求而得到补足和抵偿，而船舶建造业又支持了一系列重要工业部门如冶金工业。不过在这一方面英国不久也将受到德国的竞争的威胁。

如果说资本在繁荣时期对于向劳工作出的让步感到无所谓，那么它当前却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容易激怒了。它对仲裁审理不满，它有时通过仲裁裁判所的裁决“去拒绝工人更高的要求”，而在另一些时候，它“利用战略地位迫使工人接受比仲裁裁判所的裁决更加对他们不利的条件”<sup>②</sup>。另一方面，浮动工资等级制度以前曾保证工人享有工业繁荣带来的份额，现在由于营业不景气它就愈来愈频繁地只使工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了。各工会断然放弃了这种工资制度。由于工人方面放弃浮动工资制、企业主方面有计划地破坏仲裁裁决，伴随着英国工联主义全盛时期的整个调停仲裁审理就失去了基础，“社会和平”也就随之消失了。这种变化得到了

① 见1898年12月中旬的《德国工业报》。——卢森堡注

② 维伯《英国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182页。——卢森堡注

正式承认，因为前几年废除了规定一切劳资之间的冲突必须经过调停审理的1867年和1872年法律。同时，随着营业持续兴旺、工人状况安定的消失，也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精巧地建立工会并使它们错综复杂的机构象从前那样正常地、顺利地行使职能。随着浮动工资表和经常性的调解审理的废除，这种精巧的机构和工会特有的官僚主义大部分也都完全失去了作用，所有在最后十五年内成立起来的工会同从前的工会相比，都以组织和职能的简化见长。在这方面，它们和大陆国家的工会相似。但是，正象我们在机械制造工人的罢工和瓦里斯煤矿工人的罢工中所看到的，由于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仲裁审理越来越无效，劳资之间的冲突便越来越变成**实力问题**。“社会和平”在英国也向社会战争——**阶级斗争**让步了，工会逐渐由保障工业和平的组织变成以德国、法国、奥地利的工会为榜样的战斗组织。

最近的两个重要的征象表明，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方面还是英国无产阶级方面都对这一变化有了清楚的认识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去进行严肃的阶级斗争。在企业主那里成立了**反对工会的议会行动的联盟**，在工人那里重新出现了**统一的工人联合会的思想**，这种思想受到资本家和老派的工会会员、“社会和平”的拥护者的憎恨，但是在英国的无产阶级大众中，清楚地表现出团结起来的要求，表现出符合这个词的实际意义的**阶级意识**的觉醒。

从我们对英国工联主义简史所作的概述中可以对同伯恩斯坦及其拥护者的争论作出三点结论。

首先，认为**工会对于社会主义有直接意义的想法**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人们在这样认为时援引的英国工会运动以往取得的成就，大部分恰恰是由于它们纯粹的资产阶级性质、由于它们对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的敌视态度而取得的。英国工联主义历史著述家悉·维伯<sup>①</sup>和比·维伯反复地并特别强调地断言，每当英国的

工会运动浸透社会主义思想时，它就失败，相反，当它变得狭隘、庸俗化、摆脱社会主义影响时，它就获得成功。<sup>①</sup>

所以恰恰英国工联主义（心满意足的、体面的、狭隘的、见识浅薄的、带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感情的工人绅士是它的典型代表）证明，工会运动本身还丝毫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传播社会主义意识的直接障碍。反过来也一样：社会主义意识在有些情况下也能够成为纯工会成就的障碍。

德国和所有大陆国家的工会，一开始就是在阶级斗争而且是在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常常简直可说是社会民主党的产物，是它的产儿（请看比利时和奥地利的情况）。这里的工会事先就已纳入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同英国的情况相反，它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并在受到它保护时，才能指望获得成功（请看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保护结社权的行动）。从这一观点即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观点来看，德国的以及整个大陆国家的工会（尽管它们有自己的弱点，并且部分地由于有这些弱点）比英国的工会先进。推荐英国的例子等于建议德国工会离开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基础而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基础之上。

为了有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是德国工会应当效法英国工会，而是相反，英国工会应当效法德国工会。可见英国眼镜之所以对德国不适合，并不是因为英国的情况比德国**先进**，而是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它比德国**落后**。

其次，如果我们抛开工会对社会主义的主观意义即它对于阶

---

① 悉尼·维伯(1859—1947)——英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费边社创建人之一，和妻子比阿特里萨·维伯合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的著作，宣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和平解决工人问题的改良主义思想。——编者注

② 参看例如维伯《工会史》第121和142页；《英国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213页及其他各页。——卢森堡注

级意识的影响不谈，而去看看它的客观意义即根据机会主义的理论工会应当交给工人并让他们用来粉碎资本的那一“经济权力”，那么，这一权力也证明自己不过是一个童话，而且是“从古就有的童话”。甚至在英国，工会不可动摇的经济权力（完全不谈它是付出怎样的代价获得的）大部分已经是属于过去的事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力量是同英国资本主义的某一个特定的并且是例外的时期——对世界市场的独占统治联系在一起。唯独这一时期由于它的稳定和繁荣成了工联主义的真正全盛时期的基础，但是它既不会在英国也不会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再次出现了。

如果说德国工人运动甚至能够和愿意听从机会主义的 建议，为了“经济权力”而放弃“贪食奇谈”即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仿效英国工联主义，它将永远不可能获得英国工联从前的那种经济权力。这是出于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因为老工联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无法通过机会主义人为地用法术变出来的。

那么，概括地说，伯恩施坦的“英国眼镜”是什么呢？这是他理解方式的一面凹面镜，其中显示出的一切图像都是头脚倒置的。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斗争最有力的手段，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却简直是一种障碍，他所看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却是英国的运动的过去，在这一运动向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过去已日益消逝了。

发表于1899年5月9、10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05、106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471—482页。

（周家碧译 殷叙彝校）

## 一个策略问题

(1899年7月6日)

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sup>①</sup>不仅给法国社会党人,而且给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提供了很合适的机会对策略和原则作一番考察。无论如何,社会党人积极参加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是一种超出通常的社会主义行动方式的范围的现象。这是否同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的活动一样,也是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一种合理的、适宜的方式呢?或者相反,这是对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策略的违反?最后,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否是一种例外情况,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容许的和必要的,在另一些条件下则是不能容许的和有害的?

最近,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伯恩施坦的理论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即所谓**社会主义一部分一部分地输入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主义分子加入政府既是值得欢迎的也是自然的。既然一方面可以逐渐地、一点一滴地把社会主义输入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自动地逐渐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社会党人愈来愈广泛地参加资

---

<sup>①</sup> 亚历山大·埃蒂耶纳·米勒兰(1859—1943)——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曾于1899年6月22日—1902年5月28日在反动的瓦尔德克-卢梭资产阶级内阁中任商业部长。列宁指出,米勒兰入阁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编者注

产阶级政府就甚至会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完全符合他们所谓的日益接近在立法机构中取得社会主义多数。如果说这一事件按照这种方式符合机会主义的理论，那么它同样也是适应机会主义的实践的。既然取得直接的、明显的成果（而不管通过怎样的方法）是这种实践的指导路线，那么，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在“实践政治家”看来应是一种不可估量的成功。为什么一位社会党人部长不能通过细小的改善、缓和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补缴工作来实现一切呢！

如果按照另一种观点来看，问题就不一样了。这种观点就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后，才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目前的社会主义活动只限于通过阶级斗争为这一时刻作好客观的和主观的准备。当然，社会民主党为了实际发挥作用，必须占据现今国家中的一切可以取得的阵地，在所有的地方向前推进，这是事实。不过，这只是作为前提，这是人们可以在那里开展阶级斗争，即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的阵地。

但是就这方面来说在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机构及其政府之间有着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在议会里，当工人代表无法使自己的要求获得通过时，他们至少可以采取反对派的立场继续斗争。与此相反，政府的任务是贯彻法律、是行动，它决不容许在自己内部有一个原则上的反对派，它必须使自己的所有机构不断地行动，因此，即使政府是由不同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就象某些时候以来在法国的混合内阁中那样，它总是有一个基本上共同的基础作为立足点，这个基础使它能够采取行动，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最极端的代表就整体来说可以同最反动的保守派并肩进行统治。与此相反，现存制度的原则上的敌人而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或者每时每刻都反对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当一个政府的积极成员，这种状

况显然是难以持久的，它势必导致社会主义成员被逐出政府，或者终于进行合作，每日每时为保持和延续国家机器而在每一政府部门完成必要的职能，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再当一个社会主义者，至少是在政府职务的范围内不再当一个社会主义者。

当然，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有许多要求也可能被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以及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所接受，至少抽象地说是这样。因此乍一看来可能会觉得，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政府里致力于实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改良，从而可以同在议会里一样有效地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然而，这再一次表明，机会主义政策总是没有考虑到，在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首要的问题不是争取什么，而是怎样争取。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在立法机构中的代表力图实行社会改良，那么，他们拥有充分的可能通过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立法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政府（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否决预算上），而使他们的争取资产阶级改良的斗争具有原则的社会主义性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性质。与此相反，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作为政府的成员，也就是说在同时积极支持整个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下，力图实行同样的社会改良，实际上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或者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因此，如果说社会民主党人进入代议机构促使阶级斗争得到加强，从而促进无产阶级的事业，那么，社会民主党人进入政府只会带来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引起腐化和混乱的后果。工人阶级的代表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不致于背离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为了同时夺取政府并把它变成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的政府。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或者不如说衰亡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那时无产阶级的代表最终夺取政权还不可能，但是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显得是必要的，尤其是当问题涉及到国家的自由或者民主成果（例如共和制）的时候，当资产阶级政府本身已经声

誉扫地，处于瓦解状态，以致没有工人代表的支持无法使人民服从。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人民的代表当然不应为了侈谈抽象的原则而不去捍卫共同的事业。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的形式必须使无论资产阶级或者人民对于其行动的暂时性质以及特殊目的不致产生丝毫怀疑。换一句话说，社会党人参加政府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不应导致同政府的活动及其存在完全一致。现在在法国是否形成了上述形势，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各社会主义政党从一开始并且在没有考虑参加政府的情况下就已经声明，支持任何一个真诚的共和主义政府。米勒兰入阁，而且肯定是在没有得到他的同志们的赞同的情况下入阁，恰恰相反使各社会主义政党部分地不得不放弃这种支持。总之，问题不在于对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特殊事件作出判断，而在于从我们的原则得出一个普遍的准则。根据这一观点，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看起来是一种只会损害阶级斗争的试验。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按照自己的性质来说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能成为执政党。

发表于1899年7月6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53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483—486页。

（李兴耕译）



## 烂 核 桃

(1899年7月22日)

白尔尼曾经说，每当他读他的半官方反对者的文章时，都觉得自己好象是在咬一个烂核桃。每一次他都一丝不苟地用力将这个半官方的核桃咬开，然而出乎意外，牙齿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狠狠地碰到一起，神经陡然一颤，口里留下来的只有令人作呕的味道——好象含着蛆。现在阅读那些不可胜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书籍、小册子和文章的人碰到了类似的情况，而最近几个月里，这类作品简直象强风中吹掉的核桃一样接二连三地被抛了出来。

在《康拉德年鉴》的最新版里，一位初出茅庐的西姆克霍维奇博士打扮得怪里怪气，登上了舞台。他在他那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sup>①</sup>的六十页的大作中，引述马克思主义从前的和新近的所有著作，提到近两个世纪来的大部分哲学家，让那些所有用活的和死的语言写作的有权威的证人都出来为他发誓作证，还用一些诗句插缀其间。所有这些哲学家、学者和诗人在他那里都以咄咄逼人之势证明，马克思的学说的一切论点早已被生活和科学统统抛进了废物堆。

这个最新战胜马克思的人从纽约射出他那致命的毒箭，但显

---

<sup>①</sup> 约翰奈斯·康拉德编辑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第3辑第17卷第6册第721—781页。——编者注

然他是在德国的某个大学里被弄得愚昧无知的。这样一句话恐怕就足以说明他自己的“科学”水平了：“卡尔·马克思的……重大错误在于，他提出了一个不是确定社会应该怎样，而是解释社会现在怎样的体系。”<sup>①</sup>这就是说，马克思没有制定出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社会方案，而是写出了对现存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说，他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是科学的研究家。他的“重大错误”就在这里。

在本世纪末的今天，如果在其他某个科学领域有一个西姆克霍维奇提出某种类似的论断，例如，认为达尔文的重大错误在于他解释了动物世界的实际发展情况，却没有指出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发展，那么一个科学杂志的编辑部就会把他的文章立刻退回去。唯独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尤其是在涉及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此种中学生式的判断却可以在教授们办的一个杂志上心安理得地公诸于众，而这远非一种偶然现象，相反，对资产阶级杂志上和大学里的当今官方社会科学来讲，这倒是很典型的。

“受过科学训练的头脑相信形式上的正义原则的胜利，并对社会组织的技术安排漠不关心，但理解力没有受过培养的人在其信念中却拘泥于一个物质上确定的组织，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图景，而不相信抽象的 *suum cuique*（各得其所的原则）。”<sup>②</sup>这是西姆克霍维奇的另一个判断。我们看到在他这个人身上有着取得文凭的蠢材们的一切受过科学教养的优点，因此他也不缺乏自负。只有那些未受过教育的群氓才会死死抱住为了实现正义原则需要有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那种想法不放；用施塔姆勒<sup>③</sup>式的智

① 《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17卷第6册第736页。——卢森堡注

② 《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17卷第6册第780页。——卢森堡注

③ 鲁道夫·施塔姆勒（1856—1938）——法哲学家，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编者注

慧加以科学训练的头脑却仅仅拘泥于“形式上的原则”，也就是说“拘泥于”这个原则在麻雀和德国教授们在其中运动的那一元素——虚幻的空气——之中的存在。此外，在西姆克霍维奇为社会民主主义所致的悼词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原则——“革命”、贫困化理论、价值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就象秋天从树上掉下的落叶一样接二连三地败落了，于是福尔马尔、康普夫麦尔、康拉德·施米特和作为所有这些人泰斗的**伯恩施坦**就仪表堂堂地列队出场了。对于这一些，读者自己一定会思考的。几个月来在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杂志和一大批厚厚薄薄的书籍中奏起的这个陈腐的曲调过分无聊和单调，不值得人们对它去做进一步的分析了。

然而不管怎样，在所有这些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危机和战胜马克思主义的乏味的老生常谈中，毕竟提出了一个问题。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战胜马克思就是德国教授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行当，也是在德国谋取大学特聘教师职位的屡试不爽的好办法。事情甚至还不止于此。倘若人们看一下近二十五年来德国社会科学总的发展情况，就会发现，这一发展除去要战胜马克思这唯一的一件事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而这个发展的最重要、最积极的原动力就是否定马克思的学说这一意图。

让我们以国民经济学为例。经过斯密和李嘉图到马克思，从剖析资产阶级制度到揭示出这个制度的运动规律和它的灭亡，这是古典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资产阶级科学**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说来，他们必然要否定马克思所得出的社会主义的结论，因此也顺理成章地要诋毁整个古典国民经济学。作为这个经济学的最了不起的工具——导致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基础的演绎法——的对立面，所谓的历史学派被创造出来了，这个学派的原则是，象蚂蚁那样将零碎的“事实”生拉硬扯地拖到一起以及把“历史的”草茎和历史的垃圾堆成整座山丘，在这些山丘的下面，资产阶

级社会的普遍运动规律成功地被掩盖和藏匿起来了。他们就这样用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思辨”来满足现代国民经济学的要求，也就是提供了历史的观点，同时又削去了真正的历史方法的任何革命锋芒。

古典经济学，包括它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马克思的另一个根本特点是对经济现象的客观的研究。柏姆-巴维克—杰文斯的“主观学派”是“战胜”这种危险的研究方法的一个产物，这个学派不想从人们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想用个人的灵魂深处的想法来解释社会现象，并通过这种办法来消除资产阶级关系的危险的后果。

尽管采取了这种种办法，然而面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却仍然有必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那些也是由马克思一度加以揭露的，现在还裂开着的伤口进行处理。布伦坦诺的讲坛社会主义，这个“由粪便和火形成的怪胎”，就是为这件事操心的。

哲学，尤其是它的社会学部分，也经历着与国民经济学同样的发展过程。如同古典经济学经过斯密和李嘉图而发展到马克思那样，古典哲学经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顺理成章地发展到马克思，从辩证法和唯物论发展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同“战胜”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完全相似，也必须战胜古典哲学的主要成果：辩证法和唯物论。由于从黑格尔那里开始的哲学的条条道路都不可避免地通向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最危险的强盗巢穴，于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除去简单地通过一道诏令将黑格尔从哲学的发展中一笔勾销并且让科学“回到康德去”之外，就别无他法了。

然而最难办的还是“战胜”历史唯物主义。为了满足一切现代史观的要求，满足一元论，也就是满足统一性，同时也是为了避开唯物主义学说的那些危险的结论，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折腾之后，终于在施塔姆勒的帮助下发明了一个新的、对整

个古典哲学来说都是陌生的“一元论”，它将社会生活的所有现象都在教授们的大脑里磨成一片毫无差别的糊糊，可见这个一元论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而简直就是些胡言乱语。它作为衡量各种社会意图是否合理的标准所能办到的仅仅是提出一个“形式上的社会理想”，而这个理想的最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永远也不能实现。

这样，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德国的整个官方社会科学就已经大大地“战胜”了马克思，马克思成了它们的整个存在的秘密根源。不过，战胜者们所有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和哲学的“学派”本身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它们的出现不是要去说服马克思的天然追随者，即各人民阶级，而仅仅是为了使马克思的天然敌人，即资产阶级能够自我安慰，或至少能够自我麻醉。不论是罗雪尔<sup>①</sup>还是柏姆—巴维克，是施穆勒还是施塔姆勒，这些教授的所有夸大其词而又晦涩的废话都摆脱不了那样一个社会阶层的某种穷极无聊的情调，这个社会阶层只在自己人中间相互取悦，并从一开始就准备不加区别地相信凡是反对可憎的马克思的一切。这个讲坛上的小集团是以“科学性”自负的，他们自我满足和彼此欣赏，但是在这种种傲态的背后却透露出他们非常不舒服地意识到劳动场所的庞大的马克思追随者队伍的强烈的、无声的蔑视。在“历史学派”故弄玄虚的空话后面可以听到马克思在进行无情嘲讽时得意的笑声，而社会民主党的坚定步伐声则轻蔑地盖过了讲坛社会主义最卖力的鼓吹社会改良的长篇大论。

他们所鼓吹的简直就是一种“消化科学”，一种促进对于剩余价值的消化的科学，这种科学丝毫不企求或者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剩余价值生产者的尊重。

<sup>①</sup>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罗雪尔(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创始人。——编者注

但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却突然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在广度上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许多结果之中，有一种就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机会主义潮流。机会主义处在与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性对立的立场上，很自然，它必然要从头至尾经过在它之前几十年资产阶级科学已经采取过的所有一切相同的步骤，更确切说，是倒退的步骤。那些以在讲坛上从理论方面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为职业面领取俸禄的好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转移到社会民主党的营垒中去了，这是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奇的。在伯恩斯坦及其门徒们的理论中，由于长期的和毫无效果的大发空论而早已死亡和腐烂，早已自然而然地被埋葬和被忘却了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突然复活了，“主观论者”复活了，施塔姆勒的那个变幻莫测的“社会理想”复活了。这个社会理想就象一只故意捉弄人的蝴蝶，让人永远也捕捉不住（“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捕捉〕就是一切”）。不言而喻，资产阶级消化科学的根本性质不会因为有几个迷途的、头脑发昏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它盲目模仿而有丝毫改变。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座座城垣同样也不会因为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人充当志愿兵吹奏资产阶级的喇叭面倒塌。

不过只要党还没有正式地明确无误地将这些事实摆出来，资产阶级战胜马克思的那整个一伙人就总会舒舒服服地躺在最甜蜜的幻境之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连做梦也未想过的，在社会民主党内似乎竟也有人追随他们了，不是吗；到头来他们甚至对他们的战胜马克思，对他们自己都开始相信起来了！

正是我们党内的这股机会主义的轻风使得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这种资产阶级的见解象烂核桃一样在最近几个月里如此密集地倾撒下来。调子还是老的，其中的新货色不过是信心和希望。此外还有爱。因为甚至新近出现的西姆克霍维奇也许诺我们说，如果我们发誓与业已被战胜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他就不会忘记

我们，并且还打算“与饥饿者分享面包”。

如果说，教授和他们的虔诚的门徒们关于社会民主党内部事务的单调面无聊的“评论”也值得给予回答的话，那真是乏味到了顶点。但是将从前那样的敬畏态度和从前那种应有的自我蔑视再教给他们，而且要通过给予彻底的打击来做到这一点，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为纪念马克思所应做的事情。一个令人痛心的必要性是，在这方面也要涉及到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自己。

发表于1899年7月22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6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487—492页。

（于智元译 殷叙彝校）

## 致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摘录)

(1899年9月14、15、16日)

### 二 误 会

如前所说,与伯恩施坦、席佩耳和机会主义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论战自然会成为讨论的中心。根据这些代表人物的反复表白,首先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党和机会主义的拥护者之间究竟存不存在有争议的问题以及问题何在?例如,如果人们听一听福尔马尔在斯图加特对于同伯恩施坦的辩论曾说过什么话,海涅和格腊德纳乌厄在他们的发言里怎样论述了这一问题<sup>①</sup>,费舍不久前在柏林第二选区的会议上如何发表意见<sup>②</sup>,最后再读一下伯恩施坦本人最近发表在《前进报》上的一篇文章<sup>③</sup>里所写的内容,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引起极大轰动的与伯恩施坦的全部争论原来不过是出于一场严重的误会。伯恩施坦以及他的拥护者要向党推

① 格·格腊德纳乌厄、沃·海涅和格·福尔马尔在1898年10月3日至8日于斯图加特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代表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企图掩饰他们的立场,声称他们的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偏离党迄今的实践。——编者注

② 理查·费舍在1899年9月5日在柏林第二选区的社会民主党选举协会为参加汉诺威党代表大会而召开的会议上把麦·席佩耳、沃·海涅和爱·伯恩施坦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基本原则的攻击说成微不足道的,并断言党内没有机会主义。——编者注

③ 伯恩施坦《我对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的态度》,《前进报》1899年9月3日第206号。——编者注



荐的并不是新东西,但人们只从反面理解他们,并赋予他们的话以完全另一种的意义。

假如情况是这样,即伯恩斯坦、福尔马尔、席佩耳真的完全不想标新立异,只是要坚持党迄今所做的一切,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吵吵嚷嚷呢?阁下需要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倍倍尔1891年在爱尔福特与福尔马尔的慕尼黑演说作斗争时对福尔马尔说过的话拿来对伯恩斯坦说了:“假如问题是保持老的策略,那么,根本不需要发表这些演说。”<sup>①</sup>如果伯恩斯坦不想向党推荐什么新东西,那么,他的文章、来信和著作<sup>②</sup>同样是完全多余的。

下面的情况更使“误会”的假说看来特别可疑:迄今为止,在我们这里只要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只要党对它们进行反击,它们立刻就变成了所谓的“误会”。在爱尔福特,当党明确指出这个派别的第一个宣言即上面提到过的福尔马尔的慕尼黑演说的性质时,福尔马尔就宣称:“你们把我的策略称作新的策略,这是不对的,我根本不想要全新的策略,我站在迄今的策略的立场上,但是我希望言行一致地贯彻这一策略。”<sup>③</sup>但是一大批发言人,其中包括奥艾尔同志,用下面的话回答他:“毫无疑问,福尔马尔在他的演说中也象在他的小册子中一样,主张必须改变迄今的策略。”<sup>④</sup>(着重号是我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278页。——卢森堡注

② 1896年10月至1897年4月,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组文章,他在这组文章中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这种对党的革命基础的攻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遭到坚决的谴责。因此,伯恩斯坦向1898年10月3日至8日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递交了一份声明,坚持他的修正主义理论。1899年1月,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编者注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190页。——卢森堡注

④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223页。——卢森堡注

加的——罗·卢)

休恩朗克发表了内容相同的意见：“冯·福尔马尔先生的慕尼黑演说与其说是能出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之口，不如说是能出自一个人民党人之口更为恰当得多……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由于俾斯麦的垮台，他要求改变我们整个运动的方向，而不仅仅是策略；他想用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代替唯有通过彻底改变生产方式才能消灭目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这一革命观点，他想用一些残羹剩饭打发我们！”<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最后，倍倍尔断定：“由此可见，福尔马尔今天使劲地声明他根本没有想到要一种新策略，这是十足的虚伪……事实上，福尔马尔希望党开始实行一种完全新的策略。”<sup>②</sup>

接着倍倍尔还说了下而的话：“福尔马尔说，他的演说中确实有一些内容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个样子，为了论证这一意见，他从这些演说中引用了许多话。但是毕竟有一点是仍然十分引人注目的：福尔马尔感到有必要把他6月1日所作的演说拿去付印，因为有人错误地报道了它；然后，他又感到有必要补作第二次演说，它应当是第一次演说的注解。但是在他把两篇演说付印以后，他又不得不在这里作第三次演说，这次演说又应当被看作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演说的注解。”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新时代》上的伯恩施坦文章的经历同这完全一样，后来他不得不通过一封致党代表大会的信来解释这组文章，接着他写了一本书对这组文章和这封信作了注解，以后他又陆续在《新时代》和《前进报》上发表文章，为这本书辩护，以免发生误会。在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伯恩施坦在今天仍旧认为自己被他

<sup>①</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219页。——卢森堡注

<sup>②</sup> 同上，第273和277页。——卢森堡注

的批评者误解了，这与福尔马尔在 1891 年的情况完全相同。

在机会主义发展的这两个终端之间，在福尔马尔的头几次演说和伯恩施坦的这本书之间，每当机会主义有所表现时，所谓“误会”的说法通常都要再次出现。据说由于海涅的补偿建议（用大炮交换人民的权利）<sup>①</sup>引起的全部吵嚷是不折不扣的误会，事实上海涅同志所想的仅仅是同意把大炮交给社会主义的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

席佩耳的为军国主义辩护和对民军的嘲弄无非是那些根本“误解”了他的人的错觉。这种“误解”往往总是这样伴随席佩耳的发言，因此当他在汉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声明说“人们大概误解了我昨天说的话”时，回答他的是“啊！”的喊声和哄堂大笑。<sup>②</sup>每当机会主义看来有遭到清算的危险时，就会听到“误会”的说法，党内对此早已习惯了。

但是，如上所说，正是这种情况使人十分怀疑关于没完没了的误会的假说。它的有规律的出现也只能用两种原因来解释。部分地仅仅是出于这一愿望：每当某种言论和行动被人以非难的态度抓住和加以攻击时，就想回避争论。这种动机在福尔马尔和席佩耳两位同志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倍倍尔在爱尔福特曾公开而明确地说过：福尔马尔拒不承认他有那些见解并求助于所谓的“误会”，不过是为了躲避一项斥责他的严厉的决议。

另一个特别与伯恩施坦的理论有关而更具有普遍性的原因是这些理论自身的特殊性质。它们的最危险的一而在于它们的结论，也就是当它们完全成熟时会给运动带来的结论。我们党内所有反对伯恩施坦的人一致认为，他的观点的最终普遍后果将是

---

① 见本卷第 143 页注③。——编者注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7 年汉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7 年柏林德文版第 136 页。——卢森堡注

瓦解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个结论吓了伯恩斯坦一大跳。他发誓说，他既不盼望这个后果，也不为争取这个后果而努力。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主观意义上是对的。要把伯恩斯坦说成是打算毁灭工人运动，这是荒谬的。相反，他以为他的观点能最好地为工人运动服务。然而，问题不在于伯恩斯坦想什么和希望什么，而是撇开他个人不谈，从他的理论中客观地产生什么。伯恩斯坦不希望从他的观点引伸出最后的结论，或者说看不到这一点并且半路上停下来，这一事实成了大量误会的来源。但是，误会不在强调他理论中隐蔽的东西和把他当作叛徒来批判的那些人方面，反而是在认为他的言论和誓言是有说服力的人方面，这些人认为从党的原则立场看来伯恩斯坦的理论中“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一些来自工人中的同志尤其是这样，他们没有时间和可能来思考伯恩斯坦观点的进一步的结论或者完全弄懂他的言论——即使他使用的词句同党使用的一样——的真正含义。所以，在对机会主义理论作出判断时误会确实起着一种巨大的作用，只不过是在同迄今所认为的那种相反的意义；不是出于误会使伯恩斯坦和他的追随者受到批判，而是出于误会使许多人为他们辩护。因此，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澄清后一种意义上的对机会主义的误会。

### 三 对 立

如果要弄清伯恩斯坦派和党之间的真正对立，可以重温一下倍倍尔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讲的话，只要把提到福尔马尔的那些地方当成是指伯恩斯坦就行，再也没有比这样做更加准确和清楚的办法了。

“福尔马尔认为当前的政治局势有了重大的改善，他相信已经采取了一种‘新方针’…… 我们应当走上谈判的道路，寻求在现

行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良。  
‘向善意伸出手来!’愚昧和偏见使不少善良的人成为我们的意图的反对者,我们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克制……现在我不得不声明,如果党遵循福尔马尔的策略,并且暂时撇开我们本来的目标而首先把它的全部鼓动工作集中到实现这五项要求(最近的纲领——罗·卢·)上面,那么我确信,这将成为一场必然导致党腐化堕落的斗争。这意味着完全放弃我们本来的目标。也就是说,同我们本应做的和以前做过的恰恰是背道而驰的。迄今我们是为争取我们能够从今天的国家争取到的一切东西而斗争的,但是,我们得到的始终只是一点微小的让步,根本不会改变事物的真实状况,这一点我们是经常强调的。我们要全局在胸,任何新的让步对我们来说只有这样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立足的斗争基地整治得更好一些,使我们更加拥有防卫能力……但是,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我们要向群众指出,敌人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是不会把最起码和最正当的要求给予他们的。我们议会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启发群众认清敌人,而不是目前是否实现某项要求的问题……我们代表工人阶级同其他所有阶级对立的利益,因而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象福尔马尔在他的第一次慕尼黑演说中所主张并且在第二次演说中进一步主张的那样实行某种妥协……照他的策略做,我们必然会走到这种地步:由于我们仅仅为眼前的任务进行宣传而**最终忘记我们是社会民主党**;我们忘记今天的国家和社会是社会民主党的死敌,不能同它们妥协……我们迄今始终声明,我们要在消灭现今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即现今的国家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要力图占有一切手段和优势,使我们为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减少困难。整个目标是主要的事情,其他的事都是次要的……**与此相反,福尔马尔宣称伟大的总目标目前是次要的事情,而我们**

必须争取实现的最近的实际要求是主要的事情。这是一项原则的对立，你无论把它设想得多么尖锐都不为过分，澄清这一点当然是代表大会的任务。”<sup>①</sup>

我们在这里明确而清楚地阐述了党内通行的观点和机会主义观点之间的对立。

这种对立的核心是最终目的和实际斗争的相互关系问题。

我们争取政治自由或者社会改良的斗争不过是取得国家政权和消灭现今社会的预备步骤，所以在这个斗争中，最终目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的决定性因素，整个斗争因此带有根本同现社会对抗的性质。因而，我们在这个斗争中使用的仅仅是这样的手段，它要符合我们对当今社会所采取的势不两立的立场，此外我们还运用这个斗争本身首先向全体工人进行社会主义的启蒙。

从机会主义的立场出发，一切显得颠倒过来了。如果认为每一项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就已经是一点一点地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已经是斗争的目的，那末，他们就觉得达到这一目的的所有手段都是同样好的。那末，要是通过投反动政党的票或者批准建造大炮或者用其他任何手段来为人民取得一项权利，反正都一样。一方面，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启蒙显得完全多余，因为如果我们简直是每天都在实现社会主义，那么“谈论”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必要呢！“难道我们除了在每一次发言的时候反复背诵陈旧的教义问答（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之外不能做得比这更好吗？”<sup>②</sup>

另一方面，从资产阶级的改良中期待一切，就会使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失去了它迄今的不可调和性。如果我们把可以从资产阶级政党那里得到的东西看作全部目的，那么跟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作

<sup>①</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1 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 年柏林德文版第 173—174 和 274 页。——卢森堡注

<sup>②</sup> 福尔马尔的发言，《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1 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 年柏林德文版第 182 页。——卢森堡注

无情斗争——它只有着眼于我们的最终目的和我们的阶级斗争才有意义——就成了政治上的愚蠢。在此情况下，政治上的机敏要求我们采取协商的、愿意谈判的和让步的做法，正如必须采取以下的做法一样：在斗争中一般不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分歧的因素，而强调我们和它们共同的因素，“在对于‘自由主义’的宣战中，应当有些分寸”<sup>①</sup>。

这样强调团结，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的基础以及在相应程度上遏制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到头来也就产生了一种对所谓的民族的利益的理解，对保护民族工业（见席佩耳在汉堡<sup>②</sup>的发言）、民族“防御”（见席佩耳在汉堡的同一个发言和他对民军问题的态度）、三国同盟（见福尔马尔1891年在慕尼黑的演说）、“开明的”殖民政策（见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的理解。

机会主义观点，这种看起来“不是什么新东西”的观点就这样在党内蔓延开来，渐渐地促使工人运动的整个面貌发生变化。纲领，策略，对待国家、资产阶级、对外政策和军国主义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了，社会民主党也从一个革命的、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民族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政党。

#### 四 批评的自由和科学的自由

因此，同机会主义的辩论关系到社会民主党这个进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政党的存在本身。倍倍尔在爱尔福特曾说过：“这样一种策略对党来说有点类似这种情况：人们把一个生气勃勃的机

---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29页。——卢森堡注

② 指席佩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堡代表大会（1897年10月3—9日）上的发言。  
——编者注

体的**脊梁骨打断了**，然后还指望这个机体象以往一样起作用。我竭力反对打断社会民主党的**脊梁骨**，也就是说，反对通过实行一种软弱无力的策略和斗争方式、反对通过仅仅为了所谓的实际目的进行斗争，而把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把反对统治阶级以及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抛到九霄云外。”<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这种反击，这种反对机会主义的无理要求的行动本来是一种完全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近来有些人试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就党是否能使用它的自卫权问题进行争论，试图把清算机会主义本身说成是不正当的行为。这首先是在**自由批评**口号的名义下进行的。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本来应当允许每个人有批评纲领和策略的自由，甚至不如说我们真该多多感谢那些通过他们的批评把朝气带入党内的人。

目前人们为维护伯恩施坦而唱出的曲子已经是老调了，福尔马尔九年前早就唱过。当倍倍尔反驳他的言论时，他在爱尔福特喊道：“人们一再提到的意见自由在哪儿呢？”

“……因此，独立思考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是，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如果你不顾诽谤、谎言和侮辱，**感激地**接受虽然可能看错、但有良好愿望的人们为了党的利益而提出的某种倾向的意见——我这样说不是指我自己，而完全是一般地讲——，如果出现这种**新观点**，从而使**老的、墨守陈规的絮絮不休的宣传鼓动换换花样**，人们应当感到高兴。”<sup>②</sup>

不用说，没有一个党象社会民主党那样把自由的和不断的自我批评当作一种生存必需的条件。因为我们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向前进，因此我们的斗争方式也不断地改变，这一过程是我们发

---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277页。——卢森堡注

② 同上，第261—262页。——卢森堡注



展壮大的先决条件。但是，除了对我们拥有的理论不断地进行批评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使我们发展壮大。只不过有一个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只有当我们党内的自我批评正好顺着我们斗争的方向进行时，它才能达到为发展服务的目的，因此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才受欢迎。一切使我们为实现最终目的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更有力、更彻底和目标更明确的批评，应当受到由衷的感激。但是，那种竭力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完全背离阶级斗争和放弃最终目的批评，它已不再是前进和发展的一个因素，而是崩溃和瓦解的一个因素。

如果有人打算通过着手开展反犹太人的宣传来使我们的“老一套的絮絮不休的宣传鼓动”“换换花样”，我们对此将怎么说呢？对于如此的“换换花样”，我们的同志们肯定不会表示感谢，而只能对之发出满腔愤怒的喊声。但是，例如象席佩耳炮制的维护军国主义的言论，它同我们纲领的矛盾不比反犹太主义与我们纲领的矛盾小。

如果我们以同样“愉快的”心情接受任何一种批评，既接受推动我们向目标前进的批评，也接受把我们引开并把我们将完全拉到另外一个阵地的批评，那么我们就不能成为目标明确的斗争政党，而是一个空谈家的集团。这个集团大叫大嚷地开赴战场，却连自己也不十分知道要往哪儿去，并且准备根据随便什么“建议”改变整个进军路线，或者干脆向后转并“躺下睡党”。

有一点是要考虑的，那就是尽管我们十分需要自我批评的自由，并且尽管给它以广阔的活动余地，但是毕竟必须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构成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的存在本身，并形成我们作为同一政党的成员共同活动的基础。我们不可能对于这些为数不多的普遍的基本原则在我们队伍内部使用“批评自由”的原则，因为这些基本原则既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因此也是在

我们队伍内批评这些活动的前提。我们的确用不着捂着耳朵不来自外面的涉及这些基本原则的批评。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些基本原则视为我们作为政党存在的基础，我们就必须坚持这些原则，也必须使它们不为我们的党员所动摇。我们在这里只允许一种自由：属于或者不属于我们党的自由。我们不强迫任何人与我们一同列队前进，但是，如果某个人自愿加入队伍，我们必须以他同意我们的原则为先决条件。

否则，如果我们愿意使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全部观点、纲领和策略每天花样翻新地遭受某种不受限制的“自由批评”，那么我们也可以“自由批评”的范围内把无政府主义者、民族社会主义者<sup>①</sup>和伦理主义者等等容纳在我们党内，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根本不拥有什么固定的、不可侵犯的和约束性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能成为由于确定的原则而有别于其他党的政党，我们就失去脚下的基础并消融在“自由批评”的空气中了。

因此，对我们作为一个政党的本质自身实行批评的自由，也要有它的实际界限。构成我们本质的是阶级斗争，它不应受到党内的“自由批评”。我们不能以“批评自由”为借口，去自相残杀。但是，正如倍倍尔说过的，机会主义想要打断我们的脊梁骨，从而导致我们作为阶级斗争的政党的毁灭。

最后，伯恩斯坦的维护者的最后一招（请看费舍同志在柏林第二选区的演说），是把处于辩论中的问题说得非常深奥、复杂和困难，以致使绝大多数同志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必然显得是一种特别狂妄的行为，更不必说对此作出决定了。这种（恕我们这样说）“装

---

<sup>①</sup> 1896年由弗里德里希·纳乌曼创建的民族社会主义者联盟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并企图用基督教民族社会主义蛊惑人心的要求阻止工人阶级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斗争。——编者注

傻”的政策多半会在汉诺威起作用。但是，连一个简单的“不学无术者”也很容易看出它的破绽。

要知道，在党代表大会上要讨论的不是科学的、理论的问题，而是一系列关于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的纯粹实践**的问题。例如，首先是对待军国主义和民军问题的态度。要想劝说工人相信，议程第六项关系到席佩耳同志“对军国主义的科学研究”，这可确实需要有高度的厚脸皮。如果这种论断在党内得到天真的信任，那么只好说：可怜的施特格弥勒！如果他只是想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一篇论述他的谋略的文章，他或许今天还会在我们当中泰然自若地受到尊敬。因为谁敢抱怨“科学地研究建造教堂”<sup>①</sup>呢？

事实上，席佩耳对民军要求的声讨是和施特格弥勒的建造教堂一样不能从“科学”观点加以探讨的，席佩耳在他的文章中企图简单地证明：民军，即人民军队——它向来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纲领**的条款之一——是某种在技术上不能达到、在政治上不受欢迎、在经济上困难重重的东西，相反，军国主义却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上是有益的。这就使我们迄今的以反军国主义斗争为轴心的整个议会活动和我们的全部宣传鼓动劈面挨了一记耳光。如果人们想借口科学的自由来否认党有权对如此向它的基本观点进行的攻击表示态度，那么这在曾经发生过的滥用“科学”之名欺骗群众的行为中肯定是最恶劣的一次。

同样，列入议程第七项的那些问题是实践的而不是科学的问题。但愿巴伐利亚邦议会选举的策略<sup>②</sup>不是使社会民主党代表免

---

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巴登邦议会社会民主党议员施特格弥勒为批准用四万马克在勒拉赫建造一所教堂辩护。为此，1894年10月21日至27日在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严厉地谴责了他。——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为了1899年7月17日巴伐利亚邦议会的选举在慕尼黑第一选区和莱茵普法尔茨选区向他们的选民们提出了一份联合的候选人名单。结果这一联合使中央党在邦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编者注

于判决的深奥问题。与此类似，伯恩施坦的理论包括两个不同的部分，即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在理论部分，伯恩施坦说明了他对价值论、危机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批评意见，在实践部分，他谈到了工会、合作社、殖民政策以及对待现存国家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

显然，第一部分不属于党代表大会的范围：党内并没有人打算，譬如说就价值理论或者危机问题进行表决并作出决定。但是，在相应的程度上，伯恩施坦观点的第二部分，即表现在福尔马尔、席佩耳、海涅等人的活动和言论中的那一部分，必须成为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的对象。党员群众可以、能够和必须对他的策略、他对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态度作出决定。谁要否认党员群众的这种权利，谁就是把他们贬低为没有判断力的群氓。

在我们党内，群众中的不知名的同志由于狭隘或无知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曾随时受到尖锐的指责或者也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难道仅仅因为知名的同志能够用“理论”当佐料把他们的观点端给我们，党就根本不能以严厉的态度对这些同志的更加严重得多的罪过作出判决吗？今后人们一定也会这样议论我们的党了：绞死小偷，放跑大盗。

面对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口号，党代表大会的口号必须是：批评的自由要受到充分尊重，“科学研究”的神圣性不受侵犯。但是，正是在伯恩施坦集团长时间地和畅行无阻地运用了“批评”之后，为了揭露这个集团的内在特性及其倾向，现在是党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对这种批评的后果表明态度并宣布这种批评是一种堕落的理论、它在我们的队伍里没有容身之处的时候了。

## 五 危险何在？

伯恩施坦和他的理论是最近一年半以来我们党内讨论的中

心。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的见解也将成为主要争论的题目。

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机会主义派别对党的内在危险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要对付的仅仅是伯恩施坦、他的文章和他的书，那么本来就不必把这列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一个专门的讨论题目。一次文字争论就完全够了。但是，伯恩施坦绝对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相反是作为党内一个完整的派别的理论的解说者、而且是作为这个派别发展史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出场活动的。这是一场辩论和党的正式表态之所以必不可缺的真实原因。

我们在爱尔福特已经看到倍倍尔揭露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发动的全部危险性并且与之进行了斗争。福尔马尔的两次慕尼黑演说包含了伯恩施坦那一整本书的萌芽。但是，今天的情况与1891年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当时，福尔马尔是**孤家寡人**。在党内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任何会议上、在党代表大会上根本没有人为他辩护。他和他的观点即使在巴伐利亚本地以及在**整个南德也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在爱尔福特，南德的代表们一个接一个起来拒绝为福尔马尔承担责任。

来自**纽伦堡的勒文施坦**同志声明：“我们的选民……完全拥护迄今由党的领导贯彻执行的政策。他们也已坚决表示反对福尔马尔的观点。”<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同样，来自**美因兹**和来自**卡尔斯鲁厄**的代表们尖锐地反对福尔马尔。

来自**纽约堡的厄特尔**同志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了如下的著名修正案：

“党代表大会在此明确宣布，它**不赞成**福尔马尔在今年6月1

---

<sup>①</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221页。——卢森堡注

日和7月6日的两次慕尼黑演说中涉及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和应当采取的新策略时所持的立场，而且认为这一立场对党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害的。”<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在这个不顾情面的修正案面前，福尔马尔仅仅受到另一个南德代表、来自路德维希港的埃尔哈特同志的提案的保护，而这个提案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包含了对福尔马尔的斥责：

“在福尔马尔同志无条件地赞成倍倍尔和其他的报告人（恰恰没有一位报告人袒护福尔马尔——罗·卢·）阐述的保持党的迄今策略的观点之后，党代表大会宣布对厄特尔的提案不予讨论并转入下一议程。”<sup>②</sup>

顺便说一下，这位厄特尔同志曾以“福尔马尔的阐述不能促使我赞成他的孤立的立场”<sup>③</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这句话证实了福尔马尔在整个德国和在巴伐利亚的孤立。

而且我们看到全党团结一致地反对福尔马尔，除了倍倍尔、辛格尔和李卜克内西外，还有奥艾尔同志，他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当前的形势下改变策略，我甚至认为照福尔马尔建议我们的那样来改变它是不妥当的。他说，必须把走上谈判的道路当作我们的任务，他十分合乎逻辑地发展到要求我们必须实行‘自我克制’。我认为这种‘自我克制’是危险的。按这种做法，我们哪怕不是自觉的和有意的，也确实会走到这种地步，即我们有两种纲领，一种为了平日的需要，一种为了星期日的需要。面对所有其他政党，我们党迄今所遵循的严格界限将因此长时间变得模糊起来。——我们的纲领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

---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216页。——卢森堡注

② 同上，第287页。——卢森堡注

③ 同上，第202页。——卢森堡注

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这一观点。现在，厄特尔建议要十分明确地宣布党代表大会不赞成福尔马尔的观点。——这不是责备，不是投不信任票；每个同志必须接受最高权力机关即党代表大会十分友好的和充满同志情谊的声明：我们不赞成你的观点。我请你们通过附有厄特尔补充提案的倍倍尔的决议！”<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这就是奥艾尔同志 1891 年反对孤立的福尔马尔所说的话。

从那以后，情况大大改变了。福尔马尔播下的种子已经茂密地发芽滋长。从那以后，每一年，每一次党代表大会都显示出“实用政策”这一福音的新进展。今天，我们看到站在福尔马尔一边的有巴伐利亚和南德一些曾在爱尔福特极其激烈地反对过他的同志，还有当时热烈同情独立派<sup>②</sup>（至少在他们的船漏水以前是如此的）的席佩耳同志。此外，还有经常充当席佩耳同志和所有陷入困境的“实际政治活动家”的庇护人的那位奥艾尔同志，他曾在爱尔福特那么令人信服地呼吁通过厄特尔的提案。现在，福尔马尔可以开列出一个可观的名单作为他的成绩。在那个莱博雷洛<sup>③</sup>名单中，伯恩施坦同志不过扮演“一千零三位美人”中的最后一位美人。

然而，在这里重要的不仅仅是性质。首先应该看到，正是这些对所谓实用政策发生兴趣的同志占据了一整批党的最重要的岗位，这就保证他们的观点能够得到广泛的运用和传播，也就是说，他们作为编辑掌握一些党的报刊，作为国会议员和邦议会议员占据一些议会讲台。党在两条战线上的真正的斗争，即反对政府和

---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1 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 年柏林德文版第 223—224 页。——卢森堡注

② 见本卷第 48 页注④。——编者注

③ 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何塞·索里利亚的诗剧《花花公子堂璜》中的仆人名。——编者注

统治阶级以及对工人群众进行启蒙，是在报刊上和人民代表机构中进行的，但恰恰在这里，机会主义策略信徒的代表人数最多。

这种状况使他们获得的影响和重要性同他们的人数非常不成比例。作为议员和编辑，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站在他们背后的无产阶级群众，哪怕他们与这些群众的想法和信念是直接矛盾的，而情况往往就是这样。但是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够对群众施加持久的、不受监督的影响，按照自己的意图直接对他们进行教育，尤其对新加入党的、出身于工人的、年轻的和未受过训练的成员更是这样。要注意的是，目前我们恰好不得不愈来愈多地不仅吸收纯无产阶级分子，而且也吸收小资产阶级分子，而机会主义的编辑和议员的观点正好说出了后者的心里话，这样一来，撒出去的种子也就落在本来就是最合适的土壤上。

最后，很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实践的政治活动家”中纯粹是年轻人占压倒的多数，他们是党的真正的后继者，他们作为编辑和议员大约在十年到十五年之后注定要在运动中指挥一切。

把所有这些事实加以归纳，那就必须非常严肃地看待倍倍尔说的迟早“要打断”社会民主运动的脊梁骨的那一危险。但是，不应当仅仅喜欢作悲观的估计、仅仅喜欢发出珈桑德拉<sup>①</sup>的警告。不错，我们的运动在机会主义逐渐蔓延开来的这十年里不仅没有每况愈下，反而非常兴旺和巩固起来。福尔马尔在斯图加特曾用以下的话指出这一情况：“而且重复这一套（指关于机会主义危险的警告——罗·卢·）也是完全无济于事，因为党毫不动摇地继续‘向上堕落’，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水平和成熟程度。”<sup>②</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但是毫无疑问，他是最没有理由为此兴高采烈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的女预言者。——编者注

<sup>②</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8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8 年柏林德文版第 105 页。——卢森堡注



的。

我们的运动不是托庇于所谓的实用政策的福音，而是由于蔑视它才壮大起来的。仅仅因为党每次对机会主义的突然袭击进行强有力的自卫，仅仅因为党始终拒绝福尔马尔的策略——“新方针”、他的投票赞成预算①、他的农业纲领②等等，党才能作出它已经作出的成就。如果它把“实用政策”的观点作为它迄今全部活动的准则，那么，它既不会获得二百二十五万张选票，也根本不会具有目前它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公认的重要意义。

但是，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今后，运动的发展与壮大仍旧取决于党在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否找到必要的力量。

发表于1899年9月14、15、16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13、214、215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29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519—534页。

（于沪生译 殷叙彝校）

---

① 见本卷第49页注③。——编者注

② 指格·冯·福尔马尔维护农业中保持小生产的观点。——编者注

## 我们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

(1899年9月22日)

我们要求《前进报》在每次出现意见分歧时应当作为中央机关报代表整个党出来发言，它回答说，它“**完全承认**对出现的每个策略问题表示态度的职责”。

去年一年中我们党内出现了三个引起激烈意见分歧的主要问题。它们是：

1. **伯恩施坦**的理论。所有党的报刊都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所有敌对的报刊都抓住这个题目不放，党的最小的省报也以种种方式对伯恩施坦的书<sup>①</sup>表示了态度。中央机关报并兼柏林地区党机关报的《前进报》至今**不置一词**，没有表明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真的没有吗？《前进报》在3月28日的一篇题为《虚幻的希望》的文章中说，自由派报刊上发出一片欢呼声，认为伯恩施坦已接近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政党的观点，这是一场“**荒唐可笑的演出**”。要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正人君子”——他们演出了这幕“双重喜剧”——读一读伯恩施坦的书，“他们就会发现，……**伯恩施坦根本没有触动**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和最终目的**”。（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众所周知，这正是伯恩施坦和他的信徒所坚持的。《前进报》既然拒不承认伯恩施坦与党处于对立的地位，它

---

<sup>①</sup> 指《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编者注

在这里就是支持了——尽管是偷偷摸摸地——伯恩施坦的态度。

2. 席佩耳对军国主义的态度<sup>①</sup>。在辩论这个最重要的策略问题时，在《新时代》和党的省报都以最详尽的方式探讨这个课题时，中央机关报也没有哪怕发表一篇短评，使人能看出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真的没有吗？它已经间接地表明了态度：这就是1. 在转述席佩耳的言论时，完全隐瞒了最明显的、最主要的和最遭到反对之点，即席佩耳的“减轻负担论”；2. 在转述考茨基同席佩耳就恩格斯的观点所进行的争论<sup>②</sup>时，竭力使这一争论在读者眼里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它认为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多半只有参考的性质”（2月8日的《前进报》）；3. 向它的读者完全隐瞒了党的其他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如《莱比锡人民报》。席佩耳同志曾两次对该报的论述进行反驳<sup>③</sup>。由此可见，这一次它也没有公开表明态度，而是以隐蔽的方式支持极其严重地违反全党纲领的行动。

3. 巴伐利亚邦议会选举<sup>④</sup>。这个问题也在各报刊、并且部分地在《前进报》本身引起了争论。李卜克内西同志也在这个问题上——但仅代表他个人——公开谴责了巴伐利亚同志的行动<sup>⑤</sup>。中央机关报本身直到目前对这个问题没有表示任何态度。真的没有吗？有，间接的，它向它的广大读者完全封锁了德国党的报刊如《萨克森工人报》和《莱比锡人民报》——它们的编辑部还在七月中旬就对这项肮脏的交易尖锐地提出了批评——的反对意见，却偏偏非常详细地转述了登在奥地利一家非社会民主党杂志《天平》上的福尔马尔的一篇文章，自己没有加一句话。

①② 参看本卷第149页注\*。——编者注

③ 1899年2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收到席佩耳的来信，作者要求公开发表他的信。——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205页注②。——编者注

⑤ 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要妥协，不要选举联盟》1899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

可见这次仍旧是没有采取公开的态度，却用隐蔽的方式支持机会主义。

即使这样，《前进报》还说得很漂亮：党交给它一个任务，即维护使党一致的东西。其实，任何人都是把党正式通过的纲领和党正式承认的、经过检验的策略理解为使党一致的东西。我们已经用事实证明，《前进报》没有维护这些一致的东西。但是，中央机关报显然把使党“一致”的东西理解成在相互矛盾的观点之间跳蛋舞，这种态度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以完全没有主见为基础的。因此，它自豪地认为如下的情况出色地证明了它“完成这项任务不太顺利”：它没有使党内的任何人满意，既没有使那些要求它体现党的纲领和党的策略的人满意，也没有使那些想抛弃这一纲领和策略的人满意。

这的确是《前进报》的辉煌成绩，甚至跳蛋舞的能手李伯尔先生也要羡慕不已。但是，《前进报》忘记了，虽然它的职责恰恰在于引起那些攻击党的纲领和党的策略的人的“不满”，但是如果它没有满足与这些人针锋相对的愿望，即要求它维护全党的原则的愿望，那就是严重的玩忽职守。

由于中央机关报用这种办法不能把党的原则同它的对立面区别开来，所以它根本没有能力哪怕只是判断党内出现的各种不同争论问题的真正性质。例如，**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sup>①</sup>，而且它首先涉及的是党的活动的一个崭新的、在理

---

① 1895年社会民主党布勒斯劳代表大会讨论土地纲领时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机会主义者首先以麦·克瓦尔克和爱·大卫为代表反对发展农业大经济，从而否认了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个观点特别遭到考茨基的反对。但是，另一方面考茨基却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小农才能作为同盟军，并且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把这些小农直接争取过来。倍倍尔指出，为了民主的目标可以把农民争取过来。党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否决了土地纲领草案。——编者注

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经过检验的领域。还有**参加普鲁士选举的问题**，<sup>①</sup>根据**全体参加者反复声明，它不是原则问题**，而仅仅是一个**实效问题**。《前进报》却把这两个问题同席佩耳的蔑视民军、伯恩施坦的否认最终目的以及巴伐利亚的投票支持中央党相提并论。

《前进报》在党内出现的任何意见争执中所注意的恰恰不是**意见**，而仅仅是**争执**。近年来的党内生活对它来说仅仅是一系列没有差别的“**争执**”，在这些争执中，它认为自己作为“起指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的使命是最热心地尽力撮合和调停。但是，它相信，最有效地完成这项使命要用**这种方式**，即它本身对一切争执保持**沉默**，就好象它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掉了。

但是，如果认为只要对令人不愉快的现象默不作声，这种现象就会消失，那么这不过是一切软弱无能的人所用的众所周知的自我欺骗。事实上，《前进报》的调和政策已走向它的反面，它使现有的矛盾**尖锐化**了，这就使我们不能纯粹从可笑的一而来看待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的安抚行动了。

掩盖矛盾，人为地把不可调和的观点“揉合在一起”，这只会使矛盾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以致于它们迟早会猛烈地爆发出来，造成分裂。并不是我们要象《前进报》所说的那样“排斥”（这恐怕是用羞羞答答的方式表述**开除**）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已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足够清楚地说明了根据**我们的意见必须承认的那些措施**。《前进报》的和解政策却适得其反，它会很大程度地引起分裂的危险。谁强调**观点的分歧并为之斗争**，谁就是促进党的统一；谁**掩饰观点的分歧**，谁就是促进党的分裂。

---

<sup>①</sup> 1897年10月3日至9日社会民主党汉堡代表大会在辩论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问题时实质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主张参加和拒绝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决定参加邦议会选举要有一个条件，即拒绝妥协或者与其他政党结成选举联盟。 —编者注

此外,《前进报》本身的言论正好又一次证明,尽管它对有争论的问题从来没有采取过明确的和公开的态度,它却是在机会主义的航道里游泳。在它责怪我们想通过严格的原则把党缩小成一个“宗派”并且喜欢“虚伪的激进态度”时,它是在逐字地重复伯恩斯坦对我们党所作的同样的指责。

中央机关报以自己的无主见调和所有的意见分歧,用掩盖破坏原则的行为来保卫党的原则,它却认为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述自己的这种行动:“《前进报》在一切问题上忠实地遵守党的纲领的!”

或许《前进报》是想说:“忠实地躺在纲领上”吧!但是,党需要的不是一个站着不动和躺着不干的、而是一个向前进军的中央机关报。但愿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将督促它前进。

发表于1899年9月22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20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555—558页。

(于沪生译 殷叙彝校)

## 在 189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1899 年 10 月 11、12 日)

(10 月 11 日)

党员同志们! 要是我在倍倍尔同志作了出色的报告之后还想详细谈论问题的理论方面, 那就是往大海中倒水白费劲了。倍倍尔如此透彻地探讨了这些问题, 提出了许多新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实际材料, 再来谈这些问题就是多余的了。但是, 大卫的一些意见(其中一部分是针对我的)促使我出来回答。我不会去研究他关于农业的观点。肥料问题在他的观点中作用极大, 使我不由得想起农业委员会中一位波美拉尼亚经济顾问的讲话。他说: “我相信, 我用‘大粪是农业的灵魂!’来结束我的讲话, 你们是会全都同意的。”(大笑和喊声)

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的理论观点的最大弱点是他们关于所谓经济权力的理论, 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在目前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获得这种经济权力, 才能够成功地进行一次政治革命。大卫以及伯恩施坦的另一些拥护者常常指责我们空谈和偏爱死板的公式。我却要证明, 在夺取经济权力的问题上, 死板的公式和空谈恰恰是在他们那一边。

大家知道, 马克思曾证明, 任何政治的阶级运动是以一定的经济状况为基础的。马克思指出, 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上的一切阶级

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努力掌握了经济权力。大卫、沃尔特曼和伯恩施坦盲目地把这个公式应用于目前的情况。这表明，他们既不了解过去斗争的本质，也不了解目前斗争的本质。

过去的阶级，特别是第三等级，在获得政治解放之前，就获得了经济权力，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指这样的历史事实：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阶级斗争的原因要到经济事实中去寻找，一个新上升的阶级同时建立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并且最后在这种新的所有制形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手工业者在中世纪初期反对城市贵族的斗争是以下列事实为依据的：他面对贵族对于土地的所有制，建立了一种以劳动为基础的新的所有制形式。这是一种经济上的新生事物，它终于粉碎了政治上的桎梏，并且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了变得无足轻重的封建所有制的残余。中世纪末期，重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时中产阶级展开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起来了，它最终导致第三等级也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

试问：难道可以把这一公式搬到我们的条件中来吗？不行。恰恰是那些空谈无产阶级经济权力的人忽略了我们的阶级斗争同以往一切阶级斗争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以往的阶级斗争相反，无产阶级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建立一种阶级统治，而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这个论断决不是空谈。它的根据在于：无产阶级并没有建立新的所有制形式，而只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就是把它转为社会所有。因此，如果以为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就能够获得经济权力，那是一种幻想。它只能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伯恩施坦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模式搬到我国的条件中来。但是，他自己和“经济权力”的其他拥护者却把法国大革命的经济模式搬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来了。



大卫阐述了挖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整套理论。我不知道，他关于社会主义斗争的观念是否确实会导致挖空；我对此非常怀疑。但无疑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必须以挖空我们的头脑为前提。

大卫以及伯恩施坦的拥护者完全是从这种经济权力的观点出发来考虑我们对工会和合作社的态度的。他们责备我们把工会和合作社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我确信，在我们中间，以及在所谓的政治家（那些想在政治家和工会活动家中间人为地制造区别的人是这么说的）中间，没有一个同志不明白，在德国，在工会领域内，大部分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大家必须把自己的力量用在这一任务上。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如果人们使我们放弃工会斗争，或者工会斗争不再继续发展，那么，政治斗争也必然因此遭到最严重的损害。因为，首要的条件是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而工会斗争是这一方面的最好手段。但是，从某种观点来说，那些指责我们对工会的友好态度不是全心全意的人也许是对的，尤其是如果他们把友好态度理解为促进对工会的幻想的话。的确，如果你们想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工会不仅是吸引工人参加阶级斗争、对他们进行启蒙并且改善他们目前状况的手段，如果你们把事情理解成这样，工会也能直接用来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挖空资本主义所有制，那么，我们不仅应当，而且必须拒绝支持这种观点。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的最大敌人是它自己的幻想。从根本上看，代表这种观点的人决不是工会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努力后来必然使人失望。

更为错误的是那一派关于合作社的观点。我在这里只想讲几点意见。把合作社同工会、甚至同政治斗争并列起来，这已经成为时髦。不，合作社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也完全撇开它对于工人阶级的积极意义和影响不谈，那就可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合作社不是阶级斗争。

其次，那些认为合作社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萌芽的人忘记了目前情况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后备军**。即使我们假定，合作社逐步地排挤一切资本主义企业并取而代之，我们也不可能作出这样荒诞的假设，竟认为在保持目前的市场关系并且没有一个总的计划的情况下，就能够使生产关系适应市场的需求。后备军的问题将跟过去一样不能得到解决。

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人们把哪一种合作社看作是理想，看作是抽象的模式。我只知道，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合作社运动的典范的英国合作社，就其生产部分来说完全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人喊：我们的典范是比利时的合作社！）在工联代表大会上一个裁缝工会提议，希望工会的议会委员会同合作社方面达成协议，以便敦促合作社遵守议会委员会提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剥削决没有被消除。

与这种经济观点有关的是伯恩施坦派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社会化的理论**。在大卫的发言之后，详尽驳斥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多余的了。因为他也把**工资协议**看作是一种局部的资本主义社会化。那些同志显然把事情看成这样：整个实际政策仍旧同以往一样，只是也许更多地考虑到合作社，这样一来就很方便了：给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于是社会主义就大功告成！人们只是忘记了，正如恩格斯说过的那样，如果人们把鞋刷子归入哺乳动物一类，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sup>①</sup>

另外，关于所谓崩溃论谈一点意见。当然，如果我们把我们目前已经做的一切称作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还要引起一次崩溃就会是完全多余的。但是，那些有着如此疯狂的观点的同志们（**芬德里希：尊严！——主席摇铃**）——请原谅，我没有侮辱的意思，我想说“错误的”。对社会主义持有如此错误的观点的同志们只是这样理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编者注

解进化论；他们对辩证主义历史观作一个小小的修正，于是历史就会重新顺利地、完满地得到解决。他们把关于崩溃、关于社会灾变的概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进化论中分离出去，通过这种方式得出一个惬意的关于进化的概念，就象某一位布伦坦诺先生所理解的那样。如果我们想从历史学习，我们就会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阶级斗争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上升的阶级在旧社会内部通过细小的进步、合法的改良慢慢地愈来愈发展壮大起来，一直到它感到自己强大得足以通过一次社会的和政治的灾变来挣脱旧的桎梏。它不得不这样做，尽管它在旧的统治阶级的内部就已经能够把它的经济权力发展到最大限度。对我们来说这样做就十倍地更加必要。那些认为不经过激变就可以平静地把社会引向社会主义的同志完全不是站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我们完全用不着把革命理解为动用干草叉和流血。革命也可以用文明的形式进行，如果说有某一种革命具有这样的前景，那么，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我们最不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和希望进行一次残暴的革命。但是，这种事情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完全不去考虑我们取得政权的形式问题；这是由我们目前还无法预言的形势所决定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事情的本质，这一本质就在于我们力求彻底改造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只有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做到，决不能采取在目前社会内部进行社会改良的方式。那些沉迷于这种希望的人所采取的立场是只有对过去一无所知并且对将来抱乐观主义的人才会采取的。

现在谈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倍倍尔作了六小时的发言，出色地驳斥了伯恩施坦。试问：如果我们可以假定伯恩施坦是我们队伍中代表这些理论的唯一的人，如果意见分歧没有超出抽象理论的范围，倍倍尔是否会这样做呢？我们是一个实际的政治斗争的党，如果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人同党内其他人的观点有

理论分歧，那么，不管这个人有多大的功绩和多么重要，倍倍尔也不会发表这样的演说。但是在我们党内有一批同志站在同他一样的立场上，而意见分歧不仅涉及理论，涉及抽象的概念，而且涉及实践。大约十年来，我们队伍中有一股相当强大的思潮，企图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把我们现在的实践说成是社会主义，并且（当然是无意识地）把我们力求实现的社会主义、唯一不是空谈和幻想的社会主义，说成是革命空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倍倍尔理所当然地表示蔑视说，伯恩施坦的观点是如此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人们无法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理解这些观点，因为他总会说，你们误解了我。过去伯恩施坦写文章不是这样的。这种暧昧，这种矛盾不是同他的个人，而是同他的那一派，同他阐述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如果你们仔细考察十年以来党的历史，尤其是研究一下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就会看到，伯恩施坦派已逐渐加强，但还决没有达到成熟；我希望，它永远不会成熟。在它目前的阶段，它完全不能明白自己的实质，完全不能为自己的倾向找到正确的语言。伯恩施坦的暧昧是可以这样解释的。这个伯恩施坦派是怎样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无稽之谈的，你们可以从最近几天中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慕尼黑的一次对目前的党代表大会表示态度的集会上，有一位发言人在谈到席佩耳事件时，说了如下的话：席佩耳谈到民军，而我们的纲领中说的是国民军（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差别；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他接着说：为了替席佩耳辩护可以说，我们纲领中这一段话的真正意思只是表明，我们在当前必须力求缩短服役期！我不想在事先就涉及最近几天要举行的关于民军问题的辩论，我举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方法的特征。我们的最低纲领具有完全确定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不可能象从手枪中发射出来那样立即实现，而只有这样实现：我们在经济和政治的领域进行顽强的阶级斗争，从现存制度那里争得细

小的改良，使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愈来愈改善并且获得最终推翻现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的最低要求只适合于现在。我们接受人们给予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要求实现全部政治纲领。然而，慕尼黑的同志不是把明确地包含民军制的要求的第三条、而是把缩短服役期的要求说成是党的实际要求。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把我们最低纲领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真正的实际的最低纲领，那么，我们现在看作是最低纲领的东西，就会成为最终目的，而我们真正的最终目的就会完全脱离现实的范围，并真正成为“革命空谈”。

(10月12日)

**福尔马尔**谴责我想搞宗教裁判，根据是我在柏林第三选区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压制批评自由。如果他说的我曾提出一项建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涉及到海涅提出的一个决议案，它要求党代表大会允许无限制的批评自由。对此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您对批评自由的理解与其他任何人的理解没有什么两样，那么这个建议不仅是完全多余的，而且是直接给了党代表大会和党一记耳光。我说，没有一个党象我们党这样允许这么多的批评自由。但是如果您对批评自由的理解是：在批评自由的名义下，党没有权利对最近一个时期的某些观点和批评表态，没有权利通过多数人的决议声明：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那么，我就必须对此提出抗议，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讨论的俱乐部，而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党，这个党必须有明确的基本观点。

发表于《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9年柏林德文版第127—133、136—137、219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567—574页。

(李兴耕 涂敏译 殷叙彝校)

## 德雷福斯案件和米勒兰事件

——对一次“国际性征询”的答复\*

(1899年)

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要求无产阶级在涉及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一切地方采取行动。这对于使资产阶级分裂的一切冲突都是适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势力相互关系的变动，国内政治关系中的变化也首先影响工人阶级的处境。我们不可能象无动于衷的见证人那样旁观资产阶级内部发生的事情，除非社会主义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实现，例如通过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单独的移民区。既然我们不幻想这样从资产阶级社会移进社会主义社会，而相反，要运用在这个社会内部制造出来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胜利进程中就应当尽力影响一切社会事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它应努力成为一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政治事件中发挥越来越重大作用的强大力量。阶级斗争的原则不但不禁止这样做，而且还要求无产阶级积极干预资产阶级内部发生的一切比较重要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

- 
- \* 征询的问题有两个：德雷福斯案件和社会党人参加政府问题。这次征询是由饶勒斯的《小共和国报》发起的（参看《米勒兰事件》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23—24页）。但该报没有刊登罗莎·卢森堡的答复，而只把它转给了沙尔·佩居伊的《双周杂志》。文章的题目是《1898—1912年的法国社会主义》一书的法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以德雷福斯案件为例，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的干预既不必用关于资产阶级冲突的一般观点，也不必从社会的人道主义利益的角度去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显露出了四种社会因素，它们直接使它具有阶级斗争问题的性质，这些社会因素是：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教权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这些直接敌人，我们是一向依据我们的原则和基本倾向在一般的鼓动中口诛笔伐的。所以，当需要我们运用当前的活生生的事件而不是用抽象的陈词滥调去揭露他们的时候，我们却不投入和这些敌人的战斗，那将是多么不可思议！

因此社会党人参加由德雷福斯案件激起的运动这件事本身，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不应引起任何怀疑。唯一能够成为问题的是怎样参加这一运动。用这种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作用和资产阶级“修正”派的作用截然不同。资产阶级“修正”派只打算纠正一场合法的谋杀，而这件事却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分裂。资产阶级分子想通过对总参谋部采取的行动医治军国主义的脓肿，使它能够活下去，而社会主义者却必须与没落的军国主义制度本身作斗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民军和人民武装的要求。

社会党的态度和资产阶级德雷福斯派的态度可以截然不同，因此甚至没有必要提到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修正”阵营的支持，因为社会主义者得到了进行一场完全独立的斗争的机会，也就是说一场使他们区别于运动中的其他派别的鲜明的阶级斗争。

至于这个运动实际上在多大程度具备这个特点，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觉得，有时我们的同志们可能过多地强调抽象正义和维护德雷福斯个人的观点，而多少忽略了关于民军的鼓动。这样做的结果，无产阶级所得到的阶级意识可能要比它能够获得的要少些。但是批评容易实践难，况且今后当法国的全体社会党人理

解这个社会事件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意义时，法国的同志们仍有许多机会利用德雷福斯案件的教训及其全部后果为阶级斗争服务。

我们认为，德雷福斯案件对无产阶级的真正政治意义在于，它提供了把一场震撼全国的大规模政治活动变成阶级斗争的题目的可能性，并且通过这种办法，使有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传播更多的社会主义意识，超过运用抽象宣传我们的原则的方法时许多年才能达到的程度。

正因为如此，这个运动把许多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卷进了自己势不可挡的潮流。如果说德雷福斯派的运动在社会主义者的行列里引起了强烈的抵制，我们认为这是来自一种虽说是本能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感觉，即法国无产阶级的一切大规模的自发的阶级运动都不会局限在各不同组织的框框内，并且威胁着要打破这些框框。但正由于这个原因，法国社会主义各支分散的力量的联合才表明是任何广泛的强有力的行动的先决条件。至于我们，我们并不担心不同的社会主义组织在日常政治斗争的灵活战斗中实行联合会给马克思的学说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带来丝毫的危险，因为这一学说和这些原则已经在法国扎下根了。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再没有比摆脱了抽象的陈词滥调的伟大的生气勃勃的阶级斗争更好的学校了。唯物史观也不允许我们相信抽象的公式能引起富有生命力的人民运动的发展，相反，正是在整个无产阶级参加的大规模的强有力的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上，才会对理论和原则获得一个明确的观念。

对第二个问题即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问题的答复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这种参加，是把它理解成象参加立法议会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斗争的正常方式，还是理解成国家生活中一个特殊时刻采取的特殊措施。我们觉得饶勒斯公民在他的《组织起来》（7月17日《小共和国报》）一文中赞成后一种观点。他清楚地、鲜明地



提出了问题：“一个社会党人能否在危机时期，在一定的期限内响应资产阶级政党的呼吁和他们携手合作从事政府活动？”接着，他引用我们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7月6日）上的一篇文章<sup>①</sup>，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认为一个社会党人进入政府只有在绝对特殊的情况下才是许可的，但是表示怀疑在法国现在是否存在这种情况。他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人们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如果人们只是考察一个特定的行动，那么对于当时提出的要求和形势的复杂性无条件地加以否定，的确是狭隘的学理主义。

可见说到米勒兰事件，问题归结为要弄清楚，法国当时的形势是否已使社会党人入阁势在必行。在这里无法考察只有法国同志能够作出判断的实际情况。但是在一个局外人可以发表意见的限度内，我们觉得，由于缺乏先决条件之一，也就是缺乏一个唯一能够授权进行这场危险试验的强大而统一的党，这场试验就显得是不能容许的。但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饶勒斯提出问题的方式就有些不同了。在《社会主义的方法》（8月3日《小共和国报》）一文中，看来他是把社会党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的活动与他们在议会、市参议会等机构里的活动相提并论的。他写道：“实际上，如今的社会主义已强大到足以进入一切机构，夺取一切权力而不致被资产阶级社会吞掉。”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就等于在原则上同意把进入政府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许多行动手段之一，但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的。在前面提到的7月6日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论述了我们认为应该遵循的观点，所以在这一里只择其要点说一下。

我们能用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法是阶级斗争。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机构，并且利用资产阶级

<sup>①</sup> 指《一个策略问题》一文。见本卷第183页。——编者注

社会中发生的并容许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切事件。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党人基于自卫的精神必须干预德雷福斯案件。但也正是根据这种观点，参加资产阶级政权就显得是不许可的，因为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本身排除了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是替社会党人担心政府活动的危险和困难，我们不应当在无产阶级利益给我们安排的岗位带来的任何危险和困难面前退缩。但一般来讲，内阁不是一个从事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政党的活动阵地。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不取决于它的成员的个人特点，而是由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职能决定的。现代国家的政府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它的正常运转是阶级国家存在的条件之一。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后，阶级统治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政府不会变成社会主义政府，而是一个社会党人变成了资产阶级部长。一个对工人友好的部长能够实行的社会改良本身绝不包含丝毫的社会主义，这些改良只有当它们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的时候才是社会主义的。来自一个部长的社会改良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性质，而只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这个部长，由于他担任的职位，是把这些改良和他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其他职能、军国主义等等所承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议会、在市参议会里是通过和资产阶级政府斗争而争得有益的改良的，而在担任内阁职位的情况下却只有支持资产阶级国家才能达到同样的改良。所以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并不象有人以为的那样是社会党人局部地夺取了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局部地征服了社会党。

发表于1899年《双周杂志》第11期第77—82页。译自罗莎·卢森堡《1898—1912年的法国社会主义》1971年巴黎法文版第81—85页。

（王以平译 李兴耕校）

## 世界政策的成果

(1900年1月25日)

英国人在南非战争中的失败现在已是肯定的了，<sup>①</sup>这无疑将在世界政治形势中引起深远的变动。但是目前，这些变动就它整个范围来说还难以判断，因此，要把它们记录下来似乎还为时过早。例如，关于国际关系，无论如何必须首先等待战争的结束，特别是要看俄国的态度，才好准确地估计结果。

然而毫无疑问，德兰士瓦战争现在已经产生了某些后果，特别从发展民主利益的观点看，这些后果本身的重大影响已经足以使人评价它们的意义。我们认为对英国来说，它的失败的无可辩驳的结果之一是今后不可避免要改组它的国防。

英国是迄今仍然保持募兵制度的最后一个大国。这支军队固然是按照现代化的原则训练出来的，而且当然完全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使一支以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军队在当前反对布尔人的战争（在陌生的大陆和不利的地理条件下进行）中也会遭到同样可耻的失败。可是，目前的军队组织对英国的失败无疑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因而人们更加肯定会将这次失败归咎于它。

目前，英国的报刊已经在很热闹地讨论军队的刻不容缓的改

---

<sup>①</sup> 1899年10月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一场对南非布尔人共和国的战争，最初在军事上遇到一些困难，最终于1902年5月残酷地征服了布尔人共和国。——编者注

革。但是，根据逻辑判断，这些改革只能按照**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方针进行并且只能以实现这种制度为结局。英国直到目前依然维持在所有其他国家已完全陈旧的和早已过时的**募兵制度**，这不难从它的地理位置找到解答。迄今，英国军事力量的重心是**海军**，这已完全足够保持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国际地位。

与布尔人共和国的冲突——顺便说一句，这是英国自己，即由于它的帝国主义欲望而陷入的一场冲突——初次严厉地检验了英国的**陆地的武装力量**。在这次检验失败之后，对英国来说，军队的改革简直就是它在南非是否能继续统治的问题了。

但是，不仅是这样。更为紧迫的是，英国目前还面临它在**中亚**的统治问题。俄国想方设法利用英国在非洲的实力地位的每一次动摇，以便在适当的时刻在中亚突然袭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俄国半官方的报纸公开表明，俄国尤其指望英国的陆军崩溃。使英国在南非的战争中被打败之后立即在中亚陷入一场陆地战争，这是俄国的显而易见的计划。因此，有效地、彻底地改造军队组织，对英国来说，现在已经是一项无法回避的、而且是很紧迫的任务。

这里就显露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英国通过它在非洲的失败取得的结果同不久前美国通过它与西班牙的**胜利的战争**取得的结果<sup>①</sup>一样。世界政策在所有情况下并且通过各种道路导致同一目的：**加强军国主义**。北美联邦紧接着它的殖民掠夺之后既着手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也着手改组和加强它的陆军。英国已经是海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它也不得不加强在陆地的军备，以便与此相称。最后，德国是陆地上的一等军事强国，现在被它的帝国主义欲望驱使也在筹划建立第一支海军舰队。

---

<sup>①</sup> 参看本卷第52页注<sup>①</sup>。——编者注

目前，世界政策的狂热在所有的**大国**都明显地朝这样的方向发展；驱使它们全然不顾它们的地理、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差别，不仅在**陆地上**而且在**海上**拼命推行军国主义，并因而给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带来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因此，我们现在期待的**不是**社会斗争的削弱和缓和，而是矛盾的加剧以及现代社会的外部斗争和内部斗争同样的尖锐化。毫无疑问，英国的失败将首先大大抑制一下与人民为敌的英国军国主义。但是，就长远的后果来说，这一失败会导致军国主义和世界政策重新突飞猛进，对这一点，我们是不应搞错的。

不过，军国主义发展的反动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又会产生**革命**的后果。如果象我们设想的那样，英国战后一旦按照大陆的榜样改组军队，就是说，在陆地上开始推行现代的**军国主义**，那么这就不仅会卓有成效地为社会民主党竭力争取的那种向民军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做好准备，而且无疑会因此引起英国**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变革，这一变革必然要导致英国劳动人民的革命化，导致他们的阶级觉悟的社会主义化，并促使他们向大陆的社会民主党靠拢。

看来，这确实是资产阶级世界政策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积极成果。

发表于1900年1月25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0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676—678页。

（于沪生译 殷叙彝校）

## 回到亚当·斯密去!

(1900年5月)

爱·伯恩施坦曾在本刊对许列尔博士的一部早些时候的著作《古典国民经济学和它的反对者》进行过评论<sup>①</sup>，现在我们谈的是许列尔博士这一作品的续篇：《历史学派的经济政策》<sup>②</sup>。

毫无疑问，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使这个题目本身就非常饶有兴味。首先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历史学派是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理论领域中唯一真正的民族产物。古典自由学派时期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同样都只是英国古典主义的一个分支。哈勒<sup>③</sup>—弥勒<sup>④</sup>的浪漫学派尽管在实践中颇有影响，但几乎称不上是一个国民经济学学派。它甚至未曾尝试去建立一种积极的经济理论，就我们所知，勉强可以说是它的唯一的学术上的信徒是有名的雅尔克<sup>⑤</sup>，而照白尔尼的说法，此人是由于维护梅特涅的政策而从普鲁士的反对派中被提拔出来当奥地利顾问官的。同样，我们也不得不宁可

---

① 《新时代》第13年卷(1894—1895)第2册第211页。——卢森堡注

② 理查德·许列尔《历史学派的经济政策》1899年柏林版。——卢森堡注

③ 卡尔·路德维希·哈勒(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辩护人。——编者注

④ 亚当·亨利希·弥勒(1779—1829)——德国经济学家，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代表人物。——编者注

⑤ 卡尔·恩斯特·雅尔克(1801—1852)——德国政论家，1832年任维也纳宫廷和首相府顾问。——编者注

把李斯特<sup>①</sup>的政治经济学“民族体系”也看作一项业余爱好者的探讨，而不是什么理论学说。只有历史学派提出了一个经济学说的完整体系并在专家学者和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物们中赢得了极大一批信徒。

还有一点，就是历史学派的内部历史忠实地反映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如果在探讨这个学派的学术观点、方法和发展阶段时把它们同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考察，那么这一探讨同时也将是德国资产阶级近代发展的一幅速写。

决不能说，许列尔博士是象我们这里分析的那样去理解他的任务的。他所提供的不如说是对一群重要的古典自由派、反动浪漫派和历史学派理论家的政治经济观点非常粗略的评述，以及对上述各流派的不同方法所作的一般考察，这同样是很粗浅的。

许列尔博士十分正确地把进行研究工作的演绎法称做是古典自由派国民经济学的最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这一派在实践中起进步作用的基础。他同样正确地指出，历史学派由于放弃了演绎的研究方法，因此缺乏各项确定的原则，并因而在理论上毫无建树，在经济政策上也处于落后状态。这一切在许列尔是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作热烈的辩护，同时也是他在劝告当代国民经济学家回到这一方法去。但是对于历史学派为什么丢掉了古典的研究方法以及怎样来解释历史学派尽管浅薄和落后却在德国国民经济中具有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我们在许列尔博士那里得不到回答。而只有把这些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才能弄明白许列尔在全部分析结束时对当代经济学提出的劝告。

本世纪初古典经济学说的独家统治地位就是在德国也是众所周知的。马尔维茨<sup>②</sup>在1810年写信给拉埃尔说，亚当·斯密是除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编者注

拿破仑之外欧洲最强有力的君主。这话决非过甚其辞。在普鲁士施泰因—哈登堡时期<sup>③</sup>的所有国家活动家都是亚当·斯密的学生。那一时期政府的绝大多数文告都带有古典学说的明显印记。甚至高级军事将领格奈泽瑙<sup>④</sup>、沙恩霍斯特<sup>⑤</sup>、维茨莱本<sup>⑥</sup>全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热烈信徒。斯密的理论是德国整个改革时期的圣经。这是在耶拿大败<sup>⑦</sup>之后，有短短一段时期改革派曾经从顽固的反动派手里夺取了权位。

但是这一理论很快招来一个对立面的原因也正在这里。施泰因—哈登堡的进步改革并非来自一次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运动，也不是起源于社会本身。不如说是法国的打击促使统治阶层作出这些改革，而这个统治阶层又简单地把它们强加于社会。它们也很快就造成了来自两个阵营的反对派：一方而是目的在于挽救农奴制的容克；另一方面是中产等级中的那些人，他们认为新近的改革首先威胁了他们的利益，这主要是在当时还很有力量的手工业阶层，取消行会制度和有利于英国货进口的自由贸易政策都严重地伤害了他们。

第一方面的反对派在哈勒—弥勒反动浪漫学派中反映出来，第二方面的反对派则反映在早期历史学派朔登、卢登、克恩和其他

---

②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马尔维茨(1777—1837)——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编者注

③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施泰因(1757—1831)——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在普鲁士推行资产阶级改革。他的继任者是卡尔·奥古斯特·哈登堡(1750—1822)。他们执政的年代被称为施泰因—哈登堡时期。——编者注

④ 奥古斯特·威廉·安通·格奈泽瑙(1760—1831)——普鲁士将军，曾任北德意志联邦总参谋长。——编者注

⑤ 格尔哈尔德·约翰·大卫·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普鲁士将军，曾对军队进行改革。——编者注

⑥ 约布·威廉·卡尔·恩斯特·冯·维茨莱本(1783—1837)——普鲁士将军，曾任国防部长。——编者注

⑦ 指拿破仑的军队在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军队。——编者注



一些人身上。人们只要考察一下在这两种情况下，产生反对古典学派的这两种经济学派的社会基础具有哪一种性质，也就容易说明它们不同的理论特点了。

反叛的容克对资产阶级发展的开端所提出的抗议在哈勒浪漫学派中得到了反映；他们针对被他们批判的改革提出一个非常明确和顽固的“理想”：中世纪封建主义。这种政策的理论表述——浪漫派经济理论完全和梅特涅的反动、和神圣同盟时期一样明确、顽强和有力。这种理论从一些确定不变的“原则”，即从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各项原则出发，并且顺理成章地在有关经济政策的所有问题上运用这些原则。

第二个反对阵营的情况则不同。行会中产等级即——手工业师傅和小店主等人的生存虽然受到革新的威胁，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眷恋封建主义独占统治的时代，因为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留给他们的同样是血泪伤痕。他们本身不是一个紧密的社会整体，他们也就不可能提出一个确定的积极的经济政策纲领。他们在资本主义新近的发展和封建传统之间摇摆不定，两种伤害都叫他们害怕，他们做得到的只是时而站在封建立场向自由主义国民经济学斗争，时而又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向浪漫派理论斗争，永远拒绝从出发点得出彻底的结论，永远半途而废。

稍晚由希尔德布兰德<sup>①</sup>—罗雪尔创立的历史学派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行会制的小资产阶级以中世纪生产方式的名义反对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制度，这里却是现代资产阶级本身起来对它自己阶级统治的后果提出抗辩。

古典国民经济学按照不可战胜的逻辑处处都最终转化为自我批评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在英国，李嘉图直接开创了英国社

---

<sup>①</sup>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政治经济学中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编者注

会主义者的整个学派(汤普逊<sup>①</sup>、格雷<sup>②</sup>、布雷<sup>③</sup>等);在法国,紧跟着第一个把古典经济学平庸化的萨伊<sup>④</sup>之后出现了西斯蒙第;在德国,在劳<sup>⑤</sup>以及随后的杜能<sup>⑥</sup>和洛贝尔图斯的学说中已经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萌芽;到了马克思,古典经济学完成了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也就是转化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分析。

只有战胜了出发点——古典经济学,才能否定结果——社会主义的批评。古典学说用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表述了它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探讨的成果,这些成果是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加以否定或修改的,剩下可以做的只有反对这个研究本身即方法。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和基本规律,那么历史学派正相反,它的任务是使这一经济的内部联系神秘化。旧历史学派过去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均等化”和“范畴化”性质的反感只不过是中世纪各种关系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提出的抗议,这种多样性和特殊性是适应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的。到了罗雪尔、克尼斯<sup>⑦</sup>和希尔德布兰德,对古典主义的“绝对理论”的“历史的”批判却是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认识它自己内部规律表示抗议。掩盖这些规律就是新历史学派的目的、是它的“历史的”使命和存在的权利,因此它也把对社会经济的规律的否认提高成科

---

① 威廉·汤普逊(1785左右—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结论——编者注

② 约翰·格雷(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劳动货币”论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③ 约翰·弗兰西斯·布雷(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编者注

④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⑤ 卡尔·亨利希·劳(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编者注

⑥ 约翰·亨利希·杜能(1783—185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编者注

⑦ 卡尔·克尼斯(1821—1898)——德国旧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学的教条、经济学的方法。

各得其所：古典学派宏伟的理论大厦的落成和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德国资产阶级的上升在思想上的表现却是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自我解体 and 没落。

许列尔博士正确地责备历史学派缺乏原则，但是他对这一点没有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历史学派的缺乏原则是可以从德国实际的历史情况、从资产阶级的历史、从日益表现得彰明昭著的阶级对立中找到足够原因的。同样，从同一些实际的情况出发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尽管罗雪尔学派在科学上贫乏可怜，在实践中毫无建树，但它却仍然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影响，这比用“适应当代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各个有原则的流派才刚刚发展起来”这种状况来解释要清楚得多。

恰好相反！既然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学说显然是适应当代社会问题的有原则的学派，那么历史学派的出现就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学说尚未产生，而是由于它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发展，也就是说，历史学派是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反动。

许列尔博士没有联系社会基础去分析这个问题，他因此犯了双重错误。首先他把本世纪头十年的旧历史学派和本质上与这个学派不同的罗雪尔学说看作同一个学派，其次他不是把罗雪尔学说看作对社会主义批判的反动，相反地，而是看作缺少一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结果。

许列尔博士的研究企求具有超出一部科学专著的意义。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那样，这一著作在结束时劝告当代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回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如果他们想用古典学者对待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的那种认识来处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的话。

回到古典方法去！这一好心的呼吁显然是许列尔两篇经济学著作的主导思想，他想给今日德国国民经济学的沉闷空气吹进一

缕清风，这个愿望毫无疑问是十分动人的。只是许列尔博士的建议再次表现出来：由于他在考察经济学派问题时没有联系这些问题当时的社会基础，因此他既没有理解他所赞赏的古典学派的本质，也没有理解经济学说的当代任务。

许列尔博士把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之处归结为这个学派的演绎的方法、归结为它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原则态度。但是抽象地说，演绎法是一个纯粹形式的学院概念，它还丝毫没有说清楚斯密学派所擅长的研究方法的本质。如果仅仅是指“在研究中引进普遍的预先确定的原则”，那么除了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是可以称道的。如果按照许列尔博士的说法，斯密和李嘉图的演绎的基本原则就是经营自由、迁徙自由和贸易自由，那么亚当·弥勒和哈勒也有领主裁判权、奴隶制和宗法式的国家等等演绎的原则。作为演绎推断，从方法学上讲，它们是等值的。当时的确没有人象浪漫派那样严厉地指斥过历史学派的缺乏原则，没有人象浪漫派那样热情地宣传过必须把“永恒规律”当作经济分析的出发点。

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使人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哈勒和弥勒的浪漫派演绎法只不过在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梅特涅那里为这一方法的代表者取得了巨大的声望。因此原因显然是在于，只有古典自由派的演绎法才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它才适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

但是由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经济的一般基础当成他们研究的绝对“原则”，因此他们的研究又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在古典学派看来，现代商品经济是绝对的、标准人的商品经济。而这正是他们从之出发的实际原则，也就是他们那奇妙的演绎法的真正秘密。

正是这种对标准人的性质也可以说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然

权利的无限的毫无杂念的信仰，使国民经济学古典学者能够那样不带偏见地进行研究、那样坚决地得出结论，那样大胆地冲天飞翔，他们从这个信念出发，以天才的眼光把握住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

后来产生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一方面引起了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态度，它把目光从对普遍规律的探讨转向为个别现象辩护；另一方面是历史学派的退让态度，它事先就放弃了对经济的基础的任何研究，并宣称单纯描写过去的事物和现存的事物是科学的任务。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构成所有这些经济学派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绝对性和正常性的信念确实是古典学派的独特之处，正是这种信念使它成为**古典的**学派。

这种情况不仅说明了斯密学派的一般的科学成就，也说明了这个学派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世界主义，对人的同等看待，个人主义，经济私利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基础这种观点，等等，所有这一切被历史学派批评家算成是斯密学派罪过的东西，来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普遍人的标准，商品生产者就是标准人本身这同一概念。

但是给斯密学派的主观上无畏的、完全公正的研究预先设置下客观界限的也就是这同一个观点。只有在运动中，在历史条件中去观察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才能说明它的最本质的东西，才能解开它内在的秘密。而这一点恰恰一开始就被把商品经济当成社会生产的标准的、绝对的形式这一观点给排除掉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古典经济学不顾一切社会后果认为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因素，并极为透彻地制定了这一理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李嘉图的表述。

那么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不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承认这一区别，就连对马克思理论的通俗阐释也多半忽视了这一点。这一区别在于：由于李

嘉图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具有普遍自然法观念，他也就认为创造价值是人类劳动、是单个人的个人的、具体劳动的自然属性。<sup>①</sup>

相反，马克思却认为价值是一个抽象，是一种由社会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抽象，他由此区分出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个方面：具体的、个人的劳动和无差别的社会劳动，通过这一区分才解开了货币之谜，如同在灯光照耀下一样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为了用这一方法在资产阶级经济内部静态地区分劳动的二重性，区分劳动的人和创造价值的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必须在事先动态地按历史顺序把商品生产者和劳动的人本身分开。这就是说，仅仅把商品生产看作社会生产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态来认识。一句话，为了解开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秘之谜，马克思必须用一种同古典派经济学家相反的演绎法来进行研究，他必须依靠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暂时性的洞察，而不是根据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符合人的标准性质的信念去进行研究，他必须把古典学者的形而上学的演绎法转变成它的反面、即辩证的演绎法。

国民经济学所取得的超越斯密和李嘉图的进步、它的继续发展恰恰是以克服这个学派的演绎法为条件的，而许列尔今天却宣传回到这个演绎法。这不仅是由于，象上面讲过的那样，这一方法给认识设置下固定的界限，而且也是由于古典派经济学家自己已经达到了这一界限。经济学的古典方法在李嘉图的学说中已经发挥了它所能起的最限度的作用，它已经被抛进了废物堆，因为它

---

① 这一概念在亚当·斯密那里表现得尤为显著，比如当他一开始徒劳地在动物（如狗）身上找寻“交换的倾向”之后，他把这一倾向直接解释为人类本性的特点。众所周知，这一点和另外一些话曾屡次引起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傲慢的嘲笑和轻蔑。斯密的逞能的弟子们完全没有料到，被他们付之一笑的老大师的天真正是最经典地表达了他的“古典演绎法”，而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在失去这种天真时也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他们的参孙之发——他们研究力量的本源。——卢森堡注

不仅对于研究界本身是危险的工具，而且在科学上是一件不能再用的工具。回到古典学派的方法并不象许列尔博士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学的新的跃进，而是会导致巨大的倒退。正是在新的基础上直接继承古典派学说的马克思的著作证明这种倒退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

但这种倒退从社会上讲也是不可能的。在古典经济学之后，这门科学同时堕落为庸俗经济学和历史学派，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自从上述派别出现以来，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已经使那种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性质的古典的乐天信念丧失基础）仍旧继续向同一个方向发展。不仅是阶级对立暴露得无可比拟地尖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也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在普遍重新转向保护关税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不可能象以往那样把贸易自由当作出发点，同样，当生产愈来愈多地被卡特尔垄断时，也不可能采用自由竞争的教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各项原则”在今天无论在科学上还是社会上都已属于逝去的时代。

普遍号召“回去”看来是今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口号，许列尔关于回到古典经济学方法去的劝告并非首倡，有趣的却是，它是这普遍的呼声的一个部分。哲学上回到康德去！经济学上回到亚当·斯密去！拼命回到已经被克服的观点去——这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社会上已经陷入绝境的明确无误的征兆。但是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都是不会发生倒退的。

只有在马克思开辟的辩证方法的道路上还能前进。所有和许列尔博士一样足够正直和勇敢的年轻的国民经济学家都应当弄明白这一点。许列尔的正直使他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混乱、对它的缺乏体系、思想贫乏和头脑糊涂的状态不能满意，他的勇气使他能为科学的认识而牺牲阶级的偏见。即使在目前，资产阶级理

论家被迫依靠马克思学说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提出的每一种勉强算得上明智的思想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马克思的学说借用来的。<sup>①</sup>

正如资产阶级社会只能二者择一：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是崩溃，政治经济学也只能选择：是在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上前进还是宣告自己这门科学的破产。

发表于《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2册第180—186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728—737页。

(周懋庸译 殷叙彝校)

---

① 这一情况使下一事实显得特别地叫人啼笑皆非：在我们的队伍里新近有人非常起劲地试图反其道而行之，想借助年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恰恰是那些由于悄悄地享用马克思的宝藏才得以维持自己的教授生涯的经济学家去修正和“向前发展”这同一个马克思学说。这一事件使人生动地想起一个醉鬼拼命想向自己的影子要一撮鼻烟。——卢森堡注



## 站在工人背后的“德意志科学”

（1900年9月）

一位新的先知在德国工人阶级面前出现了。威纳尔·桑巴特副教授在布勒斯劳向德国无产阶级布讲希望和信仰的福音<sup>①</sup>。他俨然象拉萨尔再现教导你们说：“我的工人先生们”，要从一个新的“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的“鸟瞰”出发研究劳动问题的领域，他向你们保证说，“德意志科学”站在你们背后，他请求你们“共同奋发精神继续努力，继续斗争，共同维护社会进步的事业，在文化的道路上前进，为了我们可爱的德意志祖国的幸福，为了人类的骄傲”！

“继续”，“共同”，听起来实在有些奇怪，因为到现在为止，德国工人阶级还很少享受同桑巴特先生共同努力和斗争的愉快。当然，在桑巴特先生还舒舒服服地躺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们已经为德意志祖国的幸福，为人类的骄傲而斗争了。他们通过努力和斗争维护社会进步事业，很快就有半个世纪了，而桑巴特先生的努力和斗争却是新近发生的事。

但是，这毕竟是一些小小的不确切之处，在滔滔不绝的发言中会带出来的。我们且不去挑剔这位新先知的演说技能，让我们诚心诚意地听吧，在关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方面，那个正确

---

<sup>①</sup> 威纳尔·桑巴特《毕竟如此！工会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历史》1900年耶拿版。  
——卢森堡注

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究竟要说些什么，那个站在我们背后的“德意志科学”究竟要说些什么。

—

“首先，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提高，并不受任何自然规律的框框的限制，超出这个界限是工人本身力所不能及的”（《毕竟如此》第70页）。诚然，科学早先提出过所谓工资基金理论和铁的工资规律，而这种理论和规律又想在工资的变动中发现不变的经济规律。但是，桑巴特先生毫不费力地驳斥了这两种理论，更何况这些理论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埋葬了。尤其是他在自己的结论中歪曲了李嘉图和拉萨尔的工资规律，把它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办法是对拉萨尔的“按照习惯的”工人生活水平作新的解释。“使用‘按照习惯’这个词，可怕的规律就变成了无害的同义语的反复了。”（同上第71页）因为既然“习惯”决定工资的平均水平，那么，按照桑巴特先生的看法，问题的奥妙就仅仅在于，只要使工人的最大可能的要求（例如坐胶轮车）变成“按照习惯的”，工资就会象脱弦的箭一样迅速上升。桑巴特先生反复说：“用**变成**这个字眼应当表达出同机械的工资形成观点相反的……**正确的、社会的观察方法**。这个观察方法也就是把**国民收入的分配看成不同的竞争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这一斗争的结局不是取决于那些可以从外表看到的、可以用数字表现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情况，而是在同样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决定党派实力地位的其他因素。”（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第71页）

但是，我们从下面几页就可以知道，这个分配斗争实质上是很和平的。因为“德意志科学”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让人人都有所得，不向任何人夺取东西，让工人致富，又不使资本家变穷。

这就是说，一方面，象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工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减少广义的剩余价值来增加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获得的份额。但是，另一方面，“在任何情况下……尽管工资提高了，企业主的利润却无需减少”（同上第 80 页）。桑巴特先生劝告“天才的企业主和高贵的商人们”，如果工资提高了，可以扩大生产或者改进经营技术，或者，最简单的是，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样就把对工人的让步推卸到消费者身上了。但是，“德意志科学”也不会让消费者大众空手面去的：第一，桑巴特先生对消费者大众作了安慰，说工资斗争不总是能够成功的（“当可以及时补充人手的时候”！第 84 页），第二，假如由于工资斗争商品涨价了，那就会得到一种“满足”，即由于购买高价商品就会“最少病态地，也就是最顺利地”使社会对抗得到协调。在这方面，这位教授先生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寄希望于“妇入之心”，特别是未婚妻之心。为了让可怜的女缝纫工提高一些工资，“难道幸福的新娘为购买原来值一万马克的嫁妆付了一万零五百马克就有困难吗？”（第 82 页）毫无疑问，国民经济学上的唯一“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是很容易打动一个年轻待嫁的少女的心的，这样一来，工会运动最后的困难或许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太阳上也还有黑子，最美丽的容貌也常常还有雀斑或其他不完美之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有它的“不完美之处”：危机。可是，桑巴特先生也准备了一个防止危机的手段：还是工会运动。“正如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工会运动很本没有妨碍，而是促进了发展经济生产力这个资本主义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工会运动还适合于消除同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完美之处……在这方面，我首先想到的是保证防止经济机构流通中的紊乱，即防止危机。”（第 86—87 页）

把对工人的让步转嫁给消费者大众身上的“天才的企业主”，

发现作为这种酬劳的，是销路更大更可靠了。

因而，事事如意，皆大欢喜：工会会员得到了较高的工资，企业主维持了原有的利润，占有了更大的销路，新娘有了纯洁的良心，得到了新郎，而桑巴特先生则天下闻名。李嘉图、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全部科学的压舱物被抛入大海。“现实主义”方法的轻舟“一帆风顺地驶进了二十世纪。Vogue la galère!”（随它去吧！）

但愿不要象古时西班牙曼察那个地方的另一位勇敢的骑士的大船一样，误开到磨坊底下去啊。

当国民经济学的古典学派把工资运动归结为自然规律的现象，归结为人口规律和生产资本的绝对量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只是一贯遵循自己的基本方法，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同社会的自然界限混为一谈。对古典国民经济学作历史的辩证的批判，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完成了的。这个批判在这里也同在其他大多数场合一样，就是要把这些“自然规律”重新改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首先是购买劳动力的目的，就是要生产利润。因此，作为生产目的的一定的利润率对于招收工人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同时，这个利润率也就成为工资得以提高的平均最高界限。但是，利润具有牺牲工资而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也就是把工资压低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内在倾向。工资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随供求比例，也就是随现有的劳动力同愿意投入生产的资本量的比例而上下运动。

但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供给表现为产业后备军，即表现为由同一个资本“解放”出来的经常储备着的劳动力的数量。而需求不过是一定利润率下受到商品市场的一定情况的“鼓舞”投入到生产中去的那一部分资本。

我们看到，无论是工资提高的平均极限，无论是工资提高的较

高的或较低的程度，都决定于这样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归结起来还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追求利润的兴趣，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需要”。

工会能够超越工资规律的这个界限吗？这些界限当然不是“自然规律”的界限，桑巴特先生从马克思那里正确地学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些界限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作用是具有自然规律的一切必然性的，因为它们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本身。

比方说，如果工会能够冲破制约工资提高的界限的企业主利润，那么，这就是说，它能够取消生产今天的**目的**，从而取消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

如果工会能够同样地消灭产业后备军，或者限制它的不断增长，那么，工会也就能够阻止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说，既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后果，又能消灭它的社会前提。

但是，这一切是就工人的**实际工资**的运动来说的。至于桑巴特先生认为“任何时候”都可以无限提高的工人在社会收入中的**份额**，那么，这个份额将直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降低，尽管实际工资可能会同时增加。如果工会想制止相对工资的这种合乎规律的下降，那么工会就得使资本主义**发展劳动生产率**这一活生生的原则不起作用，因为正是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背着当事人减少了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劳动，从而也机械地减少了工人在总产品中所获得的份额。

工会自然可以通过组织劳动力的供给来限制产业后备军，从而把资本通常是无限的压力限制到同它的利润的利益还可以相容的最低限度，——这就是工会发挥作用的唯一办法。但是，如果桑巴特先生认为工会在工资的提高方面根本不受任何限制，并且可以使工人在国民收入中取得的**份额**无限增加，那么，他恰恰是想要

工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工会的道路来废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当然，在桑巴特先生看来，工资水平的确定也和国民财富的整个分配一样，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实力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在社会的表层，这是无可否认的。在社会的表层，经济规律是在人们的行动中，在工人和企业主的个人冲突中，在**劳动契约**中表现出来的。但是，桑巴特先生没有看到在这些实力表现下面的制约着和限制着这些实力表现的客观规律。他看到的情况和单个当事人、单个工人或企业主所意识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因此，那个崭新的、“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原先的诚实的庸俗经济学。

大家知道，庸俗经济学处理问题的方法同辩证的批判是不同的。它十分自满地把古典经济学所树立起来的“自然规律”当作陈腐的无稽之谈抛掉，但这样一来也就根本否定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合乎规律的解释，宣告了“自由意志”的、“自觉干预社会过程”、各个社会集团的“实力”的王国。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即在这个社会里起作用 and 推动它的发展的矛盾，实际上决不会因为这种科学的“判决”而消逝不见。但是，这些矛盾本身将被解释为偶然性，解释为小小的估计错误，小小的“不够完善之处”，它们用一点点善良的意志和智慧，用这里的一句好话，那里的一点宽恕就可以“消除”的。桑巴特先生在向工人宣布了工资可以无限提高的光辉前景之后，为了要使他教授气派的话兑现，从而从资本主义矛盾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中脱身，他会忙得不可开交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把工资的提高转嫁到利润上，把利润的损失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为他不能再向别人转嫁了，只有诉诸于消费者的良心，为了便于收到效果，他事先把消费者想象为一个待嫁的年轻姑娘。最后，有一个义务也就落到他头上了，为了保证工会按照他的药方取得成就，他就得为

每一个有钱的姑娘找一个如意的新郎。

但是我们却担心，即使这样也是白费心机。因为桑巴特先生还来不及把既没有任何相互关系又实际上不能互相抵消的事物——按照教授先生的说法——看成“相互有关”和“实际相抵”，他的补钉由于“这里不需要细说的困难”已经完全脱胶了。

企业主该用提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抵偿由于工会行动而实现的工资提高。但是，如果教授先生以为商品价格可以随意提高，那么他已经忘记了价格形成的全部“本质”。如果价格的提高是普遍现象，那么它在自己发生作用的过程中自己就会失去活动能力。但是，个别企业主要提高价格，那么他的同事先生们的竞争很快就会教训他懂得规矩。当然，个别企业主集团也可以随意提高价格。但是，这只有在他们同消费者相比拥有实力地位即组成辛迪加、卡特尔时才能办到。不过，在这些联合组织中资本的实力地位同工人相比要大得多，遗憾的是，这种实力地位恰恰在桑巴特的“转嫁理论”的唯一前提存在的地方，通常总是使工会不可能获得成果。桑巴特先生在谈论工会实力地位的时候，根本忘记了企业主联合组织的存在，只有当他需要把这些组织看做是在解决劳动冲突中的一种可爱的调解手段的令人愉快的补充时，他才记得起它们。

或者：企业主如果不能实现提高价格，他就该扩大生产来抵偿工资的增加。但是，不等桑巴特先生劝告，他们自己就这样做了，而且自远古以来，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那些扩大生产的时期，也就是工业高涨的时期正是要求提高工资的最好时机。但是，扩大生产在这里并不是什么可以随意使用的抵偿提高工资的手段，恰恰相反，它是使提高工资成为可能的一个前提，而这一前提自己又依赖市场情况，这也就是说，还是依赖资本自己增殖的利益！

或者，企业主应该干脆用改良技术的方法来抵偿工资的提高！唉！教授先生，就让您的“幸福的新娘”去相信您去吧！改良技术，企业主早就用过了，这是为了**麻痹**进行工资斗争的工人，而不是为了使工人满意。你只要去关心一下八十年代末汉堡煤炭装卸工人进行工资斗争的历史就会知道，老板们回敬这次斗争的办法是采用一种装卸机，因而立刻就裁减了工人。

当教授先生渴望为了讨好工会把一切利益对立都化成利益协调的时候，他总算连**危机**也应该能对付了。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不够完美之处”常常被用来作为反对工会的最凶恶的“手段”之一。桑巴特先生把事情颠倒过来，反而把工会当作反对危机的手段来推荐。“首先，生产之火有点减弱了。因为工人所提出的要求……总是**首先**意味着因提高生产费用而使销路产生困难，在有些情况下也直接导致缩减生产规模。”（第 87 页）但是，我们刚刚听说，工人的要求会导致生产的**扩大**和技术的**改良**，也就是说，会导致生产的兴旺，并且不是使“首先”发生的停滞得到克服，而是使已经回落的利润得到了提高，也就是说，竟超出了企业过去的规模！

但是，一位德国教授，如果他不想糟蹋德国国民经济学的神圣传统，他就不应该同科学研究工作者一起到**生产关系**中去寻找对付危机的**持久**的手段，彻底的手段，倒是应该同小贩一起到**分配关系**中去寻找。“工会所争取的**提高工人阶级在生产成果中获得份额**的事，会持续不断地起减轻危机的作用，因为它增加了群众的财富，扩大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因而巩固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在广大群众中的**销路**，**从而巩固了经济生产的无干扰的发展。**”（第 87 页）对于单个的企业主来说（庸俗经济学总是忠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正如教授先生所说的那样，工人阶级的“富裕”是解决他们货栈中滞销货的一种手段，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所有的企业



主来说,对于阶级来说,桑巴特先生的巧妙手段不过是让他们掏自己的腰包去扩大消费者群众的购买力,以便使他们能够出卖更多的商品。如果直接向企业主说明,告诉他们应该定期把多余的商品储备送给工会会员,以便保证“经济生产的无干扰的发展”,那岂不是更简单吗?我相信,我们的“高贵的商人”和“天才的企业主”,他们既然是那样的精明能干,会干脆答复他说:教授先生,您忘啦,庸俗经济学被人们发明出来是为了欺骗工人而不是为了欺骗资本家的!

此外,桑巴特治疗危机的药方中最拿手的一着是假定人们一般说来可以用扩大销路的办法来“长久地”防止停滞现象。这同样是从“德意志科学”的家俱中取出的一件古老而可敬的小摆设,这可以从欧根·杜林先生的著作里找到。但是,桑巴特先生闷闷不乐地说:“没有一种多么错误多么经常地受到驳斥的理论不是时常重新复活并且能在一瞬间搞乱没有经验的头脑的。”(第68页)如果一个头脑被它刚刚驳斥过的理论搞乱,那就更糟了。扩大正常的需求可以“减轻”危机的假设,其先决条件是生产不会那么轻易地超过目前已经扩大的市场界限,这也就是说,生产的规模,或者说也可以说,生产资本有一个被限定了的范围。这样一来,教授先生又顺利地回到工资基金理论上来了,而这个理论正是他刚才为了证明工资可以无限增长的时候从坟墓里挖掘出来而又心满意足地将它重新埋葬了的。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客观对立就以庸俗理论的主观过失的形式反映出来,而社会矛盾就以它的逻辑谬误的形式反映出来。这一理论想把工会这个从资本的对立中产生出来的现象放在普遍利益协调的基础之上,想把它当作不以“自然规律”为转移的,也就是不以资本主义界限为转移的力量因素。但是,庸俗经济学的命运也就在于,正是在它表现自己力量的意识和自由意志中自为以

超越一切社会规律的地方，却通常实际上象皮球一样最大限度地被盲目的社会力量所玩弄。

我们已经看到，工会的作用是被束缚在一定的经济界限之内的，而这些界限归结起来可以说是资本增殖的需要。但是，即使在这个界限内，工会的行动也完全服从于资本的痉挛式的发展。

在营业情况好的情况下，工会要争取工资的提高，以便在营业衰退时通过防御斗争来维持这种工资水平；在资本对可以利用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和在技术停顿的情况下，工会要取得组织上的成果；在由于危机和中等阶层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化而使得新生的劳动后备军涌现的情况下，或者在实行技术革命的情况下，又会重新遭到挫折和暂时受到震动，总之，工会的运动始终“不过是资本积累中运动的反映”（马克思）。

的确，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会的真正的经济职能正在于，它在跟随资本的运动的时候，要限制这些运动的作用，同时又要利用这些运动。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工会运动开始以前工人的状况是怎样的。工人的状况不仅仅是绝对的贫困，它的特点是，第一，工人在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很不稳定，也就是说很不均匀。第二，在任何时候，工人阶级不同阶层的状况都很不均匀。在繁荣时资本把劳动力一下子抛到天上，在衰退时又把它毫无限度地扔到地上。如果说，某些个别的熟练工人过着象小资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整个工人阶层则被压到低于身体最低限度需要的水准以下，简直是坐以待毙。

在目前，工会如果关注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的共同利益，就会带来根本的转变。由于工会在繁荣时期争得了利润所许可的最大限度的工资，以便在衰退时期利用它进行防御斗争，由于工会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同时又将处境最好的职业吸引到共同的组织中

来，由于工会最终不仅为每种职业而且也为整个阶级创造了共同的章程（劳动时间等），这样，工会也就使得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在生产的不同阶段和在它的不同阶层之间趋于平均化，并且给这种生活状况带来了一定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也就是说，正是归功于工会，工人的“按照习惯的生活水平”才作为社会现实，作为实在的东西得以产生，而在工会斗争开始之前，这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内部各种各样生活水平之间的单纯观念上的平均，是单纯的数学概念。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象桑巴特先生在他具有青春活力的理论中所建议的那样，应当尽可能地改善工人的生活习惯，并且通过这种办法来不断地限制资本。相反，问题在于资本的“习惯”，也就是说，正是资本可以生产出在空间和时间上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习惯”利润这个最高贵的习惯，确定了当时通过工会活动可能提高工人习惯的界限。

因此，对于工会来说，也正如对于每个社会力量因素来说，意识和力量对于社会过程的真正的和历史上唯一可能的干预，并不在于忽略了它的规律，而在于认识了这些规律，并且由于认识了它们而使它们为自己服务。

对于桑巴特先生来说，这当然是对工会的闻所未闻的贬低。他自己可以向工会百般谄媚奉承。但是，花言巧语的侍臣不是他的皇上的好顾问，同样，慷慨的谄媚者也不是工人运动的好朋友。如果桑巴特先生把工会捧得超出了一切社会界限，向工会描绘资本主义一切都美妙无比，这的确是他的高尚品德。可惜的是，他只能用纯粹是陈旧的、早已被驳倒的庸俗经济学的错误和混乱来证实这一切罢了。

话又说回来，国民经济学上有一个新发现要归功于桑巴特先生，与他同行的先生们至少从实践中也认识到了，但是没有认识到

这样普遍的科学上的适用性。这个发现就是，待嫁新娘也是价格形成的一个因素。

## 二

桑巴特先生一方面证明工会运动在经济上的万能，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把工会从社会民主党的“监护”下解放出来作为这个万能的条件。

的确，社会民主党本身引起了工会的产生，并且经常关心它们，支持它们和维护它们。但是，尽管有这一切情况，桑巴特先生仍然知道，社会民主党对于工会的事业总是半心半意的，甚至直接“阻挠过”工会的发展。因为“一个政党认为自己的任务仅仅是作好一切准备以便在资本主义世界崩溃的伟大时刻让社会民主党的少女喝一杯水润润嗓子，——这样一个党，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把任何工会组织看作是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训练工人部队的学校。这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必须把工会运动看作自己事业的敌人”（《尽管如此！》第64页）。这样的政党干脆不可能具有为建设工会所必需的“内心的安定”（第64页）。如果说，马克思在国际中已经不断地促进过工会运动的发展，那么，桑巴特先生不是从马克思关于工会运动对工人阶级有用的观点去解释，而是用别的动机去解释。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不能“象拉萨尔及其信徒一样，对工会运动采取原则上反对的立场”。因为，第一，马克思和他的伦敦“使徒”同英国工联界太接近了，他们不能“把工人在工会方面的全部组织要求（在这方面拉萨尔是完全无知的——罗·卢·）不加思索地撇在一边”。但是第二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及其信徒也首先知道……在他所梦想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中，英国工联会员是缺少不了的，否

则这个运动就会陷入可笑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刚一成立，对于工会就给予相当的关心。”（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第59页）换句话说，马克思及其信徒本来最乐意对整个工会运动狠狠地踢上几脚，但是很可惜，由于英国工联分子的力量，由于国际这个大动物园为完整起见应该代表无产阶级的每一个种属，少不得英国工联分子，所以他们为了不致被人嘲笑，不得不带着一副苦笑去啃工会的苹果。

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但是不幸的是，“历史的方法”被历史当场逮捕了。

还在1847年，那时还没有国际，这也就是说，关于国际的全面代表性甚至在梦中也还不存在，那时马克思还没有在伦敦定居，因此对工联的态度既不能亲近也不能疏远，那时工联本身也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还隐藏在政治运动即宪章运动的背后，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

“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sup>①</sup>

何止如此！马克思不仅从经济必然性出发论证了工会运动并且说明了它的职能。他还极其尖锐地直接反驳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傅立叶和欧文的信徒对工会的否定态度。他说他们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属于同一等级的工会反对者：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编者注

“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上记载和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非凡的先见之明准备就绪的新社会去。”<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他接着说：“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sup>②</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这就是说，马克思早在1847年嘲笑过的欧义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的见解，正是今天桑巴特先生当作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端出来的见解。而“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这次证明是先把真实的历史歪曲一番，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歪曲来判断历史的方法。

然而，这一方法还完成了更多的工作：它还替这个“修改了的”历史提出了逻辑根据。

桑巴特先生宣称，社会民主党不仅事实上在内心深处总是厌恶工会运动，而且过去和现在它的态度也只能是这样，因此，工会的繁荣直接以从社会民主党起阻碍作用的“监护”下解放出来的程度来衡量。

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议论所谓工会中立的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我们这里，拥护工会中立的人们，其出发点仅仅是策略上的考虑，这也就是希望把属于不同政党的工人集合到统一的经济斗争中来。工会的这种“集合政策”同近年来社会民主党从各方面提出的集合政策完全是一个思想。如果说在我们这里，

---

<sup>①②</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8页。——编者注

有人认为通过掩盖最终目的应该可以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吸引力，从而扩大它的直接政治成果，那么，在那里，是通过抹杀工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来加强工会的吸引力量和经济力量。

当然，德国工会到现在也没有正式规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使之成为会员的义务，但是它当前的全部工作都是按照社会主义方针进行的。

但是，社会民主党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单个**集团**来说代表整个阶级的利益，对于个别的**眼前利益**来说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前者既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为合法措施即为包括每个国家整个无产阶级提高他们地位的措施的**政治斗争**上，也表现在党的政策的**国际性质**上。后者表现在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目的同社会发展进程即以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为**准则**的一致上。

工会一开始只是代表工人直接的当前利益，这是同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正是这些利益使它不得不走下述道路：第一，通过**合法的准则**使每个国家所获得的成果日益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同时使工会力量在**国际上**结合起来。第二，它的全部政策（对于罢工的态度、最低限度工资问题、不固定工资等级制问题、标准工资合同问题、最长工作日问题、失业补助问题、妇女劳动问题、非熟练工人问题、外国侨民问题、干预生产技术问题、相应劳动权问题、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等）日益以普遍的社会联系为依据，并且估计到**社会的发展**。

这样一来，工会将由于自身的利益势必自然而然地走上社会民主党自觉地走上的道路。

因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之间所以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是因为有许多个人的联系把它们连结起来，也不是因为工会在“社会民主党监护之下”，而是因为德国工会一开始就把它们的政策和它们的斗争置于社会发展的正确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桑

巴特先生的历史的方法所如此厌恶的历史的巧合，使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一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见解走到了为集团的利益和眼前的利益而斗争的前头。

如果说，社会民主党的集合政策必然导致牺牲最终目的，那么，工会的集合政策必然导致牺牲德国工会运动目前的进步性质。关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见解的这个纽带一旦被扯断，单个集团的利益和职业利益、狭隘民族利益就会在眼前出现，这就象我们在英国看到的那样：对外，民族闭关自守，内部是四分五裂，这种情况，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中立主义的乐园英国工会运动中表现得那么厉害。

可见，仔细观察一下，集合政策变成了分裂政策，“中立思想”，哪怕仅仅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是经不起任何严肃批判的。

但是，在桑巴特先生看来，集合政策的观点也只起十分次要的作用。他所得出的把工会从社会民主党那里“解放”出来的必要性，不是来源于策略上的理由，而是来源于在工会本质中包含的对立。

这种对立在哪里呢？在桑巴特先生看来，这就在于社会民主党总是把工会看成“达到目的手段”，而工会只能当作“目的本身”才能兴旺发达。但是，如果象到目前为止的德国的情况那样，工会所依据的基础是一般的社会发展，而这个发展的最后结果社会民主党已经表述在自己的最终目的中了，那么，即使假设教授先生所说的是合乎真理的，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对立。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工人阶级地位的直接提高并不可贵，而只是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它也必然要以最大的热心来建设工会。而且它必然也会得到“内心的安定”，正如它在三十年来在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劳动保护立法，简言之，在进行全部当前工作时有这样的“内



心的安定”一样。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和现在的工会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对立，相反，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设想有对立。如果工会不象现在德国那样，而是站在别的基础上，如果它们象英国的旧工联那样，不是站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而是站在现今社会利益协调的基础上，相信在这个社会内部有充分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可能性，一句话，如果它们站在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介绍过的桑巴特的“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的基础上，那么，社会民主党和这些工会之间当然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因为对于相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利益协调和相信在国民收入中可以无限提高劳动份额的这一切庸俗经济学的幻想，社会民主党当然要无情地予以粉碎。这样的工会要同社会民主党并存也只能作这样的选择：工人们要末跟着社会民主党走，那他们就要同“现实主义”方法的协调和幸福的梦想告别，要末，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方法的幻想，那就得背弃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在工会问题上桑巴特的预言的政治意义就在于此。“正确的”、“历史的”方法一开头向工会展示了达到经济高涨的无限远景，为的是最后斥责社会民主党，说它是实现这一高涨的真正障碍。

但是，桑巴特先生难道没有为自己辩护，不是多次反对说他致使工会反对社会民主党这样一种说法吗？他不是明确地写过，说他理想中的工会会员可以“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坚强信念的社会主义者。一个真诚的社会民主党人吗”？（第64页）他自己不是明确说明并且反复说过，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唯一可能的工人政党吗？

不错！因为副教授先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从他的“鸟瞰”中他作过各种各样的观察，并且知道很多东西。他知道，“在德国

工人圈子的那个政党(社会民主党——罗·卢·)享有的威信如此之大,其他方面要同它抗争,除非发生了奇迹,要末得过几十年才行”(第57页)。他也知道,“如果有人相信,加强了工会就可以取消社会民主党,那简直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以此为目的的政策,事先就注定是毫无结果的”,并且“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任何进攻……”,都将“加强它的地位”。总之,他知道,把教授的晦涩难懂的话译成真正的德语,如果副教授想出现在工人面前,并且用文克施特恩的笨拙方式唆使工人反对社会民主党,那么,他同工人的“共同努力”就会得到一个十分悲惨的结局。因此,他允许那些“虔诚的工会会员”安然自得地“同时也”做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只是要求一点,“使社会民主党文明化”(第79页),这就是说,只要把桑巴特的命题从对社会民主党说的恭维话的一团乱麻中解脱出来,重新排列一下,变成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深信,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包含比“电车市有化”更为根本的革新(第65页),“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今后还有几百年向前发展”,而“经济生活的重点在可以预见到的时期内将落在资本主义企业身上”(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第92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相互排斥的对立,不如说,两者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在同一个社会中实现”(第92页),归根到底“一个纯粹合理与否的问题是,他(指工人——罗·卢·)究竟如何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是相信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还是相信对其他的、已经存在的政党施加影响”,这就是说,究竟由谁来担负实现上述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还是自由党、民族自由党、中央党或保守党?这纯粹是一个合理与否的问题。

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声明坚决拥护民族自由党。

在这里,我们把“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的全

部秘密都看得一清二楚了。直接反对社会民主党，反对它的学说吗？呸！多么不时髦、多么不现实主义、多么“非历史”！不是！正是要站在工人运动的基地上，把工会、社会民主党、阶级斗争和最终目的这一切，都承认下来，都接受下来！只是为了工会本身的利益给予工会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必然同社会民主党对立，为了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利益使这个党变得文明些，变成民族社会党，并且为了社会主义本身实现的利益，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合为一体，总之，为了阶级斗争的利益把阶级斗争的脖子折断，这就是奥妙之处！

“谁只要把事情理解到这样的深度”，桑巴特教授先生说，“谁就懂得了劳工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 三

国民经济学的“德意志科学”早已发挥了警察的补充物的作用。如果警察是用棍棒对付社会民主党，那么这个“德意志科学”用的是“精神武器”。

它已经这样做了：首先，制造骗人的舆论，炮制长篇大论的教授的哲理来宣传利益协调，宣传阶级斗争荒谬。其次，当这些学说被马克思粉碎之后，就施展“反驳”的手法，更多的是对马克思和他的学生进行诽谤。再其次，树立一个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讲坛社会主义。最后，当教授的混合物无人过问，只能留给发明者自己使用，而马克思的学说却以社会民主党的形式变成了赫赫逼人的力量的时候，就直接支持警察，支持反社会党人法。

然而，反社会党人法失败了，社会民主党肩头一耸就同时摆脱了警察和“德意志科学”，摆脱了普特卡默以及谢夫莱和施穆勒，于是“德意志科学”就缩到自己的书斋里和讲坛上，满足于领固定薪

水去教育资产阶级青年，使之适应于普鲁士-德意志国家的公职。

于是有十年之久工人运动很少听到“德意志科学”。

资产阶级最终放弃了收拾社会民主党的希望。它对自己的两个奴才，对刽子手的拳头，尤其是对教授的头脑，丧失了信心。

但是，现在一个经济高涨的时期来到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世界政策的时代。在资产阶级眼前展现了一片新的视野。持续了多年的繁荣，与推行世界政策相联系的进行军备和征服带来的获取金雨般的利润的前景，使得资产阶级世界已经消沉的心又强烈地跳动起来。

但是，为了推行世界政策和“民族”政策，资产阶级需要人民群众的援助。另一方面，它相信在工业高涨的前景中可以找到吸引工人阶级的诱饵。它鼓起了新的勇气再一次试图征服劳动人民。号令又响了：学者们，上班去吧！于是，干缩在自己书斋里的象木乃伊般的教授们，一个接一个地露面了，匆匆忙忙去参加人民集会，服服贴贴在参孙<sup>①</sup>——无产阶级面前唱起德莉拉关于资产阶级世界政策的恋歌。

这位充满青春活力、满怀信心、从头到脚都很时髦的副教授威尔纳·桑巴特一马当先，他用轻盈的脚步和细致的表情跳着跳着。他知道他掌握着“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对顽固不化的无产阶级作出奇迹，他知道他掌握着护身符，这个护身符使他成为“世界政策”的名教授，即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威尔纳·桑巴特先生通过不断地练习掌握了这种自己估价很高的能力。最初，他是马克思的一位勤奋的学生，甚至为德国教授毫不姑息的老人恩格斯，也费过他几句褒辞。桑巴特在他写的悼念恩格斯的文章结尾时说：“看来，他是一个好人。”

---

<sup>①</sup> 圣经中古犹太神话中具有非凡力量的英雄。——编者注

那时，桑巴特教授将反驳马克思学说的事留给“政治野心家”去干了。但是，世界政策的时代不仅摘去了许多娇嫩的蓓蕾，也摘去了布勒斯劳教授们的科学上的无偏见性。弗兰茨·梅林在他的这个教授走了头几步就看透了他，及时反驳了他，应该说，梅林这一次也做对了。桑巴特先生同他的同事一起投入政治“野心”的激流，而最后走到了其他教授开始的地方：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斗争。

这一转变既急速又彻底。桑巴特先生以前证明，德国不是从输入国发展到输出国，而是相反的情况，这样他顺便也就为主张关税保护的人提供了他们所希望的论据。这一论点曾使他的自由主义同事们大吃一惊。现在他正同他的同事们肩并肩地为德意志大舰队而斗争，这一舰队是“为了保护德国的输出”而发明出来的<sup>①</sup>。

以前，他向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保证，他对反对反动派和剥削抱有热烈的同情，现在，他同文克施特恩先生和勒维先生手挽着手代表世界政策的反动和世界政策吸取工人鲜血的事业。

以前，他要保卫欧洲文化的利益，反对亚洲的野蛮，现在他是拥护世界政策的野蛮，反对欧洲和亚洲的文化。

以前，他保护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它的老敌人官方的“德意志科学”，现在，他以这个“德意志科学”的名义登场反对马克思主义。

桑巴特先生在他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一书中关于拉萨尔参加工人运动是这样解释的，说拉萨尔“巨大的”、“阴险的”野心，必然使他在“政治领域”寻找道路，“一切有野心的人，如果他不能成为元帅或者艺术家，在我们时代里必然走这一条道路”。

---

<sup>①</sup> 1900年，德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大舰队的法案。此事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时柏林有一些教授出来参加群众集会，企图说服群众拥护大舰队。其中有瓦格纳、施穆勒、文克施特恩、勒维、桑巴特等。——编者注

至于桑巴特先生，在我们看来，他本来可以成功地成为一个艺术家，比如成为一个走绳索的人，或者，按照他的航海热情来看，也可以成为一个海军司令，但是，看来，他的野心比拉萨尔还要大，还要阴险。他宁愿把走绳索的本领和航海热情都带到“政治领域”中去。

他自觉地、坚定地登上舞台，用一百多年来的全部知识和一切智慧武装了自己；他有舒尔采-德里奇、舒尔采-格弗尼茨以及其他庸俗舒尔采的社会协调论，他有罗雪尔的历史方法，他有英国维伯夫妇的局限性，他有拉萨尔的装腔作势，他有尤利安·施米特的自高自大，他有从所有语言、诗人和时代那里找来的一口袋引语，他有用曾祖父的古文和教授的词令编织而成的文风，他有乌尔利希·冯·胡登的豪言壮语和自己制造的玄妙的谬论，最后，还有一种可靠的心理影响工具——诽谤和谄媚。

拉萨尔，就是这个矮小的教授用自己的小手摹仿的装腔作势的拉萨尔，在教授看来是一个大野心家，因为资产阶级拒绝了他，他就紧紧抓住了工人阶级。

李卜克内西，在教授看来是“啦啦队的灵魂”。

倍倍尔呢，即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还是要坚持剥夺”这一口号的倍倍尔呢？教授首先在布勒斯劳的报告中按照倍倍尔的样子给他铸造了一个肖像，把他当做“政治儿童”的典型，“这些政治儿童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的末日’就要来到”，他们“任何时候都不去看一看是否在门前出现一个流着牛奶和蜜水的新王国”，把他当做“正在死亡的社会怪人的一代的”典型，在这些怪人的头脑中，“一个没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经济制度行将到来的思想”还在继续作祟，一再预言“世界末日”指日可待。

但是，对于同一个倍倍尔，当桑巴特先生认为有可能利用他关于工会和政策的演讲为自己的“现实主义方法”服务的时候，他竟

在自己的讲稿付印的最后时刻在附录中说了这样一些赞扬的话：

他属于这样的“伟大领袖之列，他们的威望决不只是由于他们逻辑严密，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敏感性，由于有这种敏感，他们善于觉察到……人民灵魂中最隐秘的活动”，而“当群众的野心”（这位教授先生连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只能想象为大规模的群众野心！）改变了的时候，就“改变自己的见解”，而在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中……最充分地表现了他们的人民性；他，倍倍尔，“随时凭自己的本能就能觉察出”群众有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他是“社会民主党内各种思潮和派别之间的对角线”，如此等等。这样，他把倍倍尔描写成一个政治风向旗，之后，他还把倾盆大雨般的个人阿谀奉承的话加倍倍尔身上：“不可思议的崇拜”、群众的“无限信任”、“热烈的心”、“最纯洁的性格”、“个人的魅力”、“鲜明活泼”、“火一般的精神”、“公正诚实”、“随机应变的能力”完全象老恩格斯，同时在才能方面也完全象老俾斯麦，体现了群众的希望和野心！不过，桑巴特先生忘记了，他对倍倍尔说了这么一大堆阿谀奉承的话，却恰恰要冒着得一笔意外收入的危险，因为不是别人正是倍倍尔提出了这样一个原理：敌人赞美我的时候，我就得立刻问问自己，我是否做了愚蠢的事。

继领导人之后，就该轮到小人物来交替地挨骂或受捧。首先，“冯·艾尔姆、列金、泽吉茨、米拉尔格、蒂姆、德布林、波尔施等人”是“我们工会新一代军官”，排列成由“具有同样野心（噢！又是这个野心，到处都是野心，教授先生！）的下级军官组成的相应的队伍”。“这些人”是“专职工会工作者”的“新典型”，他们的“特有的才能和知识”发展到了“完全成熟的地步”，具有“新的精神”，具有“特有的灵魂”，这些“能干的人”创造了一种新的信仰，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工人出身的政治鼓动员受到的待遇，却不同于上述由桑巴特先生照自己的理想改造成工会工作者的那些“军官”。关

于他们的情况，教授先生什么也不想知道：“这些肤浅的、无头脑的空谈家，这些人现在往往还在报刊、人民集会和联合会中占居领导地位，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什么都不行，只会把几句背得烂熟的、连自己也不懂的、从党的出版物中学来的句子，象鹦鹉学舌一般反复空谈，或者象牡牛一样到人群中嚎叫，他们除了这种‘党的鼓动工作’外，什么工作都不行……”桑巴特教授先生想把德国工人阶级“从这种漫画式的政治鼓动家中”解放出来（第9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桑巴特先生在他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第99页）中，痛心疾首地悲叹在我们的阶级斗争中良好的风气和文雅的方式都败坏了。“仅仅从表面上看来，表示意见的方式多刻薄，多伤人，多粗暴，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应该是这样吗？”

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感到是直接说出来的。我们早就对党内的腔调和语言变得粗暴感到痛苦，终于有人向党严正地提出警告，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桑巴特教授本人就最好地证明，可以用一种文雅的、贵族式的方式反驳自己的论敌。因此，为了使自己避免产生刻薄、伤人和粗暴的腔调，为安全起见，我们想准确地掌握教授先生的语言。

这么说，副教授先生，您想让工人阶级摆脱“漫画式的政治鼓动家”吗？那么您指的究竟是哪些人呢？难道是在反社会党人法下在监狱里长年度日的社会民主党的无数鼓动家是游手好闲的人吗？您这位政治经济学的文人，您是在学院和资产阶级客厅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啊！

也许是指我们地方上的小型报纸的谦虚的编辑们和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家？他们历尽难言的辛苦，从自己无产阶级的生活地位出发奋发图强，在坚韧的斗争中求得每一点教育，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己成为伟大解放学说的信徒，难道他们就是您所说的那些“浅



薄的、无头脑的空谈家”吗？您这位浅薄的空谈家，从年青时代起人们就把德国政治经济学的陈辞滥调和一望而知的东西往您头脑里灌，为的是让您，如果上帝和世界政策帮忙的话，成为一个正教授！

是指我们无数无名的鼓动家吗？他们时时刻刻都把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存作孤注一掷，孜孜不倦，一次又一次地在集会上和联合会中把群众鼓动起来，千百次地反复宣传那些关于社会主义福音的既老而又永远新鲜的话。您说的那些“漫画式的政治鼓动家”，那些“象鹦鹉学舌一样”“反复空谈”党的出版物上字句的人，或者“象牡牛一样到群众中嚎叫”的人，就是他们吗？您这个可笑的拉萨尔的模拟品，象鹦鹉一样一再重复布伦坦诺的陈词滥调，并且把社会民主党要灭亡的过时的学说搬到群众中去，固然不是吼叫，但却利用群众的天真和善良，窃窃私语，阿谀奉承，造谣中伤！

教授先生用斥责和恭维侮辱了工人阶级的大小领袖以后，向听众告别时作了保证，说工人阶级决无理由缺乏勇气，因为“德意志科学也”站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追求的目标。

可是，这个“德意志科学”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喷射毒液的科学，是反对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反社会党人法的科学，其次，是引诱工人阶级去支持海上军国主义和世界政策、从而得了勋章的科学，最后，是想用愚蠢的煽动使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脱离社会民主党的科学。这样的“德意志科学”，桑巴特教授，是您想使社会民主党“文明化”的科学，这个科学不是站在德国工人阶级背后，它是站在**海军陆战队的背后**，这支海军陆战队目前正在中国登陆<sup>①</sup>，以便完成匈奴人的文化使命。

如果说，这个科学站在工人阶级“背后”，那么，顶多是这样的

---

<sup>①</sup> 指 1900 年英、德、俄、日、法、奥、意、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件。——编者注

意义上说的,就是德国工人阶级今天也和过去一样,对于这个佩带勋章的、服服贴贴的、妄自尊大的、随机应变的“德意志科学”,总是要带着应有的轻蔑态度——背朝着它<sup>①</sup>。

发表于《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2册第740—747、773—782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767—790页。

(李宗禹译)

---

① 《新时代》紧接着卢森堡的这篇文章之后刊载了弗·梅林的一个说明：“在卢森堡同志所评论的桑巴特先生的论文中，副教授强调说，我曾在数月前在《前进报》上许下的关于阐述他的工会活动的诺言，至今未兑现。这一点他是对的。由于突然落在我身上的紧迫的党的工作和长期不在柏林，使我暂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我返回后打算着手进行时，考茨基告诉我说，卢森堡同志那时对副教授已经产生了同情。卢森堡同志十分和蔼可亲，她允许我看了她的手稿。因为我发现，在这篇文章中，我心里想的一切比我本来可以说的都已经更好地说出来了，为此我恭恭敬敬地向副教授提出请求，把她的批评也看做是我的诺言的兑现，他在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品文的附录中对我说了一些阿谀奉承的话，这只是因为我四年前曾经警告过他会成为第二个谢夫莱，如果我希望他这样的话，那么他日后真的成了第二个谢夫莱，他由于具有和这位先行者格格不入的街头流浪儿童的性格（和这位先行者不同的是缺乏渊博的知识）而要努力同他相称。”

弗·梅林

1900年9月10日于施泰格里茨-柏林”

## 在 1900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兹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摘录)

(1900 年 9 月 17 日)

### 五

如果我就世界政策讲几句话，那么这不是要提前讨论第七项<sup>①</sup>的问题；我只打算略为接触一下由我们党开展的关于中国战争<sup>②</sup>的宣传是否同这一事件的影响相称这个实际问题，对此不作否定回答是不行的。当然，我们的报刊，特别是《前进报》为谴责政府的冒险政策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还不够。在这种场合，宣传的重点不应当放在只影响极少数居民的报刊上，而应当放在深入到与我们的运动尚无联系的广大群众中的口头宣传上；但是就这方面来说，做得太少了。直到目前我们一直是懂得用浩浩荡荡的人民运动来回答反动阴谋的。但是现在发生的事件就影响而言超过了我们近十年来所经历过的全部事情，这些事件形成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历史的转折点，这时却没有通过举行抗议集会开展有计划的宣传。我们的报纸固然要求召开国会，对我们来说，提出这个要求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这个要求成了我们的唯一口号，

---

\* 本篇选译的是第 5.6 两节关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事件的发言。——编者注

① 第七项议程讨论的是“世界政策”。——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67 页注①。——编者注

那么，人们就真的可以说，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世界政策这座大山生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老鼠。因为，人们确实能够预料，批准舰队提案<sup>①</sup>的这个国会将是目前的世界政策的最可靠的支柱。因此，我们只能从国会为我们进行抗议提供讲台这一立场出发来看待国会的召开。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把抗议带到人民的集会上并直接诉诸群众不是更重要千百倍吗？我绝不想责备党的执行委员会，它对它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仅仅是因为它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这些理由的误解。譬如，局外人可能获得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们主要是一个议会政党，这个党对于巨大的世界历史事件除了在国会用几次演说抵挡一下外，就什么也不懂了；或者对情况了解得很差的人可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的党曾在各种场合发动过十分令人瞩目的抗议运动，却偏偏在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欧洲反对亚洲的一场流血战争中如此平静，因为它对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沙文主义顾虑重重，当然，这种看法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我恰好知道，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决不会过高地评价议会活动或者对沙文主义顾虑重重，所以，我希望将来不再为这类缺乏根据的猜测提供机会。

## 六

(1900年9月18日)

我昨天对辛格尔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报告所作的评论得到了各方面的承认<sup>②</sup>。（芬德里希喊道：“甚至包括我！”）普凡库赫的回答

<sup>①</sup> 1900年1月20日德国公布了第二个舰队法草案，它规定要把1898年第一个舰队法所确定的战舰数目增加两倍。不顾广泛的抗议运动，这项法律于1900年6月12日通过。——编者注

<sup>②</sup> 见本篇第5节。——编者注

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我抱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态度对待执行委员会是大错特错了；普凡库赫为执行委员会不采取行动辩解的话是不值一驳的。他又把那老一套的兜售不掉的货色拿出来，说什么我们没有一打倍倍尔等等。对形形色色的抱怨和批评总是这样回答的，完全象莫里哀笔下的医生对一切疾病只知道开一种处方：泻药和灌肠！我将向诸位表明，我们如何能在不成倍增加我们的第一流宣传鼓动员的情况下也做出优异成绩。一、本应为中国战争发表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必须向广大群众说明这项政策的骇人听闻之处。二、我们本来可以通过党的领导机构的命令进行统一的有威力的口头宣传鼓动。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中国战争是世界政策新纪元的第一个把所有的文明国家卷进去的事件，联合起来的欧洲各工人政党本来必须立即用抗议来回答国际反动派——神圣同盟的这第一次进攻。在这方面，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个国家的党本来应该采取主动。（喊声：“巴黎！”）我知道，一星期以后将在巴黎<sup>①</sup>作出表示抗议的决定；但是，问题毕竟不在于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没有人怀疑他们是反对与中国作战的最坚决的人——提出抗议，而在于在各个国家唤醒漠不关心的人民群众，就这方面来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党不仅在本国犯了未尽责任的罪过，而且在涉及国际团结上也是如此。我们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确实惹人耻笑。我们每天咒骂世界政策，我们在和平时期大声疾呼反对军国主义，但是，当战争一旦真正爆发时，我们却不去总结成果，不去证明我们多年的宣传鼓动确实取得了成绩。中国战争的一些最重大的事件，即皇帝的演说和往东方派遣军舰全都发生在休假期内，这是确实的。但是，要想在德国领头干的这场后果严重的战争中为自己获准休假，最低限度必须

---

① 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召开。——编者注

是帝国首相；而我们是反对党，作为这样的党必须留在岗位上，我提出这点不是为了对已经过去的事进行批评，而是因为我们目前无法摆脱世界政策的新纪元，这类事件可能每天发生，因而我希望我们能更加跟得上形势一些。最近，我们将讨论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问题，并且——如果我不是完全弄错的话——将就此作出决定。提出参加这项选举的最重要的、唯一令人同情的理由（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就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宣传鼓动寻找新的领域。不过如果我们不重视我们原有的宣传鼓动领域，追求新的又会有什么结果呢？你们在哪里找得到比战争更好的宣传机会，在哪里找得到比最近的事件更好的唤醒群众的机会呢？所以，请你们不要再用缺乏宣传鼓动员的说法来敷衍我们。如果一个单个的演说家足以开始一场战争，那么即使我们的倍倍尔们、奥艾尔们和福尔马尔们没有象家兔那样成倍增加，我们也完全可以凭我们的演说家们开展一场反对战争的抗议运动。

发表于《190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0年柏林德文版第116—117、165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799—802页。

（于沪生译 殷叙彝校）

## 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 大会上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发言\*

(1900年9月27日)

两个委员会<sup>①</sup>，即第四和第五委员会一开始就举行联席会议，因为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目前不过是世界政策这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不同方面。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对军国主义提出抗议不是什么新鲜事，无产阶级凭它正确的本能一向认为应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整个文明的死敌。老的国际就曾一再提出这样的抗议。但是，对我们来说，问题不仅在于重复以往的决议，而是在于面对世界政策这一新现象提出某种新的内容。发言人<sup>②</sup>在代表大会的掌声中描述了世界政策的疯狂和殖民政策的逆流，它们在最近六年中导致了四次流血的战争。对此，社会主义者再也不应当局限于发表柏拉图式的宣言。到目前为止，国际的实践行动仅限于经济领域。一个国家的工人在经济上对其他各国工人状况的依存性早就显示出

---

\* 这个发言的德文本主要是根据《前进报》上的报导编辑的，有时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法。法文本则是卢森堡当场发言的记录。两个文本有所不同，因此将它们同时收入。前一个是根据德文本译的，后一个是根据法文本译的。两个文本之间用星花隔开。——编者注

① 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十二个委员会，负责预先逐项讨论议事日程并草拟决议，每个国家各出两名委员参加每个委员会。——编者注

② 即卢森堡。——编者注

来并且已经在一项以劳动保护为目标的国际的工会行动中得到表现。就政治方面来说，不同国家的工人利益的密切关系却难于觉察得多。但是在这方面世界政策也造成了急剧的变化。所有重要的文明国家一致卷入同样的军国主义、海上扩张主义，同样地追逐殖民地，到处出现反动，尤其是国际间出现了持久的战争威胁，或者至少是一种持续的敌视状态。但是从面也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共同的政治活动的基础。无产阶级必须用国际的抗议运动来抵制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联盟。决议<sup>①</sup>包含这一方面的实际建议。我们建议的东西不多，仅仅责成各国的社会主义议员投票反对用于陆地和海上军国主义的任何经费，并要求由代表大会创建的常设委员

<sup>①</sup> 这个一致通过的决议说：“基于1899年在巴黎、1891年在布鲁塞尔和1896年在伦敦召开的各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通过的谴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灾难深重的后果，并要求废除常备军、组织国际仲裁法庭以及由人民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多项决议；

其次，鉴于上次国际代表大会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无产阶级迄今所获得的政治成就以及现今社会的整个和平面正常的发展受到军国主义特别是它的最新形式即世界政策的极大威胁；

最后，鉴于这一扩张和掠夺殖民地的政策，正如对中国的十字军讨伐向我们所表明的那样，引起了国际竞争和冲突，从而有使战争成为持久状态的危险。而无产阶级将必须独自为这种状态在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作出牺牲，代表大会宣布：

1. 每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必须加倍努力地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

2. 首先绝对必须用维护和平的各国无产者的联盟来回答主张战争的各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世界政策的联盟，也就是说，从政治领域的多少带有柏拉图式的显示国际团结精神的做法过渡到强有力的国际行动，过渡到反对军国主义和世界政策的共同斗争。

为此，代表大会决定采取以下的实践手段：

1. 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为了反抗军国主义应着手进行并努力推动青年的教育和组织工作；

2. 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有责任无条件地投票反对用于军国主义、海上扩张主义或者远征殖民地的任何经费；

3. 委托社会党国际常设委员会在一切具有国际影响的适当时机在各国发动一次同样形式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抗议运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00年柏林德文版第27—28页）。——编者注



会在具有国际影响的、例如象中国战争这样的事件中在所有的国家发起同样形式的抗议运动。但是只要严格地做到这不多的几点，我们在国际关系方面无疑就会取得巨大进展。不过，国际工人政党的接近不仅从日常反军国主义斗争的立场看来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从我们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来考虑也是迫切需要的。愈来愈有可能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将不是通过一次经济危机、而是通过世界政策引起的一次政治的危机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或许还要长久保持下去。但是总有一天，丧钟迟早会敲响，为了使我们能在决定性时刻担负起伟大的任务，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必要通过不断的国际行动为这一时刻作好准备。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就此提出口号，希望它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这样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期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日常斗争以反对军国主义的和世界政策的反动。”

发表于《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00年柏林德文版第27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807—809页。

（于沪生译 殷叙彝校）

\* \* \*

第四委员会和第五委员会的成员一致同意将两个委员会合并，因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是同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动潮流。

社会主义活动家一贯赞成与军国主义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军国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大敌，它力图压垮我们，使我们挨饿，败坏我们的道德。老的国际发出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呼声；每一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和各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都抗议

并谴责军国主义这一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最有力的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公民们，我们的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同以前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类似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并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

但是，我所要宣读的以及我们准备投票表决的决议内容，并不是重复这一观点；相反，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两个委员会中，我们大家一致希望走得更远一些，提出某种新的东西，首先是某种实际的东西。这就是在讨论我们的决议时大家一致同意接受的纲领。

某种新的东西？难道军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老的祸害之一，最老的罪行之一？会产生什么新东西呢？这就是：这种军国主义政策已经普遍化，并且在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形式下变本加厉。这不再仅仅是在两个或三个邻国之间为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准备的大规模武装；这是一种军国主义，它经常地促使世界列强进行新的殖民掠夺，它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一个纯粹的军国主义国家，英国也同样；迄今为止，德国几乎是唯一致力于不断扩充自己的军队和舰队的国家，现在这种政策成了整个世界的口号。这种政策以中日战争为发端；接着是美西战争，德兰士瓦战争以及欧洲国家联合反对中国的战争。公民们，如此迅速地接连发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还从来不曾这样疯狂！

确实，资产阶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在自己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但是它将耗尽自己的最后的力量，从而加快自己的不可避免的崩溃时刻的到来。

这种殖民政策开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对内对外政策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政策中必须准备好应付的办法。现在该是社会党通过自己的代表对世界政策公开表明态度的时候了；这正是我们想要通过这个决议所指出的。

我现在谈一谈这个决议的实际方面；决议建议开展经常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国际性行动。公民们，迄今为止，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团结主要表现在一些原则宣言和社会主义的代表们在各次代表大会上进行定期的磋商；至于自己的行动，它迄今主要只限于经济领域，只限于工会领域。国际团结迄今只具有这样的性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在所有国家几乎都是同样的，而政治状况则差别很大。但是，这种世界政策也将改变所有国家的政治状况。

自从这个新时代开始以来，无论在法兰西共和国或俄国专制制度下，无论在古老的英国或年轻的德意志帝国，我们到处看到同样的军国主义统治，同样的殖民政策，同样的反动，所有国家都处于经常的战争状态。正是这种同样的反动，在所有国家为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和宣传造成了新的基础和一致性。正是这种不断的战争状态导致无产者不断地团结起来维护和平！（鼓掌）

然而，不仅为了给予我们的日常斗争以新的推动力，而且从我们的最终目的来看，各国无产者在政治方面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目前是迫切需要的。公民们，在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一般设想，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将成为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头，资本主义大崩溃的开端。现在这种设想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可能；恰恰相反，愈来愈可能的是，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政治危机将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因此，公民们，既然资本主义的马尔波罗<sup>①</sup>不断地处于战争状态（也许他再也无法脱离战争状态），既然世界政策引起各种冲突和突然的、难以预料的事变，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我们迟早必然要担负起的重大任务作好准备……

---

<sup>①</sup> 约翰·邱吉尔·马尔波罗公爵（1650—1722）——英国统帅和政治活动家，1702—1711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编者注

当然，我十分清楚，大崩溃并不是在今天或明天就会到来；也许，我们的被奴役状态比我们所设想的还要长久，还要痛苦。但是这个时刻必将到来，我们的代表大会敲起警钟，号召全体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成联盟，进行政治行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行动的时刻到来了；让我们手挽着手，共同前进，组成一支队伍，为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作好准备！（长时间的鼓掌。欢呼声）

译自《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法文速记记录》  
1901年巴黎法文版第181—185页。

（李兴耕译）

# 法国的社会主义危机\*

(1901年1—2月)

## 一 导 言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问题中，米勒兰事件是第一个引起国际上普遍兴趣并成为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议题的。可惜巴黎代表大会更多地是作为理论家而不是作为实际政治家来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它对于议程的第九个问题<sup>①</sup>只作了一般的理论回答，没有对米勒兰事件明确表示态度；任何一般性的决议，不论表述得是否成功，都可以作各种解释和说明。在代表大会之后，饶勒斯在法国和伯恩施坦在德国正是这样急于把巴黎代表大会的结果说成是有利于米勒兰的，最后，福尔马尔也在《社会主义月刊》12月号上发表文章<sup>②</sup>，否认考茨基有解释考茨基决议的资格，并把考茨基决议说成是米勒兰的一次胜利。福尔马尔表示，他自己对

---

\* 我当然本来打算亲自答复福尔马尔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的反对我的文章（格奥尔格·福尔马尔：《关于米勒兰事件》，载于《社会主义月刊》第4卷1900年柏林版第767—783页）。但是由于卢森堡同志在该文发表时已经同我讨论过以这篇论文为导言的一组论文，由于她的论述使我本来要说的话大部分成了多余的，因此我就不想发表意见了。——考茨基注

① 指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议程的第九个问题：夺取社会权力以及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编者注

② 参看《米勒兰事件》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142—166页。——编者注

于米勒兰入阁感到欢欣鼓舞，米勒兰入阁对社会主义有良好的后果，并且叹息说，可惜德国社会民主党远远落后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队伍里也有美丽的海伦，在类似的情况下，只要帕里斯钟情于她们，她们是甘愿被帕里斯拐走的<sup>①</sup>；我们还可以象当年聪明的伊威希那样，当人们问他法国的巴拿马事件在他的祖国加里西亚是否可能时，他回答说：“这样的人肯定是会有的，只是没有运河。”因此，福尔马尔的文章在这方面并没有向我们说出什么新东西。即使在他提出事实为米勒兰辩护时，也只是重复众所周知的、饶勒斯和其他人在法国经常重复的论据。在下面一些文章中，我们将有机会分析饶勒斯的观点，福尔马尔的观点自然会由此得到说明。福尔马尔的文章除了阐述他自己的看法外，还承担了向德国人报道法国的事实、向法国人报道德国的舆论的任务，而且是同样报道错了，在这一方面它才需要特别加以回答。

有两个问题在判断米勒兰事件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第一个问题是：米勒兰在接受部长职位时有没有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同意，第二个问题是要确定，国际代表大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通过考茨基决议对米勒兰入阁究竟作了怎样的判断。

福尔马尔首先对德国读者说，考茨基由于不够慎重面大大受了骗，他在《新时代》第二期上的文章<sup>②</sup>中把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说成是他擅自采取的、事先未经社会党同意的行动。福尔马尔（他不是考茨基那样的糊涂虫）在巴黎“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调

---

① 海伦是希腊神话中的美人，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得到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帮助，把她诱走，因而引起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编者注

② 卡尔·考茨基《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人部长》。参看《米勒兰事件》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71—85页。——编者注

查”，并且“从最熟悉情况的人士方面”得到了关于米勒兰入阁经过的“详细报告”，他现在很乐于提供这个报告。

根据这个报告，我们看到米勒兰就象是一个乖孩子，他在受到瓦尔德克-卢梭的邀请后立即要求召集一次社会党议会党团会议并请求同志们给予指示。在会上对于参加政府不仅普遍表示赞成，而且具体说来，盖得派和布朗基派，特别是瓦扬和桑巴，可说是高兴得热泪盈眶，对他的行动表示祝贺。

如果事情正如福尔马尔所描写的那样，那么即使对于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估价总的说来没有改变，然而对于米勒兰的行为以及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其他方面的党内斗争的迄今为止的估价，就要完全改变了。既然米勒兰这时是作为社会党的合法代表出现的，社会党也为他承担责任，那么，法国工人党和瓦扬派对此粗暴地表示反对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这种反对显得确实象福尔马尔所竭力描述的那样是对社会主义团结的破坏。

幸而国际社会民主党现在用不着把迄今关于米勒兰事件所说的以及所写的一切都颠倒过来，因为福尔马尔只不过上了一位法国的爱开玩笑的人的当（显然这种事是最谨慎的人们也会碰到的），他的“最熟悉情况的人士”肯定是善意地欺骗了他。瓦扬在去年12月4日所写的下面这封信（他准许我们公开加以引用）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实际情况。瓦扬写道：

“我多次有机会公开说明事实。在内阁组成的前两天，米勒兰在一次社会党议会党团的会议上象叙述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那样说，在杜毕伊内阁垮台后，有人建议他参加一个正在组织的内阁，他仅仅是在他个人负责的情况下参加这一谈判，与党完全无关。我立即声明，我注意到了米勒兰的发言，如果类似的谈判例外地重演并且获得成功的话，我要请求议会党团和党发表一个声明，使党完全不牵涉到这样一种个人行动中去，因为党决不能参加资

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参加内阁。米勒兰在听了这些话之后作了一个表示赞成的手势，我们多数人随即动身去参加议会全体会议。当时我们中间没有人想到要怀疑米勒兰所说的话，据他说，组织内阁的谈判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因此，当第二天一位被认为是十分了解情况的朋友告诉我，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组成了，米勒兰和加利费一起参加了内阁，我对此感到很惊讶。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并且立即通过风动邮筒发了一封信给米勒兰，我在信中请他毫不迟延地对谣传加以澄清，我认为这种谣传是一种诽谤，在信中我附带说，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我在议会党团会议上所说的话就失去了它的效力。我指的是，由于内阁中有加利费，我们不再能只限于发表声明，米勒兰参加政府既不能代表党，也不能使党承担义务，而且我们还必须用一切力量反对使一个社会主义者成为镇压公社的刽子手的同僚的行动。

因此，当我第二天同时接到刊载着关于瓦尔德克—米勒兰—加利费内阁组成的消息的报纸以及米勒兰通过风动邮筒寄来的明信片（他在其中写道，他收到了我的信，他刚参加了内阁第一次会议，事情已经做了，他认为他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未来将会作出判断），我急忙赶到我党（革命社会主义党）议员和友好议员那里，同一天晚上，报纸上发表了我们的抗议书，我们从社会主义议会党团中分离出来并组成了一个革命社会主义党团，以此对我们的抗议书作了正面的肯定……

我再一次读了您的来信，我看到，我们的隐蔽的敌人根据一位议员的叙述指责我和桑巴否决了在议会党团中就米勒兰之事提出的建议。（参看福尔马尔的文章。——罗·卢·）<sup>①</sup>上面我给您所写的这些话就足以纠正这种说法，我有一次曾听到过这种说法，但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279 页注<sup>②</sup>。——编者注



它并不因此而不是虚假的。它或者是一种误解，或者是一种谎言 (une contrevérité)。”

由此可见，事情十分清楚。米勒兰既没有召集一次社会主义议会党团会议，又没有向会议表示他可能参加内阁，也没有取得党团对于他入阁的同意。相反，根据他的话议会党团根本不可能认为，他说的是有实在意义的现实的事情，而瓦扬和其他人对待米勒兰的这种模糊的暗示的整个态度，就可以使他毫不怀疑，他只有违背老的党组织的愿望才能参加政府。

如果福尔马尔象他热情劝告考茨基的那样细心周到地自己着手收集情报，那么，他就会在《革命社会主义党年鉴》（1899—1900年，巴黎新地街45号，第39—53页）上找到所有这些叙述，它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出版，并且据我们所知直到现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怀疑或反驳。这样一来，他就不必费力去传播错误的消息并且拿这些消息来教训别人了。

考茨基阐述了他的得到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的意义，福尔马尔对此作了纠正，他在这样做时已不再是根据可靠的消息，而是依靠自己的敏锐观察和精巧的构想了。他说，巴黎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决议的表决，并不象考茨基所臆想的那样是表示反对米勒兰，而是表示支持米勒兰。文中把一些党的领袖在代表大会上和会在外的某些言语和行动非常精巧地拼凑在一起并且加以对比，以此作为证据。

例如，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作为考茨基决议的报告人，当然曾经直率地反对米勒兰入阁。但是，福尔马尔这个通晓人情的人知道，在这种场合不能把王德威尔得的发言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是报告人，所以他不得不对双方都讨好。至于王德威尔得早在一年前（1899年9月21日《小共和国报》）关于米勒兰事件就发表了同样的意见，福尔马尔忘记了，因此，他关于这一点也无法奉告读者，那

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即使王德威尔得确实是反对米勒兰的，但安塞尔在王德威尔得之后发言，“无保留地”支持内阁。既然一个比利时人支持米勒兰，另一个表示反对，那就很清楚，多数的比利时人是支持米勒兰的。

但是，福尔马尔甚至连一个代表的意见都不需要听，就可以了解一个代表团的判断了。例如，英国人对于米勒兰问题根本没有发表意见，但是福尔马尔知道，他们很可能也是支持而不是反对米勒兰的。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对饶勒斯的鼓掌就不会超过对盖得和瓦扬的鼓掌，而尽管巴黎代表大会上很乱，但这一点福尔马尔是看得很清楚的。一个细心的人有什么东西觉察不到呢！

至于说到德国代表团，福尔马尔认为，“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同福尔马尔一样为米勒兰感到高兴。既然福尔马尔没有疑问，那么读者就更加用不着怀疑。事情就这样了结。

但是德国代表团对米勒兰内阁表示赞同的态度也是符合党内舆论的，根据福尔马尔的说法，党的报刊上“许多表示赞同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评论的是“米勒兰的个别行动”，因此根本没有涉及他的内阁问题）证明了这一点。

意大利人也没有逃脱福尔马尔强加的论据。因为同费利相反，科斯塔指出，多数的意大利代表赞成考茨基决议。既然意大利人投票赞成考茨基决议，那么他们就不是按照考茨基的意思，而是按照福尔马尔的意思来理解决议的，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人能够怀疑吗？

甚至米勒兰的最厉害的敌人费利，福尔马尔也有办法把他变成一个朋友。为了确定巴黎代表大会上投票的意义，福尔马尔恰好发现，费利在两个月之后“对事情重新作了考虑”，并且在曼图亚表示赞成社会党人内阁<sup>①</sup>。这样一来，巴黎代表大会上通过考茨基的决议就变成了有利于米勒兰的一次辉煌的国际示威。

可惜从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论据中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我们在德国也已经成熟到可以担任部长职位了，因为我们也不缺乏律师的才能。但是根据普通人的理智，就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的真正意见。

考茨基决议指出：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得到整个党组织的赞成，而社会党人部长继续作为本党的全权代表时，这种冒险的尝试（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罗·卢·）才有可能带来益处。如果社会党人部长不服从自己的党，如果他不再作为自己的党的全权代表，那么他参加内阁就会从巩固党的手段变为削弱党的手段，从促进夺取政权的手段变为阻碍夺取政权的手段。”<sup>②</sup>

米勒兰不是作为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全权代表接受部长职位的，这一点不仅从法国不存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党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而且从他既没有得到个别的组织的委托、也没有得到议会党团的委托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至于福尔马尔后来在巴黎听到的

---

① 我们不得不也纠正福尔马尔关于事实真相的这个论断。恩利科·费利在去年12月12日的一封信（考茨基把这封信转给了我们）中写道：

“我一如既往表示反对。我在曼图亚只是说，如果新的国王真正想走上改良的道路（我们的政治家在刺杀国王事件发生后，以及在妨碍议事进程的运动向他们证明了反动法律无能为力之后，曾一再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就必须选择有能力进行改良的人，而不是那些现在只是为了钻进政府而谈论改良的老反动分子（索尼诺之流）。

由于极左翼是由社会主义者、共和派和激进派组成的，因此我说，可能会把激进派召唤到政府中去（激进派的首领萨奇利议员公开承认君主政体）。相反，我经常说，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参加政府在意大利王国是不可能的，或是荒谬的。最近我在关于新国王的纲领的一次议会演说（12月3日）中重申了这一点。因此，从巴黎以来我丝毫没有改变我的观点。”——卢森堡注

② 《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00年9月23—27日）会议记录》1900年柏林德文版第17页，参看《米勒兰事件》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44—45页。决议的德文本与法文本略有出入。——编者注

来自“最熟悉情况的人士方面”的有趣内幕，无论如何国际代表大会是毫无所闻的。相反，整个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毫无例外地认为，米勒兰入阁是一种擅自采取的个人行动。甚至米勒兰的辩护者饶勒斯也证实这种看法，他恰恰再三把米勒兰擅自采取的行动用来作为社会主义者必须实行统一的论据。

由此可见，代表大会的多数在通过考茨基决议时即使没有点出米勒兰的名字，仍是用这个决议来表明，他们认为米勒兰入阁是削弱法国无产阶级和阻碍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由此可见，如果说福尔马尔事后对代表大会的表决作了有利于米勒兰的解释，那么，这只不过是那种人们熟悉的办法的新的样品罢了，按照这种办法，有的人自己赞成一个意味着他的观点失败的决议，事后却又能够把这个决议解释成他的胜利。

至于特别说到德国党——对于法国同志来说，说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发表在《小共和国报》上的国际征询<sup>①</sup>中，除福尔马尔之外，在德国进行活动的所有老的党的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尔和考茨基都表示反对米勒兰入阁。但是，到底谁表达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福尔马尔还是上面提到的四个人，福尔马尔只要回想一下他在策略上同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尔和考茨基相对立的那些实际事例及其结局，就可以很容易地确定这一点了。

## 二 “保卫共和国”政府

饶勒斯及其追随者为米勒兰入阁提出了三点理由：保卫共和

---

<sup>①</sup> 参看《米勒兰事件》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23—34页。——编者注

国的必要性；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良的可能性；最后是出于这样一个总观念：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将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实行政治统治，它的外部表现就是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

从时间上来说，首先提出来作为理由的是保卫共和国。

共和国在危急中！因此一位社会党人做资产阶级的商业部长是必要的。共和国在危急中！因此在马提尼克岛<sup>①</sup>和夏龙<sup>②</sup>的罢工工人遭到屠杀后，社会党人必须继续留在内阁里。共和国在危急中！因此必须拒绝对这次屠杀进行调查，必须放弃对殖民暴行进行议会追究，必须通过大赦令<sup>③</sup>。政府的一切行动，社会党人的每一次投票和表态，都要考虑到共和国受到威胁以及保卫共和国。现在该是摆脱日常斗争的表面的热闹及其口号的干扰的时候了，要对形势进行分析，特别是要仔细考虑这样的问题：这种危险和这种保卫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美利坚合众国，尽管有着最激烈的内部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我们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东西威胁到那里的共和政体的存在。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因为美国的共和国联盟是和独立同时获得的，它作为自由的国家决不可能以君主制的形式实行统治。与此相反，在法国出现对共和制命运的担忧也是自然的，因为共和制已经是两次通过战斗建立起来，又两次在经过短暂的时间之后重新被君主制消灭了。因此在法国，过去的时代对现在投下了阴影，在两者

---

① 1900年2月，在马提尼克岛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了因反对削减工资而罢工的农业工人。结果九名罢工者被杀，十四名罢工者受伤。——编者注

② 1900年6月，在索恩河畔夏龙的一次罢工中，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了罢工者，结果三名工人被杀，其他许多工人受伤。——编者注

③ 1900年12月19日，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大赦令，根据这项法令，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撤销了最近几年的所有政治判决。此外，凡是同德雷福斯案件有关的一切犯罪行为都被一笔勾销。——编者注

之间存在的历史发展的距离被掩盖起来了。

尽管两次拿破仑政变——雾月十八日政变和十二月二日政变——被许多表面上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它们决不是突如其来爆发的。无论第一帝国还是第二帝国都首先是在此之前发生的革命的直接结果，都是革命波浪的倒退运动的最后静止点，这种倒退运动在这两种场合下都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的两个强大的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农民造成的。

在前一场合，由于革命的急风暴雨越出了资产阶级为它所确定的目标——建立资产阶级的法治国家，并且威胁到这个法治国家的基础本身，资产阶级就想中止革命，使它退回到起点，从而扼杀革命。此外，农民突然得到了解放并且获得了地产，它既害怕进一步的革新又担心恢复旧制度，于是寻求建立一个对革命和正统君主制持同样敌对态度的政府，以便使自己获得的成果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自己的短暂的统治期间摧毁了小资产阶级并且把它推到反动派的怀抱中去，但是同时表明，工人阶级自身还没有切实可行的独立的行动纲领，它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弄得精疲力尽。最后，形成了一个与之对立的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的联盟，它把一切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撇在一边，首先把发展一支对外的集中的强大力量看作是必不可少的。

在后一场合，站在前列的是资产阶级，它和大地主一样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风暴感到惊恐万状，起先依靠小资产阶级的帮助在六月大屠杀中镇压了无产阶级，然后，为了打倒小资产阶级，逐步地加强了政府的权力方面削弱议会的权力，终于以这种方式自投罗网，它采取比一贯的保皇党人更加温顺的态度，对波拿巴王朝提不出任何指责，只是指责它不是奥尔良王朝或波旁王朝。此外，从第一帝国以来忠于拿破仑传统的农民必然把第二帝国看作是借助于强有力的士兵之手使可憎的、城市里的捣乱分子俯首听

命的手段,但是农民自己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因此,政变的图式尽管同革命发展过程的图式是相反的,在这两种场合却是相同的。在前一场合,如同在后一场合一样,一方面存在着同君主制相联系的大的社会阶级的实际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真正的共和主义成分即工人阶级预先注定缺乏行动能力。最后,在这两种场合君主制在终身执政官或全民投票产生的总统职位中找到了现成的基础,反革命过程已经把军事首领和政府首脑的绝对权力的全部标志都赋予这些职位。因此,每一次在政变中得到表现的,是在共和国的内部作为反革命的成果早已成熟了的东西,它并没有创造新的状况,只是确认这一状况并赋予它名称。

在德雷福斯危机时法国的状况则完全不同。有些人认为,不驯服的将军或民族主义者的骚乱是以前两次政变为榜样的第三次政变的预兆,他们忽略了从最近三十年来法国整个社会发展作出结论。在这一期间,在法国社会内部恰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结果总的说来可以概括如下:在前两种场合,当共和国还未能清除革命的渣滓时就被扼杀了;现在则共和国第一次有可能相当长久地继续存在下去,进入一个正常的生存阶段,并且向资产阶级社会表明,共和制能够比世界上任何君主制更出色地为它的利益服务。

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第一次在第三共和国里获得了完全的政治统治,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它通过几乎是连续的机会主义派的内阁和议会多数实行这种统治。法国的殖民政策和军国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巨额的国债表明,共和国在这些有利可图的行当中可以同任何君主国相竞争。巴拿马丑闻和南方铁路公司丑闻<sup>①</sup>终于证明,共和国的议会和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同奥尔良王朝的政治机关一样方便地用来作为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工具。

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第三共和国是良好的温床,它通过国债

制度以及不断发展的官僚机构造成了一支庞大的国家小食利者和小官吏的队伍，这些人把自己的整个生存寄托在共和国的平安无事的存在之上。

但是即使对于自己的古老的和最顽固的敌人——地主，共和国的幸福女神也给予慷慨的赠与，而大地主得到的利益多于小地主。

如果说一部分农民在第二次拿破仑政变时期就已经相当进步，通过一系列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的起义对君主主义表示了不信任，那么，现在它得到充分的机会在更大程度上修正自己对于共和国的看法。在最近二十年间实行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大多数措施恰恰是有利于富裕农民的，这些农民过去是波拿巴主义的老的支柱。土地的赋税从1897年以来减少了两千五百万法郎，大地主的赋税负担总的说来从1851年以来绝对地降低了将近六分之一，虽然他们的纯收入大大增加了！保护关税制度，尤其是对牲畜和谷物的保护关税，首先是以使大地主发财致富为目的的。此外，还花费了几亿法郎来改良耕地，建筑郊区的道路，进一步降低农产品的运费和奖励制糖业，等等。

最后，几乎完全停止实行有效的社会改良，并且把国家收入的整个重心转到间接税，从1869年到1897年从关税得到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三，从烟草专卖得到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从酒类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而人口却几乎处于停滞不变的状态！这一切证明，第三共和国向一切有产阶级提供了非

---

① 1888年底，法国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破产和无数企业倒闭。1892年发现，该公司曾广泛收买和贿赂大批身居要职的官员和报刊。

1895年1月和10月，由于发现设在马赛南方铁路公司的财务上有重大的不轨行为，导致了一场内阁危机。这家公司滥用政府给予的建筑铁路线的特许权来谋取巨额的利润。——编者注



常明显的物质利益，而把负担最沉重地压在唯一的不占有财产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身上。

除了这些之外，还可以补充一点。如同在对内政策方面一样，共和国在对外政策方面也非常出色地提供了自己的适应能力的证据。它通过同沙皇俄国的联盟把欧洲反动派的首领和自己的宿敌变成了友好的保护人和同盟者。

因此，最近这三十年在这个国家里并没有白白过去。第三共和国发展了自己的社会内容。对于法国来说，它从革命变革的可怕幽灵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正常存在形式。

现在，作为共和国后盾的，有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即“饱食者”，有广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共和国解除了自己的从前的主要敌人的疑虑），有农民（共和国对于农民来说就象是一位体贴入微的母亲）。尽管共和国对待工人阶级就象对待弃儿一样，工人阶级对它仍保持过去的信任。但是工人阶级现在也完全不同于第一次政变和第二次政变时期了。现在法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得到了教育，受到了训练，并且组织了起来，虽然分裂成一些派别。它的党在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将近一百万张选票。它成了共和国的一个坚定的、令人尊敬的保卫者。

很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中，君主主义的作用缩小了，已经完全不同它过去曾经起过的作用。在日常政治斗争的口号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于把德雷福斯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营垒看作是政变的总部，正如习惯于把每一个反动派（梅利纳、巴尔图或利鲍<sup>①</sup>之流）

---

① 茹尔·梅利纳(1838—1925)——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96—1893年任法国总理，保护关税主义者；

路易·巴尔图(1862—1934)——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从1894年起屡次担任部长，1934年在马赛被刺；

亚历山大·利鲍(1842—1923)——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曾任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编者注

立即看作是君主主义者一样。如果对它作进一步的平心静气的考察，那么，这个民族主义营垒并不是一个同类政治性质的内部一致的整体。恰恰相反，这个营垒不如说是一个由具有各种不同的企图和利益的形形色色分子组成的大杂烩。

我们看到，在这个营垒里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声名狼藉的高级军官、总参谋部及其追随者。他们虽然由于担心共和主义的行政当局的追究而很自然地起来反对这个当局，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对于恢复君主制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兴趣。相反，只有第三共和国通过形形色色的改革和特权以及通过狂热的沙文主义崇拜才使军队成为以前从未成为的偶像。德雷福斯案件最清楚地表明，高级军官在共和国里过着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说真正天堂般的生活。人们可以冷静地说，在机会主义派的共和国的卵翼下得到发展的军事长官的为所欲为和专横暴戾，在君主制度下并不是那么轻易地可能发生的。因此，高级军官本身不可能真正渴望受到君主制的严格控制。他们之所以采取反共和主义立场，在这里仅仅是作为被共和国抓住或揭穿了骗子手的一种合乎自然的自卫手段。

其次，我们还看到在这个营垒里有教士。他们虽然在共和国里始终保持警惕，并且等待时机，以便扼杀它，他们无疑对于公众的舆论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自己缺乏行动的能力，只有借助于他人进行活动，只能作导演和提词员，而不能作演员。

再次，我们看到在法国这个小手工业和犹太财团的国家里很自然地得到很大发展的反犹太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它容易接受反“德雷福斯派”的煽动和任何一种反动潮流，为民族主义蛊惑宣传提供了最良好的土壤，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需要热中于凯撒主义的政变而且事实上并不热中于这样的政变。

最后，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真正的君主主义者：法国落后地区的

农民的代表；贵族，他们在平静时期由于事物的发展过程在第三共和国里不得不大部分作为归附者与之缔结公开的和约或者至少沉默地对时局表示顺从，而现在，由于受到危机的骚乱的鼓舞，他们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后面跟着他们的追随者——保皇主义的仆从、记者和作家。

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软弱无力的分子立即同教士携起手来，团结在处于窘境的将军们周围，以便把他们作为攻城槌推到前边并利用这次危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情况同声名狼藉的总参谋部的反叛立场结合在一起使整个营垒势必带上一种凯撒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从外而带入的君主主义倾向没有任何物质基础。不仅在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中不存在一个朝着这个方面的重大的运动，而且也不存在一个表而上的中心，一个不管怎样可以认真加以考虑的王位觊觎者，其中之一是俄国军队的一名中校，他居住在沙皇俄国的一个外省城市里，过着默默无闻的守卫部队的的生活，只能举出色当和梅斯，而不是奥斯特利茨和耶拿作为自己唯一的合法证书。另一位王位觊觎者是一个在国外到处游荡的无足轻重的人，他的拥护者是几百个陈腐的男人和妇女，他的全部“鼓动”只限于举行一年一度的宴会，正如最近又一次举行的那样，他们在这些宴会上发表传统的演讲，把希望寄托在“发展的进程”上。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的行动必然仅限于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反犹太主义的猖獗，以及前所未有的对军队的颂扬。要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要推翻共和制则差不多一切都不具备：内部的团结一致，组织，行动纲领，以及最主要的是社会关系的总的内部发展。而在以前的情况下，君主制已经象成熟的果实那样在社会关系内部发育起来，只要通过政变就可以诞生。德雷福斯案件能够把上述全部因素都发动起来，为一次君主主义的鼓动准备基础，为实行一次政变提供机会，但是它无法代替政变的真正动力，这样的

动力并不存在。君主主义在这个场合部分地只是危机的外表，而不是危机的内容。

引起危机的完全是另外的原因。第三共和国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完善形式，但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内部矛盾。这些基本矛盾之一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议会统治基础上的共和国和一支庞大的同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相适应的常备军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强大的君主国里，军队很自然地降为行政权力机关手中的驯服工具；在一个议会制的国家里，中央政府是由文职人员组成的，经常在变动，国家首脑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不管是“资产阶级混蛋”、过去的皮匠或能言善辩的律师都有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因此很自然，军队有成为一支独立的、同国家整体只有松散联系的力量倾向。

法国的社会发展促使资产阶级追求利益的政策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使法国分裂成各个集团，这些集团缺乏对整体的责任感，把政府和议会当作玩具，以谋取它们的私利。另一方面，这一发展导致军队的独立，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变为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准备不顾、违背、甚至反对共和国的利益而保卫它们自身的利益。

只有使军队溶化在国民社会之中并且把国民社会组织成为军队，把武装力量从征服和殖民统治的工具改造成民族自卫的工具，简言之，**用民军来代替常备军**，才能解决议会制共和国和常备军之间的矛盾。当还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内部矛盾就表现为周期性的危机，表现为共和国同自己的军队的冲突，在这些危机和冲突中，军队独立的明显结果——它的腐败和缺乏纪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威尔逊丑闻<sup>①</sup>、巴拿马丑闻和南方铁路公司丑闻在德雷福斯

<sup>①</sup> 1887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茹尔·格雷维的女婿众议员威尔逊出卖荣誉军团勋章的不法行为被揭露后，格雷维不得不辞职。——编者注

案件中必然得到类似的表现。

因此，高级军官的反抗是由于他们企图保持自己对于共和国行政当局的独立性，而不是想在一个君主国里完全丧失这种独立性。

从上述情况很自然地产生了这场所谓的君主主义行动的滑稽可笑的性质。报刊上展开着猛烈的笔战；反犹太主义的无赖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嚣；在民族主义报刊的编辑部前举行集会并呼喊表示赞同的口号；德雷福斯派的报纸编辑部的玻璃窗被打得粉碎；对不介入的过路人纠缠不清；在沙勃洛尔街出现了臭名昭彰的盖兰工事<sup>①</sup>，最后，在赛马时一批纨绔子弟殴打了总统<sup>②</sup>，但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气氛中，却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政治行动来实行政变。这场骚乱的顶点是这样一个大历史时刻，那时，神经有点错乱的小丑戴鲁累德抓住了正带领自己的士兵回兵营去的罗日将军的马缰，以便摆出引人注目的姿态向爱丽舍宫的总统府进军<sup>③</sup>，而丝毫没有考虑，罗日在爱丽舍宫应做些什么事情，从整个这场冒险中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穿军装的骗子终究比穿便服的小丑更狡猾一些，他用剑对戴鲁累德的手指一击，这就是对这位反犹太主义首领的“友好姿态”的回答。君主主义政变的唯一的一次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 
- ① 在开始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后，1899年3月12日，拘留了一些反对重审的人。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反犹太主义的头目盖兰在巴黎沙勃洛尔街的一座房子里构筑工事拒捕。他声称如果强行冲入房子就要放火。于是政府包围了这座房子，用饥饿迫使他投降。1899年9月19日，盖兰不得不停止抵抗。1900年1月4日，他被法院判处十年徒刑。——编者注
- ② 1899年6月1日，在巴黎附近的奥特伊尔，一些保皇派为了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表示抗议殴打了法国总统。——编者注
- ③ 法国沙文主义的首领沙尔·戴鲁累德在1899年2月23日由于德雷福斯案件公开要求罗日将军实行军事政变。戴鲁累德遭到逮捕，1900年1月4日被判处驱逐出国十年。——编者注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实际情况明显地不同于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这里同通常一样，共和国的命运不是取决于个别的“救世主”，更不是取决于当部长的人，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的整个内在联系。在繁杂的日常斗争中，要研究现象的社会背景是很困难的，对于参加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很自然对事件和事情作出夸大的估计，在法国发生政变的危险可能被看得很严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显然，那时最紧迫的是共和派在议会里，尤其在议会外采取坚决的行动，以便遏制民族主义暴徒和总参谋部分子。

但是现在，在危机结束后，再来重复日常斗争的这种看法，当真把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特别是米勒兰当作法兰西共和国的真正“拯救者”而加以欢迎，那就是庸俗历史主义的表现。这种庸俗历史主义同庸俗经济学是一样的货色，它把发生的事情看作是部长们和其他历史“领袖”的产物，就象从政治生活的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而不是按照其真正的内在联系来加以理解。对于米勒兰的拯救共和国，要如同对于来自戴鲁累德和盖兰的君主主义危险一样认真地对待。

事实上，如果保卫共和国取决于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行动，那么，共和国早就要垮台了。君主主义政变的闹剧同保卫共和国的闹剧是相适应的。

很少有一个政府比较严重的时刻上台，也很少有人把比较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政府身上。如果说君主主义危险在更大程度上是用来吓唬人的幽灵而不是实际的危险，那么，比那种虚构的危险更严重的是威胁着法国的实际危险，这就是：共和国在同无政府分子、反叛的军事首领以及煽动叛乱的教士们的游击战中可能表现出软弱无力，从而在将来不可避免地重复类似的危机。

整个文明世界都注视着法国。问题在于证明共和国作为一种有秩序的国家制度的生命力。问题在于表明，资产阶级法国还有足够的力量，能够自己排除它所产生的腐败因素，使之不能为害。

要采取的措施是由形势本身决定的。如果军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并且起来反对共和国的机体，那就要彻底铲除它的独立性，并且通过废除军事审判权以及缩短服役期间使军队接近国民社会。如果教士们支持军人的叛乱倾向，唆使他们反对共和国，那么，就必须通过解散宗教团体，没收其财产，使学校同教会分离，教会同国家分离，来消灭教士的势力。

最重要的是，如果军队里的腐败现象，对无辜者作出骇人听闻的错误判决以及由此而来的无尽无休的谎言、捏造、伪誓和其他犯罪活动完全动摇了法国在国内外的威望，那么，就必须通过惩罚有罪者以儆效尤，为无辜被判罪者平反，彻底整顿共和国的司法，以便重新获得尊敬和威信。

这届内阁已经执政十九个月，它比命中注定只有九个月的法国政府的平均寿命超过了两倍。这届内阁有哪些成绩？它做了哪些事情？

如果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手段和目标、任务和行动、事先所作的广告和后来的演出之间的明显矛盾，那么，在人们对瓦尔德克-卢梭的期望和他的实际行动之间恰恰存在着这样的矛盾。

关于军事司法的全部改革，迄今为止只得到国防部长的一个**许诺**：在军事法庭的程序中实施“减轻罪刑的情节”。关于军队的全部“民主化”，只有关于创办由军官阅读的报纸的一个命令。社会主义者帕斯特尔在去年12月27日的议会会议上建议实行两年制的服役期，安得列将军<sup>①</sup>回答说，他作为保卫共和国内阁的激进

---

<sup>①</sup> 路易·安得列(1838—1913)——法国将军，曾任国防部长。——编者注

党人部长，不能对于这种在半专制主义的德国实行的改革表示态度。社会主义者德让特在同一次会议上要求把教士从军事学校里清除出去，用非宗教人员代替军事医院中的神职人员；废除军队的宗教开支。本应使军队非宗教化的保卫共和国内阁的部长在回答时坚决**拒绝**这一提案，并且在民族主义分子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对军队中的神职人员大加赞扬。社会主义者在议会里（1900年2月）揭露了军队中一系列明显的滥用职权的行为。政府却拒绝对此作任何议会调查。激进党人维涅·多克通在议会里（去年12月7日会议）揭露了法国军人在殖民地、在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的恐怖统治。政府却拒绝进行议会调查，认为这种调查是“危险的和没有意义的”。在这之后，国防部长登上议会的讲台，讲述了他是如何英勇地保卫一位龙骑兵军官的，这位军官遭到他的同僚的抵制，因为他娶了一位离过婚的女人。

接着同教士这条巨龙进行了伟大的斗争。同神父的战争象红线一样贯穿着上一世纪法国的历史。仅仅第三共和国就提出了三十三个反教会法案。迄今为止的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因为这些措施不涉及整个教会，而只涉及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团，即使对于这些教团，也并不完全禁止，而只是想通过法律的批准使之服从国家。尽管有这些法律条文，宗教团体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把自己的成员增加到二十万人，把自己的财产扩大三倍。现在再来看一下“保卫共和国政府”的彻底铲除教会的独立性：瓦尔德克-卢梭的法案同过去一样仅仅反对没有经过批准的教团，为了限制它们，制定了一个法规，其中把教团同民众协会混为一谈，可以根据未来的部长的善意利用这个法规反对教士，也可以根据未来的部长的恶意利用这个法规反对社会主义者。共和国同从前一样要负担拥有将近四亿法郎财产的得到批准的教团、由国家给予津贴的俗间教士及其八十七位主教、八十七所神学院、四万二千个神父



以及将近四千万法郎的宗教预算。教士的主要力量在于他们对教育的影响，两百万法国儿童现在在教会学校里受到毒害并且被教育成反对共和国的人。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禁止未经批准的教团办的学校。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教会学校恰好掌握在得到批准的教团手中，通过激进的改革，在将近两百万儿童中，总共只有一万五千名儿童脱离了教会的影响。政府对教会的投降是以瓦尔德克-卢梭对教皇表示敬意的一篇演说开始的，并得到民族主义者的信任投票而确定下来。

最后，这届内阁的保卫共和国的顶峰是去年12月的大赦令。在两年里，法国为了要求真理、光明和正义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两年以来，对无辜者的错误判决没有得到平反这件坏事使它的良心不安。社会在充满谎言、伪誓和捏造的气氛中几乎被窒息了。

保卫共和国政府终于来到了。全世界都屏息注视。“伟大的正义的太阳”就要升起。

它升起来了。12月19日政府要求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它根据这一法令保证所有罪犯不再受到惩罚，拒绝给予所有的受害者法律上的赔罪，把刚刚开始的全部审讯停了下来。那些昨天还被说成是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的人，今天被看作回头的浪子而亲切地拥抱在怀里。为了保卫共和国，赦免了所有攻击共和国的人；为了恢复共和国司法的名誉，拒绝为错误判决的受害者平反。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依然如故。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893年利鲍内阁中负有了结巴拿马丑闻的使命，曾宣布由于共和国处于危急中，所有被控告的议员不受法律追究，从而使整个案件毫无结果。瓦尔德克-卢梭这位德雷福斯案件的法定代表为了制止君主主义危险，使这一案件遭到了彻底失败。办法仍旧是一样的：

“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象吹胀

了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sup>①</sup>

即使不从社会主义的观点，不从一个多多少少有生命力的激进党的观点，而从八十年代的机会主义派（甘必大、茹尔·费里、孔斯坦、蒂拉尔<sup>②</sup>）的共和主义措施的观点来看，这种行动也是滑稽可笑的、微不足道的。为了实行这样的行动，难道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在政府中有工人阶级全部力量的代表是必不可少的？

机会主义者甘必大及其温和的共和派在 1879 年曾要求把所有的君主主义者从国家机关中赶走，从而把麦克马洪<sup>③</sup>赶下了总统的宝座，1880 年这些“正直的”共和派实现了驱逐耶稣会教徒，实行了免费的、义务的教育。机会主义者茹尔·费里在 1883 年通过法庭改革撤消了六百名君主主义法官的职务，并且通过离婚法给予教士沉重的打击。机会主义者孔斯坦和蒂拉尔为了使布朗热主义失去基础，把兵役期从五年缩短到三年。

**激进派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落后于机会主义的所有这些最温和的共和主义措施，它在施展了一系列花招之后在十九个月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没有对军事司法进行丝毫改革，也丝毫没有缩短服兵役的期限，没有采取任何坚决措施反对军队、司法和行政部门中的君主主义者，没有作出任何有重大效果的反对教会的步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34 页。——编者注

② 莱昂·甘必大(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1870—1871 年任国防政府成员，1880—1882 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茹尔·费里(1832—1893)——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曾任外交部长、总理，积极推行殖民主义政策；

让·安都昂·厄内斯特·孔斯坦(1833—1913)——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曾任内政部长；

比埃尔·艾曼努埃尔·蒂拉尔(1837—1893)——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曾任工商部长、财政部长和总理。——编者注

③ 莫里斯·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波拿巴主义者，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曾任总统。——编者注

它总是摆出一副无所畏惧、不屈不挠、坚定不移的姿态，这种典型的小资产者姿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终于在长久的支吾搪塞之后宣称，共和国没有能力对付这一帮军事恶棍，因此不得不听其自流。既然如此，为什么必须让一个社会党人参加内阁呢？！

有人说，米勒兰本人对于组成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不这样这一内阁就有可能根本无法成立。大家知道，法国并非苦于缺乏想当部长的人，既然瓦尔德克-卢梭在反叛的军队里找到了两位适合当国防部长的将军，那么，他在自己的党内肯定有半打人可以当商业部长。但是当人们了解到这届内阁的所作所为后，就必然会说：瓦尔德克-卢梭可以放心地让任何一个激进党人当自己的内阁成员，保卫共和国行动的**这个畸形儿**决不会因此而变得更糟糕。到目前为止激进党人十分懂得，仅仅靠他们自己而没有外人的帮助，就会使他们声誉扫地。

我们已经看到，在德雷福斯危机过程中人们以为觉察到的君主主义危险，毋宁说是一种幽灵，而不是现实。这充分说明，瓦尔德克-米勒兰的“保卫”并没有使共和国受到政变的威胁。但是，有些人现在仍旧同两年前一样相信存在君主主义危险，并且同从前一样用这种危险来为米勒兰的行为辩护，这些人是在玩弄一种危险的游戏。他们把形势描绘得越是严重，这一内阁的行动就越是显得微不足道，社会主义者在这一内阁中的作用就越是成问题。

既然正如我们试图证明的那样，君主主义危险是很小的，那么，大吹大擂并以失败告终的政府的拯救行动就是一种滑稽可笑的事。与此相反，如果这一危险是巨大的、严重的，那么，这一内阁的虚假行动就是对共和国以及给它以信任的各政党的**背叛**。

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阶级通过米勒兰入阁所得到的并不是饶勒斯及其朋友们那么骄傲地要求的“*large part de responsabilités*”，即广泛地分担共和国的责任，而是分担小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的明显的“共和主义的”当众出丑。

### 三 饶勒斯的策略和激进主义

在人们对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保卫共和国行动的希望和它的实际成果之间的矛盾，使支持米勒兰入阁的那个法国社会主义派别面临着一个抉择。它必须或者表示自己的失望，承认米勒兰入阁徒劳无益并且要求他退出政府，或者对内阁的政策表示满意，声明这一政策实现了它的希望，从而同政府的逐渐化为乌有的行动相适应，越来越降低这些希望或要求。饶勒斯及其朋友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当这一内阁回避主要问题而只停留在暂时的小冲突的阶段时（这一阶段持续了整整十八个月），它的政策所采取的方针以及社会主义者对此的态度还处于捉摸不定的状态。但是，大赦令这第一个坚决步骤立即使形势明朗起来。

正是对于饶勒斯派来说，结束德雷福斯案件必然有决定性的意义。两年来，他们的全部策略都押在这张牌上。在这两年中，围绕德雷福斯的斗争是他们整个政策的轴心。这场斗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战斗之一，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之一”（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899年8月12日），是工人阶级最崇高的使命，“最恶劣地放弃、侮辱、甚至否定无产阶级的伟大阶级任务”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小共和国报》1899年7月15日）“揭露全部事实真相！”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困难、民族主义者的伎俩以及盖得和瓦扬领导的另一个社会主义派别的抗议，都不能使饶勒斯及其朋友们半途停顿下来。饶勒斯怀着崇高的自豪心情说：“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如果雷恩的法官们受到反动派的卑劣伎俩的蒙骗，再一次牺牲无辜者，以便拯

救犯罪的军事首领，那么，明天我们将不顾关于开除的宣言<sup>①</sup>，不顾被误认为是对阶级斗争的伪造、缩小和歪曲，不顾任何危险，再一次起来向将军们和法官们高呼：你们是屠夫和罪犯！”（《小共和国报》1899年7月15日）

在雷恩审判时，饶勒斯怀着兴高采烈的胜利信心喊道：“正义即将得到申张！解放受害者、惩罚犯罪者的时刻即将来临！”（《小共和国报》1899年8月13日）

早在去年11月，在大赦令颁布前不久，他在利尔说：“至于我，我愿意继续下去，坚持下去直到那个狠毒的野兽被迫吐出它的毒液时为止。是的，必须追究一切伪造证件的人、一切撒谎的人、一切屠夫、一切叛徒；必须用真理之剑的锋芒逼迫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他们罪行的可耻。”<sup>②</sup>（《两种方法》1900年利尔，第5页）

饶勒斯是对的。德雷福斯案件唤起了法国一切潜在的反动势力。工人阶级的老的敌人军国主义遭到了揭露，问题在于把一切矛头对准它的胸膛。工人阶级第一次负有进行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的使命。饶勒斯及其朋友们引导工人阶级投入了斗争，从而在法国社会主义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因此，当在议会中提出大赦法令时，右翼社会党人突然处于不得不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境地。很清楚，首先有责任结束德雷福斯案件的政府并没有揭露“全部事实真相”并且迫使军事恶棍屈服，而是力图掩盖事实真相并且自己跪倒在这帮恶棍之前。从饶勒斯及其朋友们的观点来看，这是对他们寄于政府的希望的背叛。这一内阁证明自己是社会主义政策和保卫共和国的没有用处的工具，工具翻转过来反对师傅。如果饶勒斯派想要忠于自己在德雷

<sup>①</sup> 指1899年7月发表的《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宣言》。——编者注

<sup>②</sup> 《米勒兰事件》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98—99页。——编者注

福斯运动中的立场和保卫共和国的使命，那么他们必须立即倒转枪口并且设法使用一切手段挫败大赦法令。政府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牌，必须阻止它的赌博。

但是，关于大赦法案的决定同时也成了对于内阁是否存在下去的决定。由于民族主义者宣布反对大赦，内阁提出了信任问题，因此很容易形成反对这一提案的多数并导致内阁垮台。

于是饶勒斯及其朋友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不是放弃实现他们两年来的德雷福斯运动的目标，就是放弃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不是放弃“揭露全部事实真相”，就是放弃部长的职位；不是放弃保卫共和国，就是放弃米勒兰。天平仅仅动摇了几分钟。瓦尔德克-米勒兰比德雷福斯更重一些，内阁的最后通牒达到了关于开除的宣言无法达到的结果：饶勒斯及其集团为了拯救政府，放弃了他们的德雷福斯运动并且声明赞成大赦。

事情已成定局。随着大赦法令的通过，右翼社会党人不是把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是把使政府继续执政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关于大赦法令的表决是他们的德雷福斯运动的滑铁卢<sup>①</sup>；在一瞬间饶勒斯把他在两年的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

在放弃了自己政治上的主要赌注之后，饶勒斯的策略轻而易举地、非常迅速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首先，为了拯救政府，他们违心地、十分内疚地放弃了最珍贵的东西，即两年来大规模斗争的目标：“揭露全部事实真相”。但是，为了替自己依附于一个政治上失败的政府的行为辩护，他们不得不否认这个政府的失败。因此，下一步就是替政府的投降行为辩护。

他们平息了德雷福斯案件，而不是把它进行到底，难道不是

---

① 滑铁卢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南，1815年拿破仑一世在这里遭到惨败。——编者注

吗？但是，“为了结束目前毫无意义的和索然无味的诉讼案，为了使公众不致感到厌倦，这样做是必要的。公众不久就会对事实真相本身不加理会”。（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900年12月18日）

虽然两年前，他曾要求“法国所有的正直和诚实的人”起来呼喊：“我坚信，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无辜者必将得到平反，罪犯必将受到惩罚。”（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899年8月9日）

但是现在，“所有这些法庭诉讼程序会成为一种滑稽可笑的事。它只会把国家弄得疲惫不堪，而没有使事情得到澄清，甚至会损害我们想要为之服务的事业。”“对德雷福斯案件的真正惩罚”现在就在于“共和派的共同事业”。（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900年12月18日）

再向前一步，过去的德雷福斯运动的英雄们表现得就象是人们无法很快摆脱的、令人腻烦的幽灵。

左拉<sup>①</sup>，这位“伟大的正义主持者”，“法国和人类的骄傲”，曾发表《我控诉！》的人，对大赦表示抗议。他一如既往要求“揭露全部事实真相”，他再一次起来控诉。这是多么盲目！饶勒斯喊道，难道他看不到已经“很光明”，足以使一切鬼怪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尽管他在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遭到了失败，但是由于“伟大的法官，整个人类”在赞扬他，他可以聊以自慰了。但愿从今以后他和他的名垂千古的《我控诉！》不再来打扰我们。“不要再控诉，不要再作无谓的重复！”（《小共和国报》1900年12月24日）“共和派的共同事业”是主要事情。

被称作“法国军队的光荣和瑰宝”、“真理和正义的真诚骑士”

---

<sup>①</sup> 埃米尔·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曾在《震旦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揭露了法国总参谋部的卑鄙阴谋。——编者注

的勇敢无畏的皮卡尔<sup>①</sup>认为拟议中的恢复他的军职以及大赦是一种侮辱，他拒绝接受。这是何等傲慢！政府准备恢复他的军职难道不就是向他表示“最明显的道歉”吗？当然，对于皮卡尔来说，问题在于从法律上确认真理，但是皮卡尔朋友不应忘记，真理不仅涉及皮卡尔上校一个人，而且涉及“全人类”，而在整个人类中，皮卡尔的事情只起极小的作用。“实际上，在我们对正义的迫切要求中，我们不能只局限于个人的事情。”（惹罗-里夏尔<sup>②</sup>，《小共和国报》1900年12月30日）“共和派的共同事业”是主要事情。

德雷福斯，这个“令人心碎的人类痛苦的标本”和“处于极端不幸和失望中的人类本身的体现者”（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898年8月10日），失望地反对赦免，赦免使他失去平反的最后希望。这是多么不知足！迫害他的人难道不是也吃够了苦头？埃斯特哈济<sup>③</sup>“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地”在伦敦的街头踟蹰，布瓦代弗尔<sup>④</sup>“不得不离开”总参谋部，贡瑟<sup>⑤</sup>被解除了职务，走起路来“垂头丧气”，佩利厄<sup>⑥</sup>“落魄而死”，昂利<sup>⑦</sup>“不得不割断自己的喉咙”，迪帕蒂·

---

① 皮卡尔上校——曾任法国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1896年，他发现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的是埃斯特哈济，而不是德雷福斯。他把这一情况向他的上司贡瑟将军作了报告，后者命令他不许声张并撤去他情报局长的职务。后来皮卡尔向报纸透露了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从而受到军事当局的迫害。——编者注

② 阿尔弗勒德·莱昂·惹罗-里夏尔（1860—1911）——法国右翼社会党人，拥护米勒兰入阁。——编者注

③ 埃斯特哈济——加入法国籍的匈牙利人，曾在法国总参谋部供职，曾把秘密军事文件出卖给德国驻巴黎武官。——编者注

④ 拉乌尔·弗朗索瓦·沙尔·布瓦代弗尔（1839—1919）——法国将军，1894年起任法国总参谋长，1898年被迫辞职。——编者注

⑤ 贡瑟——法国将军，曾任法国副总参谋长，反犹太主义者。——编者注

⑥ 佩利厄——法国将军，反犹太主义者。——编者注

⑦ 昂利——曾任法国总参谋部情报局负责人。1898年8月30日他供认，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主要证据是他伪造的。次日发现他死在狱中，官方宣布他是自杀的。——编者注



德·克拉姆<sup>①</sup>“已退职”，还要再怎样呢？罪犯们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不就是对他们的充分的惩罚吗？如果德雷福斯不满足于这样的命运的安排，而是一定要通过人类法庭作出惩处，那就耐心等着吧！“将来总有一天那些无耻之徒会遭到惩罚。”（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901年1月5日）将来总有一天！但是现在，善良的德雷福斯必须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比他的“毫无意义的和索然无味的诉讼案”更重要的问题。（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901年1月5日）“我们可以从德雷福斯案件中得到比这种骚动和报复行为更好的东西。”（惹罗一里夏尔，《小共和国报》1900年12月15日）“共和派的共同事业”是主要事情。

再向前一步，对政府政策（为了这种政策而牺牲了德雷福斯运动）的批评也就成了同“保卫共和国”政府玩的一场无聊的游戏。

在饶勒斯自己的阵营里，对于内阁争取“军队民主化”和“共和国世俗化”的行动逐渐发出了清醒的声音。这是何等的轻率！“不断地、焦躁不安地（在十八个月之后。——罗·卢·）诋毁共同合作所取得的最初的成果”是多么危险！“为什么要使无产阶级丧失自信呢？”（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901年1月5日）政府提出的关于宗教团体的法案难道是对教会的投降吗？只有“门外汉和技术高超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论断。实际上这个提案是“在教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最伟大的战斗，这一战斗是从关于学校世俗化的法令开始打响的”。（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901年1月12日）

总的说来，尽管政府遭到一个又一个失败，“未来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难道不可以以此安慰自己吗？（《小共和国报》1月5日）问题不在于个别的法令，“共和派的共同事业”是主要事情。

但是，在一切都延期之后，“共和派的共同事业”是什么呢？它

---

<sup>①</sup> 迪帕蒂·德·克拉姆——法国反犹太主义者，曾负责调查德雷福斯案件，力图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编者注

不再是结束德雷福斯案件，不再是改组军队，不再是使教会屈服。一旦政府面临垮台的危险，就会放弃一切，只要政府就任何一项措施提出信任问题，就可以使饶勒斯及其朋友们俯首听命。过去要求通过保卫政府的行动来拯救共和国，现在要求通过放弃保卫共和国来拯救政府。现在“共和派的共同事业”就是把所有的共和派力量集合起来支持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继续掌权。

当然，饶勒斯集团对现政府的政策的立场一方面同他们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立场截然相反，另一方面它只是后者的直接继续。正是同样的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的原则，在两年前成了社会党人争取彻底解决德雷福斯案件的无情斗争的基础，现在这一原则使他们走到这样的地步，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背弃了自己的使命，也不再要求结束德雷福斯案件，并对军队以及共和国同教会的关系进行根本的改革。

这表明，在饶勒斯的策略中，社会党的独立政治意图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基本的因素，同激进派的联合是可变的、附带的因素。恰恰相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盟是经常的、牢固的因素，当时的政治意图则是由此产生的偶然的結果。早在德雷福斯运动中，饶勒斯派就不懂得在资产阶级营垒和无产阶级营垒之间划清界线。如果对于德雷福斯的资产阶级朋友来说问题仅仅在于制止军国主义的暴虐行为，消除军队中的营私舞弊现象并整顿军队，那么，社会主义者必须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罪恶的根源——常备军本身。如果对于激进派来说使德雷福斯得到平反和惩罚这一个别案件的罪犯是鼓动的中心点，那么，德雷福斯事件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仅仅是争取实行民军制的鼓动的突破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德雷福斯危机以及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作出的令人钦佩的牺牲才会在鼓动中对社会主义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本来是能够作出这样的贡献

的。但是实际上社会主义者营垒的鼓动就整体来说同资产阶级修正派<sup>①</sup>采取同样的路线，只有个别的言论比较深入地接触到这一案件的本质。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者尽管就自己运动的持久、消耗的力量和宏伟的规模来说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营垒，但是在政治上并不是更先进的、领导的部分，而是激进派的同路人和追随者。随着米勒兰加入激进派内阁，他们就同自己的资产阶级同盟者完全站在一起了。

社会主义政策同资产阶级政策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者作为整个现存制度的敌人必须在资产阶级议会中采取原则上的反对派立场。社会主义者的议会活动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对政府的政策进行系统的批判。原则上的反对派立场决不会使取得实际的、明显的成果变得不可能。相反，这种立场对于任何少数派政党来说，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取得实际成果的唯一有效的手段。

由于社会主义者没有可能使自己的政策得到议会多数派的直接批准，就必须通过不断的斗争从资产阶级多数派那里争得让步。他们通过自己站在反对派立场上进行的三种不同方式的批评来达到这一点：首先，他们提出最进步的要求，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危险的竞争者，并且借助于选民的压力推动这些政党前进；其次，他们向全国揭露政府并通过舆论来影响政府；最后，他们通过在议会内外进行的批评把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政府和资产阶级不得不加以考虑。

团结在饶勒斯周围的法国社会党人随着米勒兰入阁放弃了以上所有三种方式的批评。

首先，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可能对政府的政策进行毫无顾忌

---

<sup>①</sup> 指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人。——编者注

的批评。如果他们想抨击政府的政策软弱、不彻底和怯懦，那就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假如政府的共和行动遭到失败，那么立即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位社会党人在这个政府中起怎样的作用。因此，为了不致损害米勒兰入阁的声誉，饶勒斯及其朋友们不得不对凡是能够使工人群众认识政府的政策的缺点的一切都保持沉默。实际上自从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成立以来，社会党右翼的机关报《小共和国报》对政府活动的任何批评都消失了，进行这种批评的任何企图都立即被饶勒斯当作“神经过敏”、“悲观主义”和“夸大”而加以反对。因此，社会党人入阁的第一个结果是放弃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活动及其议会活动的最高任务：**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

其次，米勒兰的拥护者即使有时对政府的活动提出批评，也使这种活动失去任何实际意义。他们对大赦法案的立场表明，他们为了支持政府继续执政，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他们预先决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政府提出信任问题逼迫他们表态，他们就立即投票支持政府。由此可见，他们已经完全投降政府。

当然，在一个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者的行动不能象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那样自由，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社会主义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毫无顾忌地通过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派立场。与此相反，法国社会主义者考虑到“较小的祸害”常常不得不用自己的投票来防止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垮台。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议会制，投票成了社会主义者手中的锐利武器，他们可以把它当作达摩克利斯剑<sup>①</sup>悬挂在政府的头上，从而强调自己的批评和要求。由于饶勒斯及其朋友们通过米勒兰入阁而依赖于政府，他们就使政府不依赖于他们；由于他们放弃把内阁危

---

① 见本卷第137页注①。——编者注

机的幽灵作为迫使政府让步的手段，他们就反过来把内阁危机变成悬挂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政府可以把它作为随时迫使他们让步的手段。

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结社法的讨论是饶勒斯集团使自己所处的这种被锁链束缚住的普罗米修斯的处境的最突出的例子<sup>①</sup>。确实，饶勒斯的朋友维维安尼<sup>②</sup>在一次杰出的议会演说中抨击了政府关于宗教团体的提案，并且提出了真正解决这一任务的办法来与之对抗。但是在维维安尼演说后的第二天，饶勒斯在对这一演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的同时，代替政府作出了拒绝这一批评的回答<sup>③</sup>。他早在辩论开始之前，在对政府的提案提出修改的任何企图之前，就向社会党人和激进派提出了不惜任何代价要保证政府的提案获得通过的口号。这样一来，维维安尼的表态的全部政治效果就被消除了。

米勒兰入阁的第二个后果是：它把米勒兰在议会中的朋友们的社会主义批评变成了空洞的吹嘘，炫耀社会主义的“广阔视野”，而对政府的实际政策没有任何影响。

最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推动就变成一场美梦。

为了维持政府的继续存在，米勒兰的拥护者认为必须同其他左翼集团保持最紧密的团结。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问题不在于每一次取得政治成果，而在于联合的左派对内阁的忠诚，所以他们认为必须突出的不是使他们同其他资产阶级集团分离的因素，而

---

① 1901年1月至3月，法国众议院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法案。——编者注

② 勒奈·维维安尼(1863—1925)——法国独立社会党人，拥护米勒兰入阁，后脱离社会党，曾屡任部长。——编者注

③ “当然，政府对此是很容易这样回答的：它之所以落在共和国纲领后面，它之所以开始时仅仅涉及宗教团体，是因为它首先想防止最严重的危险。它的任务是使自由能够自己捍卫自己。”(《小共和国报》1901年1月17日)——编者注

是共同的因素。饶勒斯的指导思想是把左派联合在一起，而在左派的广泛的“共和主义”稀粥中，饶勒斯的集团完全消失了。

为了替米勒兰效劳，他的朋友们现在扮演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角色。

是的，在目前的共和主义多数派中，激进派反而是比较先进的因素、反对派因素，而右翼社会党人则是温和的、支持政府的因素。

激进党人多克通和佩尔坦在去年12月7日的议会会议上最激烈地要求对殖民暴行进行议会调查，而右翼社会党人的两位议员则投票反对调查。激进党人瓦泽伊反对通过大赦来平息德雷福斯案件，而社会党人则终于投票反对瓦泽伊。最后，激进社会党人佩尔坦在12月29日《电讯报》(图卢兹)上向社会党人提出如下的忠告：

“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个政府是否为支持它的那个政党的思想服务，还是使那个党背叛自己的思想。啊！我们使之掌权的那些人对我们并不太好。除了两三个部长外，所有的人几乎都同梅利纳内阁能够做到的那样进行统治。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向内阁提出警告并给以鼓励的政党，都对它俯首帖耳。至于我，则是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集体主义(即社会主义——罗·卢·)政党不是采取一种不断斗争的策略而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是让他们中的一员参加政府，这是非常好的，是的，我们认为这个思想很出色。但是，这是为了达到怎样的目的？为了使进步政策在内阁中获得更大的力量和保证，而不是为了使最糟糕的玩忽职守在内阁中获得一个人质，他的名字就足以把社会主义者的选票引入歧途。现在瓦尔德克-卢梭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是进步政党的同盟者，而是它们的思想上的领导人。我觉得，他引导这些政党走得有些太远了。他只要从口袋里拿出内阁危机这个用来吓唬人的东西，就足以使它们俯首听命。请您注意：如果在你们和我们的人中

间形成一种新型的从属于他人的机会主义者，国家的政策就会遭到一些损失。”

社会党人力图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弃反对派立场，资产阶级民主派指责社会党人对政府卑躬屈膝并且背叛了自己的思想，这是社会党人所遭到的最大侮辱，同时也是社会党人入阁的最后结果。

因此，想要通过放弃反对派立场而取得实际成果的饶勒斯策略表明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实际的策略。

这种策略非但没有扩大社会党人对政府和资产阶级议会的影响，反而使社会党人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和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消极附庸。它非但没有使进步政策在议会中得到新的动力，反而在消除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同时也消除了唯一还能推动议会和政府采取一种坚决的和勇敢的政策的因素。

这是它的最大错误。瓦尔德克-米勒兰所期望的保卫共和国行动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激进主义在议会中从一开始所处的软弱无力地位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此外也是社会党人由于参加激进派政府而注定所处的软弱无力地位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如果对于不抱偏见的人来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的可悲的“行动”意味着它的“共和主义”使命的不幸结局，那么在饶勒斯看来，这种行动尽管有种种弱点（他在来自自己队伍的批评的压力下不能完全否认这些弱点），却是法国的民主复兴的伟大时代的可喜开端，这个时代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牢固联盟的基础上的。

饶勒斯写道：“因此，我认为，建立一个左派的多数（尽管它还有些怯弱）以坚决支持一个左派政府（尽管它还有些动摇和软弱）是一件极端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

一个尚未定型的、但是必不可少的雏形，它不久就会把我们社会的运动导致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最大程度的平等。”（《小共和国报》1901年1月8日）

因此，归根到底，从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同激进小资产阶级实行共同政治统治的未来时代的长远观点来看，在牺牲最近的政治目标的条件下保持瓦尔德克—米勒兰政府以及在放弃独立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立场的情况下保持同资产阶级左派的联盟似乎是必要的。但是饶勒斯在进行他的宏伟的设计时忽略了一个事实：他现在想借助于社会党人的支持使之取得政治统治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早已被一种策略弄得软弱无力，这种策略同现在的饶勒斯的策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大革命以来，小资产阶级在法国的政治作用的基础是**共和主义纲领**。只要大资产阶级以君主制作为自己的掩护，小资产阶级就能够以人民群众的领袖的身份出现，因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的矛盾的形式并成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坚强支柱。

随着第三共和国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从共和国的敌人变成了共和国的体现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纲领的主要内容：共和制的国家政体，由议会制代表的“人民主权”，出版、结社和信仰自由，都已经得到实现，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就失去了基础，它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缓和了。对于“激进的”纲领来说只剩下适合于点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些次要的附属的东西：累进税制，国民教育改革，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

但是，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矛盾在消失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却在发展。小资产阶级在丧失自己纲领的灵魂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一大部分追随者。无产阶级在同激进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最激烈的矛盾中表现为一个



独立的政党，而在激进主义本身也发生了内部分化。它的一部分追随者由于自己的基本利益而倾向于掌权的资产阶级，它的另一部分追随者发现自己不得不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

“纯粹的”激进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在机会主义的共和国里成为一个软弱的中间党派。它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只能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或者在议会里只限于采取**反对派立场**，并且通过议会外的群众影响来加强这种立场；或者只依靠议会的手段并且指望**同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一起掌权**。

第一种方法，即同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重新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于激进主义来说是双重地不可能的。它不仅不能给予工人们任何东西。在小手工业在法国占统治地位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社会意图在法国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更加使小资产阶级感到害怕。但是由于激进主义坚持自己的狭隘的政治纲领，它走上了同机会主义资产阶级在议会里实行共同统治的唯一道路。由此开始了它的破产。

在平常时候，激进主义在“混合”政府里在机会主义的一旁注定充当消极的同谋者的角色，有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当机会主义资产阶级被一件丑闻弄得声誉扫地的時候，以及共和国经历着一次危机的时候，激进主义就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那时，激进主义就获得了重新挥舞它的“保卫共和国”纲领的破烂货的机会，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掌握政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出现这样的事实：激进主义为了实施自己的激进改革在议会里实际上并不掌握多数。这个事实在以前就很明显，只是它忘记了从中得出结论。

因此，激进主义为了进行统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把自己的纲领抛在一边，或者从事一些装饰门面的活动来掩盖自己的无所作为，或者直接推行机会主义的政策。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它很快向议会表明自己的无能，向全国表明自己的靠不住，于是它愈

来愈变成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软弱的附庸。

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活动是这种激进派政策的忠实写照。饶勒斯想把社会主义的整个目前的政策都建立在“左翼联合”的基础上。如果人们把目前的这种“左翼联合”看作是共同对共和国进行整顿和改革的团结一致的政治集团，那么这是过高的估计，就象把民族主义营垒看作是怀有严重的君主主义意图的团结一致集团一样。

完全相反，我们看到在这个“左翼联合”中有着各种不同的因素，代表着从社会主义到反动派的各种不同色彩。极右翼——伊桑贝尔集团的进步党人同梅利纳的警卫部队发生磨擦。目前的左翼内部四分五裂，只是对于恢复表面上的平静和秩序的共同需要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只要这一任务完成了，——声名狼藉的大赦令在目前情况下看来是最好地解决了这一任务——那么，使他们集合在一起的利益就会退到次要的地位，左翼就会瓦解，保卫共和国政府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在这同一届议会里，梅利纳内阁开始时曾拥有多数，这一事实表明，目前的多数只是暂时的。由于一部分左翼背弃了自己的候选人布里松<sup>①</sup>，使德夏内尔<sup>②</sup>得以重新当选为议长。这一事实表明，左翼的瓦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这种情况完全合乎逻辑地产生了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行为。由于不可能采取任何一个坚决的行动，它不得不只限于通过一系列的投降来缓和在危机中变得尖锐的矛盾。于是它忠于激进主义的传统，在缺乏实行自己的纲领的前提下，再一次通过掌握政

---

① 昂利·布里松(1835—1912)——法国资产阶级激进党人，曾任总理。——编者注

② 保尔·德夏内尔(1856—192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是进步共和党领袖之一，1898—1902年和1912—1920年任议长，1920年当选为总统。——编者注

权而背弃自己的纲领。

因此，瓦尔德克-米勒兰政府并不象饶勒斯所认为的那样是建立在激进党和社会党联盟的基础上的民主派统治的新时代的开端，不如说它是激进派小资产阶级过去的历史的继续。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使命不是实行自己的民主主义纲领，而是通过定期地清除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所积聚起来的政治垃圾，来维护采取共和主义形式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正常的继续统治。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开创的一个新时代仅仅在于，社会主义通过下列方式第一次分担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一历史使命：它抱着为社会主义纲领服务的幻想，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充当了激进主义的马前卒，正如激进主义抱着实现民主派纲领的幻想，经常充当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的马前卒一样。

由此可见，饶勒斯的策略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米勒兰入阁是为了帮助恢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此牺牲了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反对派。但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复活表明只是一种幻影。相反，由于饶勒斯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束缚在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尸体上，他就使唯一能够在法国捍卫共和制和民主制的生气勃勃的力量陷于瘫痪状态。

#### 四 米勒兰的社会改良

除了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保卫共和国行动”外，米勒兰的**社会改良**活动被说成是米勒兰入阁的第二个理由。

确实，改善和革新社会政策对于法国比对于任何其他国家是更为迫切的需要。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最初的坚决步骤（普遍的法定工作日为十一小时，在巴黎为十小时，禁止转包工，即将工程承包给包工头），随着工人阶级的失败重新化为乌有。此后，虽然

在四十年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家们<sup>①</sup>就已经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可怕后果，只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才通过了劳动保护法。从此开始了第三共和国的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奇特的社会改良工作。每一项法案经过各种起草委员会和谘询委员会的长期讨论后，被众议院推到参议院，又被参议院重新推到众议院，这里被通过了，那里却被否决；那里被接受了，这里却又被拒绝了。最后，这项法案经过双方的阉割、修正和改变之后变成了一个拙劣的作品，终于获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它从生效的最初一刻起就表明自己是一个怪胎。因此在第二天就开始准备修改这一法令。在经过十年的努力后，诞生了一个新的社会改良的死胎。共和国的第一个法令，1874年的保护女工和童工法令很快就暴露出毫无用处。从1883年起，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后，189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对1874年法令作了修改。但是，在1894年就需要在参议院里对这一法令提出新的提案并作其他的修改，其准备工作一直延续到1900年。

第一个关于保护工人健康的法令在对政府的提案进行七年的修改后于1893年获得通过。保障工资仅仅在1895年通过法律确定下来。第一个普遍的不幸事故保险法令在经过二十年的准备后在1898年终于签署了。最后，经过二十五年的“准备”并且已经有十个不同提案的老年人和残废者保险法令至今还没有获得通过。

除了对改革法令的无休止的、一知半解的来回折腾及其天生的不中用之外，对于法国来说有代表性的是，这些法令得不到认真贯彻。为了进行监督而建立的臃肿的官僚机构，例如各省和地方的儿童保护委员会等等，部分地甚至没有行使自己的职能。工

---

<sup>①</sup> “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家”在这篇文章的法译文中译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参看《1898—1912年法国的社会主义》1971年巴黎法文版第124页。——编者注

厂视察机构只是在 1892 年才不受省议会的专横统治而由国家加以改组，除了视察员的漠不关心和缺乏经验以及集体监督机关的不中用之外，还要加上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公开偏袒厂主以及公共舆论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极端落后。为了说明法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特点，只需指出，1888 年在议会中有一百七十一票赞成完全废除 1874 年刚刚建立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厂视察机构，而在 1891 年提出了一项提案，将农村地区的工厂监察事务交给乡村警察负责。同英国、德国、瑞士、奥地利的老的社会政策相比，因循守旧的法国的社会政策是独一无二的。

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有许多理由在这一领域里开展积极的活  
动。法国激进主义在社会政策方面的顽固立场还超过机会主义的政策。它由于自己迄今为止的行为在工人阶级眼里已经完全声誉扫地。由于激进主义自己的基本队伍——巴黎小资产阶级在整个德雷福斯危机以及市镇参议会选举中表现得非常靠不住，就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但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本届内阁的特殊形势。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同它的激进党前任一样依靠社会党人的支持，它上台后同自己的前任一样把背叛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意图和希望当作自己的实际政治纲领。

社会党人从未象在德雷福斯危机之后那样对政府的政治活动感到直接的兴趣，工人阶级对政府的政治活动的注意力和警惕性也从未象在德雷福斯危机之后那样强烈。瓦尔德克-卢梭政府的建立是这次危机的直接结果。在这次危机中很大一部分社会党人在国家的日常政治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因此，从来没有象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时期那样，激进主义的无能同社会主义工人的期望处于如此尖锐的矛盾之中。十八个月的无所作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赦法令在长达两年的德雷福斯危机时期的普遍分裂和动荡

不安之后甚至可能使社会党人失去经过考验的耐心。因此，保持社会党人的支持这一次对于激进党政府来说是在过去的情况下困难得多的一项任务。必须预先无条件地给予工人们一些东西，作为对他们的失望的补偿。作为这样的补偿，社会改良就应运而生。

对于这届内阁来说，有利于工人的法令是能够使社会主义者忽略它的政治失败的唯一手段。改良使工人们受到蒙蔽并且吸引了社会党人的全部注意力。假如没有这些改良，那么，甚至连饶勒斯的催眠术也无法使他那一伙人相信内阁的“保卫共和国行动”。正是社会改良的法律和法令使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政治判断发生了混乱，以致于他们后来会把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只是叛变和耻辱的东西，看作是“伟大的共和主义事业”。只是在关于工作日的法令和关于扩大结社权的提案后，政府才胆敢实行大赦并提出关于宗教团体的法案。米勒兰的社会改良使瓦尔德克-卢梭的政治投降不受惩罚。内阁对工人的友好态度是用来换取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这种投降的消极共犯关系的代价。

因此，如果有人硬说社会党人部长是激进派内阁的社会政治活动（否则这种活动就是不可思议的）的真正的和唯一的首创者，那就是无视整个政治形势的内部逻辑。完全相反，纵使社会改良事业的精神、性质和规模可以算在个别部长的帐上，这一事业本身是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由于自己完全放弃政治任务而赖以确立自己的议会存在的基础。

乍一看来，激进派内阁的上述策略似乎是荒谬的。难道他们为了能够保护反动派的政治利益就决定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难道他们为了能够掩盖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矛盾就想要突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这种策略的荒谬只是表面的。只

要对米勒兰的社会改良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归根到底它并不是对内阁的政治活动的否定，而是这种活动的直接继续。

米勒兰的全部最重要的社会改良措施的特点是，它们既引起了人们的欢欣鼓舞，也引起了人们的激烈否定，在法国和在国外成了人们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的题目。一方面，有些人赞扬这些措施是纯粹的社会主义措施，是工人阶级未来统治的先声，是社会政策的新纪元的标志，另一方面，有些人指责这些措施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至少是完全遭到失败的社会改良的尝试。

原因很简单，它并不象肤浅的观察者可能认为的那样在于对社会党人入阁问题作出判断的人的根本不同的立场，而在于米勒兰的措施的特性本身。所有这些措施都具有内在的二重性，具有自相矛盾的性质。尤其是米勒兰事业的三项最主要的，也是公众最关心的措施：关于工作日的法令、关于工会的法案以及关于强制性罢工的草案，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在社会政策方面落后于英国、德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法国突然在混合企业里普遍实行十一小时工作制，在几年内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社会政策方面的曼彻斯特主义的典型国家一跃而成为最进步的国家，昨天还是灰姑娘的法国工人阶级一下子变成了骄傲的公主。显然，只有社会党人部长才能用法术变出这样的奇迹。

但是，正如饶勒斯同志在大赦法令颁布后富有哲理地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不存在任何纯粹的胜利。开创新纪元的米勒兰法令的令人扫兴之处在于，只是在法令颁布（1904年4月1日）后四年才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在这四年里，混浊的塞纳河将流去许多河水，而许多部长将跌到忘川<sup>①</sup>中去。如果说迄今的劳动保护法

---

<sup>①</sup> 古希腊神话中的忘却之河。——编者注

在法国主要用来装饰《公报》<sup>①</sup>，那么，这是由于遭到厂主、行政机关和法庭的联合抵抗。同这些部长们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和短暂生命形成不幸的对照，所有这些反抗力量在法国表现为坚固的、不可动摇的大墙。一个要由未来的、无人知道的政府同这种社会政策方面的反动派的大墙的斗争来决定的法令，终究是一张空头支票。

然而，对于它在将来的实现的悲观主义并不是投在米勒兰的光辉灿烂的法令上的唯一阴影。现在将成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到十一小时并在将来缩短到十小时是以暂时将儿童的劳动时间延长一小时这样的牺牲作为代价的。

确实，1892年规定的儿童十小时工作日同其他劳动保护法一样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狡猾的法国厂主同四十年代的英国同行一样，以实行一种复杂的轮班制来答复这一法令。按照这种制度，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工人们的手如同纸牌一样互相混合在一起，要监督法令的实施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即使儿童的法定工作日延长一小时，这种牺牲按照“现实政治家们”向我们所作的保证，也只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人们可以怀着轻松的心情放弃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童工的一小时闲暇时间，以此换取从法律上规定缩短成人的劳动时间并使成人和儿童的劳动时间趋于相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按照米勒兰的保证——对实施关于劳动时间的法令进行监督就会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这一法律条文的通过恰恰表明了社会政策方面的轻率态度，甚至连法国立法迄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对童工和青工进行特别保护，使他们的劳动时间低于成年工人，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保护立法的最基本原则，是任何社会政策、甚至最原始的资产阶级社会政策的初步知识，是普通的

<sup>①</sup> 即《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编者注



健全的人类理智的第一要求，是自然的年龄区分的直接结果，最后是**限制工厂里的童工数量的最可靠的措施**。米勒兰法案暂时将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一小时，从而不仅在物质上牺牲了他们一小时的休息，不仅牺牲了纯粹形式上的法律条文，而且也牺牲了极端重要的东西：**对儿童进行特别保护的**原则本身****。

只有对习惯于物物交换的“现实政策”作粗暴的机械的理解，才会把不久以后将童工的劳动时间重新缩短到过去的十小时的**绝对水平**描绘成对暂时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的一种补偿。从**社会政策的观点**来看，童工的劳动时间是一个**相对的、按照同成年人劳动的比例自然地发生变化的量**。从这种观点来看，现在和将来把童工和青工的劳动时间同成年人的劳动时间联结在一起是一种**社会政策的怪事**。由于将成年人的法定工作日降低到十小时以下在不久的将来无论在法国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米勒兰的革新实际上不过是判处十二岁至十六岁的无产阶级儿童在十年以上的时期内从事十小时的强制劳动，为资本主义剥削效劳。

然而，受害者除儿童外还有成年人。实际上，对童工的特殊保护在比较切实可行的监督下并不会成为贯彻关于劳动时间的法令的障碍。在所有的国家里，尽管到处实行较短的儿童工作时间，这些法令都得到了贯彻。只有在法国议会里一位部长可以发表相反的意见，而没有受到普遍的嘲笑。此外，对儿童的特殊保护对于成年工人的保护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有工业国家、首先是英国的历史表明，缩短儿童的劳动时间机械地也会导致限制成年人的劳动时间。先进的儿童保护对整个劳动保护的进步和**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因此，米勒兰把儿童的劳动时间同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联结在一起，并且官僚气十足地大笔一挥把工人的所有自然种类都拉平。这样，他不仅使法国工人保护立法在社会政策方面落后于所

有其他国家，而且使法国工人保护立法在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处于停滞状态。不管普遍的最高工作日是不是会得到实行和怎样得到实行，对于所有种类的工人实行同样的劳动时间现在成了法国工业企业的准则。未来的成年工人十小时工作日在其实行时是不确定的、随着当时的政府及其机构的方针而发生变化的，把儿童和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拉平则是新的改良的原则性的固定不变的因素。<sup>①</sup>

因此，米勒兰的最重要措施中的第一个措施就已经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他的改良工作的虚伪性：当他给予工人们靠不住的、虚假的成果时，他却迫使工人们作出确定无疑的、明显的牺牲。米勒兰的涉及工会的第二个重要提案也证明了这种虚伪性。

在 1884 年给予工人人们的结社权至今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障。由于受到企业主的专横统治，有组织的工人们被迫通过拚死的斗争来捍卫自己最基本的权利。法国的一些最大的罢工，例如 1885 年诺尔省的罢工、卡尔莫的罢工、巴黎公共马车工人罢工以及最近克列索的罢工，都是由于处罚工人引起的。

米勒兰的提案为结社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它规定，由于参加工会而受到处罚的工人们有权控告企业主并要求给予赔偿，企业主如果进行恐吓和暴力活动就要给予刑事处分。但是不仅如此。这个法律草案给予工会及其联合会以**法人的全部权利**，这就是说，它允许工会及其联合会拥有数量不受限制的财产，并从事商

---

① 我们刚刚收到了有关上述法令的新的有趣材料。2 月 9 日的《小共和国报》刊登了米勒兰的一个法令草案，其中规定了一系列将混合企业中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 1—2 小时的特殊情况。法定工作日的特殊情况在劳动保护的实践中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在米勒兰把儿童和成年工人的同样劳动时间作为他的法令的基础之后，接着用法令重新延长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这就表明，他在实施和论证自己的法令时并不是严肃认真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童工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卢森堡注

业交易。

乍一看来，这又是一个大胆的、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社会政策方面的改良。但是在这美丽的花朵里也隐藏着一条蛆虫。

受到处罚的工会会员在法国即使在从前，仅仅根据普通的民法典(第 1780 条和第 1382 页)，就拥有对企业主的私法控告权。但是，不仅由于工人们没有力量进行费用昂贵的诉讼，而且由于很难向法院证明企业主企图进行处罚，还由于对资本家的罚款是无足轻重的，因此，私法保障被证明是完全无效的。问题在于建立唯一团结社权的公法性质相适应的刑法保障。众议院已经在 1890、1892 和 1895 年三次通过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法令，它每一次总是遭到参议院的反对而被否决。米勒兰非但没有使工人们的愿望在参议院得到贯彻，反而向参议院卑躬屈膝，并且实行一种私法控告权作为结社权的保障，他在一种新的法律保护的形式下给予工人的只是同从前一样在受到企业主侵犯时毫无保障。

第二件礼物：不受限制的拥有地产和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也同样是虚假的。到目前为止工会会员就有权在工会活动的范围内拥有财产(动产和不动产)，也有可能建立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虽然这些合作社是独立于工会的。实际上将近四分之一的法国合作社是由工会建立的。拟议中的改良只在于给予工会本身建立合作社的权利。如果人们对迄今的经验以及两个组织的相互关系有所了解，那么就必然会觉得把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这样直接地联结在一起是一种非常值得怀疑的善行。拟议中的改革一点也不适应工会和合作社的实际需要，充其量不过是在两者之间制造经常的冲突和摩擦的根源。<sup>①</sup>

---

<sup>①</sup> 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以及 1900 年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劳动介绍所代表大会都坚决反对这种改良。关于这一草案的法律部分参见《社会主义运动》杂志第 30 期上的马利乌斯·穆泰的有关文章。——卢森堡注

但是同这些虚假的成果相适应的却是很实际的、不容置疑的损失。拟议中的法令不仅在给予受到处罚的工人对企业主的控告权的同时给予企业主对封锁他的工厂的工人的控告权；它不仅宣布现有的刑法典中反对“妨碍劳动自由”的可恶条款继续完全有效；它而且还为企业主及其“自愿劳动者”提供特殊的刑法保护，反对罢工者的“恐吓或暴力活动”。这样就重新恢复了在1884年已经废除的对罢工者的惩处，而同反动方面于1890年5月在议会中提出的提案相一致。这全部改良一下子从扩大和保障工人的结社权变成限制工人的结社权。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引起轰动的关于**强制的仲裁法庭和强制的罢工**的法律草案。要是谁还不能认识到米勒兰的最初一些改良的社会主义的、划时代的性质，那么，上述草案想必会擦亮他的眼睛。如果说其他措施是在国际工人立法的熟悉范围内展开的，那么这个法案则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原则：**强制罢工**。显然，没有一个改良能够比这走得更远了。从“苦役监禁法案”<sup>①</sup>到米勒兰的罢工法案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以致有人以为这个法案是未来国家的前奏。如果说前一个法案是架在工人脖子上的刀子，那么米勒兰的法案则是置资本的经济统治于死地的武器。甚至我们的一些党刊起初也认为，“企业主已不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了”。

但是，只要对这一法案进行仔细的考察，就会产生各种严重的怀疑。拟议中的这个法令只保证运用于国有企业，在私有企业中这个法令在任何时候都要取决于企业主的自由决定。这样，反对资本的致命武器就受到资本家的控制。此后工人中的少数派根据这一法令的明确规定必须服从多数派的罢工决议，但是它并没有规定在少数派不服从罢工决议而继续工作的情况下将给予怎样的

---

<sup>①</sup> 参看本卷第37页注<sup>②</sup>。——编者注

惩罚。这把用来让资本家自杀的锋利的刀子，如果加以仔细的观察，实际上是没有刀刃的。最后，当工人们呼吁进行调解而未获结果时尽管有权根据多数的决议进行罢工，而企业主则同从前一样可以不经过任何预先的调解仪式在罢工时或在罢工后将全体或任何一个工人开除并用其他工人来代替。这把危险的刀子归根到底既没有刀刃，也没有刀柄。

但是米勒兰的这一改良同他的其他改良一样，不仅用一只手给工人以幻想，而且用另一只手夺走了工人的巨大实际利益。

根据这一法案的规定，只有在一个企业或一个工场里工作的工人才可以每次作出关于罢工以及关于提出的要求的决定。因此，在缔结劳动契约时，不是工会，而是工场的工人作为缔约人来同企业主相对抗。这样一来，不仅不可能使最先进的成果和要求通过工会得到普遍推广，从而使个别工人团体得到提高，而且不可能实行同一职业的普遍罢工行动以及超出同一职业的范围的罢工行动，尤其是在法国经常发生的政治罢工和声援性罢工。<sup>①</sup>由于工场代替工会成为经济斗争的单位，就使斗争失去同一职业和整个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支援，以及工会在领导搏斗中的推动力。

正如关于劳动时间的法令直接违背劳动保护的正常发展一样，拟议中的罢工法令也是同工会的正常发展背道而驰的。前一个法令官僚气十足地大笔一挥把需要保护的各自然种类的工人拉平，而后一个法案则人为地否定了工人阶级经济组织的自然集合中心。对于工会发展的有害作用对最有资格的专家——工会领导

---

① 赫伯特在今年第一期《德意志言论》中说，每一工业区的劳动纠纷将由同一个劳动评议会来解决，因此通过这一方式会导致劳动条件的平衡化。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劳动评议会只审理一个工场的工人所提出的要求，他们在审理时不可能超出这些要求的范围，但是问题在于在提出要求时进行平衡，只有工会才能做到这一点。——卢森堡注

人的判断起决定作用,这导致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在迄今所知的大多数情况下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法案。<sup>①</sup>

但是,我们认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仲裁法庭的裁决的强制力量**。由于这一法案似乎排除了强制性仲裁法庭达成任何调解的可能性,还由于劳动评议会作出的裁决在没有得到罢工工人的赞同的情况下就立即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罢工的目的(在这方面在法案中存在着模糊的地方)简直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工人们显然不可能拒绝仲裁法庭的裁决并通过继续罢工直接迫使企业主作出让步,或者间接地对仲裁法庭的裁决施加影响,使之有利于自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仲裁法庭的裁决并不象它在迄今的实践中自诩的那样是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双方实际力量对比的体现。罢工的过程,把罢工继续进行下去的能力大小,对于仲裁法庭的裁决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的判决是立即具有约束力的。

那么,根据米勒兰的法案罢工起怎样的作用呢?只不过是仲裁法庭开始的**信号**,如果在工场的窗口挂起一面旗帜同样可以成功地达到这样的结果。

现在,只是根据强制仲裁判决,强制罢工的划时代的善行才显露出自己的全部光辉。工人们得到保护,不受破坏罢工者的侵犯,但是与此同时,罢工失去了任何意义和目的。根据这种强制仲裁判决,关于在罢工前、罢工时和罢工后的表决方式以及工人们在表决前和表决时的态度等等的详细复杂的规定也引起特殊的兴趣。归根到底,这种中国式礼仪的唯一实际意义仅仅在于用严厉

---

① 参看列金在《前进报》(1900年12月25日)上的出色评论以及《德国工会总委员会通讯》去年第47号和第51号上的文章,还有《奥地利冶金工人》(1900年12月29日)和《人民之声报》(1900年2月3—10日)。大家知道,一大部分法国工会活动家热衷于总罢工,这也影响到他们的坚决反对立场。——卢森堡注

的保护措施来反对“未参与者”对罢工者“发生影响”。在法国，大规模的罢工通常是由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议员领导的。在这种情况下，草案中规定的上述预防措施意味着把社会主义“挑拨者和煽动者”从经济斗争的领域里排除出去。

在米勒兰的提案中，罢工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形式，正如在部长的论证中公开说出的那样，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出于对工人阶级的尊重以及考虑到他们的成见才保留下来的。这一法令的倾向和目标在于最终取消罢工，这在新西兰这个米勒兰提案的模范国家已经成为现实。

因此，新的改良不仅意味着破坏无产阶级在经济斗争中的职业团结和阶级团结，并把无产阶级分割成个别的工场小团体。工会的实际作用只限于参加劳动评议会的选举，罢工的唯一作用是呼吁劳动评议会进行仲裁，而整个经济阶级斗争变成了一种民事诉讼。

米勒兰在法案中切断了工会的生命线之后，在对这一法案的论证中以雄辩的口才向工人们鼓吹建立工会组织的必要性。

对米勒兰的一些最重要的改良作较详细的考察表明，这些改良是微不足道的、十分拙劣的。当然，这并不是由于社会党人部长抱有恶意。相反，不能否认在部长办公室里辛辛苦苦编制极端复杂的草案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真诚努力。在米勒兰的活动中，在商业部长不直接受到议会立法的约束的领域里，例如在他的关于实行邮局职工八小时工作日的法令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部长的法令和法案的缺陷决不是偶然的，它象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社会改良事业。

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社会改良事业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两面性，一手给予另一手取走，把对工人的让步同对企业主的让步结合在一起。这是内阁的整个政治措施所特有的那种平衡体系。在前

一场合同在后一场合一样，实行这种平衡政策的意图不是为了解决暴露出来的矛盾，而是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办法是对深深扎根于社会基础的矛盾进行外部调节，将这些矛盾纳入法律准则的范围。这些准则使相互冲突的双方力量表面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们似乎会防止这些冲突骤然爆发起来。大赦法令从法律上消除国民社会同常备军之间的冲突，结社法企图掩饰共和国和教会之间的矛盾，社会改良则从法律上消除劳资之间的斗争。

然而，政府的政策不得不与之保持一致的“共和派多数”既不代表劳动的利益也不代表民主的利益。正如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表面上完全不偏不倚的大赦中实际上把军国主义反动派的受害者交给了军国主义反动派的代表们发落一样，在形式上平等的社会改良的所有方面从根本上看是损害工人的利益的。当米勒兰把在形形色色的平等协商的机构（例如最高劳动委员会、劳动评议会）中的各式各样的代表权赠送给工人们，并把这些机构说成是开展独立的工人斗争的最高手段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些机构会堵塞这一斗争的活的源泉：发展工人保护立法，保障结社权，自由开展工会活动。当人们在谈到内阁的社会政策方面的活动时可以说，这些活动同它的政治活动一样，唯一力求达到的是缓和矛盾并使其外部表现形式变得温和些，那么还必须补充说，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活动中是通过损害工人的利益达到这一目标的，正如在政治活动方面是通过损害民主来达到目标一样。

因此，当我们把制定“保护罢工者法令”同屠杀夏龙和马提尼克岛上的罢工工人联系起来看，把官方鼓励工人们组织起来同使用士兵破坏罢工（就象现在在蒙索累明<sup>①</sup>那样，参见1901年2月

---

<sup>①</sup> 1901年2月蒙索累明的矿工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举行罢工。不久三千名士兵进驻该地。黄色工会的会员在士兵的保护下于3月开始工作，致使1901年5月罢工结束时，工人的境况没有得到改善。——编者注



7日《小共和国报》)联系起来看,就不会觉得这是偶然的和奇怪的。这同米勒兰的社会改良活动并不矛盾,而仅仅是它的合乎逻辑的补充。这种活动的基本思想是同时保护工人和企业主的利益。对工人的保护是通过虚假的让步,对企业主的保护则是通过物质的让步来实现的。这一基本思想最明显地表现在同时制定在纸面上有利于工人的措施以及用刺刀的铁的现实来保护资本上。

因此,米勒兰社会改良的缺陷在下列事实中得到了详尽的解释:这些改良仅仅意味着把政府政治活动的普遍指导原则忠实地运用到社会政策的领域里,换言之,米勒兰实际上不是作为**社会党人部长**而是作为**激进党人部长**进行活动。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有人用米勒兰的社会改良活动来为米勒兰入阁辩护。但是米勒兰不仅不是内阁的社会改良活动的**首创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一社会改良活动是作为激进派内阁本身的一个存在条件而产生的。米勒兰也没有**决定社会改良的性质**。环境比个别人物表现得更加有力。一个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并没有把政府的社会政策变成实现社会主义意图的工具,而是相反,在自己的社会政策中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工具。

资产阶级国家中的社会改良从一开始就是残缺不全的缀补工作,虽然它并不注定要象米勒兰的社会改良那样可悲,尽管他有着良好的愿望。除了最初的一些工人保护立法到处是由于考虑到民族自我保存而不得不实行的以外,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改良只是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激烈的、持续的斗争的产物。只是出于绝对必需满足被社会党鼓动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考虑,才作出让步。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丝毫不能改变这一事态。因为只要一个社会党人部长置身于**资产阶级**内阁,这就是说,只要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资本的利益,那

么，一个社会党人部长也是受到政府和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的表决的约束的。

因此，希望借助于社会党人部长来导致社会改良的空前高涨，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忽略具体环境的空想。恰恰相反，社会党人部长引起毫无根据的幻想和希望，从而成为社会改良的正常发展的一个障碍。

一旦一个社会党人成为官方社会政策的代表，推动统治阶级的社会政策的主要手段——来自社会党方面的**无情批评**，就比对政府的总政策的批评更加不可能。如果说对政府总政策的批评所涉及的行动是社会党人至少不必直接参加的，那么，对社会政策的批评就直接指向社会党人部长及其活动。

实际上，米勒兰的追随者在法国引起了一种盲目和催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府的每一项社会政策措施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划时代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接受下来。

关于劳动时间的法令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原则上规定十二岁的儿童和成年人具有同样长的工作时间的法令。按照饶勒斯的说法，这个法令是“工人阶级能够享受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小共和国报》1900年1月16日）是“从法律上重新恢复工人阶级的统一”<sup>①</sup>！（《小共和国报》1900年1月20日）

商业部长给工厂视察员的通告信（要求他们同工会取得谅解），是“最大胆的作品”，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编年史上的值得

---

① 饶勒斯甚至描绘了所有工人同时从工场里走出来时的色彩鲜艳的情景：姑娘们为自己的健美而感到高兴；母亲们急急忙忙奔向自己婴儿的摇篮；男人们认真学习，以便把自己培养成革命的工人；孩子们陶醉于充足的阳光和森林里的音乐。饶勒斯只是忘记了，当孩子们根据米勒兰的法令离开工厂的时候，森林里已经完全黑暗，鸟儿早已入睡。——卢森堡注

纪念的大事”。(惹罗-里夏尔,《小共和国报》1900年1月21日)

规定在公共工程中必须实行适合当地情况的劳动条件的温和的法令是“米勒兰的一个社会主义作品”。(《小共和国报》1899年8月7日)

最高劳动委员会是拿破仑第三建立的一个机构,根据米勒兰的改良,它通过八种不同的选举方式组成,要是对这些选举方式进行仔细的研究,对于一个普通的凡人来说至少需要四个星期,而这整个机构的作用在于一年里举行十五天会议。工会对最高劳动委员会拥有部分选举权。对这一独创性机构的三分之一成员的选举权同前面提到的法令一起形成了“栽在资本主义土壤上的社会主义幼苗,它将带来美好的成果”。(《小共和国报》1900年1月21日)

对米勒兰的每一行动的赞扬在他的追随者那里简直达到了公开否定他们自己的观点的地步。饶勒斯曾经不断地一有机会就谈论总罢工;在这之后,他把关于强制罢工的提案说成是“无产阶级集体行动的”最好的“开端”,而这一提案禁止任何共同的行动,从而也禁止总罢工。(《小共和国报》1900年12月20日)

他们甚至把米勒兰的个别言论和姿态向工人群众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最大胜利。例如,商业部长出席利尔工业学校的一次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的演说被说成是“载入社会主义和共和国史册的最伟大、最富有成果的时刻之一”。(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899年10月18日)与此相适应的是他们要求修改把巴黎公社错误地看作是法国社会主义史上最伟大的时刻的观点。

如果说法国的社会政策落后于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不仅要归罪于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落后状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要归罪于工人阶级的漠不关心。许多次革命留给法国无产阶级的遗产是对两方面的极端的爱好:一方面是

爱好片面夸大政治行动的作用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变革上；另一方面是爱好片面低估政治行动的作用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自助”上。但是这两种极端都同样导致忽视日常的、同朝着合法改良的政治发展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斗争。

迄今为止，法国工会虽然至少在纸面上拥有相当众多的会员（在1899年有四十九万三千会员），但是它的力量是很小的。在每一个地方的每一行业中几乎都有好几个组织。除了这种极端严重的分裂状况之外，还要加上缺乏活动经费。例如，劳动总联合会是一个拥有十万会员的大规模的、分布极广的联盟。它的委员会在两年（1898—1900）中共收入两千一百马克；最后，在工会中半无政府主义性质占优势，总罢工思想十分流行。

在工人组织的这种状况下，即使最好的社会改良，大部分只能停留在纸上。在法国，由于工人们对社会改良的发展并不关心，这些改良没有超出机会主义—激进主义的拙劣作品的范围。正是在迄今法国工人保护立法的主要特点中，在其轻率和没有计划的试验中，最明显地暴露了这种改良活动同坚定不移的、强有力的工会运动、同日常斗争的实践缺乏联系。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推动法国工会进行独立的行动，开展有力的斗争，以便通过法律的和经济的道路改善劳动条件。但是米勒兰的社会改良恰恰起着相反的作用。它在物质上力图使工会失去自己的活动内容，即不受妨碍地开展经济斗争，并把工会从战斗组织变成人为地虚构出来的社会和平的机构的一部分；此外，它在形式上使工人阶级对官方的社会政策的批评和独立的进攻行动成为不可能。

米勒兰入阁按照这一方式远远没有在法国开辟社会改良的一个新纪元，而是意味着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使之停止，这就是扼杀唯一能把健全的现代的生命注

入僵死的法国社会政策的因素。

## 五 米勒兰事件和各国社会党

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我们只是停留在实际政策的范围，只是从饶勒斯所说的社会党人入阁要达到的直接目的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人们通过实践达到的结果，每一次都同根据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原则从一开始就得出的结论一样，这一次也是如此。如果说正是饶勒斯的策略没有完成它预期要完成的实际使命，那么这只不过是下列事实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个策略由于把社会党人入阁从一种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手段变成工人阶级斗争的正常方法，同时也就背弃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负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废除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使命，但是它却参加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而这个政府的任务是维护私有制并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永远存在下去。社会主义者负有把无产阶级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政党并引导他们同所有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使命，但是他们却把工人阶级变成共和派资产阶级的附庸。

把参与对无产阶级实行奴役当作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把同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上的结合当作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这一内在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饶勒斯当然否认这种矛盾。他认为，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中央政府只是得到公认的参加立法机构和市政机构这一原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策略从空想的宗派主义的弃权态度到积极的现实政策的发展中的更高阶段；在他看来，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联盟是下列原则的结果，工人阶级必须支持和利用资产阶级

中的进步派别去反对它的反动派别。

我们认为，饶勒斯对得到公认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引证，无论在前一场合或后一场合都是建立在对于国家的本质以及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错误观念的基础上的。

从社会主义的任务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的立法机构和中央政府按其本质和职能体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机构。

议会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斗争和派别斗争的机关，因此它成为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统治进行有组织的反抗的最合适的场所，但是政府内部的工人代表从一开始就绝不能起这样的作用。中央政府负有把在议会中和在国内展开的党派斗争的最后成果付诸实现的使命，它首先是一个行动的机关，它的生命力建立在内部的同质性上。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的各个部门——生产、交换、信贷和运输是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工业的世界贸易在中世纪的交通手段的情况下以及社会主义的交换在私有经济生产的情况下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资产阶级国家既然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组织，在它的各种职能之间也必然存在完全的和谐一致。

一种现代的大工业的殖民政策是以一种相应的军国主义的形态及其实行世界政策的实力为前提的。一种侵略性的保护关税的贸易政策要以热中于掠夺的殖民政策为其自然的补充。没有一种能够通过间接税制度从人民群众中榨取相应的资金的财政政策，现代军国主义就会是不可思议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赋税制度、国债制度和垄断制度不仅直接地而且通过交易所的中介同工业政策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军国主义、贸易政策和殖民政策就其整体来说决定着对外政策的内容和方向。

因此，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就象是一部齿轮机，它的各个部分在所有方面都互相联结在一起，彼此决定和调整它们的运动。使

整个齿轮机转动起来的直接传动装置是资产阶级议会，但是原动力首先是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统治政策的一致性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致性。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如果否认每一个政府成员对整个政府的政策应承担 responsibility 并且把内阁的每一个部门看作是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的势力范围，那么，这是以彻底的机械主义国家观为根据的。从政府各种职能的内在联系自然而然产生政府各个成员的连带责任。法国宪法以及任何一个以议会制为基础的宪法中规定所有部长全体为政府政策负责的条文，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种国家法的微妙的说法，而是对职能上的一致性的恰当的法律表述，这种一致性是资产阶级政府的生存原则。

饶勒斯当然把内阁对于国家的连带责任看作是空洞的形式，是中国式的礼仪。<sup>①</sup>在他看来，社会党人部长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负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就象社会党人在参加萨克森邦议会时必须对国王和宪法宣誓一样。他援引李卜克内西的例子，后者以高傲的蔑视态度跨过了这个“纸上的障碍”。

饶勒斯在这里忘记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前面提到的宣誓一点不妨碍社会党人一旦参加邦议会就立即对政府和邦议会中的多数派采取根本的反对立场，而社会党人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中却不得不参与执行政府的政策。如果社会党议员在邦议会中由于他们的宣誓而不得不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的席位上去，并且同他们团结一致地进行投票，这种类比才是正确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类似之处，而是存在直接的对立；社会党人参加人民代议机构是为

---

<sup>①</sup> 参看饶勒斯在利尔的演说。《两种方法》第8页。——卢森堡注

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参加政府则是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行动承担责任。

其次，要是以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政策，另一个部门可以执行社会主义政策，因此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也就是按各个部门把中央政权夺取到工人阶级手里，这是十足的空想计划。

如果米勒兰在社会党内的追随者竭力否认他对其他部长的行动负有责任，而把他的责任限制在他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至少相信可以把米勒兰自己的行动说成是“社会主义政策”。除了对米勒兰的社会改良无批判地加以吹捧外，他们还把社会改良说成是商业部长的唯一工作，而对其他一切闭口不谈，以此来制造后一种幻想。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只不过是许多生产条件中的一个条件，同样，在资产阶级的工商业部的职能中，对工人的社会救济只不过是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次要的方面。这个部的职能全都是致力于使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繁荣昌盛。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贸易政策**。

要是米勒兰想在这一领域里按照社会党的最低要求行动，他就必须公开地设法取消梅利纳 1892 年建立的自治的、以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为基础的高额保护关税，首先是废除粮食关税。但是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米勒兰在 1899 年同美国签订的协定对此作了回答。当热中于当部长的梅利纳刚刚想要攻击这个协定是对农业保护关税主义者合法权利的背叛时，米勒兰的社会党朋友们就能够把这当作卑鄙的诽谤而加以驳斥。他们可以自豪地指出：“……在贸易协定中农业产品被排除在特惠税率之外，……贸易协定不适用于粮食，它的进口由一项特别的法律来调整，……畜牧业者的利益比在梅利纳的草案中得到更多更好的保护，因为对



美国的皮革和鞣皮不实行最低关税。”<sup>①</sup>

这就成功地证明，米勒兰作为商业部长卓有成效地代替了“Père famine(饥饿之父)”梅利纳，同时还表明，只有当一个社会党人显示出他有能力执行资产阶级政策并且放弃社会主义政策时，他才能够在资产阶级政府中起作用。

米勒兰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活动使社会党人入阁的整个问题得到了新的说明。情况不仅是：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私有制和阶级统治存在着，作为现政府成员的社会党人就不得不执行资产阶级政策。而且在目前社会的基础上，除了资产阶级政策外，根本不可能存在另一种政策，甚至即使部长实行了社会主义纲领对目前国家的全部要求，他也仍然是**资产阶级**部长。他至多用他的活动促进资产阶级发展中的**进步**倾向。但是不仅如此。事实表明，一个部长在现政府中不仅一般地同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而且同目前的统治集团和派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不仅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奴仆，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奴仆。

前面提到，饶勒斯把米勒兰对内阁的总政策承担责任当作空洞的形式而同李卜克内西对萨克森宪法宣誓相提并论。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假定的根据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的一种完全机械的理解。但是我们乐意只限于考虑米勒兰对于**他自己的**职权范围的责任。只是饶勒斯还需要证明，李卜克内西对萨克森国王的宣誓给萨克森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同米勒兰的贸易政策给法国人民带来的后果是一样的。那时他也会得到对于他在利尔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如果为了我们的事业，有必要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打进资产阶级政府的堡垒，那么，我们是否也会犹豫不决呢<sup>②</sup>。这个计划只不过等于“我们的人”从资产阶级堡垒中间资

<sup>①</sup> 富尼埃，1899年8月17日《小共和国报》。——卢森堡注

<sup>②</sup> 《两种方法》第8页。——卢森堡注

产阶级一起向我们自己的队伍开火。

参加**市镇参议会**的问题则完全不同。确实，市镇参议会和市长都要执行交下来的行政职务和贯彻资产阶级法律，但是从历史上看市镇参议会和市长是同政府完全对立的因素。

政府是体现着集中的国家政权的，市政机构则是从**削弱中央政权的地方自治**中产生出来的，是对于中央政权的**解放**。资产阶级统治的特殊手段；军国主义、文化政策、贸易政策、外交政策构成政府的真正本质，而市政机构则专门担负**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任务，也就是说，它所担负的任务是同不知道任何阶级划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行政机构相应的。因此，中央政府和市政府从历史上看是目前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两极。在法国，市政机构和政府之间、市长和地方行政长官之间的经常斗争是这一历史矛盾的具体表现。

对于社会主义的策略来说由此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目前国家的中央政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体现，把它消灭是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自治是未来的因素，社会主义变革将以肯定的方式以之为出发点。

当然，资产阶级政党也懂得把它们**的阶级内容**注入到市政府的经济和文化职能中去。但是社会党人在市政府中决不会陷于必须背弃自己的政策的处境。只要社会党人在市镇代议机构中还处于少数地位，他们就完全象在议会中一样，把采取**反对派**立场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但是如果他们成为多数，那时他们就把市政府本身变为反对资产阶级中央政权的一个斗争手段。

饶勒斯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来为他**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联盟**辩护，在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建议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反动派。<sup>①</sup>他显然指的是《共产党宣言》结尾的一段话，那

---

<sup>①</sup> 参看饶勒斯在利尔的演说：《两种方法》第4页。——卢森堡注

里写道：“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sup>①</sup> 但是这段引文是以一种完全确定的历史内容为根据的。

《共产党宣言》的指示恰恰是针对上一世纪前半期的斗争而言的，这一斗争的目的是用**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代替封建阶级的统治。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支持一个上升的阶级，它对反动派的政治上的胜利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性。现在的情况则根本不同了。资产阶级已经到处达到了他们力图达到的目的，我们看到他们现在不再为反对反动派而斗争，而是同封建主义的残余联合起来成为反动派的正式代表。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几乎只是指**小资产阶级**。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一个力图代替资产阶级的上升阶级的表现。我们并不是走向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正象不是走向小手工业对大企业的经济上的胜利一样。目前社会发展中同资产阶级跟封建主义的斗争相类似的内容，不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地位当然也决定了它和工人阶级之间暂时具有斗争的共同性。但是在现阶段无产阶级负有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领导成分的使命，而小资产阶级则是同路的附属的成分，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政党即使在它的道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道路有很长一段距离相重合的地方，也有责任不把自己的斗争限制在同小资产阶级共同的领域里，而是相反，要有计划地超越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图，并极力加以引伸。

即使在饶勒斯所援引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没有建议工人阶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编者注

级同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实行政治上的融合。恰恰相反。宣言作为原则提出了共产党给予革命的资产阶级以支持，然而立即补充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sup>①</sup>

要是饶勒斯想直接用马克思的学说来检验他的策略，那么他就应该首先考虑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后，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主要战斗之后向无产阶级所作的指示，这个指示固然起初是预期革命要继续下去的，后来却也成了和平时期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准则。在1850年的第一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向工人们建议：

“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应当把这些要求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他在列举了一系列具体的例子后在结尾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sup>②</sup>，而且要按照这一精神，即工人绝对要在一切方面比小资产阶级走得更远。（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但是饶勒斯一派在同法国激进主义建立联盟时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们已经看到，坚持米勒兰入阁迫使社会党人把同激进主义的联盟作为自己整个策略的牢固的基础，因此愈来愈缩小和背弃革命的阶级斗争。

首先，社会党对政府的批评和国内的政治启蒙工作停止了，政治斗争集中在议会中进行。其次，在议会本身也放弃了反对派立场。关于大赦法的表决向我们表明社会党右翼放弃了反对政府的独立斗争。

但是还在继续滑下去。在关于结社法的讨论中饶勒斯的朋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着重点是卢森堡加的。——编者注

<sup>②</sup> 同上，第391页。着重点是卢森堡加的。——编者注

们又向前走了一步。十名社会党议员在2月4日的会议上竟走到这样的地步：由于政府拒绝了一个以保护工人的结社权为目的、由整个社会党议会党团签署的提案，**他们投票反对自己的提案！**我们在这里看到社会党人从一个负有进行原则的阶级斗争、领导国内全体反对派的使命的党，变成议会中临时组成的动摇不定的派别，变成一个傀儡，其活动由资产阶级政党来决定，并且正如从前的激进派于尔班·戈伊埃在《曙光》上以令人震惊的蔑视态度称呼他们的那样，变成了一群“马木留克兵”<sup>①</sup>。

因此饶勒斯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正象他援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一样，是站不住脚的。在我党的历史上和目前的实践中没有一个地方找得到任何一种同社会党人入阁的理论相似的观点或者支持它的论点。

当然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同任何社会主义政党一样在发展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策略。但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不断扩大和加强阶级斗争**，但从来不是**放弃阶级斗争**。因此饶勒斯所拥护的策略远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法的一种结果，它对于德国工人运动以及法国工人运动来说完全是一种“新方法”。

只有当人们注意到饶勒斯策略的最后结果时，才会懂得使法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派别发生分裂的深刻内在矛盾。

最近，特别是从德雷福斯案件以来，在我们报刊上也渗透进一种观念，似乎法国的兄弟之争的原因在于，革命派的代表，即盖得和瓦扬的这两个老的党信奉一种十足宗派主义的教条狂热主义以及一种僵死的弃权政策，他们对日常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要求漠不关心，而饶勒斯派则代表了社会党策略的生机勃勃的发展、对政治

---

<sup>①</sup> 马木留克兵是埃及中世纪的禁卫军，大都由奴隶组成。——编者注

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多样性的适应以及对工人阶级当前利益的关心。

这种观念是以对法国社会主义实际状况的完全忽视为依据的。恰恰是工人党(所谓盖得派)和革命社会主义党(所谓布朗基派)这些老的组织开辟了法国社会主义进行活动的实际斗争的全部道路,并且制定了一种其基本特性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致的策略,虽然大家知道法国和德国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上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

正是工人党首先在法国把议会活动按照该党经马克思校订过的纲领的说法“从资产阶级欺骗的工具”变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而且不仅是为了达到鼓动性的启蒙工作的目的,也是为了争取目前的实际改良的斗争。

我们有意举出 1889—1893 年这一届的议会会议,在这一时期,饶勒斯派的最优秀的力量还没有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法国工人党的代表在上述一届的议会会议上建议并在议会中主张:1. 实行象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完整的劳动保护纲领;2. 禁止工厂中实行罚款,由劳资双方人数均等的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修改工厂规则;3. 将所有的工人救济基金交给工人管理;4. 禁止在发生劳动冲突时使用军队;5. 对于企业主侵犯结社法实行刑事追究;6. 改组最高劳动委员会,使其一半成员由工会选举产生;7.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男女工人平等的最低工资,禁止国营火柴工厂雇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8. 煤矿国有化;9. 把劳动保护扩大到商店和家庭工业,最后,由工人选举工厂视察员。我们在这里看到最详尽的议会改良工作,它同我们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活动完全符合。

上述两党在本届议会中的活动也是同样的情景。当事情关系到劳动保护或酒类税,对外政策或劳资仲裁法庭,捍卫议会的监督

权和预算权或捍卫共和国反对僧侣时，布朗基派议员的优秀队伍及其“共产主义同盟”和法国工人党的同盟者——布雷东、德让特、格鲁西埃、桑巴、瓦扬、泽瓦埃斯等总是站在战斗的前列。

上述两个党组织同样在法国**市镇参议会**中展开了可以看作其他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典范的活动。单是法国工人党就在一百个以上的市政机构中占多数，在几百个市政机构中占强大的少数。他们年复一年不倦地从事的建设性细小工作遍及教育、卫生、救济事业、照明、供水、甚至戏剧和艺术等各个领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工作不是属于过去的，它直到今天还在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着。

最后，在**工会斗争**的领域里，盖得一拉法格的党以及瓦扬的党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法国工人党在1882年就已经承认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以后，它在1890年向它的全体成员建议参加相应的工会，这个决议是同我们德国工会的愿望相适应的。它在1895年决定提出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一切劳动部门中工会章程对于所有从业工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它通过自己不倦的鼓动创建了纺织工人、海员、皮革工人的全国联合会，许多地方的矿工工会等等，并且领导了所有重要的罢工斗争：1882年在罗昂，1885年在德卡兹维耳，1890年在加来，1892年和1895年在卡尔莫，目前它在夏龙和蒙索累明开展活动。最后，当饶勒斯及其朋友们用一切方法助长法国工会活动家的空想——总罢工的思想时，工人党企图通过同这种思想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来把工会运动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当饶勒斯派为了政治上的利益想使工会同社会主义政党完全合并的时候，盖得和瓦扬则为了工会自由发展的利益维护工会对于政党的组织上的独立性。

由此可见，在法国社会主义的所谓“反内阁主义”派和“内阁主

义”派之间所争论的不是关于实际工作还是“革命空谈”的问题。如果说米勒兰的支持者指责他们的对手忽略实际的改良工作，那么，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把实际工作同无条件地赞同现政府的一切行为等同起来了。

谁反对米勒兰—科利亚尔法案，也就是说反对规定童工必须跟成年工人同样长的劳动时间，那么，他就是**反对劳动保护**！谁把政府关于宗教团体的提案说成是不彻底的和毫无用处的，那么，他就是为**教权主义反动派的胜利**效劳！谁向全国揭露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共和主义的”卑劣行为，那么，他就是**反对保卫共和国**！

这种说法同德国国会中的反动派的奇谈如出一辙，他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说成是社会改良的反对者，因为它曾反对俾斯麦的劳动保险。

实际上法国党内的争论涉及的不是实际工作，而是实际工作的**方式方法**，实际工作的“**两种方法**”，只有从法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才能判断和理解这两种方法的矛盾的全部尖锐性。

在君主制的国家，例如在德国，共和制仅仅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要求，因此同社会主义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共和制在法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必须对这一形式进行批判和反对。只有当社会党人得以破除对于共和制国家形式的幻想，揭露其社会内容时，他们才能够使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阵营并且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政党。社会主义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同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进行不断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盖得派和布朗基派（部分地还有所谓阿列曼派，虽然是以另一种途径，即通过极端否定政治斗争）这些老党的不朽历史功绩就在于促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实行分裂。

将近二十五年来，盖得、拉法格、瓦扬及其朋友们不倦地致力于加深无产阶级和共和派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壕沟，而饶勒斯策略



的客观倾向就是要重新完全填塞这一壕沟。如果说这一倾向在议会党团的态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那是因为除了饶勒斯的追随者外，还有他的坚决的反对者瓦扬、泽瓦埃斯及其同志们参与决定议会党团的策略，并在很大程度上使饶勒斯的指示丧失了影响。

当然，饶勒斯派也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他们坚决相信，通过他们的“新方法”恰恰能够给社会主义立下巨大的功绩。饶勒斯自己在1900年2月10日在巴黎所作的一次演讲中甚至声明在所有基本的理论观点上同意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是一个党是什么样子，并不在于它把自己说成什么样子和以为自己是什么样子，而是要看它的行动。尽管饶勒斯具有真诚的社会主义信念以及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极大的献身精神，饶勒斯派活动的决定因素，即它的政治策略恰恰导致工人阶级重新溶化到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阵营中去，这就是说，使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所完成的全部事业重新化为乌有。

正是由于害怕重新沦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老的社会主义组织才往往在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日常的政治利益这一点上走得太远，并且在共和国危机中向工人阶级提出了弃权的口号。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德雷福斯危机中袖手旁观，而不是相反地站出来领导运动并从而决定运动的方向，这无疑也是一个令人遗憾不止的事实。

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出于对政治形式的漠不关心，那是完全错误的。早在1889年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就在对布朗热危机发表的宣言中明确地宣布：“共和制是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政治形式。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共和制。”

即使现在，两党在议会中也支持“保卫共和国”内阁，把它当作较小的祸害，尽管它有种种卑劣行径。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保卫共和国，而在于工人阶级党应当是同

一切资产阶级相对立的独立政党，还是只应当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一个消极的组成部分。

考茨基两年前曾说过，饶勒斯通过他的德雷福斯运动挽救了法国社会主义的荣誉，那么今天必须说，盖得和瓦扬通过他们顽强地抵制社会党人入阁不仅挽救了社会主义的荣誉，而且挽救了社会主义本身。

从最近一次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以来，法国社会主义的情况完全改变了，而人们在国外没有觉察到，也没有重视这种转变的影响。

在代表大会期间饶勒斯派得到很大的国际同情，这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由于他们勇敢的**德雷福斯运动**和由于他们争取社会主义统一的有力行动。

此后，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分子在德雷福斯危机中的合作，由于米勒兰入阁事件插了进来，就蜕化为对政府和激进党盲从的政策。这一来饶勒斯及其拥护者就把他们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在一个时期内取得的在工人阶级政治斗争中的领导地位重新让给了老的党组织，这些组织现在同过去一样，是国家政治中的先进部分。

由于饶勒斯派在对待米勒兰入阁的态度上丧失立场，米勒兰入阁对于社会主义统一问题同样是非常不幸的。米勒兰事件作为德雷福斯危机期间的一个特殊情况还可以勉强加以辩护，因为那时不仅法国的当事人，而且外国的观察家都觉得共和制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在内阁的保卫行动失败后，为米勒兰的行为辩解的任何借口都消失了。但是饶勒斯却不再把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看作是一种例外的措施，他在利尔和布尔日的演说中，同他所接受的第一次法国统一代表大会（1899年）的决议以及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考茨基决议直接相对抗，把社会党人入阁说成是工人运动的正常斗争手段，是“新方法”，这一来，他就把他那一派的活动置于这样

一种基础之上，在这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统一是非常困难的。由此可见，现在恰恰是饶勒斯这位团结思想的不倦的代表者由于坚持一种策略（向这种策略作斗争不仅是他的社会主义对手们的权利，而且是他们的义务）而葬送了他自己的事业并成为不团结的因素。

由此可见，从国际代表大会以来，事态发生了整整一百八十度的变化，这一情况使社会主义界对法国党内状况的看法有必要作一次根本的修正。

对于我们德国来说尤其如此。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外国的一个在所有基本特点方面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党，也没有任何理由赞扬外国的这样一种倾向，在我们这里，在所有的实际场合，这种倾向只要稍一冒头，党就要加以反对。

实际上我们在饶勒斯的策略中重新发现了我们在德国也已经熟悉的社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所有基本特点。关于法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复兴的理论不过是关于小手工业稳固性理论的政治摹本。把社会党的政策降低为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采取共同行动，这就是在实际上克服“贪食奇谈”。取消对“共和主义”政府的任何批评以期待它乐善好施的行动，这就是“向善意伸出手来”这一原则的实现。目光短浅的无原则政策（它唯一指靠议会中暂时的组合），这就是“随机应变”政策的体现。而实行高额粮食税的社会党人部长，这就是“实际政策”对灰色“理论”的极大胜利。

因此，如果法国米勒兰入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策略在我们这里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得到机会主义的拥护者最热烈的同情，那么，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情况也使得米勒兰事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

我们现在在法国看到一次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策略的出色试验，在其他地方缺乏这种试验的一切前提。在德国，不仅由于国家

的政治状况,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团结一致,看来使这一策略的拥护者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论来塑造工人运动并把他们的意向付诸实现。他们只能在“实际工作”的空谈方面下功夫,却无法造成值得一提的影响来进行这种“实际工作”。

在法国我们现在看到行动中的机会主义。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中特殊因素的独特结合,它骤然间取得了权力,“实际工作”的词句在付诸实行,纸牌上的国王骤然间成了真正的国王。它手中掌握了权杖,它可以表明它能够干些什么。

它正在表明这一点。

它一半已经陷入窘境,它很快将彻底地名誉扫地。瓦尔德克—米勒兰内阁的经验有助于打消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对机会主义试验的兴趣。因此我们祝愿它长寿!

发表于《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1册第495—499、516—525、548—558、619—631、676—688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5—73页。

(李兴耕译)

## 巴登的预算表决

(1901年4月)

在我们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曾经有人说，如果在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新的观点”，从而使“老一套的喋喋不休的宣传”能有一些新的花样，那我们应该高兴。看来这是象过去一样，非常关心使党的单调的“喋喋不休的宣传”不时地插入一个有趣的插曲。在稳健的、紧张的反反对咄咄逼人的反动政治的自卫斗争中，在我们队伍中周期性地出现的越轨行动就起了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用，我们的巴登邦议会的议员们赞同预算就是又一个例子<sup>①</sup>。

为了论证这种否定我们迄今公认的斗争方式的行为，或者更准确些说，为了给它辩护当然只是援引了那些不仅是陈腐的，而且早就在讨论中被驳倒的理由。

事实上，最近在奥芬堡<sup>②</sup>举行的党的会议上，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能够拿得出来的仍旧是那个老调子：预算表决是策略问题，不是原则问题，德国各邦的预算与帝国的预算不同，大部分不是军事经费，而是文化经费。因此，象对所有的策略问题一样，可以完全听任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决定自己的态度，这就是说，根据情况赞成或反对预算。同时，党在各个邦并不象在整

---

① 1900年5月28日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巴登邦议会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巴登邦代表会议于2月24日在奥芬堡举行。——编者注

个帝国那样面对巨额军事经费，因此没有始终非拒绝预算不可的理由。

这种论证尽管毫无价值，但看来在党内仍旧有一些人是对它认真看待的。这些观点的一般表述刚刚才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sup>①</sup>上遭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拒绝，而这一次从本质上说来无非是要把它们贯彻到实际中去，而且巴登的同志们既不是最先也不是唯一走上赞同预算这条路的，所以党必须透彻地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且最终阻止我们的邦议会议员们继续用资产阶级政策进行实验。

—

我们党内有一个派别，一般说来它的特征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一再把社会民主党的行动说成是策略问题，也就是随机应变地纯粹以实效为理由作出决定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不是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指南，而是一种锁链，是执行所谓“实际政治”时的一种障碍。看来他们根据的是这种天真的设想，认为把任何问题称为策略问题，就足以使一切违犯党的纲领和原则的行为得到特许证了。根据这种理解，可以说把“策略”设想成一个没有警察的警告牌的死角，人们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地堆放一切瓦砾和垃圾。因此只要把我们的整个阶级斗争一部分一部分地从原则的领域偷运到策略的领域，就足以使他们用这种聪明的和舒适的方式来“挖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是“挖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且把社会主义本身变成一个“策略问题”，就是说使党成为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党。

---

<sup>①</sup> 指1899年10月9日—14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编者注

不过他们忽略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所表现的决不是在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方面的多样性，而是在运用这些原则方面的多样性。我们党的策略是事先就被我们的原则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它能在这些范围内，而不是在这些范围之外发展。只能允许策略变化在党的原则范围之内进行，而把一个问题说成是策略问题，还决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可能和责任从原则性角度检验这个问题的既定的解决办法。恰恰也有一种**违犯原则的策略**，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最近人们喜爱的那种关于策略的夸夸其谈就达不到目的了。仔细检查起来，经常发现这不过是掩盖违背社会民主党原则的行动的一种方式，目前这个事例也符合上述情况。

自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存在以来，批准财政立法就被看成是对国家投信任票，反之，拒绝这一立法被看成是表示对国家不信任。对一个我们不满意的政府，我们不批准给它经费；任何一个严肃的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原则历来都是这样的——从英国自由党到普鲁士进步党都是这样的。

社会民主党不仅反对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反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因为它绝对地反对**阶级国家**，这正是它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同之处。拒绝给这个国家以物质手段，这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是一个实效问题，正如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是一个实效问题，正如我们致力于消灭雇佣制度和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一个实效问题一样。这里涉及的是我们作为一个进行阶级斗争的党的本质问题。从这个立场出发，在帝国预算和各邦预算之间不存在丝毫差别。

我们认为，关于军事经费和文化经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是多还是少这一数量方面的考虑，只有在我们一般说来站在现今国家的立场并且仅仅反对它的畸形发展、比方说反对军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才具有决定性意义。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把我们拒绝帝国预

算的理由仅仅归结于预算中包括军国主义经费，这样他们就把一种固然适合资产阶级、但迄今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承认的政策加罪于我们。事实上，我们拒绝让人民纳税支付德意志帝国的经费，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军事国家，而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但这一点对德国各邦是同样适用的。

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认为，巴登的预算“十分之九是文化经费”，“一方面向政府提出种种社会要求，同时又拒绝主要包括文化要求的预算是没有意思的。”（1901年2月27日卡尔斯鲁厄《人民之友报》关于奥芬堡党代表会议的报道。）这是企图把德国各邦的对内政策说成“主要”是超越任何阶级特性、符合社会民主党的社会要求的文化工作。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巴登政府实现了我们纲领中的哪一点“社会要求”。我们的邦议会党团能把什么看作是巴登预算中这类符合社会民主党意图的“文化”项目呢？显然是：**巴登官僚的薪俸**，而人民群众对于他们的任用是一点也不能施加影响的；**警察、宪兵队、法院和监狱**的经费，而这些都是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维持“秩序”和惩处社会民主党罪行的；**巴登国有铁路**的管理费用，而这些铁路是靠剥削工人和职员获取它们的利润的；**农业**的费用，其中十分之九在农业方面的“文化目的”的借口下是有利于大地主的；最后还有**教育事业**的费用，而就其整个精神来说，这首先是为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着想的。这一切都是用绝大部分从没有财产的人民群众口袋里拿来的经费支付的。一句话，按照芬德里希的看法，巴登政府的全部**阶级政策**都是文化工作，对此我们党的“社会要求”本身就决定我们应当予以支持，但巴登政府同任何另一个政府一样，在整个实践活动中已证明自己是“管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事务的委员会**”。

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考察我们的巴登邦议会党团的活动。根据奥芬堡党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观点来判断——例如芬德里希在那



里说,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在巴登代议机构中的行动整个说来恐怕很少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气味。哪怕他们曾经对政府的整个政策严格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进行过坚决的批评,但是既然他们终于批准了这个政府的经费,那么他们以前的反对派言论就成为空话了。判断一个政党的政治态度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使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区别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决定性因素,是对整个资产阶级政府持原则上反对的态度,而这一态度最明确地表现在否决财政立法。被巴登的选民派到邦议会同巴登政府的阶级政策进行斗争的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由于批准预算而成了这个阶级政策的帮凶,并且要为它共同承担责任,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否定了自己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代表的特性。

## 二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策略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一种从原则立场上看应受谴责的政策,永远不能从策略立场上被看成合适的。

假如我们转到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的立场上,并且暂时假定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各邦的预算表决中的态度完全是一个策略问题。同样让我们和他们一道假定,我们党之所以在帝国议会拒绝财政立法,是因为它绝大部分是为军国主义目的制定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从巴登议员自己的策略立场出发,他们批准预算也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

由于德意志帝国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着一种有机的统一性,因此拒绝给帝国经费,却批准个别的邦的经费,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矛盾的行为。他们赞同以军国主义为理由而拒

绝批准帝国预算，但是军国主义决不是由德意志帝国在各邦之外的某一地方，或者在各邦之间的空隙里培植的，而是由巴登和所有其他各邦积极地或消极地**共同培植**的。正是德意志各邦在军国主义问题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反动态度，正如在最近的舰队法草案<sup>①</sup>中所表现出的那样，首先应该为普鲁士德国今天执行的方针负责。同样，对**关税政策和对内政策**也可以这样说。南方各邦参与了帝国的面包投机、苦役监禁法案<sup>②</sup>和全部对内对外的反动政治，正如它们参与了陆上和海上的军国主义活动一样。

关于帝国预算和邦预算，帝国政策和各邦政策之间存在原则性区别的看法也是南方一些党员经常流露的观点，根据那些观点，只把目前的反动政治归罪于帝国，特别是归罪于普鲁士，南方各邦却被看成是自成一体的政治组织，它们本来是民主的，只是由于在普鲁士面前软弱无力才被迫参与普鲁士的丑恶勾当。但是，这种说法无非是毫无批判地跟着济格尔<sup>③</sup>之流的南德意志分离主义者学舌，他们作为真正的小市民不能理解南方的“民主”与北方的反动之间的历史的、辩证的联系，他们乐意采摘现代化中央集权制大国生长的美丽的花朵——经济的蓬勃发展、政治的实力地位——却把这种发展的另一面，即处于普鲁士霸权控制之下的中央集权制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政治看成是讨厌的、多余的附加物。

实际情况恰恰是，帝国是以南方各邦的名义并且为了南方各邦而培育军国主义的，正是这一情况使南方各邦能够在自己国内显得象是受压迫的、民主的无辜者并且“主要地”致力于芬德里希

---

① 见本卷第270页注①。——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37页注②。——编者注

③ 约瑟夫·济格尔——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巴伐利亚祖国报》的编辑和帝国议会议员。——编者注

所说的“文化任务”。在今天这种形式的德意志帝国内，除了经济发展也就是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外，帝国主义作为这一发展的政治补充，对于各邦来说，是最强大的联系环节，是统一的要素，是团结的要素。因此，德意志帝国的反动不是帝国的南方各邦在政治上无权的結果，相反，这种无权却是德国各邦普遍的军国主义发展的逻辑結果，这种发展用铁链把它们与帝国和普鲁士绑在一起了。

德意志各邦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只组成一个國家，同样，各邦的預算完全是对帝国預算的补充，各邦預算和帝国預算在政治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邦預算仅仅是根据表面的、历史的特性才和帝国預算区别开来，单独提出并投票通过的。

要看到这一点，绝对不需要掌握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个真正严肃地进行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的资产阶级政党，只要它有几分远见并且执行目标远大的政策，它就一定会在各邦采取同对待帝国一样的那种反对派态度。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到全面的政治发展及其重要的内在联系，因此从党的立场看来，人为地把各邦的政治与帝国的政治分开就是直接倒退到小资产阶级分离主义的狭隘性，而且批准各邦的财政经费就是在各邦支持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和反动政治，而人们通过拒绝帝国預算来加以反对的正是这个军国主义和反动政治。

### 三

每当人们想让党放弃原则性的立场时，用的都是“实际政治”的名义。芬德里希在巴登邦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也说：“人们在进入这样一个立法机构（邦议会）时得到了这样的经验：要从理想概念世界走出来，进入事情难以解决的实际情况的世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可以实现的事情上，而不是放在

值得想望的事情上。”(1901年2月27日《人民之友报》)

从“可以实现”的立场出发，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从前已经多次批准巴登预算，正如现在批准申克尔内阁预算一样。这样做他们得到了什么呢？

让我们暂且再一次站在我们的“实际政治家”的立场，并且让我们假设，这首先关系到使著名的“文化要求”得到保证的问题。如果预算的命运取决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表决，那么不管从原则立场和策略立场来说批准预算是多么不合理，它至少还有一点实际意义。但是我们的七人党团在巴登邦议会是一个极小的少数。不管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赞成还是反对，这个预算连同他们如此珍爱的“文化经费”反正会被批准。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非批准预算不可的理由，因此芬德里希的策略的全部“实际”意义等于零。

这正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只要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还是少数派，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涉及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国家的存续问题时，它的表决只有纯粹宣传上的意义。由于否决预算是用坚决的方式表示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可调和的态度，因此它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向人民群众说明它在议会中的立场的强有力的武器。可见社会民主党否决预算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对人民在道义方面的影响，但是只有当这种否决是经常的和成为原则的时候，它才能保持这种意义。

如果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根据资产阶级的模式把否决预算变成一种仅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议会斗争的实用手段，那么他们就不仅轻率地放弃了他们作为反对派的宣传的作用，而且他们也不会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任何影响。

要详细了解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由于在巴登再一次投票赞成预算而取得的实际成果，只要总结一下在奥芬堡代表会议上发出

的对政府的那些抱怨就足够了。首先我们从报告人奥皮费修斯那里听说,巴登的警察(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正是批准了给这些警察的薪水)没收了我们巴登同志的一份印了十万张的传单,警察在上一次五一节也进行了“非常粗暴的”干预,并且在很多城市由于游行而惩罚了工人。报告人芬德里希告诉我们,政府(他们正是给这个政府投了信任票)一点都不考虑铁路工人的一项关于提高薪金的请求,同样也不考虑建筑工人的一项涉及国家监督建筑的请求。最后,我们还从芬德里希和德累斯巴赫那里听到,社会民主党为争取**邦议会和市镇议会的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而作出的一切努力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徒劳的。单是这一情况就足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巴登邦议会的策略的“实际方面”了。这个国家以种种形式给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制造障碍,无耻地剥削自己的雇佣工人而对他们最微薄的要求充耳不闻,这个国家甚至拒绝给予工人阶级以起码的政治权利即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批准给这样一个国家以维持生存的经费,这确实是为自己争取权力并且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的最有独创性的手段。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事实:一旦社会民主党离开原则性政策的坚实基础,它就会比资产阶级政党堕落得要深得多。我们倒想看看有哪些资产阶级政党会在受到象巴登社会民主党所受到的那种对待时还给政府投信任票。如果资产阶级背叛了他们自己的原则,它至少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它每次这样做时都看得到或多或少会使他们满意的好处。但是,怀着无私的爱而俯首帖耳地吃耳光和挨拳打脚踢,这是唯独我们的“实际政治家”凭着天才的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才能做出来的。如果他们想象自己是为了实际的考虑而放弃原则,那么这一次同过去一样,只能是自我欺骗和过高估计自己。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没有任何实际目的的丧失原则的行为,说得更正确些,**是为了原则而丧失原则**。

巴登事件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人们可以看清我们的一些邦议会党团的策略。而且如果芬德里希和其他同志发誓说他们是在“严格地维护党的原则”情况下执行他们的策略的，那么党的任务是，一有机会就向他们讲清楚，在严格地维护社会民主党原则的情况下批准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的经费，就等于说，例如在严格地维护博爱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在严格地维护财产权的情况下盗窃，在严格地维护道德的情况下卖淫。

发表于《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14—20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77—85页。

(苏冰桐译 殷叙彝校)

## 关于《新时代》的政治态度\*

(1901年8月)

在8月23日柏林第三选区的会议上,有几位发言人又谈到了《新时代》的政治态度<sup>①</sup>问题。前进报是这样报道的,“伯恩哈特同志说:我认为《新时代》的情况远比这里谈到的糟糕得多,它现在相当片面,而且看来只为某一种思潮办报。象伯恩施坦、席佩耳等等这样的撰稿人在该报上已经看不到了。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这家科学的中央机关报直截了当地否定在党内的一方占优势的观点。海涅证实了这一事实并说明,伯恩施坦是自己辞去撰稿工作的<sup>②</sup>,因为他在《新时代》上遭到的那种形式的攻击已使他不可能继续为该报撰稿。想在党代表大会上改变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由于《新时代》的订户愈来愈少,党不得不承担损失,而《社会主义月刊》的版面却向每一种观点开放,因而它的订户愈来愈多了。”

考茨基同志目前不在此地<sup>③</sup>,如果他认为值得费劲<sup>④</sup>那就让他

---

\* 这篇文章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近年来发现的卢森堡的手稿。1982年首次发表于《德国工人史论丛》。卢森堡在手稿上作过多处删改,现将她删改的地方在脚注中注明。手稿原来没有标题,标题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① 原为“政治倾向”。——编者注

② 伯恩施坦是《新时代》的常任撰稿人之一。——编者注

③ 1901年考茨基在奥地利舒尔茨休养。——编者注

④ 原为“觉得有必要”。——编者注

来回答对他的编辑工作的攻击。不过，我们作为撰稿者并从而对《新时代》的“片面性”也负有罪责的人要在这里对显然已在柏林第三选区顺利地萌芽滋长的混乱情况作一些纠正，以澄清视听。

1. 《新时代》的“片面”是事实，也就是说它和党具有同一的思想和标准，它是特别适合担负党的思想指导工作的。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机关报，它当然应当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服务，而不应当为传播疏懒的大学生、提倡社会改良的教授、以摧残社会主义者为职业的人、民族社会主义的浅薄爱国者以及其他没有地盘而专靠鼓吹舰队政策、消费合作社和修正马克思混饭吃的政客们的“多方面”<sup>①</sup>的混乱思想服务。

2. 上述事实完全不排除《新时代》也在它的版面上向不同于自己的观点提供最自由的天地。证据：在伯恩施坦已经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公开决裂以后，他仍然担任了一年撰稿人。

至于伯恩施坦终于退出《新时代》的集体，这并不象海涅的不真实的报告所讲<sup>②</sup>的那样是由于伯恩施坦受到了攻击，相反，伯恩施坦是在《新时代》上对考茨基进行了一系列的、而考茨基没有给予回答的挑衅以后这样做的。（见1900年4月28日第31期和5月5日第32期<sup>③</sup>）

又一证据：新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爱斯纳的文章在关于社会主义入阁问题上是和《新时代》的观点截然对立的<sup>④</sup>。再一证据：席佩耳（海涅的选民因为看不到他的关于民军的文章而感到十分

---

① 原为“机会主义的”。——编者注

② 原为“所强调的”。——编者注

③ 指爱德华·伯恩施坦，《我对倍倍尔决议的态度》和他退出《新时代》的声明。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334—351、414页。

④ 参看艾斯纳《议会主义和内阁主义》（《新时代》1900—1901）第2册第489—491页。——编者注



痛苦)大约也不是《新时代》使他放下他那好斗的笔的,不如说是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之后,他象夜莺在秋天沉默下来一样完全自愿地搁笔的,这是为了给他自由灵魂的飞翔寻求更温暖的天地。最后,海涅总该想得起来,甚至他本人,这位为政治上多面性<sup>①</sup>辩护的野心勃勃的<sup>②</sup>律师也是《新时代》的撰稿人,而且据我们所知,至今他还未曾有过因为自己的精神产品被退回而痛哭的事情。我亲爱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新时代》当然不能由于殷勤好客而不再维护一定的方针,即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和爱尔福特纲领的方针,而单纯<sup>③</sup>从各种政治风向拼凑和捡拾文章,从而变成大大小小的奇才们的“多方面的”垃圾堆。这<sup>④</sup>肯定会使我们党内一些野心勃勃和多方面<sup>⑤</sup>的奇才感到很痛苦的,但多半是不会改变的了。要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至今一直是党内大多数人的决定性方针,而海涅同志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他这样地居心不良,竟劝《新时代》去当危险的“多方面性”的养子。他比许多别的人知道得更加清楚,在我们党内,如果有一个人持有看来象是妥协政策和与此类似的机会主义的“多方面的”观点,哪怕他根本没有把这些观点讲出来,他也会多么遭人厌恶。如果这个人要指天誓日地向全世界证明,他从来没有把这些观点形诸于口,那他将是白费力气!有一句中国谚语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译自《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1982年第5期  
第694—695页。

(周懋庸译 殷叙彝校)

① “多面性”后原有“迄今”二字。——编者注

② 原为“热心的”。——编者注

③ “单纯”后有三个被删去的看不清楚的字。——编者注

④ “这”字之后原有“显然”二字。——编者注

⑤ 这里有一个删去的看不清楚的字。——编者注

## 我们的导师的遗著

(1901年9月17日)

弗兰茨·梅林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1年3月至1844年3月）。

一年前一位编纂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目录的资产阶级学者在《政治学手册》中刚刚抱怨说，不但完全缺少“一部详细的马克思传记”，而且也完全缺少“一套包括马克思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马克思著作全集”，并且不能设想在近期内“这项工作能由单独一个人来完成”<sup>①</sup>。现在我们却很顺利地一举完成这两项工作：马克思著作的科学版本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详细传记。

尽管梅林在前言里说，他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只不过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科学版本作准备工作，然而它——如果狄茨出版社答应不久为我们提供的其他各卷也是按这种精神编辑的话——实际上已经是我们这两位老导师的著作的**科学**（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讲）版本了，而且就在这一场合涉及我们的

---

<sup>①</sup> 卡尔·迪耳《政治学手册》修订第2版第5卷，1900年耶纳德文版第707页。——编者注

马克思之处来说，它同时也是我们能够设想的最好的马克思传记。

当然，表面上看来我们见到的第一卷只收集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几篇内容完全不同而且互不相关的著作：他论述希腊哲学的博士论文，其次是关于书报检查与出版自由，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文，还有恩格斯论述国民经济学和英国情况的两篇著作。这些著作本身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单独阅读起来固然会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然而它们对于非常细心的读者来说也始终只是一些里程碑，读者只能从这些著作中想象马克思在这一期间经历过的发展，不能弄清这些著作的内在的和外部的联系。即使根据马克思对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学说的自然哲学加以比较时所作的努力而深入的研究，也很难直接说明这两位古代哲学大师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有什么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说不清楚希腊哲学同三月革命以前的普鲁士书报检查、莱茵地区的林木盗窃和黑格尔法哲学问题怎么能够有内在的联系。

然而梅林在这本书里谦虚地用“导言”作标题插进一些论述，于是从马克思思想活动中的一些形形色色的，孤立的片段中，一个完整的、充满活力的形象、一个甚至可以捉摸到的、生动的人物就逐渐出现在我们眼前，以他为中心，所有一切同他亲近的并且在思想上经常同他交往的人——亲戚，老师，朋友，同学和战友——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人物重新被人想起，或近或远地围绕着他活跃起来，我们看到他们诸位生气勃勃，在活动，在斗争，在思考，在工作，和马克思以及彼此之间保持思想上的接触，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自己特殊的精神素质和兴趣，甚至表现出自己的性格和脾气。这一群人和我们靠得如此之近，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思考和交谈。梅林以他们为中心设计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历史场面，近景是思想和政治状况，各种时事问题和有争论的问题，各种思潮

流派、党派、大学生活，著作界，资产阶级社会，官方；在远景中他概述了历史事件的一般特征，并且粗略地但清楚地把在变动和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作为总的背景。

梅林就这样把马克思生活中的思想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片断联成一个整体。他不是把马克思从他那个时代割裂开来，把他象一个陌生人、一个曾经存在的人、一个已经逝世的人那样摆在我们面前，让他用一种混乱的、令人似懂非懂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他的思想抱负和斗争。梅林使我们摆脱我们这个时代，置身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置身于那个时代的活跃的生活之中，共同经历、共同体会那一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中战斗、成长和发展。

梅林在写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时已经显示出自己是描绘历史环境的大师。但从目前这本书来看，我们认为他在这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也许是因为这幅图画画面较小，可以在艺术上更加细致地调色；也许是因为这幅画是以梅林对之倾注了那么多真挚的爱的一個形象为中心的。

梅林的那些“导言”所占用的篇幅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而且形式上看他被迫把这些导言作为单篇的、独立的、每次都是研究不同材料的片断插进来，时而描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统治权术，时而介绍希腊哲学，时而说明莱茵地区工业的发展情况，时而叙述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哲学和政治杂志的幸与不幸。正是由于这一情况他所取得的成就不得不使人感到吃惊。但是他也善于用寥寥数语刻画出一个形象，用有力的几笔展开一幅历史前景。他自己很少或者几乎根本不涉及次要人物，却通过突如其来地在毫不相干的地方插进一些从他们自己的信中或从另一些写给他们的信中摘来的短文的几句话，通过一些顺便写下的，却很确切的简短评语，使我们眼前立刻出现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而对这个人物以及

他与马克思的关系我们就很了解了。比方说卢格<sup>①</sup>的形象就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出现，他那喜欢埋怨的、略欠豁达的正直品格，他那热情的努力和斗争无疑激起了我们的同情，但从他身上我们也清楚地感到，他不可能在思想方面来对马克思的发展起任何值得一提的作用。

我们在近处多次遇到布鲁诺·鲍威尔<sup>②</sup>，他的精神力量无疑是令人敬佩的，但我们本能地感到他是不可信赖的，我们认为，他尽管比周围的人高出一头，但是同有着火一般热情的、还不太成熟的、内心还有矛盾的、正在寻求和探索的青年马克思相比，却是一个侏儒。

如果梅林不使我们完全进入那个时代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之中，我们怎么能和非常正直的老科本<sup>③</sup>结识呢！他以青年人的热情颂扬弗里德里希大帝，把他当作现代启蒙思想、希腊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政治艺术和一切可能存在的道德和天才的体现者！然而我们对于他本人和他在思想上对马克思的影响有很好的了解，并且愿意紧握他那真挚的手，因为他把心爱的著作献给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创立者。然而被梅林从历史文献的废墟中第一次发掘出来的科本的形象不过是一颗人造的珍珠。

但是梅林用最丰富的色彩着意刻画的是老马克思的形象。德国工人阶级恐怕是在这里第一次对自己的伟大的先驱的父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正如在给他儿子的信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这位卓

---

① 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编者注

②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③ 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1808—1863)——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佛教史专家。——编者注

越人物的聪明智慧、他的清晰的思想 and 端正的品德引起我们的仰慕，他成了我们热爱和尊敬的朋友。

马克思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壮大起来的，他们就这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烈地吸引了我们。我们与那个时代柏林的思想领袖们交往，深深地关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命运，我们和这一群青年黑格尔分子一起为反对伪善而斗争，我们参加《莱茵报》编辑部同科伦书报检查官的斗争，和受难的编辑们一同迁往巴黎，我们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德法年鉴》的创办，预感到将会发生新的问题，出现新的前景。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这样一个人的传记理解为他的精神生活的全部丰富色彩和整个成长过程的再现，那么梅林——就他在第一卷中研究的那一段时间来说——也就提供了完满的马克思传记。一切有可能对马克思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个人的和社会的、伦理的和科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每一种都充分地得到了考虑。梅林决不试图根据传记这个词的传统意义来撰写一部传记，他决不试图用倒叙的方法来“说明”已经发展成熟的马克思，正是这种情况保证了每一种因素都得到了它应有的那一分考虑。他的作法刚好与传统相反，他从头开始再现尚未成熟的、正在成长的马克思，他只逐步指出表明马克思的每一次思想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突出部分，让整体本身去对读者产生影响。而正是我们从书里对这个时代和这个人物的描绘中获得的和谐的印象，正是我们在注视和了解马克思的成长时产生的满意心情，提供了说明马克思发展的具有“充分根据的”保证，保证一切都象梅林所阐述的那样、并在那种程度上共同构成了这个伟人的一生。

马克思有一次（目前我们无法查找这句话的出处，它肯定是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某个脚注里）说过，决不能用向过去追溯一个事件的原因的办法，而只能用以过去为起点再现一个事件的办法

来检验对于这一事件的解释是否符合唯物主义。马克思就是这样再现法国二月革命和拿破仑政变并从而说明这些事件的。现在梅林也就是这样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把马克思本人当作德国思想中的一个光辉事件而加以再现的。而且由于他在这样做时在历史哲学观点方面也忠实地遵循马克思，从人的环境来说明人，从历史来说明环境，从经济史来说明政治史，所以梅林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书是学生向导师的最崇高的敬意的表现。

我们也不知道，除了刚刚提供给我们的这本书外，还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科学”版本。从作家和他的时代出发去阐明每一件思想作品是科学性的最高准则。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所有现在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一方面同他个人的发展有联系，另一方面也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德国的思想流派和社会状况有联系。梅林用两种方式来说明每一篇文章，首先是具体地说明材料本身，其次是说明它与马克思及他那个时代的联系。例如对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在这里同时看到的是一篇希腊哲学史简短的、但是概括而精辟的叙述，直到它以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作逻辑的结局为止，还有一篇德国哲学发展的叙述，直到它达到与上述各希腊学派的共同点为止。最后还从上而涉及的那些题目角度对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本身作了评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每一次既了解到所涉及的问题对于马克思和他那个时代具有的意义，也了解到马克思为那些问题作出什么贡献。结尾时，梅林又在每一篇发表的文章的后面，用简短的形式对该题目有可能进行的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给予全部必要的指示，并写了文章的题解。

不过梅林出版的这本著作并不是官方的、传统的、学究意义上的“科学”版本，随便举例说，不是象瓦格纳编辑和科扎克书店出版的洛贝尔图斯著作那样的“科学”版本。梅林的版本根本没有教授

先生的那种自吹自擂和厚颜无耻的毛病，这位教授在他所谓的“经济社会主义方面的李嘉图”的著作的前言里除了说他的这个李嘉图是一个伟大的经典作家以外，只字不提他的著作，他的时代，他的重要意义，却啰啰嗦嗦地向广大读者讲述他自己在搜集遗稿时的苦恼以及他与出版方面的竞争对手鲁道夫·迈耶尔<sup>①</sup>和摩里茨·维尔特<sup>②</sup>的争吵，他表现的如此粗俗，使读者感到厌倦，恨不得一挥手把妨碍他去读原著的编者推到一边，这种编者就象一个笨拙的侍从一样，他不把我们引到他的主人那儿去，却把我们拦在前厅听他讲那些废话，说什么他早上如何如何没有把主人的皮鞋擦好并因此受到申斥。

梅林的解释和马克思的文章融为一个整体，使人根本没有感到它是另外一篇著作。一个作者完全溶化在另一个作者之中，评注和它的对象结合成了一本书。而这本书教会我们去理解马克思和热爱马克思。德国工人阶级可以为首先献给他们的这部著作感到骄傲，这本书以大师的手笔描绘了他们的最伟大的导师。

## 二

我们早就从《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自己后来发表的言论中大体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这个不知满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来说，费尔巴哈从人道主义角度对黑格尔所做的修正是“一次启示”，并且推动他去构思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作为从事

---

① 鲁道夫·海尔曼·迈耶尔（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人，俾斯麦的反对者，九十年代为《新时代》杂志撰稿人，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以及《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和《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的作者。——编者注

② 摩里茨·维尔特（1849—1916以后）——德国政论家。——编者注



经济实践的人，通过对英国社会状况的观察而受到激励和启发，他们同时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门。不过我们对于这一内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马克思的内在发展过程的各个细节和大的脉络的认识，从来没有象梅林出版的这本书给我们介绍的那样清楚。

在进一步分析了现在提供的材料之后，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的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到1844年出版《德法年鉴》和与恩格斯在思想上发生接触为止）同时存在着两条彼此独立的线。一条线是继续不断的内心危机，表现为寻找“真理”，具体说，就是寻找解决思维同存在、物质世界同思维过程之间的哲学矛盾的方法。另一条线是同实际世界、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时事问题和有争论的问题的一系列接触。马克思评论书报检查、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的文章，以编辑部名义就摩塞尔河沿岸葡萄酒酿造者问题发表的文章以及论述犹太人问题的文章都属于这一类。这些著作对于马克思的发展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他在老问题上通过不断接触德国实际存在的困苦而对社会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几年以后他就对这一社会写下了死刑判决书；在这些问题上他认识了后来他的哲学思想象闪电般射入的那一园地<sup>①</sup>。当年同马克思共同信奉黑格尔的伙伴鲍威尔、施特劳斯<sup>②</sup>、费尔巴哈没有走出抽象的思辨哲学的领域，而马克思却锻炼成实践的战士了。由于同德国实际保持生气勃勃的、不断的接触，他后来能够在费尔巴哈完成了使人摆脱抽象对人的精神重压这一工作以后立即就以此为依据而把“对于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sup>③</sup>”并且提出这一问题：“德国解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编者注

②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编者注

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那里呢？”<sup>①</sup>

第二，他在这样不断地接触实际的时事问题的时候，每次都痛切地认识到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缺陷，这就促使他重新去研究和探讨主要的问题：一个总的观点，从它出发，可以对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切局部问题提出协调一致的解釋和统一的解决方法。

梅林说得对，马克思在他计划为《莱茵报》撰写但是没有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即关于农民的地产分析这一纯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恐怕不会再同黑格尔的观点和睦相处了。其实，他在这以前论述实际问题时，就已经摒弃了这种观点。黑格尔辩证法这一锐利武器固然使他在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问题的辩论时取得那样辉煌的战果。然而在这里为他效劳的只不过是辩证法即思想的方法；至于说到观点本身，即实质性的态度，那么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为出版自由和为贫苦农民在森林里自由拾柴的权利辩护时，与其说是从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中引伸出自己的观点，不如说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正象梅林自己说的那样，首先是马克思对“贫穷的、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群众”的深深的、真诚的同情，是这颗“心”促使他早在唯心主义阶段就进行斗争，并且决定了他的立场。

我们认为，目前发表的著作所十分清楚地表明的事实非常重要，而且恰恰在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经历了我们自己队伍中的所谓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这种“批判”的主要倾向（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是肢解马克思的学术体系，排除至今恰恰构成它的主要支柱的那些因素；通过客观的必然性进行历史的论证，通过经济分析进行科学的论证。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页。——编者注

据说,单纯凭经验观察到剥削的事实即“剩余产品”,就足以成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基础,只要意识到分配的“不公正”就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合理的。

事实证明,马克思自己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剥削的事实,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他也已对法国和英国的原始形式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好的了解。例如他关于林木盗窃的阐述就是前者的证明,当《莱茵报》同奥格斯堡《总汇报》就共产主义进行争论时,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向奥格斯堡《总汇报》发出的训诫则是后一点的证明。1842年10月马克思写道:“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也不论奥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sup>①</sup>

按照现在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或者——从学生追溯到老师那里——更确切地说,按照在“社会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观点,这些前题已足以为工人运动提供论据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显然还没有能使这个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转向社会主义。在同一篇论述共产主义的文章中马克思表明自己在1842年底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意向。

他作为该报的主编写道:“《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sup>②</sup>

由此可见,对那些蠢材来说,“经验的事实”已足以使他们去进行一种平庸的“经验”社会主义的笨拙改名工作,但它们却不能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33页。——编者注

天才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因为还缺乏普通概括性的、有成效的观点，缺乏用来建立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大厦的坚如磐石的基础。马克思必须通过另一条道路来达到这一点，这只是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一场论战之后才有可能。

现在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经历过的内心危机的三个重要界标：1837年11月10日卡尔写给他父亲的、令人惊奇的长信，几年前已经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但是现在同马克思整个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才充分显示它的重大意义；其次是在这卷书里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最后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从这三篇文献中看到，马克思以不同的形式探讨意识与存在的统一这个问题，寻找对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道德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一元论的统一的解释，并取得了一些不同的成果。显然，在他没有亲自参与揭示这种一元论之前，他是不会找到它的。

从后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来看，我们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研究法学并且正是在这一方面作了最重要的研究哲学的尝试，这一情况是特别有利的。其他的黑格尔分子几乎是一味死守在神学的思辨领域里，也就是说死守住抽象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却一开始就在无意之中接触到物质的社会生活的最近、最直接意识形态即法。法的确在许多地方如此清楚地暴露出隐藏在自身中的经济核心，以致连在其他方面没有传染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家有时也不得不对整段整段的法律史作出纯经济的解释，巴塞尔的阿尔诺德教授在六十年代研究中世纪城市所有制时就是这样的。

马克思在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大学生时就开始了第一次内心的斗争，他对于整个法学领域从哲学上作了批判性的说明。当然，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不可能使物质的法学和形式的法学结合起来，因此，这一宏伟的计划失败了。马克思在失望之余转向纯粹的

哲学，我们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看到他力图解决自然哲学中的同样的问题。

对于整个法学领域作出统一说明的任务虽然没有解决，却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痕迹。**社会的存在形式问题**仍旧是他的主要问题。费尔巴哈刚刚完成他在哲学中的“政变”，并且使迄今受到自身思想肆无忌惮的虐待的人重新以血肉俱全之躯登上王位，并且把作为尘世和天国的独裁者的权力交给他，这时马克思立即用这个新获得的尺度回头再去研究他的第一个大问题——法哲学，也就是社会的存在形式。对于费尔巴哈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如果说费尔巴哈把人从人本身的哲学幻影中解放出来，那么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解放作为社会的受压迫和受虐待的成员的人呢？**

一眼就可以看出，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作为普遍的国际性学说、作为历史理论、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作出回答。

马克思从新的立场出发，从无数光彩夺目的、接二连三咆哮奔腾而来的辩证的结论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胜利的一个演绎的图式**。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结尾部分说：“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

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sup>①</sup>

马克思在1844年初是这样写的。这下他倒霉了！他因此犯了一个错误，五十多年以后他的那些从他那里受益的学生还要为此同他算账。这就是他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演绎法**，他**先验地**预见到社会主义胜利和斗争的必然性，而不是简单地以“剩余产品”及其“不公正性”这一经验事实为依据。

相反，只是在演绎法的照耀下，他才对一切所有的“经验事实”有了新的看法，只有在他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根**阿莉阿德尼线**<sup>②</sup>时，他才在现存社会日常事实的迷宫中找到了这一社会的发展和灭亡的科学规律的道路。

**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它是科学的，它就象闪电一样射入资产阶级社会中这块无产阶级的园地，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本身在它历史地形成的同时也带来了充分的、唯一的真正“科学的”合法证书，说明它必然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样子。与此同样，梅林为我们提供的这本关于马克思学说创立的第一阶段的著作同时也是这一学说的**合法证明书**，这一学说产生的历史**真实性的证明书**。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同意梅林的这句话：“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根源就意味着揭露‘战胜’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根据的。”<sup>③</sup>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的图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会再一次向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保证，马克思的思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5页。——编者注

② 出自古希腊神话的比喻，指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编者注

③ 弗兰茨·梅林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1923年柏林和斯图加特版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1.3.—1844.3.）第11页。——编者注

将不顾种种软弱无力的“战胜”它的尝试仍旧证实自己是炸毁资产阶级社会并且把“德国人”解放“成为人”的那种强烈的闪电。

发表于1901年9月17日《前进报》第21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130—141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 三论比利时的试验\*

(1902年5月)

### 一 答艾·王德威尔得同志

我们没有等到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敌人停止对社会民主党的攻击，就对比利时同志最近这次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提出我们的批评意见，这有两点充足的理由：第一，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比利时的兄弟党作为真正的战斗的党**永远不会**不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第二，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王德威尔得同志及其战友从来没有特别由于这一攻击而感到泄气，相反，他们总是给予几下切中要害的还击，对资产阶级攻击者不屑一顾，无所顾忌地走自己的路。何况比利时同志本身也认为就他们在最近的斗争中的策略作出批评性的判断是十分紧迫和十分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为此目的举行一次非常的党代表大会。<sup>①</sup>

但是现在王德威尔得同志却责难我对比利时的事件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描述。他说，自由党人根本没有对社会党领导人的行动施加影响，工人领袖在任何一项有关措施上的策略都是有他们本

---

\* 1902年卢森堡就比利时罢工问题发表《比利时的试验》一文。王德威尔得以《再论比利时的试验》一文来和卢森堡争论。之后卢森堡写本文作了答复。——编者注

① 指1902年5月4日举行的比利时工人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编者注



身的理由的。

如果我们的令人不快的假设是错误的，那么，肯定任何人都不会比我们自己更加乐于通过我们比利时同志的最杰出领袖的有权威的说明受到教益。可惜，对于我们来说，王德威尔得同志的阐述似乎只是使问题更加是非不明和更加复杂化了。

自由党人本身正在从现行的不公正选举中得到好处。他们象被押上刑场一样卷入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从根本上说，他们不是社会党人的同盟者，而是他们的敌人。但是，工人党为了迎合这些表面上的朋友只把斗争目标限制在成年男子选举权上，而不去要求对选举权的条件（年满二十一岁）作出任何公开的规定，并把比利时同志本身并不喜欢的比例选举制列为宪法的附带条款，难道这种做法同上述情况是相符合的吗？

比利时的工人领袖在整个斗争中高度评价他们同自由党人的战斗友谊，甚至在他们遭到失败以后在议会内和议会外向人民发出的第一项呼吁也是“我们与自由党人的同盟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牢不可破的”！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王德威尔得同志说得完全正确，比利时的自由党人从根本上说是争取选举权运动的敌人，而不是它的朋友，他们已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样说并没有否定比利时同志在最近的斗争中同他们建立战斗友谊这一事实，而只是说明，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斗争必定会遭到惨败。

王德威尔得同志的一切进一步的论述都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既然自由党人在斗争一开始就立即背叛了工人党，那么很清楚，议会内的行动肯定毫无希望，只有议会外的上街行动才能有所成就。

相反，王德威尔得同志却得出结论说，一旦自由党人转而反对社会党人，上街的行动就没有希望了。继续进行罢工就只有一个

目的，即推动国王去解散议会，一旦连国王也做不到这一点，那时除了回家去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但是这样一来，就不只是对最近这次情况下的总罢工宣布死刑，而且是对把这一武器运用于比利时这整个做法宣布死刑。因为只要自由党人宣称他们反对群众运动，只要列奥波特<sup>①</sup>对这一运动丝毫不加关心，——今后也可以完全有把握指望获得这两种结果——就足以使人宣称工人群众的行动是没有目的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王德威尔得同志只是还应该说明一下，除去为了使全世界看到一种一致地停止工作又同样一致地恢复工作的动人场面以外，到底为什么要宣布总罢工呢？

但是在王德威尔得同志这番推理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那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只有通过议会道路才能期望取得普选权斗争的胜利，而且要依靠教权派的英雄般的自我克制来做到。王德威尔得同志确实曾经十分严肃地援引比利时右派的领袖韦斯特<sup>②</sup>先生的话，韦斯特在他引用的那次发言中表示欢迎任何新的有关选举权的骗局，唯独不要普遍的真正的选举权，但后者恰恰是关键所在。

对人民群众的行动完全失望而唯独对议会活动抱有希望，企图在刚刚遭到敌人的迎头痛击之后说服敌人，使他相信自己是真正的战败者，在斗争期间为失败寻找借口而刚一失败又拿对未来胜利的没有把握的指望来进行自我安慰，相信种种能起拯救作用的政治奇迹（如一位国王进行干预，对手在政治上实行自杀），所有这一切对于小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策略来说都是十分典型的，以致在我们看了王德威尔得同志的论证以后，我们根本无须去设想

---

① 列奥波特(1835—1909)——比利时国王(1865—1909)。——编者注

② 查理·韦斯特(1837—?)——比利时人，律师。1874年以后多次当选议员，1884年曾任司法部长，为教权派领袖，反对选举改革。——编者注

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之间会有什么由公证人签字盖章的同盟协议，就可以认为我们关于自由党人在最近这次斗争期间在思想上取得领导权的假设只是进一步得到证实了。

其次，如果说我们还曾经怀疑我们从远方对比利时事件形成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比利时同志刚刚举行的非常代表大会的过程已排除了这种怀疑。沙勒罗瓦的社会党人的提案（这些提案对总委员会关于复工的决议表示遗憾并且谴责了同资产阶级政党的任何妥协）以及比利时工人大军的最老和最重要的队伍即广大的矿工群众的代表们的发言都证明，处在近傍的人们也能得出同我们已经发表的同样的结论。

当然，这次代表大会是以投工人党总委员会的信任票而告终的，这一情况表明，纪律和对我们比利时党的领袖的信任幸而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动摇。不过，对自由党人的策略加以考虑的第一次试验就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果不想导致更坏的情况，那么这就必须是最后一次。

就讲这么多，作为对艾·王德威尔得同志的答复。

但是，我们似乎有必要利用这一机会联系比利时的事件谈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我们认为，如果说，国际无产阶级从比利时的试验中十分明确地吸取了某种教训的话，那么，这个教训肯定是，片面地对议会活动和资产阶级民主寄予希望只能使我们在政治上遭到一系列失败，引起人心涣散。在这个意义上说，必须把比利时的事件看作是对机会主义理论进行的一次实际检验，它将顺理成章地促使这一理论的追随者对它进行彻底的修正。

有一部分情况却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比利时的党刊和德国的党刊都与此完全相反，试图利用比利时的失败对革命的策略进行修正，这种做法同自由思想党人莫瑟<sup>①</sup>和纳乌曼牧师的尝试有惊

人的一致之处。据说，总罢工、上街的行动已经在比利时被证明是完全过时和无济于事的了。甚至有一个叫弗兰茨·费舍的同志在布鲁塞尔的《人民报》上提出，最新的经验中的最大的教训是，必须放弃“法国人的那种玩弄革命词句的方法”，转而采取“德国社会民主党即国际社会主义先锋队的那种经过周密思考的进行组织和教育的方法”，同时他还援引了《汉堡回声报》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道，巴黎公社的失败已经是证明不能使用革命手段的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德国的另一些党刊上也能够在比利时停止总罢工以后立即看到这样的说法：“比利时同志现在遵循的策略无非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一策略”，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反对总罢工，认为它是“不可取的和多余的”，这个党一向“宣布在政治上训练和组织工人阶级是夺取政权的唯一目标明确的准备工作”。

这就是说，根据最近的事件对比利时的策略所作的某些错误的修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庇护下进行的。现在我们就来简要地探讨一下，究竟可以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中得出什么关于总罢工问题并且一般地关于暴力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推论呢？

## 二 总 罢 工

总罢工无疑是现代工人运动最古老的口号之一，而且肯定是在社会主义内部引起异常激烈而频繁的斗争的那些口号之一。但如果人们不是一听到这个词、这个声音就大吃一惊，而是对事实进

---

① 鲁道夫·莫瑟（1843—1920）——报纸出版人，他出版的报纸有《柏林日报》和《柏林人民报》，前者在政治观点和人员方面接近自由思想联盟，后者在内政问题上与该党的观点一致。——编者注

行彻底的探讨,那就一定会发现,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把总罢工的说法理解成完全不同的事物,并且相应地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

很明显,纽文胡斯要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举行的那种赫赫有名的总罢工和国际矿工总罢工不是一回事,后者在九十年代初就在英国筹划进行,爱琳娜·马克思还曾提请法国社会主义者利尔代表大会(1890年10月举行)通过一项提案加以支持;1898年10月法国各行各业为声援铁路工人运动而试图举行但遭到惨败的总罢工和瑞士东北铁路取得光辉成就的铁路工人总罢工之间同样有着很大的差别;1893年获得胜利的卡尔莫总罢工是一次反对处罚当选为市长的矿工加尔文约克的抗议示威,它同1839年2月宪章派大会决定举行的“神圣月”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等等,等等。一句话,要对总罢工问题作出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其首要条件是,把民族的总罢工同国际的总罢工区别开来,把政治的总罢工同工会的总罢工区别开来,把一个行业的罢工同各行各业的罢工区别开来,把由于一时一事所引起的总罢工同出于无产阶级总的意图而实行的总罢工区别开来,等等。只要回顾一下总罢工的各种各样具体的表现形式和运用这一斗争手段的各种经验,就足以使人认识到,任何千篇一律的做法和一概否定或一概推崇这一**武器**的做法,都是轻率的了。

我们认为,如果撇开纯属一个行业的工会的总罢工(它已经在大多数国家成为日常现象,因此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已是多余的了)不谈,专门探讨一下**政治总罢工**,那么,我们就必须按照这一斗争方法的本质把**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和我们姑且称之为**一时的政治性群众罢工**这两种罢工区别开来,属于前一类型的首先是那种民族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景的总罢工,这类罢工一向是法国的工会、布鲁斯派和阿列曼派津津乐道的。比方说,1869年5月27日的《国际》报就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概念,那里写道:“如果

罢工扩大了,彼此互相联合起来,那么它们就很接近于成为一场总罢工;一种体现当前流行的那些解放思想的总罢工,只能以将会实现社会变革的大崩溃而告终。”1888年在波尔多举行的法国工会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具有同样的思想,它写道:“唯独总罢工或者革命才有可能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同一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另一项决议是可以说明这项决议的特征的姊妹篇,它要求工人“要断然同欺骗他们的政客划清界限”。最后,提交给1900年夏在巴黎举行的最近这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得到白里安支持而遭到列金反对的法国提案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一提案要求“全世界的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总罢工,或者是,这种组织在他们手中应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施加压力(它为导致必要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所不可缺少的)的一种简单的手段和杠杆,或者是,在情况十分有利时,能够使总罢工为社会革命服务”<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另一方面,要把总罢工作为反对资本主义战争的手段的思想也属于这一类型。1868年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一项决议表达了这一思想,九十年代以来在布鲁塞尔、苏黎世和伦敦召开的几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sup>②</sup>纽文胡斯又接受并且维护了这一思想。

无论前面那种情况还是后面这种情况,这种观点的特点在于相信总罢工是一件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换句话说反对它的个别生命攸关的职能的万应法宝,相信总罢工这个抽象的、绝对的范畴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同样适用并会带来胜利的那样

---

① 《1900年9月23日至27日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00年柏林德文版第32页。——编者注

② 国际社会党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是1891年8月16日至22日举行的,苏黎世代表大会是1893年8月6日至12日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是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举行的。——编者注

一种阶级斗争手段。在纸上是怎么描绘的，面包师不做面包了，路灯不亮了，火车和有轨电车停驶了——崩溃发生了。这样在雾里拿着棍棒四处挥舞的做法就象公式一样对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不顾地点和时间，不顾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具体政治条件，同时也不考虑要把社会主义的决战同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同循序渐进的教育和组织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这一观点的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特征。但是随着这种无政府主义特征也同时产生了这一理论的**空想性**，因此也就有必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反对总罢工思想了。

因此，几十年来我们也看到社会民主党出来反对总罢工这一空想。法国工人党同法国工会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它们这样做的理由和德国代表团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同纽文胡斯进行正式交锋的理由完全一样。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这不只是由于它提供了反对空想理论的科学论据，而且特别是由于它在议会活动的阵地上进行了日常政治斗争的**实践**，从而驳斥了那种等待最后一次决战而“袖手”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

人们经常提到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总罢工的斗争就到此为止，而且也只能到此为止。确实，科学社会主义的批评只是针对绝对的、**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理论的。它也只能针对它。

法国工人时常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举行一时的政治总罢工，例如上面提到的卡尔莫罢工，特别是**比利时**工人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也多次运用这一手段，这样的总罢工只在名称和表面做法上与那种无政府主义总罢工的思想具有共同之处，不过这在政治上两个对立的观念。那一种总罢工口号的基础是一个共同的抽象理论，而后面那种类型的政治罢工则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势的产物、作为取得一定的政治效果的手段而在一定的国家或者只在一定的城市和地区举行的。这一武器的效用总的说来从一开

始就是无可争辩的，因为**事实**，因为法国和比利时取得的胜利证明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丝毫也不能把用于反对纽文胡斯或者反对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时十分有效的全部论据，拿来反对局部性质的政治罢工。老李卜克内西在驳斥纽文胡斯时强调，要进行一次总罢工需要一个对无产阶级进行组织和教育的阶段作为前提，而这个阶段就已经使总罢工本身成为多余的，工人阶级已经不言而喻可以直截了当去夺取政权了。这一剑是刺得很漂亮的，但不能用它来反对局部的和一时的政治总罢工，因为在这方面只要有一个很得人心的政治解决办法和有利的物质情况作为前提就可以了。相反，无可怀疑的是，比利时的总罢工作为争取选举权斗争的手段所发动的参加运动的人民群众的人数，通常比按照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觉悟来说应有的人数要大得多。同样，卡尔莫的政治罢工也收到了十分强烈和迅速的教育效果，甚至一个右派议员在运动结束后曾对社会主义者说过：“如果你们再取得几次象卡尔莫那样的成就，你们就把农村争取到了，因为农民总是倒向强者一边的，而你们已经证明你们比矿业公司、政府和议院更加强盛。”<sup>①</sup>由此可见，一时的政治总罢工并不象纽文胡斯或者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罢工那样，在秘密的小团体之中，在作为前提的必要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打算取得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成果之间兜圈子，它只是同日常政治生活的某些具有深远意义和振奋人心作用的因素联系起来，同时又作为进行社会主义鼓动的有效手段发挥作用。

同样，硬说以日常政治工作特别是议会活动为一方和**这一类型**的总罢工为另一方之间存在一种对立，这也是无的放矢。因为政治总罢工远远不是要**取代**细小的议会工作和其他细小工作，它只同其他的鼓动手段和斗争手段一样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且

---

<sup>①</sup> 1893年工人党年鉴。——卢森堡注



不仅如此，它甚至作为一个工具直接为议会活动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迄今所有的政治总罢工都是为维护或者争取议会权利服务的。卡尔莫的总罢工是为了维护市镇选举权，比利时的那些总罢工是为了争取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

因此如果说，德国还没有发生政治总罢工，此外也只是少数国家才零星地把它付诸实践，那么，这决不是由于它同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斗争的“德国方法”相矛盾，而仅仅是由于这样的情况：为了使一次总罢工有可能成为政治手段，必须具备十分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在比利时，工业高度发达，加上国土不大，因此，不仅罢工能在地区方面轻易而迅速地扩展开来，而且罢工人数绝对用不着很多。比方说三十万人，就足以使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瘫痪下来。德国是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工业区分散在各个地方，其中夹杂着一个个大的农业区，工人队伍十分庞大，就这一方面来说，它是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的。对于整个法国以及一般说来对于较大的、工业不很集中的国家，情况也是一样的。

但是，除此之外，具有一定程度的**结社自由**和民主习惯也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一个国家，那里的罢工工人竟象上西里西亚那样被警察和宪兵赶着去做工，罢工工人在“愿意上工的工人”当中的鼓动工作即使不致使他们受到苦役监禁也一定会使他们被关进监狱，那么，在那里当然是谈不上举行一场政治总罢工的。这就是说，尽管迄今只有比利时以及法国的部分地区才把总罢工作为政治武器来使用，但这绝不能被看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种虚假优越性和罗曼语系国家的一种暂时失误。这不如说——除了缺少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地理条件外——是我们在政治方面的半亚洲式落后状况的又一个证据。

最后，**英国**的例子证明，使用这一强大的武器还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要把**工会的工人运动和政治的工人运动在内部交织在**

一起。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胜利地举行总罢工的一切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尽管如此，那里却从来没有把这一强大武器用于政治斗争。比利时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作用的，工会和党在任何较大的行动中都协同动作、密切配合，而在英国由于工联采取狭隘的、只顾工会的、因此也是分散进行的鼠目寸光政策，又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就无法使那些斗争汇合成政治总罢工。

因此，上述比较详细的探讨证明，如果不考虑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根据德国的实践，就一概对总罢工作出绝对的评价并加以否定，那无非是民族的妄自尊大和轻率的生搬硬套。这种情况又一次证明，当有些人夸夸其谈地向我们吹嘘社会主义策略的优点是“放开手脚”、“不要作茧自缚”、要能适应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时，从根本上来讲这始终只是指的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暧昧关系的自由。相反，一谈到一种群众运动，一种看起来略似革命策略的斗争方法，热衷于“放开手脚”的人立刻就表现为眼光极其狭窄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想把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塞进所谓德国策略的西班牙长靴<sup>①</sup>中去。

现在比利时的总罢工恰恰没有取得成果，但这一事实还不足以证明要对比利时的策略“进行修正”，因为众所周知，那里的总罢工事先既没有准备，也不是真正从政治上运用的，不如说，总罢工的领导人使它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在它还根本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以前就将它解散了。这一运动的政治领导人，确切些说，议会领导人根本不想看到出现群众行动，这样，罢工群众就无计可施地留在后台，与本来的、在前台进行的行动没有任何联系，直至他们完全从舞台上被排挤出去为止。因此，比利时最近的运动没有成果这一

---

<sup>①</sup> 意为受束缚。——编者注

事实之不能证明总罢工没有用处，正如巴赞<sup>①</sup>以麦茨要塞投降不能证明要塞在战争中没有用处，德国自由党人在议会中遭到失败不能证明议会活动没有用处一样。

情况恰恰相反。比利时工人党的最近行动的失败一定会使任何了解真情的人相信，**只有总罢工——实际上开赴战场——才能取得某种成果。**如果必须对比利时同志的策略进行修正，那么这一修正看来只能按照我们在本杂志上前一次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提到的方向进行。因为四月运动已经明确证明了一件事：一旦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同流合污，那么旨在间接反对教权派、但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罢工就将徒劳无益，资产阶级从对政府施加一种政治压力的媒介变成了一只使工人阶级裹足不前的皮球。因此，比利时的试验的最重要的教训不是要反对总罢工本身，而是相反，要反对同自由党人结成注定使任何的总罢工都不会取得成果的议会同盟。

但是，如果一听到“总罢工”一词就拿已经用来而且用得不能再用的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纽文胡斯的似是而非思想的陈旧口号来对付，如果只是根据对比利时事件极其表面的误解就要对比利时的策略“进行修正”，那么，这是我们必须十分激烈地加以反对的，因为不仅比利时的工人阶级一如既往，而且**瑞典的工人阶级也**正要把总罢工这一武器用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这些国家进行斗争的同志当中，哪怕只有一小群人由于相信所谓“德国的”斗争方法高明的空话而在战略上犯了错误，那也会是很可悲的。

---

<sup>①</sup> 弗朗斯瓦·阿希尔·巴赞(1811—1888)——法国将军，1864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军长，后任莱茵军团司令，1870年10月在麦茨投降。——编者注

### 三 暴力和合法性

最近这一时期关于“旧式的革命手段”根本无用这一点已经谈得很多，尽管如此，迄今却从来没有讲清楚，人们究竟是怎样理解这些手段并且打算用什么手段来代替它们。

通常，人们习惯于将对工人群众进行**日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同“革命手段”、即主要是走上街头的暴力革命对立起来，在比利时的试验遭到了失败时也是这样讲的。但是，这样一种态度是错误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组织和教育工作本身还不是斗争，而仅仅是进行斗争的准备手段，这无论对于一次革命还是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斗争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本身还不会使**政治斗争**成为多余的，正如建立工会和募集捐款不会使工资斗争和罢工成为多余的一样。如果宣扬组织和教育工作比“革命手段”优越，那实际上是把暴力革命和合法的改良即**议会政治**这两方面互相对立起来。饶勒斯的这些话已经清清楚楚地表述了上述观点：“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形式、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是有可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因此我们的职责是向议会阐述这一合乎逻辑的渐进过程。”（见1902年2月11日《小共和国报》）他的另一些声明也是这个意思：“无产阶级还能使用的唯一方法是建立合法组织和进行**合法行动**的方法。”（见1902年2月15日《小共和国报》）

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极其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抓住这一点，在讨论中不要涉及对群众进行组织和教育工作是有益的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而把争论集中到唯一实际的焦点上。

有人下定决心要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以议会行动来代替对暴力的任何使用，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决心首先引起注意的地方是关于随心所欲的**制造革命**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是进行革命还是

放弃革命，是准备革命还是把它束之高阁，显然要看革命是有益的还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而定，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今后是否有可能发生革命，关键只在于哪一种信念现在在社会民主党中占居上风。但是，尽管合法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工人党在其他方面的力量估计得很不足，它在这一方面对工人党的力量的估计却是过高了。

迄今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人民的暴力行动绝不象政论家和官方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所谓“领导人”或者“党”的一种随心所欲的、自觉的产物，不如说，它们完全是自发的、以自然的强制力量贯彻的社会现象，其来源在于现代社会的阶级性质。社会民主党的兴起目前还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丝毫改变，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也不在于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规定法则，相反倒在于使自己服从它的法则并从而使这些法则为自己服务。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而社会民主党却要反对这种革命，那么唯一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会由阶级斗争的领导者变为它的追随者或者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障碍，而这个斗争最终无论如何一定会在某一时刻在没有它或反对它的情况下进行下去。

把这些简单的事实回顾一下，就足以看清楚，是进行革命还是纯粹合法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而主要是历史发展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机会主义者既然把革命排除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外，同时也就不折不扣地断言暴力已不再是现代历史的一个因素了。

这是问题的理论核心。只要把上述观点表述出来，就会发现那是荒唐可笑的。暴力不仅没有随着资产阶级“合法性”的增加，随着议会政治的发展而丧失历史作用，而且它在今天正象在从前的任何时代一样也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基础。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暴力之上，它的军事组织本身就充分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

点，而机会主义的学理主义的一个真正本领就是忽视这一事实。但是，甚至“合法性”的领域本身如果仔细加以考察也足以证明这一点。难道中国拨款<sup>①</sup>不正是由“合法性”、由议会政治提供的采取暴力行动的手段吗？难道象洛布托判决<sup>②</sup>那样的法庭判决不是“合法地”使用暴力吗？我们还不如这样提出问题：资产阶级的合法性的全部职能究竟表现在哪一点上呢？

如果一个“自由的公民”被另一个人违背他的意愿而强制地弄到一间无法居住的狭小暗室并在那里关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任何人都懂得这是一种暴力行动。可是，一旦这一行动是根据一种印成书本、称作刑法典的东西采取的，这个暗室叫作“普鲁士王国监狱”或者叫作苦役监狱时，那么它就变成一项和平的合法的行动了。如果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迫而违背他的意愿去不断杀害他的同胞，那么这就是一种暴力行动。但是，一旦这一行动被称为“兵役”，那么一个好公民就想象自己是平平安安地在合法性的气氛中生活。如果有一个人使另一个人违背他的意愿失去其一部分财产或收入，那么不会有人对这是一种暴力行动发生怀疑，但是，如果把这一行动称为“征收间接税”，那么这仅仅是执行现行的法律而已。

一句话，向我们提供的资产阶级合法性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暴力，而这一暴力从一开始就被提高为必须遵守的准则。一旦个别的暴力行动被当作一种义不容辞的准则确定了下来，那么事情就会在资产阶级法学家的头脑里、同样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的

---

① 1901年10月底法国政府向议院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提供一笔拨款以支付法国军队参加八国联军镇压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的费用。这一提案于1901年11月25日以295票对249票通过。——编者注

② 1899年2月3日德累斯顿陪审法庭由于洛布托的9名工人犯有微小罪行而竟判处他们强制劳动53年，监禁8年和剥夺政治权利70年。——编者注

头脑里颠倒地反映出来：“法律制度”是“正义”的独立自主的创造物，而国家的强制性暴力仅仅是法律的一个后果，是法律的“制裁行为”。实际上却相反，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以及议会政治作为发展之中的合法性）本身只是来源于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一定的社会表现形式。

应当据此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合法主义的整个理论的虚幻性。统治阶级在他们的全部活动中完全依靠暴力，无产阶级却只应在反对这一阶级的斗争中自始至终拒绝使用暴力。而且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样令人可怕的宝剑当作抵制占统治地位的暴力的武器呢？就是那一种合法性，而资产阶级的暴力正是通过这一合法性被确定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准则、一种社会准则的！

当然，资产阶级合法性即议会政治这一领域不仅是资本家阶级实行统治的天地，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解决它们之间对立的斗争基地。但是，正如法律制度对资产阶级来说只是他们的占统治地位的暴力的一个表现一样，议会斗争对无产阶级来说只能是他们想使自己的暴力也取得统治地位的一种努力而已。如果说，我们合法的议会活动没有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工人阶级的暴力作为后盾，那么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就会变成一种比方说同用竹篮打水一样聪明的消遣了。“现实的政治家”不断提到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的“积极成果”，想把这些成果当作反对在工人斗争中使用暴力的必要性和有益性的一个论据，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些成果本身的哪怕是十分微小之处也只能被看作是暴力的觉察不到的、潜在的影响的一个产物。

但是还不止于此。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只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这一事实在议会政治本身的兴衰史中也得到了表现。

实际上上述情况表现为如下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旦统治阶级能够真正相信，我们的议会主义者没有以在一定情况下准备采

取行动的人民群众为后盾，革命的头脑和革命喉舌不能或者认为不适于使用革命的拳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基地的议会活动本身和全部合法性迟早会被剥夺。国会选举权的命运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正象萨克森的选举权的命运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一样。肯定不会有人怀疑，德国如此频繁地受到威胁的普选权之所以没有被消灭掉，不是由于考虑到德国的自由党人，而主要是由于害怕工人阶级，由于相信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是不会开玩笑的。同样，极其热衷于合法性的人也不敢否认下面一点：如果有一天竟然要剥夺我们参加国会选举的普选权，那么德国工人阶级绝不会仅仅期望通过“合法的抗议”，而是不如说会期望仅仅依靠暴力手段迟早把合法的斗争阵地夺回来。

实践当中的某些不测事件就是这样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合法主义这一理论是荒谬的。暴力显然绝没有由于“合法性”而被取消，不如说它是合法性的真正的庇护人，确切些说是它的基础，这无论对资产阶级方面还是对无产阶级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反过来说，合法性是各个时期相互进行斗争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产物，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比利时和德国最近同样都有很多事例证明，是允许还是拒绝、是维护还是取消政治斗争的议会条件，要看这样做能否在人体上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定，其次还要看人民群众潜在的暴力能否作为攻击武器或者足以自卫的武器来发挥它的作用。

由此可见，暴力作为**防御**手段在某些非常情况下是为维护议会中的席位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既然如此，那么，在必须首先夺得阶级斗争的合法阵地的时候，这种暴力在一定情况下同样是不可代替的**进攻**手段。

在比利时新近发生的事件之后就试图对“革命手段”进行修正，这恐怕是好些年来的修正主义迫切愿望所献出的那一政治结



论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样本。即使人们能够说在比利时的运动中使用暴力意义上的“革命手段”是失败的，但如果根据比利时的一次失败就对这一手段全盘否定，那么这显然要有以下的前提：在工人斗争中使用暴力必须在一切情况下和在任何场合无条件地保证取得成果。很明显，如果容许以这种方式得出结论，我们早就必须彻底放弃诸如工会斗争、工资斗争了，因为这些斗争的确已经给我们带来过无数次的失败。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在比利时的斗争（据说这一斗争证明了暴力手段是不起作用的）中工人方面丝毫没有使用暴力（如果人们不跟着警察局一起把平静的罢工说成一种“暴力行动”的话。）！既没有计划搞一场走上街头的革命，甚至也没有作这样的尝试。正因如此，比利时的失败所证明的是与人们想要归咎于它的事情截然相反的，它证明，由于自由党人背叛和教权派下决心采取极端手段，因此根据各种情况来判断，当前要在比利时不使用暴力而争取到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前景是相当渺茫的。而且它所证明的还不止于此！它证明，如果说连一项平等的选举权这样起码的丝毫没有超出现行制度范围的纯粹资产阶级的议会形式都是不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的，如果说统治阶级方面在对付一项资本主义国家中理所当然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时就已经赤裸裸地诉诸暴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一种和平的议会的方式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即整个阶级统治的任何想法，都无非是来自政治幼儿园的一种可笑的幻想。

比利时的失败还证明了一件事！它再一次证明，如果社会主义的合法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天生的历史形式，那么，他们不是在同一种具体的民主制、一种具体的议会政治打交道（这种民主制和这种议会政治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日子是悲惨的和动摇不定的），而是在同一种虚构出来的抽象的民主

制打交道，这种民主制是超越一切阶级之上、经常得到改善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的。

在这里，完全凭空地低估反动的日益加强和同样凭空地高估民主取得的成就这两方面是互为依存并且很好地互为补充的。饶勒斯陶醉于米勒兰的点滴改良和共和主义的微小成果，他声称任何一项有关中学课程改革的提案、任何一项有关失业工人统计的法案都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基石。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完全象他的同胞、来自塔拉斯孔的塔塔兰<sup>①</sup>一样，在自己的异国情调的“奇异花园”里，在长着手指粗的香蕉树、巴欧巴勃树<sup>②</sup>和椰子树的花盆之间，想象自己是在一片热带原始森林的清涼树荫下漫游。

我们的机会主义者由于比利时自由党人最近的背叛而被实际生活打了一记耳光，他们把这些耻辱忍受下来，然后宣称：不过我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才能实现。

他们根本没有发现，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无非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来重复旧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和民主制是有天职实行自由、平等和普遍幸福的，这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它们的口号首先是在根据具体事例进行历史性试验以前的天真的信念——，而是一八四八年饶舌的作家和律师奥迪隆·巴罗、拉马丁、加尔涅·帕热斯等人的理论，这些理论发誓要通过纯粹的议会空谈来实现大革命的一切许诺。这些理论在这一百年间天天都在遭到失败，社会民主党作为这些理论失败活生生的证据已把这些理论彻底埋葬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甚至已完全记不起这些理论、它们的创始人及其整个历史色彩了，首先必须具备这些条件，这些理论今天才能够作为实现社会民主党目标的一个崭新

---

① 法国作家阿尔米斯·都德的讽刺小说《来自塔拉斯孔的塔塔兰》的主人公。——编者注

② 非洲一种高大树木，这里是音译。——编者注

思想复活起来。由此可见，机会主义学说的依据显然不象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是进化的理论，而是历史周期性地重复出现的理论，而且任何新的版本总是更加单调和更加乏味。

无可争辩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十年前对社会主义策略作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修正，从而对国际无产阶级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修正在于，不再象过去那样相信暴力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方法，是任何时候都适用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正如考茨基在巴黎决议案<sup>①</sup>中再一次表述的那样，今天流行的观点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首先只能是一个或长或短时期的正规的日常阶级斗争的结果，在这一斗争中不断争取国家和议会政治的民主化的努力是在精神上和部分地在物质上提高工人阶级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但是，这也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所指出的全部内容。因此，既没有把暴力从全部历史中一笔勾销，也没有一劳永逸地把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手段的暴力革命一笔勾销，也没有把议会政治抬高为阶级斗争的唯一方法。完全相反，暴力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工人阶级的最后手段，是至高无上的阶级斗争规律，这一规律时而潜在地发挥作用，时而积极地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象通过任何其他的活动那样通过议会活动使人们的头脑革命化，那么这是为了使人们最终在必要时把头脑中的革命化作拳头上的革命。

当然，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当我们的努力针对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时迟早也要同资产阶级社会发生暴力冲突，但这不是出于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把议会政治看作使工人阶级得救的唯一的政治斗争手段，是空想的，而且归根到底是反动的，正如同把总罢工或街垒

---

<sup>①</sup> 参看《米勒兰事件》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44—45页。——编者注

看作唯一使它得救的手段一样。自然，暴力革命在今天的情况下是一件非常难于使用的双刃武器。我们也可以预料，无产阶级只有在认为暴力革命是它向前突进的唯一可行的道路时，而且不言而喻只有在整个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多少有可能保证它取得成果的条件下才会采取这一手段。但是，明确认识到无论在阶级斗争的个别事件中还是为了最终夺取政权都必须使用暴力，这是一开始就不可缺少的，这样的见解也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和平的合法活动发挥它本来应有的力量和作用。

一旦社会民主党真的要象机会主义者们向它建议的那样始终拒绝使用暴力，并且使工人群众一味相信资产阶级的合法性，那么，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议会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斗争本身迟早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并且给反动派不受限制的暴力统治让出阵地。

发表于《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2册第203—210、274—280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229—248页。

（唐春华译 殷叙彝校）

## 我们的导师的遗著\*

(1902年11月9日)

弗兰茨·梅林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4年7月至1847年11月），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8年5月至1850年10月），1902年斯图加特版。

### 一

由于梅林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第三卷遗著的出版，这个版本现在全部出齐了，这就使人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前半生的精神生活 and 政治生活的全貌。这三本书事实上不仅是相互有连系的，而且反映了我们导师思想发展的三大阶段。

第一卷反映了马克思从黑格尔派到社会主义者的内在发展，反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概念从德国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哲学和政治思潮中的形成的情况。《德法年鉴》向我们表明了这第一阶

---

\* 这篇书评没有署名。从罗莎·卢森堡1902年9月20日给列奥·约吉希斯的信可以看出作者是她。（见《罗莎·卢森堡书信集》198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646页。）——编者注。

段的成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精彩  
的演绎论述中马克思最终克服了黑格尔主义。

第二卷可以说把我们从德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作坊引导到  
实践的工人运动的世界——引向法国。在我们导师的思想发展中  
出现一个新的因素：与法国空想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  
家，如卡贝、蒲鲁东、路易·勃朗的接触。几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  
在德国也开始成为实践的运动，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在他从布鲁塞  
尔被驱逐之后，社会主义就开始成为他的实际任务了。《神圣家  
族》是划分这两个时期的伟大的思想里程碑，它既是同思辨唯心主  
义的最后的、在公开讲坛上进行的决战，同时又是科学社会主义对  
于自己以往的哲学思想的总的清算。我们在这里还同时看到马克  
思指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那一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向反动倒退的一  
翼即鲍威尔兄弟的“批判”派是哲学的死胎，并且把黑格尔学派的  
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分支发展成历史唯物主义。论述法国唯物主  
义、法国大革命和蒲鲁东的各章以及几乎散见在《神圣家族》每一  
章里的一些注解同样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自己的形成初期所做  
的经典性习作。

完成了对思辨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完全转向“群  
众”。紧接在《神圣家族》之后，梅林向我们介绍了四十年代末德国  
的各家社会主义杂志，我们在这里已经立足于现实了。从三十年  
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德国的精神生活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表  
现就是这些杂志和其中争论的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  
果说在第一阶段思想界的兴趣集中在《哈雷年鉴》、《德国年鉴》和  
《秩文集》这些哲学政治杂志上，集中在神学问题上，那么到这时就  
出现了一系列纯社会主义的杂志：《社会明镜》、《莱茵年鉴》、《德国  
公民手册》、《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在我  
们和马克思的哲学青年时代的伙伴卢格、鲍威尔等人分手之后，我

们又置身于新的一代的欢腾的活动之中；赫斯、格律恩、魏特林、载勒尔、威廉·沃尔弗、魏德迈、毕尔格尔斯、荣克、克利盖、维尔特、德朗克，他们是这一时期在我们导师周围活动的人。

这里在争论问题时用的语言已经摆脱了黑格尔派的风格；这里论述的已不再是“精神和群众”、“绝对的批判和自我意识”，而是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社会改良和国家社会主义之类的凡俗问题。黑格尔已经重新用脚站立了。

同时也展开了一场新的思想斗争。如果说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看到马克思从德国哲学中发展出科学社会主义，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在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要把他的学说同一切邻近的、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的和假社会主义的流派严格地区分开来。

四十年代后半期的成就是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克利盖的感情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所作的毁灭性批判。这时马克思的理论逐渐在法国和德国的混乱的社会主义思潮中作为胜利者和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显露出来，不朽的《共产党宣言》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成果的概括和顶峰，它象一座高大的凯旋门，打开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道路。

梅林在他编的这本著作集里发表的这个时期的文章肯定不如他在自己的说明里告诉我们的内容那样有趣和那样容易使人得到启发。特别是由于梅林在多处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以及当时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来往书信的片断插进来，因此他在书中的这些评注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的一页。四十年代许多社会主义流派之间的争论在少量的选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等刊物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只有零星的反映，但在梅林的导言里却表达得既充分又形象化。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进行这些尖锐的思想斗争的图景，如果同后来他们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对照起来看，就特别具有教育意义。二十年后，一旦马克思和恩格斯需要进行“一点实际运动”时，他们多么善于耐心地与这同一个蒲鲁东主义以及同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睦相处啊；到了要考虑开创真正的工人组织时，他们是如何努力避免在学说方面唯我独尊的做法或武断的强词夺理啊！另一方面，在四十年代，当必须首先在社会主义思想界为新的科学理论占据地盘时，他们又是多么善于鲜明地把这种理论从在它近旁和四周的一片混乱中区分开来，从而表明他们是如何准确地把握住那一历史时刻的需要啊！

今天我们高兴地把再次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混乱看作科学社会主义的“更高的合题”，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给黑格尔的三段论大大增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牢固核心是在四十年代从一团理论迷雾中发展形成的，这种迷雾现在又升起了，要把这个核心融化和吞噬殆尽。赫斯、格律恩、魏特林、蒲鲁东，甚至还有好心肠的海因岑阴魂不散，他们的遗骸变成稀奇古怪的样子，冒充有血有肉的活人愉快地到处漫游。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闪电般的剑击把他们赶进了幽灵的王国，对今天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回忆这一过程确实是很适时的，这会加强党的自信心，使它的已经衰退的思想振奋起来。

第二卷的全部著作，从巴黎《前进报》上同卢格的论战直到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把卡尔·海因岑击败为止都是有助于此的，所有这些著作都带有马克思的精神产品特有的标志：他的思想的令人信服的深度。例如，人们出于思想方面天生的懒惰和惯于让步的恶习是愿意半信半疑地接受卢格论述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冷静而中肯的见解的，只是在看到马克思的回答时才重新发现深刻而伟大的观点并因此在内心感到惭愧，同样，人们在每一个问题



上，每一篇文章中都会受到马克思不同凡响的思想影响而摆脱平庸的立场。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情况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完全一样：人们时常对于《资本论》脚注中引用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观点的正确性感到惊讶，但一看到马克思随后的分析就立刻会充分感到这种“中肯的观点”的可悲的局限性和浅薄。

马克思的思想作品之所以具有这种不寻常的作用，不仅是他本人的天才，而且也因为他始终按他所论述的一切问题之间的最重要的辩证关系，从最全面的历史观点去阐明它们。抛开一切具体的内容不谈，正是这一特点使这些遗著的出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是面对着今天那种使社会主义摆脱所有的重大观点即使社会主义理论降低到连一位德国国民经济学教授都能理解的平淡无味的家常真理的倾向，正是而对着那种已经被提高成原则的思想狭隘性和那种已经被宣称为方法的凭经验摸索前进的畏缩态度，这些遗著的出版具有重大的意义。

梅林在他编辑的这一卷和第三卷里都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实际政策中的两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对这两个问题的判断是和今天的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而且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后来自己修改的。这就是**关税保护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如果在这里只讲恩格斯，而不同时提到马克思，会更加正确，因为有关的那些文章只出自恩格斯一人之手，而且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就自由贸易发表演说时对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表达的思想是那样清楚和鲜明，因此几乎排除了他同时还会朝保护关税方面动摇的可能性。梅林指出，恩格斯的那有利于保护关税的态度是对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论述自由贸易的演说的逻辑上的补充，因为马克思讲的是英国的情况，而恩格斯讲的却是德国的情况，当时两个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认为梅林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

同时也在1847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经济学家会议上极其鲜明地谴责里廷豪森所主张的在德国实行保护关税的立场，马克思的这种态度在维尔特的演说以及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他自己的札记里表现得很清楚。

无论怎样，梅林本人多次（前几个月在《新时代》<sup>①</sup>，此后在他出版的第二卷、第三卷的说明中）令人满意地防止了在今天哪怕仅仅多少按照席佩耳的观点利用四十年代恩格斯那些有偏差的见解来为保护关税派<sup>②</sup>争取同情的企图。他极其明确地指出，正是半个世纪前使恩格斯发表保护关税派错误观点的那些实际的前提，在情况恰恰相反的今天，只能使人得出自由贸易这个唯一的结论。但是我们认为，对于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观点统一成为一个逻辑上的整体的尝试，在这里只好听其自便了。

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问题，我们认为，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观点尽管说的很简短，但是和马克思1864年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观点就是，用立法形式限制工作时间，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上讲是一种进步的改革。《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sup>③</sup>正是后来成立宣言所说的一个新原则的胜利。<sup>④</sup>相反，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和后来1850年在《新莱茵评论》<sup>⑤</sup>上都发表了这样的见解，认为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

① 弗兰茨·梅林《关税战的插曲》，发表于《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年）第1册第129—132页。——编者注

② 指席佩耳在《恩格斯相信民军吗？》一文中拥护加强大地主和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并加深民族间利益冲突的保护关税政策的观点。——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编者注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页。——编者注

⑤ 卢森堡指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50年第4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6—287页。——编者注

种反动的谋杀，是工业的桎梏，是一种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才能采用的手段，据我们看，这些见解同马克思表达的那两点思想是无法取得一致的。我们认为恩格斯这一令人惊奇的见解可以很容易地用以下情况来解释，就是说恩格斯在这里把英国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时的特殊政治条件以及无疑与此有关的托利党的反动意图同这次改革的客观历史意义混淆起来了。恩格斯怎么会在某一时刻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同马克思的观点有如此引人注目的分歧这一问题即便是只同他个人有关，但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这一事实是重要的：马克思无论在贸易政策还是在对社会主义改良的评价方面，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这种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旧是权威性的明确的原则立场。

梅林处理他在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中遇到的无数其他问题时同对待上面涉及的那些问题一样：首先采取的是批判性的态度。他在这里比他在例如更具有叙事诗特点的党史<sup>①</sup>的相应章节里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他对遗著的说明尽管同样描写得极其生动，却使人感到从头到尾都是真挚严肃的思考工作，是验证，是分析。因此阅读起来特别引人入胜，令人振奋并使人耳目一新。

## 二

如果说梅林的第一卷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作坊，第二卷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争取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思想优势而进行的斗争，那么第三卷向我们展示的是已经投身于伟大的实际斗争即1848—1849年革命之中的马克思和恩格

---

<sup>①</sup> 指弗兰茨·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编者注

斯。《新莱茵报》和《新莱茵评论》上刊登的我们导师的文章就是证明。第三卷包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年半，但是在一次革命中间政治发展是象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中那样按月计算的，而不是按年计算的。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马克思和他周围的同志突然摆脱了派别的小冲突以及流亡者生活中经常令人不愉快的个人之间的小磨擦，站到最危险的革命岗位上，成为这场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坚定、最成熟的领袖，成为不仅从德国革命的高度、而且也从欧洲革命的高度观察的战略家。

他们在革命时期的作用尤其不同于黑克尔<sup>①</sup>之流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新莱茵报》本身就用这样的话非常恰当地描写了这种区别：

“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对待运动的态度是慷慨激昂的，《新莱茵报》则是批判的。弗里德里希·黑克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重大作用上，我们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由经济关系引起的冲突上。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到美利坚合众国去研究‘共和制度’，《新莱茵报》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中找到了比那个合众国更加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在那个合众国里，西部还根本没有阶级斗争，东部的阶级斗争也只是按照旧的无声无息的英国形式进行的。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看来，社会问题是由政治斗争产生的，在《新莱茵报》看来，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可能是个优秀的三色共和主义者，而《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时代开始。”<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时期的职责是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尖锐和深刻的，因为他们对阶级斗争持唯物主义观点，对法国的事件

---

① 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1811—1881)，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侨居美国。——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24—525页。——编者注

有深刻的理解，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进行的批判本身是从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立场出发的。我们认为这是从他们最后这卷遗著中确实可靠地得到的最重要的一点认识。如果说《新莱茵报》接连不断地抨击国民议会的麻木不仁、出尔反尔和怯懦，如果说《新莱茵报》要求解散联邦议会，撤换三月革命以前的官员，宣布德国为统一的国家，最后在十一月危机中还要求拒绝纳税，那么它所做的不过是任何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1848—1849年革命中（如果它严肃对待革命和民主的话）本来必须做的事情。尽管马克思的话具有坚定的革命性，他却**没有**提出任何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的要求，任何具有社会主义特性的要求。在这一革命时期，《新莱茵报》除了在阐明法国和英国阶级斗争的时候外，执行了一条彻底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政策。《新莱茵报》在革命时期还没有达到应当**在三色共和国时期才开始的那种真正的**（也就是说多半是社会主义的）反对派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新莱茵报》正好在停刊之前准备采取新策略，采取更加纯粹的工人政策和阶级政策，但恰恰在这一时刻它受到革命的打击而失败了。

《新莱茵报》的激进民主派立场在**对外政策中**尤其看得清楚。它的口号是：向俄国进攻，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作为俄国和德国之间的缓冲国，和丹麦作战以夺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sup>①</sup>，对匈牙利革命抱乐观态度，对奥地利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无比仇

---

① 当时统治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丹麦与德意志联邦之间不断发生矛盾。1848年前丹麦在此实行统一宪法，遭到反对，丹麦进行了镇压。在1848—1849年革命影响下，该地区的民族运动具有革命的解放性质，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该地居民为达到与德国合并的目的，奋起反抗丹麦统治，并向德国求援。迫于德国舆论压力，普鲁士虚张声势向丹麦发动战争，实际上步步出卖了该地区的革命军队，出卖德国民族利益，结果是普鲁士将军维列森指挥的部队全军覆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居民停止反抗，两个公国仍属丹麦。——编者注

恨，所有这一切确实不能称作社会主义的工人政策，不如说是用对待资产阶级国际政治的方法办事。

如果说，迄今确实还没有一项明确的、坚定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不如说在这一领域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多地一方面表现为单纯的感情用事，另一方面又受资产阶级民主的老传统支配，那么，梅林在他的最后一卷里对外交政策方面表现出来的早期社会主义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和阐明就更加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这里第一次对《新莱茵报》作了批判性分析。

对于《新莱茵报》的一些观点，后来国际社会民主党迫于形势的变化已经一部分公开地和正式地作了修改，一部分悄悄地作了修改，但是只要发生这种情况，梅林都慎重地强调指出这种变化，并指出它是由实际情况的变动引起的。例如关于斯拉夫民族问题，还有匈牙利革命，尤其是波兰问题。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梅林实际上是选出一个国际政策问题来深入地加以评论，这一问题从纯粹的方法论角度来看恐怕是最有趣的，同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的实际的前因后果又是被人们了解的最少的，而今天它终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意义了。梅林在结尾一段扼要地把《新莱茵报》时期以来在波兰问题上发生的变化结果作了概括，这些话无疑也可以用来说明党的运动的最近实践中某些现象：

“于是处于三个瓜分国家<sup>①</sup>中的波兰原先的统治阶级已经和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同化了。他们完全放弃了民族鼓动工作，这一工作还只是在一部分波兰知识分子和波兰小资产阶级中艰难地维持着。因此对现代无产阶级来说波兰问题正和1848年时完全不同了。波兰早已不再是沙皇专制主义为革命提供的唯一的可以进攻的侧翼；俄国象其他瓜分国一样，在本国早已发生革命。如果

---

<sup>①</sup> 见本卷第59页注<sup>②</sup>。——编者注

波兰的无产阶级想在他们的旗帜上写上重建一个波兰的阶级国家，一个统治阶级连听也不想听到的阶级国家，那么它就会演出一场狂欢节的历史闹剧，对于有产阶级来说发生这类情况固然是可以的，1791年波兰贵族就是这样的，但是工人阶级绝对不容许这样做。如果这种反动的空想现在居然出现，使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那些对民族鼓动还有一定反响的阶层对无产阶级的鼓动发生好感，那么它就是那种该诅咒的、为了微不足道的廉价的眼前成就而牺牲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机会主义的恶果，因此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绝对要求三个瓜分国的波兰工人毫无保留地同他们的阶级兄弟并肩战斗。能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一个自由波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波兰的复兴在今天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而在这场革命中现代无产阶级将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sup>①</sup>

但是我们首先认为值得对《新莱茵报》的总的立场进行一次批判性的分析。

恩格斯本人已经明确而坦率地指出，《新莱茵报》的这种立场可以用三月革命的实际条件，用当时的历史情况充分加以说明。但是法国和所有地方的那些同志特别应该注意可以从马克思那一历史时刻的改革中为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得出什么样的教训，这些同志今天宣布为社会民主党的职责的事情是同1848—1849年《新莱茵报》所做的事情完全一样的，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作用。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说明这种牺牲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宽宏大量的思想完全正确的话，那就是对于马克思在三月革命时期的策略的

---

<sup>①</sup> 弗兰茨·梅林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1923年柏林和斯图加特版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8.5—1850.10）第44页。——编者注

研究,对这一策略的历史依据及其政治成果的研究。

《新莱茵报》的策略是按照现代资产阶级首次登上政治舞台那一时刻的需要制定的。在这种时刻,相信资产阶级会认真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并有可能通过一个社会主义的左翼的坚定态度推动它向前进,是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和实践政治家的权利和义务。何况这是在一个革命的时刻,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从四十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在三月革命以前还是在这以后,在他们的著作和演讲里都执行一条完全不同的、鲜明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政策,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政策,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的上述策略事实上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是针对革命行动的那一时刻的。

但是还有第三点,那就是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三月革命特有的观点:关于所谓的“不断革命”的希望,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第一幕,小资产阶级革命并且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将接踵而来的期望。马克思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还为这点提供了证明。从这一意义上说,《新莱茵报》的态度看起来不外乎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聪明的策略,它的目的是利用资产阶级的革命骚动作为最终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阶段,要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那一边缘,在那里它已失去作用,不得不让位给更加彻底的第二轮革命。从这个观点看来,《新莱茵报》的策略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去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充当马前卒,相反,是自觉地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把它当作无产阶级胜利的一个短暂的、至多只作几年打算的预备阶段。

最后还有一点:当时根本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四十年代德国的社会主义局限于布鲁塞尔、伦敦和巴黎的几个流亡者聚居区、德国出版的几种短命的社会主义期刊、莱茵地区的几个松散的工人小组。因此《新莱茵报》在三月革命中不能维护实际



上还不存在的东西，即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政策。

显然，所有这些先决条件今天已经完全反过来了。我们看到的已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生涯的开端，而是它的尽头，或者确切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反动统治的斗争起点已经同时被证明是它的终结，此后我们亲身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连续五十年的衰落。革命的时机、革命的行动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成为早已被遗忘的梦想，成为青少年时代的愚蠢行为。今天企图重新采用《新莱茵报》策略的那种尝试的基础已不是年轻的资产阶级短暂的革命激情，而是衰老的资产阶级的和平的、日常的、“正常的”社会政治的泥潭，而这种议会生活是把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妥协提高为准则的表现。今天工人阶级终于已作为一支第一流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同没落的资产阶级相抗衡了。

在这种完全相反的历史情况下，重新采用《新莱茵报》的策略就是对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假说的歪曲，而那些主张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的人恰恰是一有机会就要自命不凡地嘲笑这个假说的。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街垒的炮火下同资产阶级合作的主张被歪曲成社会民主党同自由主义在议会中的政治交易，被歪曲成分享部长职位。马克思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立即领导工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把它从执政的地位赶走，给无产阶级专政让位，而这一希望被歪曲成通过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联盟进行议会改良，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而且从另外一个理由来说，饶勒斯等人的现行政策也是对《新莱茵报》的一种歪曲。在三月革命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协助不是表现在他顺从地参加资产阶级的任何卑鄙勾当和贩卖行动，而是表现在他用主人翁的态度无情地鞭斥这种卑鄙勾当和贩卖行为。如果马克思想驱赶资产阶级前进，他就用脚去踢，用马刺

去刺，使他们受伤流血。如果饶勒斯之流忘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政策，那么请他们至少在现在从《新莱茵报》上学习一下，一种真正激进民主主义的政策是怎样的。

在那里他们也就会从这种经典式的试验中吸取最大的教训。归根结底，这种在最有利的历史时刻，以最娴熟的技巧、以天才的最出色的方法实行的策略的成果是什么呢？难道《新莱茵报》象马拉<sup>①</sup>从前在巴黎的地下室里写的《人民之友》为法国无产阶级在国民公会中的统治作了准备那样，真正做到了把资产阶级哪怕是稍微向左推动一点，争取一个比较激进的分子的一翼团结在自己周围，对革命进程施加一定的影响，掀起第二次大的革命浪潮吗？丝毫没有！新莱茵报维护德国革命史的荣誉，它在这场革命中同时又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岗哨，是荒野上的呼声。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自觉地担任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任务也就是这样一劳永逸地完成了。

梅林的书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一卷反映一个伟大的思想斗争的时代，对于德国来说这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这最末一卷使人感到同样已经逝去的一个伟大革命时代的动向。梅林如此宽广地把握和再现了这两个烘托出我们导师伟大形象的伟大时代，当人们被带到这幅过去的图画面前时，他就会暂时忘却平日的一切不幸，并且憧憬与此相似的未来，这就是梅林为德国工人阶级作出的不朽功绩。

发表于1902年11月9日《前进报》第263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二卷第2册第291—303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① 让·保尔·马拉（1743—1793）——法国政论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编者注

## 纪念“无产阶级”

(1903年)

多年以来，在库尼茨基、巴尔道夫斯基、奥索夫斯基和彼得鲁辛斯基<sup>①</sup>英勇殉难周年纪念日时，在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殉难的烈士墓地常常发生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阴谋活动，扰乱了对波兰第一个社会主义党<sup>②</sup>奠基人的纪念。我们在这里想起了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特别是由国外的波兰社会主义党<sup>③</sup>举办的纪念活动，它们的目的在于篡改波兰工人运动的历史，使之为今天隐藏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民族主义服务。我们想起了波兰社会主义党所表示的装模作样的敬意，这个派别的纲领性信念和政治伦理观点与这些殉难者的整个生活和活动都是格格不入的。

这四个人具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们为了理想视死如归，临终时还以振奋人心的、热情的话鼓舞活着的同志们，毫无疑问，

---

① 1886年1月28日“无产阶级”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斯坦尼斯瓦夫·库尼茨基，彼得·巴尔道夫斯基，米哈乌·奥索夫斯基和杨·彼得鲁辛斯基被处决。他们是在1884年春天和夏天的大逮捕中同几百名革命者一起被捕的。——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页注③。——编者注

③ 1892年11月在波莱斯瓦夫·利曼诺夫斯基的领导下，在巴黎的一次波兰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社会主义党。波兰社会主义党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政策。它的纲领里规定要为波兰的独立而斗争，但不是与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革命的道路去争取独立，而是要通过逐步地改造波兰的社会状况来做到这一点。在波兰社会主义党内有一个左派，它于1906年分裂出来了。——编者注

这样的人物绝不是任何一个党、任何一个小组和任何一个派别的独有的财产。这样的英灵应该在全人类的名人纪念堂里占有位置，并允许每一个诚挚地热爱自由概念的人（不管这种自由思想概念的内容与形式如何）把他们当作思想相通的人而向之表示敬意与纪念。尤其是有许多波兰大学生参加纪念“无产阶级”的庆祝活动，这是我们的知识界的理想主义和富有前途的革命同情心的一个标志，我们怀着真挚的愉快心情对此表示祝贺。

因此我们不想宣布对“无产阶级”的英雄的纪念应当由我们党独占，或者由于狭隘的党派利益而象争夺帕特洛克罗斯<sup>①</sup>的尸体那样为这件事进行斗争。但是如果把对殉难英雄的郑重纪念变成一种缺乏思想内容的、市场叫卖式的玩意，如果这种纪念被降低成一种为一定的政治集团服务的庸俗广告，甚至如果为了这种卑鄙的企图而在公众舆论面前肆无忌惮地歪曲和篡改“无产阶级”的这些信徒原来的思想和原来的行动——他们是为此而以身殉难的——那么，那些在自己所信奉的原则的精神方面首先继承了“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人就应该强烈地表示抗议，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义务。我们绝不赞成这种有规律的、一年一度举行革命纪念日活动做法，这种活动仅仅由于其机械的规律性就已成为日常的平凡事情，而且像一切例行事务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件庸俗的事情了。我们却认为，目前对1月28日烈士表示敬意的最适当的方式就是，指出他们的墓地不适于让社会爱国主义者在那里胡作非为，或者去训练锡制玩具士兵举行“民族起义”。

此外，可惜现在这一代波兰革命者对我们国家过去各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了解得如此之少，因此我们认为，是重温我们

---

<sup>①</sup> 帕特洛克罗斯——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的好朋友。在特洛伊战争中，他身穿阿喀琉斯的盔甲冲到特洛伊城下，被赫克托耳杀死。他的朋友阿克琉斯给他报仇，杀死了赫克托耳。——编者注

过去的斗争历史的时候了，目前来说，对于加强道义观念也好，对于进行政治教育也好，这段历史都是丰富的宝库。要用波兰第一个组织强大、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党“无产阶级”的言行和历史真相来展示它的精神面貌，现在尤其是时候了。

谁要是想正确地了解和评价“无产阶级”党的政治思想财富，一开始他就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即这个党就它的纲领来说不是统一的，它的纲领和方针是由两种不同的因素组成的：西方的影响和俄国的影响，马克思的理论和“民意党”的实践。

王国<sup>①</sup>在八十年代的社会条件，对于工人运动（就这个词的欧洲含义来说）是一个绝对有利的基础。在最近一次起义<sup>②</sup>失败之后，以及农业改革<sup>③</sup>之后，工业的繁荣使资本主义在城市和部分乡村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关于有组织的劳动的理论<sup>④</sup>从社会上清除了贵族的民族意识形态的残余，并且以任何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如此赤裸裸的形式开创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和知识统治。现代的阶级矛盾，工业无产阶级的经济特点和社会意义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说，被马克思学说认为是基础的客观条件在王国的任何方面都已高度发展，而“无产阶级”关于自己的社会主义意图的全部论证是前后一贯地站在马克思立场上的。

1882年“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工人委员会”提出的“呼吁书”的第二段自觉地、清楚地指出：

① 见本卷第2页注①。——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页注②。——编者注

③ 沙皇政府被迫于1864年3月2月废除波兰的农奴制度，使波兰农民在1863—1864年的斗争中获得的权利得到了保证。——编者注

④ 1876年7月波兰知识界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公布了一个所谓的“有组织的劳动的纲领”，目的是指望通过“有组织的劳动”使波兰经济得到发展。——编者注

“在欧洲各民族的一般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国家不是例外：它过去的和现行的制度建立在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给予我们工人的无非是贫困和屈辱。我们今天的社会具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特征，尽管由于缺乏政治自由，这个社会的面貌是憔悴的和带有病态的。但是这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sup>①</sup>

这里同样清楚地把社会主义提到纯粹符合阶级利益的、现代的基础之上：

“考虑到被剥削者的利益和剥削者的利益不可能取得一致，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以虚构的民族统一的名义走共同的道路；并且考虑到城市工人和农村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波兰无产阶级彻底和特权阶级决裂，并且作为独立的、在经济、政治和道德的意向完全不同的阶级与它们进行斗争。”<sup>②</sup>

接着呼吁书先提到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所具有的彻底的**国际性**特点，最后强调指出，“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经济条件，因此所有其他的社会生活现象都从属于这些条件”<sup>③</sup>。呼吁书就以此表示正式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的基础。

就这一点而言，“无产阶级”在一切重大方面的观点都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原则运用到波兰的基础上。

但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一般性批判本身还没有说明党的**直接行动**的方式以及党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在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和由此得出相应的有关党的活动和任务的结论之间，一句话，在《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和**社会民主党实践的直接纲领**之间存在一条鸿沟。而“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却受到了俄国“民意党”的决定性影响的。

---

① 《战地》，日内瓦，1886年第29页。——卢森堡注

② 同上，第29页。——卢森堡注

③ 同上，第32页。——卢森堡注

这些政治观点，就其整个精神面貌来看完全适合于其他方面的社会条件。“民意党”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从社会生活复杂的整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关系、从数百年之久的俄国公社制度的残余产生出来的。它不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而是依靠所有者——农民公社。它不是力求实现资本主义的成就，而是力求预防这些成就。它不从阶级斗争中寻找它的武器，而是企图通过坚定的少数人的奋斗掌握国家政权。如果我们再补充指出，主观唯心主义是“民粹派”历史观的基础，那么结果我们就得到一种在所有方面都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原则不同的理论。

显然“民意党”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组织；在这里马克思理论的萌芽和西方的影响在一些方面也有所表现。“民意党”的政治纲领也是不容易确定的。因此人们只有经过严肃地考虑和分析这个党出版的期刊才能对下面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民意党”的政治行动？它是打算推翻独裁统治并召开全俄缙绅会议<sup>①</sup>，以便立即采取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过渡措施，并首先巩固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公社制呢，还是也许要首先争取得到普通的根据宪法的自由呢？正如我们在下面要看到的，当时也有人发表意见，认为应该从后一种意义上去理解“民意党”。“民意党”的政治策略却毫无疑问是最容易确定的，我们可以在西欧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布朗基主义**这一概念中找到相应的标签，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策略，它一方面以争取人民群众的**信任**为目的，另一方面又想通过一个密谋者的党夺取政权，以便在群众的支持下，“尽可能多地”实行社会主义纲领的内容。俄国社会民主党

---

<sup>①</sup> 1549年第一次召开全俄缙绅会议，这是俄国的一种等级议会，封建主在其中占绝对多数。这一机构一直存在到17世纪末，它是供沙皇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咨询用的。——编者注

坚持这样的评价，它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对“民粹派”的历史观和经济理论以及“民意党”的政治方法进行了详尽的批评。

由于观点如此矛盾，“民意党”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乍一看来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现象，要把如此不同的因素结合成一个整体看来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任务。“无产阶级”就其基本观点来说是站在欧洲一般的国际基础上的，而“民意党”却是一种俄国特有的、土生土长的特殊现象。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因素居然能结合在一起，这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做到的呢？正是由于这种结合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上以及对于它最后阶段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正确地解答这一问题就更加重要了。

## 二

“无产阶级”党的创建者的思想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关系到确立纲领的那一最为重要的中间阶段是与当时波兰社会主义最聪敏的人物和最有影响的领袖路德维希·瓦棱斯基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一阶段大约延续到1880年，是理论酝酿阶段，涉及的主要是在瑞士的社会主义政治流亡者，其发表著作的刊物是在日内瓦出版的“Równość”（《平等》）。在这里我们固然看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它的经济学方面已经得到部分的承认，也看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的批评，但是关于这种理论的实际运用，关于一种直接活动的纲领，《平等》的立场仍旧极不明确。他们的纲领就是1868年提出的所谓布鲁塞尔纲领<sup>①</sup>。它在开头四点中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原则和社会原则之后，接着就

---

<sup>①</sup> 原文写成1878年提出。应指1868年9月6日至1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必须把大生产资料转交社会所有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一次胜利。——编者注



宣布实现这些原则应当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革命”的任务，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行联邦式的联合”这一不很容易理解的要求。关于实践活动，纲领只作了相当难以捉摸的解释，说“我们活动的原则是行动方式在道义上同提出的目标一致”，而且十分笼统地把以下几点称为“有助于我们党的发展的手段”：组织人民力量，口头和书面宣传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及鼓动。“这就是说，根据我们党的原则精神进行抗议，示威游行和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积极斗争。”

最后，在那里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意见，认为由于合法的手段无效，“只有通过社会革命的道路”<sup>①</sup>才能实现这个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我们既没有看到政治要求，也根本没有看到直接的或暂时的要求。因此，“平等”派在其纲领中对波兰的三个部分<sup>②</sup>没有加以区分，而是把自己的原则同样运用于加里西亚、波森地区和王国并且进行同样的宣传工作。这就是说，如果社会主义者不给自己提出适合当时国情的直接要求的纲领，而仅仅一般地通过工人的“组织”直接地为国际社会革命而奋斗，那么三个部分不同的国家政治条件当然就不能起任何作用和产生任何差别。“平等”的纲领不仅对于波兰的这三个部分来说，而且甚至对于英国、法国或德国来说都可以是同样适用或者同样不适用的。

那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只有在一个方面表现得很清楚，那就是对民族主义采取拒绝的态度，坚持纯粹的国际立场。

从《平等》上发表的题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论中，我们看到：

“在很多爱国主义政党中只剩下个别的小组，它们的信念是，他们仍将举起‘为了祖国的自由’的旗帜，它们还将与敌人进行最

<sup>①</sup> 《平等》1879年10月第一号。——卢森堡注

<sup>②</sup> 参看本卷第59页注<sup>②</sup>。——编者注

后一次斗争，然后重建他们热爱的祖国！我们愿意尊重这些人的全部真挚感情，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祖国作出任何牺牲，而且即使在今天仍然作这种准备。但是我们波兰社会主义者与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两种思想，它们是无法取得一致的。<sup>①</sup>”

1880年11月路德维希·瓦棱斯基在日内瓦的一次大会上说：“今天的大会与过去很多大会的区别在于我们波兰社会主义者同你们——我们的俄国同志们的相互关系。我们不是作为未来波兰国家的战士出现在你们——俄罗斯国家的被压迫的臣民面前，而是作为波兰无产阶级的代表和战士出现在你们——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面前。”<sup>②</sup>瓦棱斯基在讲话结束时说：“巴枯宁梦寐以求的斯拉夫联盟今天对我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认为这样或那样的波兰国界是无关紧要的，这是我们的爱国者的任务。我们的祖国是整个世界。我们不是三十年代<sup>③</sup>的谋叛者，他们彼此寻找，力求扩大自己的实力。我们不是1863年的战士，他们对沙皇制度同仇敌忾，并且牺牲在民族斗争的战场上。我们既不是彼此怀抱敌意的国家，也不是彼此敌对的民族。我们是比波兰更为不幸的一个伟大的民族——无产者民族的同胞和成员。”<sup>④</sup>

与此同时，《平等》在它的一篇社论中说的比它们的代表瓦棱斯基在上述演讲中说的还要明确：“我们已经与爱国纲领一刀两断；我们既不要贵族的波兰，也不要民主的波兰，我们不仅不要，我们甚至坚信，通过人民重建波兰的斗争在今天是一件荒谬的行

---

① 《平等》，1879年11月第2号。——卢森堡注

② 《十一月起义五十周年国际会议的报告》1881年日内瓦版第77页。——卢森堡注

③ 见本卷第61页注①。——编者注

④ 《十一月起义五十周年国际会议的报告》1881年日内瓦版第83页。——卢森堡注

为。”<sup>①</sup>

除了纯粹的国际立场（这在我国特殊条件下与在其他国家比起来固然具有更为积极的政治意义）之外，当时的那种根本不考虑政治斗争的波兰社会主义表现出某种类似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尽管是不自觉的。我们今天不能确切地说明，这种估计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平等”派的为数众多的成员。然而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很快趋于成熟，人们必须承认，不如说无政府的动摇从一开始就是派别内部存在各种不同观点的一个表现。

无论如何，在这一方面，《平等》上发表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这种意见认为，从社会主义的国际奋斗的观点考虑，每个国家的政治条件恰恰只是一种障碍。根据特殊的条件相应地创建特殊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进行政治斗争仅仅被看成是一件不可避免的坏事：“我们的理想始终是国际联合，如果现存的政治条件对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来说不是障碍，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吸引一部分社会主义力量去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那么经济条件就是建立共同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唯一基础。”<sup>②</sup>

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经济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当时至少对《平等》派的一些领导人来说完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正如任何一种阶级斗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政治斗争这一基本原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一样。与此有直接联系的情况是，《平等》派由于渴望实现国际联合这一“理想”，因此不能理解，这种联合的瓦解以及代之以在每一个国家建立单个的工人党，这在社会主义斗争发展的一定阶段是一个必要的、进步的现象。

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纲领性态

---

① 《平等》1880年11月第1号。——卢森堡注

② 《平等》1881年1月第3号，2月第4号。——卢森堡注

度很快就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1881年夏，在瓦棱斯基的影响下已经向明确形成纲领的第二阶段过渡，加里西亚工人的纲领，即《黎明》第一期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奠基人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特别是纲领的政治方面已很清楚了。

在这里，一方面象前一时期一样坚决表现出**国际的和反民族主义的立场**。当然，随着瓦棱斯基派从模糊的社会主义宣传领域过渡到实践活动的基地，也就是向**政治斗争过渡**，他们的反民族主义就在这一派的复杂的政治观点的整体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采取了明确的、具体的形式。

比方说，如果说例如在瓦棱斯基的上述讲演中谈到的与俄国革命者团结和否定波兰民族主义的态度似乎只是从作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主义的国际特点**产生的，而且这也是符合《平等》派的观点的，那么在《黎明》上已经十分明确地从**最低纲领**的角度来论证这些观点了，更准确些说，已经从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行动**的角度来论证了。

在这方面，瓦棱斯基对当时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波兰人民”联盟在1881年8月发表的纲领性呼吁书所作的批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日内瓦派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布尔采青斯基，雅布汪斯基，帕德列夫斯基之所以反对上述呼吁书，原因之一是，“我们不把社会主义的目的当成遥远的和最终的目的（象“波兰人民”所做的那样），而是当成唯一的目的”<sup>①</sup>，也就是说，这个派别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对最终目的和直接的政治纲领之间的关系还不清楚，而在这同时瓦棱斯基却以令人惊奇的明确思想写道：

“我在上面所引用的‘波兰人民’的呼吁书中的内容不是随便

---

<sup>①</sup> 《黎明》1881年10月第3—4号。——卢森堡注

说说的，不是老一套的不精确的说法，而是与这个纲领的原则性条文密切相联的，这个纲领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所有纲领以及现代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相反，把民族的政治解放问题提到与全人类社会经济解放的任务同等的地位。

在纲领中这样把一般问题与个别问题（在一般问题中已经充分包括这些个别问题了）并列，只有在把一些个别问题当成最近目的，当成**最低要求**提出来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否则在波兰各部分把废除民族的政治压迫这样的个别问题与社会的和经济的解放并提是不可理解的；或者换句话说，在摆脱社会的经济的奴役的同时要使个人和所有的集团从各种物质的和道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我也把‘呼吁书’的纲领中所说的‘废除民族的政治压迫’看成是表述得不明确的**最低纲领**并据此来对待它。”

瓦棱斯基用这种方式三言两语否定了把波兰的解放当成与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具有同等价值的要求的那一纲领之后，他把这同一要求作为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而对它进行了分析：

“无需去问‘波兰人民’联盟为什么把这个最低纲领阐述得不清楚，无需去问它为什么不把这一纲领明确地定为它的奋斗的最近目的，我认为，提出这样一个纲领，不管清楚与否，对于所有三个部分也好，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单独部分也好，对社会民主党在其实践活动中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任务都是同样有害的。

社会主义者从反对资本的日常工作立场出发所提出的**最低纲领**，不是把‘民族复兴’当作目的，而是要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以便组织群众性组织来同作为政治和社会阶级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加里西亚工人党’的纲领（这个纲领不仅是为波兰人民制定的，而且也是为在加里西亚团结成一个党的那些民族的无产阶级派别制定的）的性质正是这样的。应该用这个事实来回答那些打

算谈论我们社会的特殊发展条件的人；我们也奉劝我们的社会主义革新者们对此彻底地加以考虑……

这是不难预料到的，波森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将走加里西亚同样的道路，那里的波兰工人也将与德国工人结成一个严密的组织，这一组织将不仅是由外部关系决定的，而且就其内容和本质来说也是依据国际团结的原则的……我们也不怀疑，在会议波兰，那些很好地理解社会主义任务并且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也将按同样的方针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花了较长的时间来详细地引证这段原文，是因为它对于熟悉今天的各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方法的读者来说，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信仰表白。

区别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突出特点是对应该如何使现今的社会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法的看法。换句话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直接任务及其与最终目的的关系的看法。

从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过渡只能是一定的——或长或短的——发展阶段的结果。这种发展固然决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按照社会主义精神对社会的改造归根到底只有通过一次暴力政治变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革命才能完成。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以前资产阶级社会没有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这种革命是不可能的。

这既与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因素有关，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有关，也与主观因素有关，也就是与工人阶级有关。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从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社会民主党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本身，亦即真正的广大的工人群众，首先是工业的无产阶级群众才能完成这种变革，即这种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因此社会主义变革

的第一个行动必须是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及建立对于实现过渡措施绝对不可缺少的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胜任所有这些任务，工人阶级自己必须首先觉悟到自己的任务，并且作为阶级组织起来。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面和政治发展方面都已处于相应的阶段，使采用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可能。

当然这两个条件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是相互影响的。没有使公开的阶级斗争成为可能的一定的政治前提，也就是说在国内没有民主制度，那么工人阶级就不能在广泛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提高自己的觉悟。反之，从一定的历史时刻起，从阶级对立尖锐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起，如果没有自觉的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斗争，就不可能实现民主的国家制度，也就是不可能说把它们扩大到工人群众方面。

解决这个似乎矛盾的任务的办法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辩证过程，无产阶级在为国家内的民主状况进行斗争的同时，自己也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起来并且提高了阶级觉悟；当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通过这种办法觉悟起来并且自身组织起来的时候，它同时也使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化，并且随着它自身的逐渐成熟也使资产阶级国家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

根据这种理解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实践活动所依据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是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是一种日常斗争，它的目的是使国家制度民主化，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水平和物质水平，同时把工人群众组织成一个特殊的政党，这个党自觉地用自己的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意图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对抗。

掌握这些原则并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加以运用，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因为波兰与西欧各国不同，社会主义者的处境是很复杂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波兰无产阶级所处的三种不

同的政治条件，特别是在波兰最重要的一部分——俄国部分——的特殊政治条件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民族问题造成的。

在波兰工人运动史上，正如上面的引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路德维希·瓦棱斯基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重要的困难任务，他用如此清楚和明确的方式说明了理解社会主义直接任务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我们在他以前的和他当时的波兰社会主义者那里都没有看到过。

至于说到民族问题，瓦棱斯基象“平等”派已经做过的那样，以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重建波兰。然而他提出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平等”派对民族主义意图采取否定态度的根据是，这些意图同社会主义的国际目标是相矛盾的，特别是他们整个说来对政治任务是采取冷淡态度的<sup>①</sup>，而瓦棱斯基在上述引文中说明他拒绝民族纲领的态度时却不再是以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为理由，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的直接任务，他针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提出了工人的政策。

瓦棱斯基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无产阶级日常行动的目的是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所以他们的政治纲领不可能是彻底摧毁国家或建立国家，而是获得和扩大政治权利，这些政治权利对于在资产阶级国家（他们是在这些国家里行动的）组织群众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瓦棱斯基就按照社会主义精神为波兰无产阶级确定了政治纲领的两条原则：第一，作为政治行动的出发点，把现存的历史基础和现存的国家条件当作既成事实；第二，作为这一行动的目

---

<sup>①</sup> 例如科·德伍斯基的文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这一段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比爱国主义的思想更宽广，更伟大。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爱国主义所依据的政治情况，社会主义思想以经济基础为依据，所以它要求对社会关系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它把经济体系当作背景，所有其他与整个社会生活以及与个别人的生活有关的关系和利益都在这个背景上集合起来。《平等》1879年11月第2号。——卢森堡注



的，使现存的政治条件民主化。

如果用这种方法从这些原则中得出的消极的结论是拒绝重建波兰的纲领的话，那么剩下要做的事情只是由此作出积极的结论了，这个结论的形式是为波兰无产阶级制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或者不如说三个纲领。也就是说，如果把国家政治条件当作确定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准则，那么这就说明，三个部分的波兰工人阶级采取统一行动和一个纲领是不可能的，相反，每个部分的行动和政治纲领必须是不同的，但必须是同统治该部分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共同的，不管民族的差别如何。关于加里西亚和波森省的问题，瓦棱斯基在上述文章中已经把这一原则阐述得既清楚又明确。对俄占区部分在一份稍后发表的文件中也论述过，这个文件整个说来是在正式组织“无产阶级”党之前的那一中间阶段瓦棱斯基和他的一派的观点最成熟的成果。这个文件就是1881年11月3日一个由《平等》和社会主义期刊《黎明》编辑部从前的成员组成的小组向俄国社会主义者发出的呼吁书，它转载在1881年12月1日《黎明》第6—7期上。这个呼吁书的目的是促使俄国同志和波兰社会主义者一起制定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因此这是从上述前提作出的最果断的实际结论。在该文件里不仅是这个结论，而且它的论证的方式都突出地表现了瓦棱斯基的思想的独具一格的简练和精确性，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在这里把呼吁书的结论部分全部引述如下：

呼吁书在对俄国的政治斗争以及波兰问题的历史衰亡的意义作了估价之后得出如下的结论：

“我们把我们迄今说过的一切表述为：

a) 在我们这里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社会主义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与民族问题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

b)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进展的保证以及无产阶级今后在社会革命中取得胜利的保证在于：工人群众中的社会主义觉悟得到极大的发展以及他们在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作为阶级组织起来。

c)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政治自由是必要的，由于在俄国缺乏自由，就给广泛组织劳动阶级造成空前的困难。

下面提出了与以前的“平等”派在前一年与俄国同志讨论的基础上通过的决议相一致的意见，即：

a)各社会革命组织的特点只受一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条件的影响；

b)可以一方面根据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又根据实际上存在的国家政治状况来组织各社会主义政党，而各民族间的人种界限不能作为组织的根据，因此

c)波兰社会主义党不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只能在奥地利、德国和俄国成立波兰社会主义小组，它们与该国其他民族的社会主义组织共同建立一个联合组织，这并不妨碍小组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不妨碍它们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联系。

最后的结论是：

a)在俄国为争取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斗争的结果取决于俄国境内各民族团结一致地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的共同行动；

b)考虑到俄国境内为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强调波兰的民族问题只能损害这场斗争，因而也会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

考虑到上述一切，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

1、必须组织一个由俄国境内各民族的社会主义组织联合组成的共同的社会主义政党。

2、为了联合一切力量共同行动，必须把迄今在经济领域和政

治领域分散进行斗争的各组织联合起来。

3、必须为所有在俄国境内活动的社会主义者制定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一个完全符合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纲领。”

只要看一下上述呼吁书就足以使人确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对波兰社会主义传统的历史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文件。人们不得不承认，1881年12月的呼吁书地地道道是对原则和政治纲领的表述，精确无误地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与今天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up>①</sup>的立场完全一致。

不仅有一般的原则：三个部分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和一个共同的组织，却必须与占领该部分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和一个共同的组织；不仅再次非常强调由此得出的消极结论：坚决拒绝波兰独立的纲领。而且《黎明》和前《平等》派的呼吁书在波兰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俄国占领部分的社会民主党的积极纲领：**争取俄国内部的政治自由，也就是立宪的形式。**

这还不够。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瓦棱斯基及其同志们的呼吁书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为自己提出**同样一个纲领**是理所当然的。的确，呼吁书甚至特别提到“民意党”的活动，它毫不犹豫地谈到“**在俄国为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斗争**”，并认为俄国党的这种恐怖主义是推翻沙皇制度和争取欧洲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的一种简单的策略。

此外，呼吁书企图尽可能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提出这个

---

<sup>①</sup> 1900年8月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和立陶宛波兰社会民主党左翼代表在华沙近郊举行代表大会，创立了一个共同的组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该党在波兰工人运动中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民族主义倾向作斗争。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申斯基、罗莎·卢森堡和尤利安·马赫列夫斯基。——编者注

策略，它宣称，“民意党”的恐怖主义只有在它以全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自觉行动为基础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政治意义。

毫无疑问，今天波兰的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不把恐怖主义看作一种合适的、能够达到目的的斗争方法，它们恰恰是由于受到“无产阶级”和“民意党”的经验的启发而懂得，恐怖主义是不能和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的，恐怖主义甚至直接给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造成困难和危害。但是在1881年，瓦棱斯基和他的同志们当然还不可能获得这种经验。的确，当他们发表呼吁书的时候，俄国恐怖主义者的党看来还处于全盛时期，而且似乎动摇了沙皇制度的基础，他们当然不得不相信俄国恐怖主义的积极作用和绝对的必要性。何况我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性著作（它们批判地摧毁了“民意党”的整个纲领的和策略的基础）中也看到了完全与此相同的观点，而且这是在瓦棱斯基发表这种观点的四年之后。

由此可见，在这里引人注目的不是对恐怖主义的承认，相反是这一情况，即波兰社会主义者的呼吁书力图使恐怖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广泛的阶级斗争的基础。

对当时俄国社会主义的这种看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无论如何，在这里事情的另一方面是重要的。这就是这一事实：瓦棱斯基派在纲领发展的道路上达到了纯粹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他们从这一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是：基本的政治原则是和俄国社会主义者采取共同的行动和共同的纲领。

这一时刻是“无产阶级”的创建人在发展中达到的顶峰，同时也是他们的历史上的转折点。瓦棱斯基和同志们在作出最成熟的政治结论之后，着手把这些结论运用于实践，着手在国内正式组织“无产阶级”党，这就开始了他们的发展的第三阶段，同时也是最后

的、终结阶段。

### 三

上面举出的致俄国同志呼吁书这一文件表明，1881年年底波兰社会主义者在关键性的两点上已经具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一是波兰无产阶级和各占领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在普遍原则上应当是相同的、一致的；二是在俄占区部分这一纲领应当是推翻专制统治和为政治自由而斗争，也就是为议会民主制政府形式而斗争。这是两条充分协调并在逻辑上相互补充的结论。可是当波兰社会主义者试图在实践中运用它们时，它们却发生了矛盾。共同的社会主义原则使波兰社会主义者在纲领和行动上都趋向和俄国社会主义者一致。但那个时期的俄国社会主义却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尽管瓦棱斯基小组提出把为宪法而斗争作为共同纲领，但是这个纲领实际上却不是“民意党”的纲领。波兰社会主义者声明，只有在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的领导下，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才能取得成效，但俄国社会主义者当时并不进行群众鼓动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依靠工人阶级。瓦棱斯基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把政治纲领的内容表述为“为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而斗争，目的在于“能够组成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群众组织”，而“民意党”实际上并不进行这一斗争。确切地说，“民意党”进行斗争是为了“sachwat vlasti”<sup>①</sup>，即为了夺取政权，目的是立即实行具有向社会主义变革过渡性质的改良，但是在这样做时却不依靠有阶级觉悟的群众的行动、不依靠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斗争，而是依靠“坚定的少数”的密谋行动。

---

<sup>①</sup> 用德语字母拼写的俄语“夺取政权”一词。——编者注

因此瓦梭斯基和他的同志们运用于实践的指导原则必然要陷入互相矛盾的情况。

如果那时候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象今天这样（只有少数组织是例外）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那么“无产阶级”创始人的基本原则一定会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既使俄国社会主义和波兰社会主义之间达成完全和谐的合作，又使波兰工人的群众运动发生带有自觉而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飞跃。

但是因为当“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时候，俄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只有一个受布朗基主义指导的密谋者的党。这就使波兰社会主义者陷入两难处境。为了保持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他们只有或者放弃和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纲领和共同行动，在波兰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在波兰工人中进行群众鼓动和组织工作去开展推翻沙皇制的斗争，或者遵循和俄国社会主义共同行动这一基本原则而放弃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群众斗争，并使自己服从“民意党”的斗争方法。

尽管后来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决定了波兰社会主义几乎整整十年的命运——而且这一决定是带来不幸的——我们仍旧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从两条道路中选择了后一条是一个非常自然并且极易理解的现象。因为在反对俄国的统治制度的政治斗争中，俄国本身自然一定是主要场所，相反波兰王国只处于第二线；此外还由于当时的“民意党”就人数和政治重要性来说远远超过波兰社会主义者；更由于“民意党”已经取得了一个相当漂亮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胜利，即3月13日的行刺<sup>①</sup>。这一事件使全世界的人认为他们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而这个时候的“无产阶级”却几乎还没有形成一个党。——考虑到这些情况，波兰社会主

---

<sup>①</sup>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13日被民意党人用炸弹行刺身亡。——编者注

义者组织不得不争取加入俄国的运动并成为其中一部分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那个时候“民意党”多么能左右人心并且使人们对迫近的政治崩溃产生何等巨大的希望，可以从弗·恩格斯的话得到证实，这些话写于1894年。恩格斯谈到俄国的那一时期时说：“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ispolnitel' nyj komitet)的政府<sup>①</sup>。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sup>②</sup>

如果说象恩格斯和马克思（上面的话也表达了马克思当时的观点和情绪）这样冷静的社会历史研究者——他们自己从欧洲革命历史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估计上曾给我们深刻的指示——尚且会对“民意党”活动的成果作过高评价，那么当时直接处于斗争中心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从他们一开始进行实际活动起就不能不受到“民意党”极其深重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就是说，在波兰社会主义由于按照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得出应和俄国社会主义联合起来进行共同行动的结论之后，它在既定的具体条件之下结果却必然是逐渐走上布朗基主义的道路。因此它的历史，从“无产阶级”党在本国正式组成的那一时刻直到八十年代末这个党衰落为止，就是一个不断脱

---

① 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党”（1876年秋至1879年秋）和“民意党”（1879年8月至1881年3月）的领导机关；后者宣布以恐怖手段为政治斗争主要手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6页。——编者注

离 1881 年 12 月致俄国社会主义者呼吁书中表述的立场而趋向布朗主义的过程。

如果认为在波兰社会主义者所处的环境中，上述选择是自觉地作出的，那就显然错了。在我们阐明上述两种抉择时，我们不如说是打算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作一分析。对于这一情况瓦梭斯基小组十分可能决没有如此明确地意识到。首先因为“民意党”的真正性质、民意党和瓦梭斯基及其同志们的观点之间的矛盾，在那个时候，即 1882 年还根本不象后来根据文献和事实能够看出的那样明显和易于确定。我们已经根据他们致俄国同志呼吁书指出，正是瓦梭斯基小组对于“民意党”的活动抱有幻想，希望这些活动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活动。<sup>①</sup> 如果详细研究那一时期的出版物（《平等》、《黎明》及各种小册子），可以证明，即使在波兰社会主义者中间，除了瓦梭斯基也再没有一个象人们根据那份呼吁书肯定认为会有的那样有觉悟的、成熟的社会民主党人。

考虑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和“民意党”思想上的联系从表面上看不是波兰社会主义思想财富内部严重分歧的产物，而是事态发展极为自然的结果。

但是既然对一个尽管很小的团体（迄今波兰的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组织通常都是很小的）的历史和精神面貌产生影响的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的大方向，而且还有无数偶然的个人因素，何况这仅仅是短短几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个运动就必然会由于“无产阶级”创始人理论上成熟程度不齐而更加容易受

---

<sup>①</sup> 我们在《平等》上看到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平等》在它就三月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分析“民意党”的纲领时认为它有温和的“君主立宪”的要求。该报说 3 月 13 日行刺策划者只是为了取得让步而斗争。“我们想要改变现今制度的政治形式——‘民意党’要求的就是这个。”《平等》1881 年 3 月第 5 期和 4 月第 6 期。——卢森堡注



到俄国的影响。既然“无产阶级”的文件和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表现出完全一致的性质，那么单是瓦梭斯基 1883 年秋天被捕而完全脱离战场这件事就足以使运动迅速沿着毫无希望的政治密谋的道路滑下去。

只要我们打算说清楚所谓布朗基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区别，那就首先应该肯定布朗基主义根本没有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意义上的理论，也就是说不具备关于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理论。不过这也不是这一类型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标志，因为说到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第一次尝试把社会主义的要求放在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一定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的，而且我们还要补充说，这一尝试迄今一直是成功的。早先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如果在这里能说得上有理论的话）的主要内容限于通过分析现存社会的缺点以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美和它在道德上的不可缺少来论证社会主义的意向。

和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学派一样，布朗基主义的观点立足于对资产阶级制度和私有制作消极的批判。就它本身来讲不如说只代表实际行动的一定策略，但在这方面布朗基主义暴露出它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极端革命派，在一定程度上是把雅各宾派的策略转用到社会主义的奋斗中去。我们在巴贝夫的密谋团体中看到这种转用的第一次尝试<sup>①</sup>。

这种策略的主导思想是无限信仰**政治暴力的力量**，相信暴力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社会机体内部促成一切被认为是好的和正确

---

① 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1760—1797)于 1796 年领导平等派密谋起义推翻法国大资产阶级并恢复 1793 年雅各宾宪法，建立人民专政并实行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由于有人叛变，密谋被发现，巴贝夫也于 1797 年被处死。——编者注

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尽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把政治暴力视为社会变革的杠杆。但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政治暴力在革命时期起的仅仅是一种可以说是引导因素的作用，这种因素促使社会的内部发展（它在政治上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各种结果得以变为现实。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说法，政治暴力在革命时期起的是“助产婆”作用，她加速旧社会母体内已经成熟的果实即新社会的落地并减轻其分娩的痛苦。<sup>①</sup>由此已经自然得出结论，借助政治力量进行深入的社会变革只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作为革命工具的政治暴力只能掌握在该历史时期代表革命的那个社会阶级手中才能起作用，而正是这个阶级成熟到持久掌握政权乃是革命本身的正确性和可能性的唯一合法证据和证明。

布朗基主义不承认，或者不如说不懂得这一理论，它把政治暴力视为一个既脱离整个社会发展、又脱离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工具。这一工具可以供任何一个掌握它的人在任何时候使用。从这种观点出发，革命的条件仅仅是：由一些人组成的坚定团体的愿望以及目的在于在一个有利时机进行夺取政权的密谋。

恩格斯在他那 1874 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著名文章里说：“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方案。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19 页。——编者注

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革命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sup>①</sup>

正如我们看到的,布朗基主义的策略是绕过所有过渡阶段、所有发展阶段而直接实行社会革命。这就使布朗基主义成了一种不顾条件和时间去“制造”革命的方子,就是说布朗基主义是无视一切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的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任何一个国家运用这种策略都能够取得同样的效果。可是很明显,这种行动方法的运用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沙皇制度的特殊条件下那样能够对社会主义的命运起决定性的影响。

沿着笔直的道路向社会革命“飞跃”的策略肯定会首先对一个在具有独裁专制的统治形式的国家进行活动的党的**政治面貌**发生致命的影响。

因此波兰社会主义者政治观点一步一步的逐渐改变最引人注目地证实了俄国布朗基主义的影响。

实际上,1882年9月发表的“无产阶级”党的正式纲领已经显然远离了瓦梭斯基在《黎明》第3、4号上发表的文章和致俄国同志呼吁书的立场。在这一文件的一般部分中,正如我们开头已经指出过的,波兰社会主义的未来是以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但是要确定后面的实质性纲领的性质却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并列的部分,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在**政治领域**”和“在**道德生活范围**”的要求。如果说由于最后一部分在实践方面意义较小,可以不予考虑,那么在前面两部分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当成**坐标**提出来的要求表述了**社会**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0—581页。——编者注

主义革命的内容：“1, 土地和劳动工具应当从个人手中转为劳动者公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2, 雇佣劳动应当转变为集体劳动”等等。可是另一方面在政治要求上一眼就看出表现了以资产阶级国家为考虑对象的议会民主制度的内容；1, 各政治集团的充分自主权；2, 全民参与立法；3, 由选举产生所有官吏；4, 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集社等自由；5, 妇女的全面平等；6, 信仰和民族一律平等；7, 国际团结是普遍和平的保证。”

想用几句话表明这个纲领究竟属于哪一范畴是不可能的。进一步思考后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里列举的政治要求除开不大好懂的第1条外，其余各条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通常的最低纲领相似。但正是由于这些要求是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要求的坐标提出来的，就引起一种设想，人们认为它们并不是直接针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至于它们是否指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值得怀疑，因为它们在这方面显得对建立在阶级、性别和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现存制度考虑过多。可见也许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最低纲领，而是一个供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渡的时期使用的纲领，是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纲领。

类似这样把政治上的民主要求和用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的革命改良并提，而且考虑到在革命后立即开始过渡阶段的纲领的样本，我们比方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在巴黎起草、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入署名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可以看到。<sup>①</sup>

---

① 这些要求主要是：1, 全德国宣布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4, 武装全体人民；11, 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如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16, 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17, 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参看卡尔·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恩格斯1885年写的导言。——卢森堡注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纲领决不象比方说爱·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样表现了《共产党宣言》作者的布朗基主义策略。只要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法国二月革命的新鲜印象影响下，并在德国三月革命爆发的瞬间起草这一纲领的，就足以理解这个纲领了。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力，因而指望，欧洲资产阶级一旦卷入了革命运动漩涡，就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走完它统治的整个周期。“按他们的面貌或类似的面貌”<sup>①</sup>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然后革命浪潮使小资产阶级在自发运动中取代资产阶级的地位，而最终将是由无产阶级以这种方式直接接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担负起用阶级解放的思想去完成革命的使命。

历史的经验教训了我们，今天我们对这一观点的过分乐观主义可以作出评价了。我们知道，欧洲资产阶级在第一次革命风暴后立即开始倒退，而且在它扼杀了自己的革命之后，社会在其统治下回复到“正常”生活；我们还知道，当时欧洲的经济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那时候资本主义并没有面临死亡，相反它正打算开始自己的统治。这样一来，1848年的共产主义者们认为和无产阶级专政相隔只不过几年的那一阶段延长了，它延长成一个超过半个世纪之久、甚至今天仍然还没有走向它的终点的时代。

不过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候就已经制定一个直接以工人革命为目标的行动纲领的原因并不是要“超越”资产阶级统治阶段的愿望或希望，而仅仅是在革命影响下错误地估计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速度。但是在“无产阶级”活动的条件下，就难于找出类似的情况来解释它的纲领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要求具有一个适应过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编者注

渡时期的纲领的性质，那就只能设想“无产阶级”的确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布朗基观点。

但是必须肯定，如果撇开在形式上把最终的和直接的要求混杂在一起这一点，“无产阶级”的纲领整个说来是彻头彻尾贯穿了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精神的。证明是：他们有力地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的思想；有力地强调只有**群众斗争**、**无产阶级的组织**及其觉醒才可能为将来的社会制度准备条件。群众鼓动和群众组织体现出纲领的全部论据的指导思想并且指出，党已经注意到在无产阶级日常利益的基础上进行一个长时期的准备工作。

纲领中还有几段话说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认为有了政治自由，才有可能从事组织并进行群众斗争，这种说法有些地方使人想起瓦棱斯基在《黎明》上的精确表述。纲领声称：“我们坚决抗议没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讲演和出版自由，因为这一切给工人**觉悟提高设置了严重障碍**，它一方面引起宗教的和民族的仇恨和狂热，另一方面使人**不可能进行群众性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只有这一工作才能给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组织打下基础。”稍后又说：“我们将再次进行反对压迫的斗争，也许采取守势、也许采取攻势。在采取守势时，我们不允许情况恶化，而在采取攻势时，我们将**要求改善俄国国内无产阶级当前的生存条件。**”

到此为止，尽管我们在纲领中看到的不是把反对沙皇制度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当成直接任务作出明确而坚定的阐述，而主要是政治思想上某种程度的犹豫和动摇，但是无论纲领还是它的论证毕竟没有正面表现出布朗基主义的观点。根据这一文件可以肯定的唯一事实是，波兰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无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高度明确性，而我们分析过的日内瓦小组的那些文件的特点就是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观点。但是应当考虑到下而这一情

况：1882年的纲领已经是华沙当地的小组的产物，在瓦梭斯基转移到俄占区部分进行活动之后，他显然不得不更多地照顾到当地的同志，这些同志比在瑞士的波兰流亡者更为严重地直接受到俄国的影响。如果说不明确是“无产阶级”党的正式纲领的特点，那么党的活动中的另一些现象就使人再也不能怀疑布朗基主义对党的影响已经增加了。把“无产阶级”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毫不迟疑地认为1882年的纲领是一个过渡现象，这一现象正是以其不明确性而精确地反映出波兰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处于从社会民主主义阶段到布朗基主义阶段的转折点上的立场。

#### 四

我们在前面一节里用演绎的方法论证了瓦梭斯基和其他同志创造的党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向布朗基立场的过渡，认为这是该党在当时的情况下运用其和俄国社会主义共同行动的政治指导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对关于“无产阶级”活动的一些文件的分析已经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个结论，这些文件表明，波兰社会主义者是怎样随着和“民意党”的每一步接近而原封不动地照搬该党的观点和策略的。可以严格地按年代顺序来考察一下。在这方面比方说最早的一份文件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它的日期是1883年初，也就是说比工人委员会的呼吁书即“无产阶级”党的正式纲领早不了几个月。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一个“由一些社会革命小组的代表参加并向互相接近和建立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党迈出第一步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个文件尽管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些“社会革命小组”，也没有“无产阶级”党的正式签署，但是它发表在《黎明》的“公报部分”，而且这一文件的一般政治倾向是与瓦梭斯基和他

的同志们的目标相一致的，这就已经可以使人毫无疑问地看出，它即使也许不代表“无产阶级”全党或者党执委会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反映了该党一部分领袖、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领袖的观点。因此，尽管党的后来的出版物把这些决议当成“无产阶级”和“民意党”的那个大家已经熟知的秘密协议的基础，我们却根本不对这些决议的**实际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而是仅仅把它们看成是波兰社会主义者在建党初期的思想状态的**表征**。

这些决议的指导思想和“致俄国社会主义者同志”呼吁书完全一致，即在俄国建立一个唯一的具有共同纲领的党。它们一开始就提出下列很有代表性的问题：

“A、应否建立一个单独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的革命政党？”

全体一致：不同意。相反，应当建立同属于一个在俄国全境内活动的统一的党的波兰小组、立陶宛小组和白俄罗斯小组。

这个党应当怎样活动？

活动应分为两种方式：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另一方面直接在**俄国政府内部**开展反对俄国政府的斗争。”

如果后一阐述已经透露出在政治斗争方面考虑到“民意党”活动的密谋观点，下面的段落就更加能说明问题了：

“只有在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紧密配合时，才承认政治行动是适宜的。如果比方说政府支持有产阶级，那么反对有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政府的斗争。**如果相反，政府并不依靠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但是政府的压迫妨碍了社会革命政党的活动，那就应该而且可以很容易地用密谋推翻政府**，这时候，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有产者的利益的对抗，人民群众的团结便成为革命继续前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sup>①</sup>

每一个熟悉俄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人立即会从这里辨认出“民



意党”从巴枯宁分子那里继承来的那些观点的回声。

《警钟》<sup>②</sup>杂志出版人、俄国最老的布朗基分子之一特卡乔夫<sup>③</sup>1874年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了他的《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其中已经表述了这样的理论：俄国的沙皇政府“不依靠任何社会阶级”，因此“能够和应当”轻而易举地推翻它。特卡乔夫宣称，这个国家“只有从远处看才象是一种力量……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在你们那里（在德国，在西方——罗·卢·）国家不是虚幻的力量，它的双脚都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在我们这里（在俄国——罗·卢·）这一情况恰好颠倒过来了，我国社会形态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现在”。<sup>④</sup>

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里，关于“悬在空中”的俄罗斯国家理论仅仅是关于俄国“独立”发展的完整理论的一部分。在经济领域和这一理论相应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在俄国是沙皇政府移植到俄罗斯土地上来的“人工植物”，相反，农业公社所有制才是俄罗斯民族经济的特有形式。

这样显然是把社会中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弄颠倒了。

---

① 《黎明》1883年5月14日第17期。

《黎明》编辑部对上述决议加了一条保留意见，说他们对其中的观点并不完全同意。我们觉得在那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当然是国内干部的观点。此外《黎明》编辑部根本没有具体说明他们的不同观点，因此人们没有根据作出任何结论。——卢森堡注

② 《警钟》(1875—1881)——彼·尼·特卡乔夫创办的民意党杂志。——编者注

③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1844—1885)——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之一。——编者注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1页。——编者注

只要谈到的是**资本主义的形式**，这种理论就把经济关系解释成政治权力的一个任意的产物。另一方面，按照民粹派的理论，沙皇制度同农业公社所有制即国民经济的这个“天然”形式是完全对立的。由此可见，关于政治权力在俄国究竟依靠什么生存的问题只可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回答，即在俄国，国家是“悬在空中的”，或者按“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纲领的更为准确的说法：“这个国家化一资产阶级的赘疣唯有靠赤裸裸的暴力才能维持”<sup>①</sup>。

既然这样把整个俄国的现存政治制度归结为政治暴力，那就只有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也必须把推翻这个制度看成是一个使用暴力的问题，并决定“能够而且应当轻而易举地用密谋来推翻”这个独裁政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在1874年已经驳斥了上述论据，同时他的观点以值得令人钦佩的深度揭露了俄国民粹派理论的弱点。他断定在俄国，国家不仅不是“悬在空中的”，而且是非常牢固地依靠着贵族阶级同时也依靠着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倒不如说看不出沙皇政府的物质基础的那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才是悬在空中的。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俄国“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在俄国公社之上建筑即将到来的俄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但是俄国公社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而恰恰是俄国沙皇制这种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他还揭示了这种公社内部的解体并且预言只要公社停留在这种状况，它在资产阶级发展的影响下还将进一步瓦解<sup>②</sup>。

一句话，尽管恩格斯没有指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积极任务并且没有提到工业无产阶级在俄国未来活动中的意义，但是他粉碎了“在空中”筑成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独立的”俄国道路的十足幻想，同时他还说，特卡乔夫和其他民粹派社会主义者认为，俄国“虽

<sup>①</sup> 参看《民意党历书》第5页。——卢森堡注

<sup>②</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4—620页。——编者注

然”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因此比西欧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的，象他们这样一些人，“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sup>①</sup>。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而且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并不是关于一个社会的一定的、从一开始就是编造出来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和用各种各样多少算是聪明的方法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纯粹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内部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趋势**。在两个确定的社会阶层的这一阶级斗争之外，通过建立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公社的道路，或是用空想社会主义最天才的创始人的宣传，通过农民战争的道路，或是用革命的密谋去实现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纲领中，形式上正是从这些前提出发，并且声称他们的活动是依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但是在实际上，在上面引证的文件中，他们违背“社会主义初步知识”的地方并不少于俄国民粹派。

我们的革命者从俄国民粹派那里接过了关于俄国国家是和社会阶级没有联系的并且是“悬在空中”的观点，他们相信通过密谋的道路去“推翻”这个国家是轻而易举的，这样他们就人为地把政治斗争和他们的其余社会主义活动分开；他们把反对政府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鼓动以及阶级斗争分开，把前一种斗争当成密谋的党的专有任务，而认为后一种斗争才确实是波兰工人阶级的任务。和这一观点相符合的是在上面引证的决议的第1条中，把党的任务截然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社会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另一方面是“在政府内部直接反对政府的斗争”。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1页。——编者注

上面已经讲过，布朗基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把政治暴力当成既脱离社会发展又脱离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手段。

波兰社会主义者完全不承认这种理论的一般形式，而是——象我们已经看到的——有意识地并且信念十足地宣称：“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们接受民粹派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他们就已经是不自觉地、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地站在上面表述的布朗基主义立场上了。于是，可能绕过资产阶级议会制阶段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就必然变成由此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实际上我们从党的出版物早就已经看出党的观点所发生的变化。1883年9月到1884年5月在波兰的一家地下印刷厂出版的《无产阶级》杂志第5期上已经出现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辛辣嘲笑，这种嘲笑是密谋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特有的。在《无产阶级》第2期上载有讽刺诗《对渴望宪法的1880年的自由颂歌》，而我们看到同期社论在清点党采取社会主义斗争“新口号”带来的好处时发表了如下的新颖观点：

**“已经开始的斗争产生的第三个好处：这一斗争把资产阶级推入政府的怀抱，资产阶级社会希望政府的有力支持能把她从想夺走其特权的新的敌人手中救出来；这一斗争使资产阶级和政府这两个因素愈来愈紧密相联并融为一体；并把它们造成工人阶级的一个单一的、没有用面具和言词伪装起来的敌人”。**

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费解，怎么能在社会主义运动一开始，在缺少最基本的民主自由的情况下，把资产阶级反动的增强看作一个有益的现象。当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这个阶级自然就延长了沙皇制的生存，同时加强了“无产阶级”党纲领中原来所讲的那一切“给工人觉悟的提高设置了严重的障碍”的情况，即“使人不可能进行群众性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只有这一工作才能给社

会主义社会的未来组织打下基础”。

但是我们看到，1883年的党的观点已经不再是1882年纲领中表述的观点，它用来评价政治现象的观察角度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尽管我们现在听到它（资产阶级反动）加深了斗争初起时的困难，使无数中立甚至对政府不满的人离开了斗争，但是它却因此赋予斗争以更加持久的基础，并且通过某种方针使得在革命爆发的那一时刻统治阶级能够进行的并且长期以来已经进行的对群众的欺骗更加困难，使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歪曲更加困难。”**

可见在这里，评价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的标准已经不再是逐步组织群众的必要性，即纲领有关章节中所讲的日常斗争的各项要求，而是对“革命爆发”的那一瞬间的考虑，是直接为社会革命进行的准备工作。

这一关于社会主义在波兰的状况的观点和谐地补充了“无产阶级”在同一时间对俄国的状况和“民意党”的活动所持的观点。由于“民意党”的暴力行刺，“人民对革命者的力量估价很高，并且在他们思想中产生了一个问题：站在革命者一边是否更加合适，革命者是否会把土地、森林和牧场还给他们。这取决于他们，是否用‘是’来回答人民，革命的命运也将由此决定”<sup>①</sup>。

事实上，可以用恩格斯的话说，不能想象有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sup>②</sup>。

已经再也不谈准备工作、再也不谈对工人阶级的启蒙和组织了，他们宁肯相信人民群众本身具有改变社会制度的趋向。由于这种看法，部分地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如国家民主化，当然就显得只是小事一桩，不值得关心和花费时间。在1883年10月20日第

<sup>①</sup> 《无产阶级》1883年10月1日第2期。——卢森堡注

<sup>②</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1页。——编者注

3 期上，我们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一文章中看到了明确的说明：

“（劳动人民）群众承认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一次革命，群众正在寻找他们信赖的、可以交付领导权的人，在这以前他们是不会讲话的。如果不是我们，还有谁能够而且必须取得这种信任呢！但是为了取得信任，必须用事实证明，我们是他们的压迫者的敌人，我们在今天为他们的利益进行的斗争面前决不会退缩，我们希望群众得到一切他们应当得到的东西，而且仅仅为此我们才在今天拒绝参加到资产阶级的议会竞技场中去，在议会中，一个愚昧的多数会把革命的命运交到群众的敌人手中，因此我们认为，一个只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坚强有力的临时政府是工人阶级可能彻底解放的最好保证。”

这是一个布朗基主义思想的经典性信念自白，以“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临时政府”来同一个“资产阶级议会竞技场”对立，这样一来政治纲领在目前的重要意义就完全消失了。

1874 年在伦敦出版的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的宣言丝毫不差地宣称：“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sup>①</sup>

弗·恩格斯在对上述宣言（这是由三十三三个布朗基主义者签署的）的批评中回答说：“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篇流亡者的公告》。载《“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第 44 页。——卢森堡注

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sup>①</sup>

《无产阶级》第4期固然再次透露某种犹豫，要摆回到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去。我们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一文中看到这样的话：“我们的运动在到达最后斗争之前还将经历许多变故。准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反对资产阶级利益而迫害我们的政府的阴谋而斗争，是保卫政治自由，使它们不致遭到对付人民奋斗的卑劣密谋的破坏。政治自由没有保卫人民不受社会压迫，我们重视政治自由是出于另一个原因：我们的活动要取得成效，需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那样它才会取得广泛而自由的进展，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我们的活动才转向地下的密谋。有了政治自由，就容易影响群众，他们将更快地觉醒，他们将更快地集合在社会思想旗帜周围，他们才能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在存在政治奴役的原始的赤裸裸的形式的地方，在极度专横统治的地方、在连最起码的人权都不受尊重的地方，反对政府给我们的活动设下的政治障碍的斗争必须特别顽强。在这些地方社会主义行动纲领的一个重点必须是推翻政府”。

根据引文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毕竟已经懂得为了能够广泛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在“爆发”前必须取得政治自由。但是在这里对政治自由作了非常片面的、浅薄的、形式主义的评价，仅仅把它当作社会主义者活动的技术性辅助条件，这也是令人惊奇的。这里没有考虑到从客观的**历史的**方面看，资产阶级议会制政体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发展绝对不可缺少的阶段。如果相反，把议会制民主仅仅当成一种使革命“爆发”的准备工作易于进行的外在的手

---

<sup>①</sup> 见本卷第448页注①。——编者注

段，那么不言而喻，按照逻辑就得出争取民主制形式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必不可少的和首要的任务的结论，而是把民主制当成一种惬意的、不必拒绝的偶然可能性，但即使没有它，在必要时也满可以对付。

“无产阶级”在《我们和政府》一文的第二部分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而我们在该党在华沙的这份杂志第5期和最后一期上又看到：

“如果由于我们的革命工人的进步而感到害怕的政府打算和我们那多少算是爱国的资产阶级靠近，如果政府为了鼓励资产阶级一同来对付我们，愿意在政治方面、民族问题方面向资产阶级作一些让步，那么请吧！我们一定不反对这些让步并且将努力利用一切给予资产阶级的权利倒过来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关于政治自由的纯布朗基主义观点，它从这两篇原则性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的国家对于我们具有一个重要的并且是生死攸关的意义。国家的生存和现今经济制度的生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国家保护特权阶级，压迫并且迫害致力于社会解放的政党。粉碎政府机构意味着摧毁阻拦我们达到目的的有组织的障碍。”

由此可见，这里说的归根到底不是专制政府，而是“今天的国家”，也就是说把特殊的俄国形式的政府同一般的阶级国家的制度视为一体。与此相应，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也首先不是对国家制度进行进步的改革，而是“粉碎政府组织”，或者说是直接推翻阶级政府，即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要塞。

最后，党史上最重要的文件，即1884年初在路德维希·瓦梭斯基被捕而脱离战场后党和“民意党”缔结的正式协议，表明上面充分分析过的政治观点的演变已经完成。象通常那样，这一协议在



波兰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已经联合相当久以后正式宣布了这一联合，并且这个协议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致俄国同志呼吁书的一个极好的“补充”，它表明波兰社会主义者在1881年底到1884年初这段短短的时期内在政治变化上已经走了多么长的路程。

在“无产阶级”中央委员会致“民意党”执委会的报告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提法：“在斗争中锻炼出来并在斗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战斗力量（《无产阶级》党）在适当的时刻将被用来作为推翻现存政府和通过中央委员会掌握政权的辅助组织，依靠群众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它将是群众利益唯一真正的代表——将实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凭借这些改革最终使现存所有制概念破产，使社会主义纲领的那一将能在革命时刻实现的部分成为现实。”<sup>①</sup>

这里已经非常清楚地把推翻“现存政府”（Prawitelstwa）<sup>②</sup>，即沙皇制当作社会革命的直接序幕；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完全失去了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日常斗争的性质；最低要求和最终目的之间的距离、政治纲领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距离消失了，日常活动转变为直接对一场据说可以立即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的空想。

与此相应的是中央委员会接着论述了有关“爆发”的一切细节，许诺在没有“得到民意党”执委会发出的信号以前决不开始“国家政变”（Gosudarstwennowo Pereworota）<sup>③</sup>，但是政变后，中央委员会在“它的创造性的工作”（Sosidatelnych rabotach）<sup>④</sup>中保持独立性等等。

一句话，尽管文件里除此之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观点和群众

---

① 见民意党通报1885年第4期第242页。——卢森堡注

② 用德语字母拼写的俄语“政府”一词。——编者注

③ 用德语字母拼写的俄文“国家政变”一词。——编者注

④ 用德语字母拼写的俄文“创造性的工作”一词。——编者注

鼓动观点等等，但是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布朗基主义的纲领。但是这份文件使致俄国同志呼吁书中表达过的思想得到了实际实现，从而它同时又是波兰社会主义逐渐变化的链条中的最后一环。

## 五

党的政治观点的转变自然一定会反映在党的实际活动之中。

这表现在以下两个主要之点上：群众鼓动和一般的政治宣传消失了。

按照“无产阶级”党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党在理论上是以阶级斗争为依据并始终竭力强调群众斗争的意义和在日常利益的基础上进行鼓动的意义<sup>①</sup>。但是当党一旦把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成目的并且采取由一群“勇敢的少数”的进行密谋的道路之后，党就丢掉了本来的群众斗争路线。在策略本身的概念里，例如象我们提到过的《无产阶级》杂志第3期上的文章《我们和资产阶级》所阐述的那样，已经认定人民群众直到社会革命的那一刻起为止都是起着完全消极的作用、“群众承认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一次革命，群众正在寻找他们信赖的、可以交付领导权的人，在这以前他们是不会讲话的。”可见，这样分配革命的角色是和古希腊悲剧理论一致的：个人去行动，而群众组成合唱队，也就是说，群众是个人行动的消极的回声。

布朗基主义的策略就这样实际上把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原则变成：工人的解放只能是一小撮密谋者的

---

<sup>①</sup> 我们在提到过的中央委员会和“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中还看到一段简明的阐述：“这样一来，党开展活动主要是依靠在工人中传播关于他们的阶级特性的思想，一方面通过宣传社会主义，一方面通过在当前日常利益基础上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并为日常利益组织反对特权阶级和政府的斗争，其结果必然会瓦解现存国家机器”。——卢森堡注

事情。

此外，单是密谋斗争的技术就排除了群众的作用，密谋（不管它同什么样的纲领联系在一起）也好，当作主要的和长久的斗争方法的恐怖主义也好，都从来不是群众的事情，而且就其性质来说也不可能是群众的事情，而只能是单个人组成的一个小团体的事情。从这一点考虑，“无产阶级”宣称的群众鼓动就必然始终是一个不能运用的原则。

尽管人们通常习惯于从“无产阶级”的活动中举出两件众所周知的事作为该党进行群众鼓动的证明：为反对1883年2月华沙警察总监对女工实行卫生检查的命令而采取的行动<sup>①</sup>，还有1885年3月失业工人在华沙皇宫广场的示威<sup>②</sup>。

但是举出的这两个例子完全不能用来证实“无产阶级”在波兰确实曾经发动过群众运动或者说曾经有能力发动群众运动的说法。

尽管上述两例已经证明党懂得诉诸群众的必要性，并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在一些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和不是由他们的主动性引起的形势下保卫群众。在第一个事件中，党巧妙地利用当局的个别命令，勇敢地号召群众起来反抗；在第二个事件中，党在缺乏觉悟、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一次自发示威面前出现，党号召他们，要求他们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但是这两件事恰好同时也证明，“无产阶级”党由于他的实际立场，根本没有能力利用出现的机会来开展持久的鼓动工作。要达到这一点，党应当懂得给愤怒的

---

① 1883年2月华沙警察总监布杜林命令从事工业、商业、手工业工作的所有妇女必须接受卫生检查，“无产阶级”党组织领导了反对这一命令的宣传活动，迫使沙皇政府撤销这一规定。——编者注

② 1885年3月2日失业工人在华沙皇宫（总督府）前示威，沙皇军队冲散了示威队伍并逮捕了一些示威者。——编者注

工人群众指示某种直接的、明确的任务，指示一个直接的、工人群众能够理解的行动。这样的任务当时是有的，即向被侮辱的女工，也向失业的工人指出，专制统治，工人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状况，是改善工人物质和社会处境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同时向工人说明，绝对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日常斗争，既反对单个资本家的剥削，也为争取政治自由而反对沙皇政府。一句话，只有在党一开始就具有一个把群众作用估计在内的进行**日常的经济或政治斗争**的纲领时，党才能开展持久的群众鼓动。

相反，“无产阶级”既然企图立即进行社会革命，而且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把工人阶级当做直到革命的时刻还是消极旁观的角色，那么这个对群众愤怒感到吃惊的党自然不可能提出任何目标去引导群众的愤怒并使之取得实际的结果。

上述两个例子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区别中清楚地表明，随着党离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愈远，党和群众的联系也必然相应地愈来愈微弱。

在1883年第一个事件中对女工的号召里，尽管我们没有看到从沙皇政府机关的命令这样一个合适的材料得出最低限度的政治结论，但是我们至少看到对实际活动的某种具体指示，即号召建立**工厂中的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sup>①</sup>

在第二个即1885年对皇宫广场上示威的号召书中，我们已经再也根本看不到进一步的和实际的口号。党号召在华沙街头要求面包和工作的失业者去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不用说这公然是采用了一种非常粗野的和煽动的形式。<sup>②</sup>

这样，党就自己把群众排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直接斗争之

<sup>①</sup> “每一家工厂、每一家工场和每一个仓库都应当联合组成一个团体，为了帮助因反抗而受迫害的同志，为了将来集体罢工以迫使你们的‘老爷们’作出让步，必须把基金会建立起来。”《黎明》1883年4月10日第15期。——卢森堡注

外，同时以为了群众和代表群众的名义独揽大权。

于是一直宣传群众鼓动的“无产阶级”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把自已愈来愈限制在小组宣传之内，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从一群人中挑出个别人，让他们加入秘密的党组织。

但是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降低为关于“爆发”的空谈，

- ② 号召书在解说了资产阶级经济的经济方面及其无政府状态之后用了这样的结语：“够了！我们也要求人的权利。让我们剥夺强者的特权，让我们分享公平的劳动(?)和它的产品。”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目的。是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携起手来并且团结一致地去对付我们的敌人，我们在敌人面前愈来愈勇敢、愈来愈具有威胁性，我们就能达到目的。尽管我们为了胜利还要付出很多牺牲，但未来终究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以人权的名义号召我们所有的工人弟兄站到‘自由、工厂和土地’这面旗帜和口号下来，我们号召所有抱着善良的愿望的人为反对压迫人类的奴役而斗争。再一次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阶级斗争》1885年2月、3月第10—12期。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利用当前的群众运动，不断指出无产阶级最终解放的广阔前景。但是只有同时明确地指明通向这一遥远目标的道路，上述指示对于群众才有现实价值。相反，象“无产阶级”宣传的不具体的口号肯定始终只是听不明白的声音，是空话，它给群众的觉悟增加不了哪怕是唯一的一个政治概念，也没法给群众的进一步行动作出指示，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样一来，甚至上述两次这么有利的鼓动时机也没有给运动留下持久的成果就流逝了。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和进行常规鼓动时，“无产阶级”更加不能使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意志提高到一定程度，也不能使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就更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就连“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文件上非常重视的在群众中进行经济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到了。既然持有人民群众“默默地”等待革命的观点，经济斗争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党在华沙的杂志《无产阶级》第2期上的文章《失业和恐怖》中提出的原则也具有相同的意思：“既然失业给工人带来的好处很少，那么我们只能够在研究和考虑了一切可能的成功机会之后，极其小心地发出号召。如果某个地方违背我们的愿望爆发了反抗，我们必须给它指出方向并且赋予它有效斗争的性质，但不是群众斗争，而是个人斗争的性质。如果和平的斗争没有获胜的把握，我们必须向武装斗争，向恐怖寻找出路。”还有：“和平的失业达不到目的，必须同时惩处那些引起类似事件和加重贫困与压迫的人。群众不需要我们去号召他们进行这样的斗争，这种斗争必须出自个人的行动，必须具有秘密的十分神秘的惩处和复仇的性质。”——卢森堡注

而且它的鼓动也已经缩小为小组活动，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消失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还有另一个情况对“无产阶级”的命运尤其有影响。以推翻政府和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密谋活动所独有的特点是，它一般只能用在中央国家权力即最重要的政府机关所在的地方。可以设想最利于“夺取政权”(Sachwat Walasti)<sup>①</sup>的地方是彼得堡，但在俄国国家机器中只具有次要意义的、省一级的华沙。只要在“爆发”时给这个省分配的是充当这一行动中的助手角色，那么直至“爆发”的那一瞬间，这个角色所能做的多半只是无所作为的等待和小组内的宣传，就连“民意党”活动的主要形式即以瓦解政府为目的的有计划的恐怖手段，也当然只能用在中央权力的最重要的代表身上，也就是只能在首都运用。除非是为了惩处特别过份的罪行，恐怖手段也用不到省一级的、第二流和第三流人物身上。

如果我们接受社会民主党所理解的那种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反对沙皇制度的群众斗争的观点，事情就完全改观。毫无疑问，俄国本土在这方面也首先起着决定性的、最有影响的作用。不过根据上述观点，只有工人阶级本身直接的行动才能推翻沙皇制度，因此正是俄国全部疆域内的无产阶级斗争是持久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从另一方面看，既然应当由工人阶级本身、而不是工人的一小撮社会主义密谋领袖去实际运用战胜沙皇制度的胜利果实——民主自由，那么使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集团内部的阶级政治觉悟达到最高程度也就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从密谋者的观点来看，波兰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注定套在俄国“民意党”的车子上充当消极工具，无所作为。更有甚者，就连“民意党”在“无产阶级”认真地和正式地同它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那个时候也已经走上下坡路。自从行刺亚历山大二世以后，民意

<sup>①</sup> 用德语字母拼写的俄文“夺取政权”一词。——编者注

党的历史进入急剧衰落的时期，自八十年代中期后，无法避免的困境对俄国运动所起的瓦解作用已经显露出来，处在这种条件下的密谋党没有力量去进行恐怖的行刺活动，开始靠侈谈行刺或是试图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行刺来维持生存。在唯一可以采取这种行动的俄国都开始碰到困难时，波兰的运动不能不迅速走上下坡路。事实上“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实行过该党在最后几年鼓动中谈得这样多的行刺。唯一的恐怖活动是两次刺杀：对叛徒斯雷姆斯基和海尔斯泽尔及斯克雷茨兹斯基的处决。<sup>①</sup>但是在沙皇制的政治条件下，在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时消灭暗探和叛徒纯粹是自卫行动，它和本来的纲领及恐怖策略没有共同之处。<sup>②</sup>

实际上恐怖主义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上一直只是一个意图，而党的政治活动就以此告终。

## 六

至此我们已经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无产阶级”的活动：在短短的一段时期内在俄国“民意党”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政治纲领的观点；按照政治纲领规定的形式进行的实际工作。

正象我们知道的那样，“无产阶级”党除了在策略上和她的俄国姐妹有区别之外，在坚决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一点上

---

① 1883年根据“无产阶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兹盖日处决了弗兰齐泽克·海尔斯泽尔和斯雷姆斯基，在华沙处决了斯克雷茨兹斯基。——编者注

② 瓦梭斯基在法庭演说中反驳了国家检察官加给“无产阶级”的在“内部和外部”运用恐怖手段的指控，并明确指出：“恐怖主义应当理解为对一些代表一定政治制度的个人所施行的暴力行为。很清楚，国家检察官先生所说的内部和外部的恐怖手段是处决叛徒和暗探，完全用不上恐怖主义的名称。一个秘密组织为了生存，必然采取保卫本身安全的一定措施。这是十分自然的，以致在其成员中有国王甚至主教的著名的光明社的章程中也有一节规定对叛变处以死刑。”——引自《战地》第149页。——卢森堡注

也是同它有区别的。“无产阶级”党已经在1882年的纲领以及1884年它和“民意党”的协议中、最后还在它直到最近的宣传活动中强调了这一区别。在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方面，“无产阶级”在形式上始终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准确地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

这一事实就其本身而言和“无产阶级”的密谋性质丝毫也不矛盾。因为布朗基主义本来不是什么理论并且自己没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它可以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大致协调起来。

例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恩格斯指出，法国工人承认“德国共产主义”即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宣言，就恰恰是上面提到的法国布朗基主义者1874年的纲领<sup>①</sup>。

尽管在开始的时候，“德国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社会逐步发展的理论——同任意“制造”革命的策略、同相信政治暴力万能是很不协调的，但是这种联系对于法国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此法国工人运动中这一很有影响的派别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

从那个时候起，法国布朗基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他们关于直接任务的观点上，愈来愈接近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在九十年代，爱德华·瓦扬的党就已经仅仅在名义上还是“布朗基式”的党，实际上却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了。这个组织和法国马

---

<sup>①</sup> 恩格斯说：“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叫做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那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把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说成是，国际不接受这五个人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现在连三十三人委员会也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了，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原文。”——卢森堡注



克思主义者的党不久前实行全面联合<sup>①</sup>，完成了布朗基主义者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的自然发展过程。

但是，“德国共产主义”在八十年代初就是波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因此把马克思的学说和“民意党”的布朗基策略联系在一起丝毫也不意味着波兰运动本身发展中的进步，同时也没有保证波兰社会主义比当时的俄国社会主义高明。正相反，和俄国社会主义相比，波兰社会主义失掉了内部的统一性和一贯性。

我们已经讲过，事实是布朗基主义在它自己的祖国法国没有能找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因而被迫接受陌生的甚至和它的本质相矛盾的理论，而俄国社会主义却恰恰在这一点上是个例外。

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的协同作用，布朗基主义策略在其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特殊的理论，这一理论——至少是表面上——为布朗基主义提供了使它成为一种完成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世界观的某种物质基础、某种论据。这种基础正是民粹派的理论。

我们知道，布朗基主义依据的是可能任意推翻现存制度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想象，却除了援引政治暴力的决定性作用外提不出任何其他的合理论据。而民粹派尽管不是用全面的社会理论，但至少是用关于公社的纯粹的俄国理论成功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由于民粹派把俄国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农奴制体系联系在一起（再说科学研究早已证明，公社所有制是一种具有纯粹国家一官办性质的产物），由于他们从残余中看到了国民经济和俄国农民精神的天然原则，他们就认为他们在公社废墟上得到了在俄国直接

---

<sup>①</sup> 1901年11月3日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布朗基派和盖德派在伊夫里大会上联合成法国社会党。1902年9月26日至28日在科芒特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加强这一联合具有重大意义。——编者注

实现社会主义的阿基米德支点。也就是说，俄国农村经济的特殊制度为按照布朗基主义行动的精神绕过所有发展阶段提供了似是而非的论据，这种论据认为，在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发展恰恰是偏离和绕过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毕直的捷径。

“民意党”从民粹派分子那里接过了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解释，于是他们对社会主义行动和直接任务的观点就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根据俄国“劳动解放社”<sup>①</sup> (oswoboshdenije truda)<sup>②</sup> 的出版物中的全面评论已经知道，关于俄国“独特的”历史道路的理论究竟荒谬到什么程度。但是在目前这件事情上涉及的不是这些观点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问题，而是这些观点和俄国恐怖主义者的特殊策略的一致性问题的。

再说实际上，既然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都已经以公社的面貌存在于俄国社会内部并且已经完成，那就当然只需要夺取国家机器以及除掉社会主义自发发展的障碍即独裁政府就行了。另一方面，如果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是存在于人民思想和灵魂中的天生的自然本能，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就只是号召人民夺权并做出决断，而目的在于对群众进行启蒙和组织的专门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

因此，“民意党”的策略连同它关于俄国特殊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构成了某种统一的整体。可是“无产阶级”的情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策略同党所承认的和宣传的社会主义普遍原理逐步发生了矛盾。

俄国社会主义者企图借助公社跳过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时期进入社会主义，波兰社会主义者虽然与此相反，根据王国内的经

---

① 1883年秋格·瓦·普列汉诺夫建立了劳动解放社。这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民粹派的俄国组织。——编者注

② 用德语字母拼写的俄语“劳动解放”一词。——编者注

济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论证自己有理由存在，但同时也声称要绕过资产阶级议会制政府阶段，而这种政府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天然后果和政治上的相应概念。

“民意党”依靠俄国农民天生的共产主义观点，“无产阶级”虽然与此相反，首先指望在波兰工业无产阶级中形成社会主义觉悟，但同时又拒绝那些唯一能使这种觉悟在阶级斗争中达到相当程度发展的政治条件。这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没有使波兰社会主义表现出高于俄国“土生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相反，只是引起了它本身一系列的内部矛盾。

另一方面考虑到“无产阶级”在其中开展活动的沙皇制度的特殊政治形式，这一由于布朗基主义策略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而产生的矛盾必然带来和我们在法国看到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在法国，在上而提到的那一时刻，社会主义在七十年代和稍晚都是以第三共和国，也就是以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最高形式为自己的活动领域的，由于已经具有进行广泛日常阶级斗争的条件，布朗基式的轻视议会“竞技”和类似的“妥协”的态度或多或少只不过是些无害的空话。在这里，社会主义者受政治生活和愈来愈强有力地发展的、不可抗拒的阶级斗争的驱使不由自主地逐步趋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必然在一定时期之后取得胜利并战胜同它相矛盾的策略。我们上面讲过，这一情况实际上也已经发生了！

相反，在王国，在沙皇制的专制统治条件下，轻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是失望的表现，准确地说，不是对已取得的民主制形式的历史价值不理解的表现，而是对取得民主制形式漠不关心。

但是考虑到在俄国内部战胜沙皇制和取得民主制形式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恰恰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么，以如此有害的态度置这一生死存亡问题于不顾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必然会产生严重

的影响。和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的历史完全不同，在波兰，策略必然会使已得到传播的同策略相矛盾的理论的实际意义化为乌有，或者准确地说，这一策略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理论的所有概念。

如果言词和概念永远包含相同的思想内容，就是说处于凝固状态；如果它们永远是同一思想价值的流通符号，那么社会理论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任务整个说来会是一件极其乏味而简单的事。实际上却恰好相反，尽管听起来荒谬，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某一个党历史上的思想面貌的概念再也没有比从该党自己的言论得出的更不准确的了。

要是有人想仅仅根据“无产阶级”党在出版物中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基础和任务的一般观点来评价该党，他会因该党直至最后都那样有力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观点而大吃一惊，但是既然我了解“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普遍原则和运用从这些原则中为自己的活动得出的结论的具体方式方法，我们就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只有语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党却用这种语言表达绝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无产阶级”完全承认《共产党宣言》的精神：“资产阶级制度”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真实的基础。但是这一理解只限于经济方面，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包括政治方面，即资产阶级在政府和立法方面的直接统治。同时“无产阶级”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过程。

“无产阶级”还承认“工人阶级的组织”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保证。但是他只把这种组织理解成工人群众仅仅为了社会革命那一瞬间的联合，而不是为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日常斗争的联合；“无产阶级”认为通过传播关于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观点可以组织群

众，但不是在为日常利益而斗争本身的过程中逐步组织群众，一句话，它理解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是社会主义鼓动的人为产物，而不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鼓动只不过是给这一斗争灌输觉悟而已）的自然的历史产物。

尽管“无产阶级”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但是他把阶级斗争主要理解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革命为形式的冲突，并且从而把历史过程的一瞬间当成全过程。

纵观所有这些概念变化，“无产阶级”就是在运用“社会革命”这句话上也和社会民主党人用这句话的含意完全不同，在“无产阶级”看来，社会革命并不是生产力成熟到足以冲破资本主义束缚的政治结果，而仅仅是极少数社会主义者去任意运用政治暴力的结果。人民是由于对现存制度不满和渴望改善处境而被这少数人吸引过去的。

这样；在波兰社会主义者逐渐的思想变化中，他们最初的理论观点变成了一种思维形式，这些形式原来的内容完全消失了，他们就给填上了布朗基主义的内容。

## 七

正如在类似的情况通常会出现的那样，“无产阶级”所采用的策略性观点遇到的环境越不利，运用的可能性越少，它在党所提出的口号里就表现得越明确，越引人注目。特别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时，例如警察的镇压手段把“无产阶级”的老一代工作人员从岗位上赶跑了，例如党在国内的宣传工作削弱了，而且尽管个别勇敢的人作了充满牺牲精神的奋斗，直至最后仍高举“无产阶级”的旗帜，这种宣传仍旧必然要局限于毫无成就的小组工作的范围之内，在这时候，在党的文献中庸俗的“革命空谈”迅速传播开来，失去了一

切能赋予它以深度的理论探讨。1885年出版的《黎明》就已经发表毫无思想内容的赞扬暴力手段的言论，比如用长长的九栏篇幅讨论谋杀国王的问题，并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探讨这个问题，是应该在革命开始以后才由人民判决统治者死刑，还是在杀死统治者的同时立即开始革命更加切实可行。<sup>①</sup>

毫无疑问，现在除了伯恩施坦一类的空想家之外，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幻想任何一种严肃的政治革命可能通过“合法的”，和平的道路完成，更不用说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了，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幻想不运用武力就能推翻反革命力量。也没有人会否认，在革命时期会出现把国王砍头的必要性，例如对待路易十六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作为卖国者和国家的外部敌人勾结谋叛，从而作为反革命派的支柱严重地威胁革命的命运。但是如果认为“让统治王朝上绞架”从来就是任何一种革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独特的奇想。这使人们情不自禁地想起恩格斯一次由于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的类似的革命的过分行动而说的话：“可见，实

<sup>①</sup> 参看《应该怎样让皇帝完蛋》这篇文章。1885年《黎明》第6—8期。就政治水平来说，这篇文章实际上与一首有趣的诗相同，这首诗已于1883年10月1日转载在《黎明》第1期上：

前进，前进，工人们！  
嘿，快拿起武器！  
举起连枷，抄起鞭棒，  
我们要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放！  
血流成河，这有何妨！  
矿山向我们呼喊，这又有何妨！  
在刑讯中，在西伯利亚，  
我们之中很多人倒下了，  
这又有何妨！  
我们的牺牲会有补偿的，  
在凶杀与破坏之后，  
自由的曙光将照耀四方。

——卢森堡注

质上很温和的人妄想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sup>①</sup>

不过流亡的波兰革命者表现出的“幼稚可笑”有一定的特殊的基础。由于有这些引人注目的“革命的”思想，显然使俄国沙皇制度下迅速“爆发”社会革命的希望传播开来，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使一种明显的信念传播开来：一次成功的革命的保证首先是充分地正确地运用暴力。在未来的革命中使用物质暴力的细节，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立场看，暂时还是一个相当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且不如说对于今天的成年人来说根本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但从密谋角度来说这些细节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相信政治因素万能（这是布朗基主义的出发点）在宣传工作庸俗化的情况下采取了信赖赤裸裸的物质暴力万能的形式——街垒、“绞架”、“连枷和棍棒”。

例如，《黎明》在同一时期的第二个奇想，就是一个同样能说明问题的征象，这个奇想就是：它主张对工人进行“专业训练”的宣传，为了使他们有能力“在革命之后”立即组织生产。<sup>②</sup>

《黎明》的理论家——他们不理解社会主义生产在技术方面现在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孕育成熟，因此胜利的无产阶级将首先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586页。——编者注

② “我们的《黎明》将始终愿意提供任何一种帮助——有一次一位细木工人写信给我们说明，按照他的意见，革命以后细木工人将必须怎么办；另一次是一位制鞋工人写信给我们，后来又有一位钳工给我们写信谈到他的思想。我们对什么感到不满意，就把它写出来。”（《黎明》，1885年第二期）有趣的是，由于这样匆匆忙忙地为“革命”作准备，就失去了对外国工人运动中最简单不过的事实的理解力。外国的工会报刊，（在德国和其他国家都是日常经济斗争的机关报），对《黎明》来说似乎是训练未来制度中的生产管理人员的函授刊物。它写道：“因此我们也看到，外国的工人是如何出版专业性报刊，他们依靠这些刊物的帮助进行准备，使自己在将来能掌握政府的和经济的领导权。”——卢森堡注

资产阶级社会接受现成的生产组织形式，然后在既定的历史基础上继续建设，改造所有制关系等等；他们公开设想，“革命之后”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将是一块空地，然后才在这块空地上按照思考出来的“最好的”方案，依靠今天的鞋匠、细木工、钳工等等团结一致的力量重新组织生产。

在这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纯粹机械的理解和人为“制造”革命的想法，已经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经济的领域。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这种完全脱离社会发展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表现得更清楚：是假设在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只需要革命的政治行动来冲破阻碍它们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束缚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完全有可能进行“革命”和取得胜利，还是假设目前已经可以随时思考出对生产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组织的“方案”——而且是分别为各个部门单独制定的方案。

关于为未来制度及时准备技术人员的考虑也就是关于让目前进行统治的王朝上“绞架”的考虑的逻辑补充，而总的说来这是一幅使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浅薄化并一直降低到庸俗化的图景。

1886年以后，国外的《黎明》和《阶级斗争》编辑小组象一个脱离了机器的飞轮一样，开始任意停留在各种极不相同的理论观点的高峰或深谷，在途中——例如在《告俄国军官书》的小册子里——他们一度甚至陷入最平庸的泛斯拉夫主义，并且越转越快，最后经过了政治信念的“一系列”变化，以十足的劲头从它的旧轨道里跳出来，在空中转了一个急弯，然后深深地掉进民族主义的泥潭并且停在那里。《黎明》的历史从1886—1887年之后确实已经与其说仍旧属于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如说是属于社会主义流亡者废纸堆的历史了。

波兰社会主义在第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在1884年结束，这就是说已经在“无产阶级”党朝布朗基主义方向的



转变表现出全部后果的那一时刻结束了。

瓦棱斯基的一次讲话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历史书页上的最后一缕光线，它使人回忆起波兰社会主义初期的思想活跃时期，他的这些话已经不再是在紧张的活动中间，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在革命者的集会上发表的，而是在二十八个月的拘捕之后，在1885年12月在法院大厅里，在一群兵和密探的包围下发表的。

从这个讲话看来，可以肯定地推断出，至少这位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卓越代表的个人观点的变化不象人们能够在那个时代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看到的变化那样彻底。但是可惜我们缺乏证据来把瓦棱斯基本人的思想和活动同他的小组的集体活动明显地区分开，因此我们不能精确地说明他对1883年（当时他还自由）暴露出来的明显的布朗基主义演变的观点。我们也很难假设，瓦棱斯基面对这种现象能完全不受“民意党”的影响。因为他当时对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的看法可惜在对“无产阶级”的审判文件里没有记载。但是根据我们在文件中找到的他的演说概要仍旧完全可以肯定地推断出，瓦棱斯基极力保护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原则免遭庸俗化，他的世界观的基础直至最后时刻仍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并保持其原有的深度和理论内容。

在瓦棱斯基的演讲中令人瞩目的特点首先是强调工人阶级本身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中的积极作用，强调日常阶级斗争的作用。

瓦棱斯基说：“如果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舞台，它必须用组织来对待组织，并且以一定的理想的名义进行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这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工人党的任务。工人阶级形成了同其他社会阶层相抗衡的力量，并且筑起一道防御反革命意图的堤防。工人党在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奋斗中，目前已在完成这一变革的准备工作。工人政党的任务在于，促使

工人自觉地对待自己的利益，并号召他们坚持不懈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工人党教育工人阶级遵守纪律，组织他们，并引导他们去进行反对政府和特权阶级的斗争。”

瓦棱斯基谈到恐怖活动时，只把它当成在日常斗争中为组织工作和群众活动争取更加自由的条件的一个辅助手段，这同样是能说明问题的。相反，他着重否定把恐怖当成实现社会革命的手段。他说：“依靠暴力来行动”是今天的百孔千疮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可悲的，但不可避免的结果。经济的恐怖主义**绝不是一种完成我们的社会任务的手段**；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它是惩罚以现今社会制度为根源的罪恶的唯一手段。”

虽然关于经济斗争的策略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不容置疑，在这一点上瓦棱斯基关于恐怖主义能产生有益结果的这种幻想绝不是关于社会主义斗争的一种密谋观点的产物，而只是对阶级斗争的实际方法的一种错误估计。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瓦棱斯基援引了上个世纪初英国工会原来的策略作为例子来说明他对经济恐怖主义的观点。——这一策略是当时英国的政治关系的**结果**，那时既不能建立公开的组织，也不能进行工会斗争；这种策略同样是争取应有的自由的一种方法。

但瓦棱斯基在他的讲演中对社会的自发发展的**客观因素**的作用的强调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作用面前，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关于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方向的教育工作。

他说：“我们知道，不断增长的社会对抗性与社会机体上不断扩大的伤口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爆发。我们也知道，如果贫困把群众推向绝望的最边缘，并且那些挣脱羁绊的人用野蛮的暴力冲击现存社会制度的话，会出现多么可怕的破坏。正因如此，我们的任务是使工人阶级对革命有准备，使他们的运动成为自觉的，教育他们遵守党的纪律，并且对目的和方法提出一个确定的纲领。

我们不凌驾在历史之上；我们遵循历史的规律，我们认为我们所致力的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我们预见到了革命并且努力使它不致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始。”

瓦棱斯基最后非常坚决地拒绝了直接准备**社会革命**、即准备“爆发”的策略。

他说：“我们组织过工人阶级为反对现存制度而斗争。**我们没有组织过革命，而是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瓦棱斯基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党的目标和原则的特点的描述而大声疾呼：“人们难道可以把我们的活动说成是目的在于策划用暴力颠覆现存的国家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密谋吗？”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目前，当瓦棱斯基大声疾呼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他的党同他在法庭前说明的观点已经距离很远了。瓦棱斯基的活动的指导思想，波兰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主义在思想方面的联系（这一联系在“无产阶级”党成立后不久就已经建立了），在特定的具体条件下导致了在当时已经看得出来的、但瓦棱斯基既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意识到的结果。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今天全面回忆“无产阶级”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历史是一次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

由于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以及受西欧的影响而形成的波兰社会状况，在1881年已经使波兰的社会主义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得出的制定一个与俄国社会主义者共同的纲领并和他们共同行动的原则，使波兰社会主义在八十年代处于“民意党”的影响之下。这种影响使波兰社会主义走上布朗基主义的道路，它必然要在几年之后在这条道路上和俄国的运动一起消失。

波兰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第一章就至此结束，但是人们可以有充分把握在事先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波兰社会主义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可以完全坚持它自己的与王国社会关系的制度相适应

的内在发展的本来趋势，那么波兰社会主义一定会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王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只有在俄国社会主义同样站到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来的时候才能得到持久的保证。

第一个条件在“民意党”瓦解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停滞期已经具备，在此期间波兰社会主义已经从“独立的”俄国理论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在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王国的群众运动，并且首先在实际上组成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此后不久（在1893年）党就正式成立了。

第二个条件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由于俄国兴起工业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而实现的，工业无产阶级一下子彻底地使由于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早就已经被驳倒的、“土生的”社会主义理论丧失了物质基础，并且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发表于1903年《社会民主党评论》第1、2期。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306—362页。

（苏冰娟 周懋庸译 殷叙彝校）

## 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

(1903年3月)

卡尔·格律恩<sup>①</sup>关于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状况的漫话<sup>②</sup>是肤浅的,可间或也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其中有这样中肯的见解: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理论对他们的后继者起了截然不同的作用。圣西门成为各种精神活动领域的整整一代杰出天才的鼻祖,而傅立叶所造就的人除开少数例外都只不过是一个由盲从者组成的僵化的宗派,这些人在任何方面都未曾超群出众。格律恩解释这种区别说,这是由于傅立叶创建了一个直至各项细节都制定好了的体系,而圣西门给他的学生提出的只是伟大思想的一些零星片段。尽管我们认为格律恩对这两位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学者理论之间内在的、实质性的区别考虑得太少,但是他的见解大体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一种只设计出主要线条的思想体系比一个完成了的、匀称的结构具有更多的启发作用。后者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思想活跃的人已不可能在这一方面独立地有所作了。

难道说这就是近年来我们觉察到的马克思学说存在停滞的原因吗?事实上如果我们撇开不多几种可以视为理论上的进步的独

---

① 卡尔·格律恩(1817—1887)——德国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期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② 卡尔·格律恩《比利时和法兰西的社会运动。书信和探讨》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编者注

立著作不谈，自从《资本论》的后两卷和恩格斯的最后几种著作出版以来，我们固然已经有了一些普及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著作，不过从根本上看，我们在理论方面仍然停留在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给我们留下的水平上。

这是由于马克思体系把思想的独立活动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了吗？的确不能否认马克思对他的一些学生在理论的活动自由方面有着某种难以摆脱的影响。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拒绝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观点负责。那种为了在思想上“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小心翼翼唯恐偏离马克思思想方法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思维劳动来说，可能是和另一极端，即正是为了不顾一切地证明“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而拼命设法完全摆脱马克思思想方法的态度是同样有害的。

只是在经济领域内才谈得上马克思创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反，他的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却只表现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些天才的指导思想，它们使人有可能展望一个崭新的世界，开辟独立活动的无限远景，激励我们的思想大胆地飞进尚未研究的领域。

可是即使在这一领域，除开少数成果之外，马克思的遗产也没有得到利用，精良武器束之高阁，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也象它的创造者初创时那样没有经过精雕细琢，只是粗具规模。

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体系没有继续扩展，那末原因并不在于这一学说已经固定不变和完成了。

人们经常抱怨我们的运动缺乏能够承担继续发展马克思理论这一事业的知识人才。实际上这种现象早就已经出现，但是它本身是一种需要说明的现象，而不能用以说明任何其他问题。每一个时代自己塑造它的人才，当时代对理论工作提出实际需要时，实际需要本身会创造出满足这一需要的人才。

可是我们有超越马克思继续从理论上发展这一学说的需要吗？

费边派半社会主义的才气横溢的代表肖伯纳在一篇关于英国的马克思派和杰文斯派之间的争论的文章里嘲笑了海德门，因为海德门根据《资本论》第一卷就声称他“完全”了解了他的马克思，并且觉得马克思的理论是天衣无缝的。可是在这以后，恩格斯自己就在第二卷的前言里说，第一卷的价值理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学之谜，答案要到第三卷才出现<sup>①</sup>。肖在这里确实抓住了海德门，使他尴尬不堪。不过海德门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几乎整个社会主义界人士都和他同样尴尬。

事实上呢！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根本问题——利润率问题提供答案的《资本论》第三卷在1893年才出版<sup>②</sup>。德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都已经以第一卷提供的不完整的材料进行了宣传工作，他们以第一卷为根据把马克思学说当作一个整体加以普及并且使人接受了。不错，对马克思的部分理论的这种宣传活动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任何地方都没有觉察到理论上的缺陷。更有甚者，当第三卷终于出版时，它首先是在专家的狭小圈子里受到重视并且引起了几篇书评和评论，可是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看，在已经深受第一卷思路影响的广大阶层里，第三卷确实没有引起反响。直到今天，这一卷的理论阐述没有唤起任何普及它的企图，而且事实上更广大的阶层仍然没有接受它，相反，新近甚至有几个社会民主党方面的人忠实地重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对第三卷的“失望”，这只能证明他们深深地沉浸于第一卷所提出的对价值理论的“未完成”的表述。

怎样来解释这样一种令人惊讶的现象呢？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5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3卷应当是1894年出版的。——编者注

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喜欢“嘲弄”别人的，在这里他也许有理由取笑由马克思奠基的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他“嘲弄”的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严肃的现象。因为我们觉得第一卷和第三卷遇到的令人惊讶的情况是说明我们整个运动中理论研究的遭遇的确凿证据。

毫无疑问，从科学的观点看，应当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到《资本论》第三卷才完成的。没有第三卷，就不能理解真正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规律，就不能理解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剩余价值，就不能理解价值规律在竞争内部的作用。但是，而且主要的是，不管所有这些问题从理论角度看是多么重要，从实际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它们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阶级斗争来说，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剩余价值的形成就是对剥削的科学说明，还有，生产过程社会化的倾向就是对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基础的科学说明。

第一卷已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它论证了“剥夺剥夺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不断发展的资本集中的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这样就大体上满足了工人运动特有的理论需求。至于剩余价值在各个剥削集团之间怎样分配以及分配时的竞争在生产中引起哪些变动，这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因此社会主义对《资本论》第三卷总的说来迄今仍然是陌生的。

在我们的运动中，对待整个理论研究的态度是和对待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态度一样的。设想上升的工人阶级通过他们阶级斗争的内容就能够自动地在理论领域无尽无休地发挥创造性，只是一种幻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工人阶级在今天唯一的保持了理论感和对理论的兴趣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求知欲是当代的一个最重要的文明现象。而从精神上说，工人的斗争意味着社会的文化革新。但是无产阶级斗争要对科学进步起积极的作用，必须有极



其确定的社会条件。

每一个阶级社会中的精神文化即科学和艺术都是统治阶级的创造物，其目的部分是满足社会过程的需要，部分是满足统治阶级成员的精神需要。

在迄今的阶级斗争史上，上升的阶级（比如近代的第三等级）也能够在取得政治统治之前预先表示要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他们在还是被压迫阶级时就已提出和没落时期的旧文化相对立的自己的新的科学和艺术。

无产阶级却处于完全不同的状况。只要他们作为一无所有的阶级仍然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之下，他们就不可能在力争向上的过程中自动地创造自己的精神文化。只要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还存在，在这个社会内部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文化以外的文化。尽管一些“社会学”教授认为无产阶级使用领带、名片和自行车已突出地表明无产阶级分享了文明进步并为之赞赏不已，但工人阶级作为这样的阶级还是处于当代文化之外的。还有，尽管工人阶级用自己的手创造了这一文化的物质内容及其整个社会基础，他们也只有为了令人满意地履行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中的职能所需要的限度内才被允许享受文化。

工人阶级只有在从他们当前的阶级状况中完全解放出来以后才可能创造自己的科学和艺术。

他们今天可以做到的是保护受到资产阶级反动派野蛮行为摧残的文化并创造文化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在当今社会里他们甚至在这一方面还只能做到这一程度，即为自己获得自身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

因此工人阶级，也就是他们在精神上起指导作用的思想家的智力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起创造性作用的天地只有科学的一个特定的部分，即社会科学。既然通过“第四等级的

思想和我们的历史时期的特殊联系”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斗争就因此对社会科学产生有益的影响，而这一无产阶级精神文化的纪念碑就是马克思的学说。

但是马克思的创造作为科学成就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它也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尽管它是为这一斗争而创造的。无论就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的详尽而完整的分析来说，还是就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无限的应用范围来说，马克思的贡献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

只有随着我们的运动逐步进入向前发展的阶段并提出新的实际问题，我们才重新到马克思的思想武库里去探索，完成和利用他的学说的一个个新的部分。但是由于我们的运动（这同任何一种实际斗争一样）在旧的指导思想早已失效后还在用这些思想对付着，因此在应用马克思的理论启示方面进展得极为缓慢。

如果我们现在因此而觉察出运动中存在理论停滞状况，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赖以生存的马克思理论无力向前发展或是它本身已经“过时”，相反，是由于我们已经把现阶段斗争必须的思想武器从马克思的武库取来却又不充分运用；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在实际斗争中“超越”了马克思，相反，是由于马克思在科学创造中事先已经超越了作为实际斗争政党的我们；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还没有达到运用马克思思想的程度。

就这样，马克思在理论上揭示的无产阶级在现今社会中生存的社会条件给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命运带来了不良后果。无与伦比的精神文化的工具被束之高阁，因为它对资产阶级阶级文化没有用处，而又远远超出了工人阶级对斗争武器的需求。只有当工人阶级从他们今天的生存条件下解放出来时，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才

将和其他生产手段一起社会化，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且充分发挥它的能量。

发表于1903年3月14日《前进报》第62号。  
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  
版第1卷第2册第363—368页。

（周懋庸译 殷叙彝校）

# 卡尔·马克思\*

(1903年3月)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sup>①</sup>

二十年前，马克思非凡的头脑停止思想了。尽管我们在几年前刚刚经历了德国教授的用语中所说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但我们只需要看看今天仅仅在德国追随社会主义的群众，看看社会主义在一切所谓文明国家的公众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就可以了解马克思的思想事业是多么伟大。

如果要用几句话来表述马克思为当今工人运动所作出的贡献，那么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发现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现代工人阶级，也就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历史存在条件和运动规律的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固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已存在大量的雇佣工人，这些雇佣工人由于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共同的社会生存条件而团结起来，摸索摆脱他们处境的出路，一部分人则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乐土的桥梁。但到了马克思才用通过夺取政

---

\* 这篇文章没有署名。从罗莎·卢森堡给克拉拉·蔡特金的信中可以看出卢森堡是本文的作者。——编者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编者注

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特别的历史任务把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上升为**阶级**。

所以，马克思在从当今社会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无产阶级运动同社会主义之间架设起来的桥梁是：**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当资产阶级怀着憎恨和恐惧密切注视无产阶级的**政治意图**时，它一向表现出一种可靠的本能。早在1831年11月，卡齐米尔-佩里埃在法国众议院就大陆上工人阶级的第一次骚动和里昂的丝绸纺织工的暴动作报告时就说过：“先生们，我们可以镇定自若！里昂的工人运动**没有显示出丝毫政治迹象**。”可见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无产阶级的任何政治骚动都是工人即将摆脱由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政治控制的先兆。

但是，马克思首先做到了把工人阶级的政策置于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从而把它锻造成置现存社会制度于死地的武器。当今的社会民主工人政策的基础一般说来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说来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只有对于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本质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都是一无所知的人，才可能设想有处于马克思学说之外的社会民主主义，即整个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政策。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费尔巴哈》中把哲学的本质表述为思维同存在的关系、人的意识在客观物质世界中的关系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存在和思维**这两个概念从抽象的自然界和职业哲学家执拗地在其中绕圈子的个人思辨的领域转用到社会生活方面，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主义**也可以这样说。它始终在探索和寻求使存在同思维、也就是使历史的存在形式同社会意识相一致的方法和途径。

几百年来，人们曾经竭力寻找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然而直

到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才找到了这种方法。马克思发现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发展在私有制的统治下是作为阶级斗争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得到实现的，由于这种发现，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因而意识同存在之间、人的意志同社会的行动之间、迄今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动机和效果之间必然的不一致才得到了说明。

这样，人类借助于马克思的思想才探明了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秘密。此外，由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就指明了这样一条道路：社会从自然发生的、不自觉的阶段进入自觉的、符合愿望的、真正人的历史阶段；在前一个阶段里，社会形成自己的历史就象蜜蜂建造蜂房一样，在后一个阶段里，社会的意志和行动第一次取得一致。社会的人自从几千年以来将第一次做**他想做的事情**。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种最终“从动物界进入人的自由的飞跃”<sup>①</sup>（对整个社会说来，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实现这种飞跃）**在当前的制度内部就已经完成了，也就是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中完成了**。由于掌握了马克思学说这一指南，工人党今天是唯一这样的党。它从历史的观点**懂得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因此也**做它想做的事情**。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全部秘密所在。

很久以来，资产阶级人士在社会民主党惊人的坚强和持续的进步而前感到震惊。时常有个别的白发苍苍而头脑幼稚的人，他们在我们的政策所取得的特别的道义成就的感召下，建议资产阶级以我们为“榜样”，汲取社会民主党充满秘密的智慧和理想主义。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编者注

他们不懂得，对于蒸蒸日上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说来是生命之源和青春之泉的东西，对于资产阶级政党说来却是致命的毒药。

事实上究竟是什么东西首先给予我们以内在的道义力量，使我们能够如此乐观和勇敢地忍受和摆脱象实施了十二年的反社会党人法这样极其沉重的压迫呢？也许是被剥夺继承权者追求在物质上稍稍改善自己状况的那种顽强精神吗？现代无产阶级不是为日常安乐逞英雄的庸人、小市民。英国工联界的那种平庸的、冷漠的狭隘心胸表明，单凭对微小物质利益的希望很难振奋工人阶级的道义精神。

或者是象在原始基督教徒那里一样，是一个教派的愈受迫害就愈炽烈的苦行僧式禁欲主义吗？现代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继承人和弟子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是有健康的感官肉欲的人，它不能遵守奴隶的道德仅从苦难中为自己的理念汲取爱和力量。

最后，难道是我们进行的事业的正义性使我们成为如此不可制服的吗？宪章派和魏特林派的事业、空想社会主义派的事业同样是“正义的”，但是他们一碰到现存制度的反对就立刻统统失败了。

如果说今天的工人运动不顾敌人的种种镇压行动仍旧战无不胜地抖动它的鬃毛，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冷静地认识到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sup>①</sup>，也就是造成了对剥夺者的剥夺——社会主义革命。它通过这种认识看到了最终胜利的绝对保证，他从这种认识不仅汲取了激情，而且也汲取了耐心，行动的力量和坚持的勇气。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编者注

富有成效的斗争政策的首要条件是对敌人的行动的认识。那么，什么东西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资产阶级政策直至它的细微末节、直至它日常政策的错综复杂情况（这种认识既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又不使我们抱有幻想）的钥匙呢？无非是这样的认识，即人们必须从各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从物质生活的各种矛盾、归根到底“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有矛盾去解释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也包括资产阶级政策）的内在的分裂状态。

而又是什么能够使我们的政策同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例如世界政策相适应，并且尤其是无需特殊的天才和深刻见解也能对之作出深入的判断呢？这种判断是切中现象的核心本身的，而最富有天才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却仅仅触及这些现象的表面，要不就是，每当触及深处便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这又无非是根据“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这条规律而获得的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洞察力。

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在斗争中选择每一种方法和每一条途径时，为了避免无计划的试验和浪费力量的空想主义偏差，拿什么作标准呢？是终于被认识了在当今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过程的趋势，我们不仅能够按照这种趋势粗略地衡量我们的战役计划，而且还能够衡量我们政治意图的每个细节，工人阶级借助于这一指南第一次做到了把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伟大思想兑换成日常政策的零钱，并使日常细小的政治工作上升为实现伟大思想的工具。在马克思以前，存在着一种由工人来推行的资产阶级政策，也存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自从有了马克思，并且由于有了马克思，才有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策，这一政策同时又是革命的现实的政策，而且是就这两个词的最完满的意义来说的。

如果我们把仅仅为自己规定可实现的目标并懂得以最有效的方法通过最短的途径去追求这一目标的政策看作现实政策，那么，



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同资产阶级政策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政策从日常的物质成就的观点看来是现实的，而社会主义政策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看来是现实的。这种区别同庸俗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完全相同。前者从市场货摊的观点出发把价值看作物的现象，而后者却把它看作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

但无产阶级的现实政策也是革命的，因为它通过它的一切局部的努力的总和越出了它在其中活动的现存制度的范围；它清醒地只把自己看作行动的前奏，而这种行动将使它成为占据统治地位和实行变革的无产阶级的政策。

于是，我们用以战胜危难的道义力量、我们在斗争中的策略直至各个细节、我们对敌人进行的批评、我们争取群众的日常鼓动、我们的全部所作所为直至最细微的地方，这一切都贯穿了马克思创造的学说并在这一学说的光照射耀下得到透彻的理解。而如果说我们有时陷于这样的幻想，认为我们当今的政策及其全部的内在力量是不依赖马克思的理论的，那么这只是表明，当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说话时（就象莫里哀剧本中的小市民用散文说话一样），却并不知道这一点。

举出马克思的这些功绩就足以使人懂得，马克思由于他在社会主义和工人政策中引起的变革必然使资产阶级社会成为他的死敌。统治阶级很明白，要战胜现代工人运动就必须战胜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后的二十年就是不断力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消灭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思想的二十年。

工人运动的历史一开始就是通过既和革命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也和资产阶级的现实政策进行斗争而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绝对专制主义或半专制主义的社会是前者的历史基础。尽管直到最近我们还观察到局部的倒退，然而大体说来，西欧社会主

义的革命空想主义阶段已经随着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形成而告终了。另一个危险，即陷入资产阶级现实政策的修修补补工作的危险，是由于工人运动在议会政治的基础上得到加强才出现的。

有人认为，也应当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那里借用**在实践中**战胜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武器，应当用各阶级的民主联合和改良的社会和平来取代阶级斗争。

人们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幻想有时尽管可以维持一个时期，但资产阶级现实政策的方法对于工人阶级不适用这一点立即得到了证明。法国内阁主义的失败<sup>①</sup>；比利时自由主义的叛卖<sup>②</sup>；德国议会政治的破产<sup>③</sup>，“平静的发展”这种昙花一现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马克思关于作为阶级斗争基础的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的规律胜利地为自己开辟了道路，每天都带来新现象和新奇迹。荷兰铁路工人二十四小时的罢工就象一次地震，一夜之间就在社会内部造成一条深邃的裂缝，阶级斗争的熊熊火焰从这里喷射出来，荷兰正在燃烧。

于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合法性的基础就象一层薄冰一样，在“工人大军一齐踏步”时，在一个个的国家破裂了，这就不断使工人觉悟到，他们的终极意图不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得到实现。这就是多次力图在“实践上”战胜马克思的结局。

成百的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辩护士把**在理论上**战胜马克思当作他们毕生的使命，当作他们一生事业的跳板。他们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们成功地使虔诚的知识阶层确信马克思的“片面性”

---

① 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机会主义分子亚历山大·埃蒂耶纳·米勒兰自从1899年6月起是该政府的商业部长）于1902年5月28日垮台。——编者注

② 比利时资产阶级虽然同工人党结成联盟，但在1902年4月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公然与工人为敌。——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99—101页。——编者注

和“夸张”。但是连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比较严肃的人，如施塔姆勒，也已经认识到：“面对一种基础如此深厚的学说”，用“那种不彻底性、‘用大致差不多的东西’”来加以反对，是不可能达到任何目的的。但是，资产阶级科学能够用什么来同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相对抗呢？

自从马克思使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在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中发生作用以后，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就中断了。经典意义上的自然哲学终结了，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终结了，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终结了。在历史研究中，不是不自觉的或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就是五光十色的折中主义取代了任何一种统一的理论的地位，就是说，放弃对历史过程作出统一的说明，也就是完全放弃历史哲学。经济学动摇于“历史派”和“主观派”这两个派别之间，它们之中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而两派都反对马克思。一派为了否定马克思而从原则上否定经济理论亦即从原则上否定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另一派则否定唯一的（客观的）研究方法，而只有这种研究方法才使国民经济学成为科学。

当然，社会科学图书博览会每月仍然提供大批的资产阶级勤劳写作的出版物，野心勃勃的时髦教授将以真正大资本主义的机械般的速度在市场上抛出一本本厚厚的书，这些书要么是一些煞费苦心的专著，它们所作的研究就象鸵鸟把头埋在沙里一样陷在琐碎零散的现象之中，这样就无需去观察事物之间任何重大的相互关系，只要为日常需要而工作就行了。要么在这些专著里只是装模做样地提出一些思想和“社会理论”，而归根到底不过是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反映，人们根据市场上“时髦”货的口味用过于累赘的闪闪发光的装饰物把它掩盖起来，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独立的思想创新、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有生气的推理。

面如果社会进步又提出了一系列更新的有待解决的科学问

题,那么,又只有**马克思**的方法能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武器。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能够提出来同马克思的理论相对抗的在任何地方都只是无理论状态,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能够提出来同马克思的认识论相对抗的在任何地方都只是对认识的怀疑。马克思学说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产儿,但是这个孩子的诞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

所以,正是工人运动的高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从资产阶级社会手中夺走了它本想用于讨伐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武器。今天,在马克思逝世二十年的时候,资产阶级社会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更加软弱无力,而马克思却比以往更有生气。

当今的社会当然还剩下一点安慰。当它徒劳地竭力去寻找一种战胜马克思学说的手段时,它没有发现对此唯一有效的手段蕴藏在这一学说本身之中。这一学说完全是历史性的,它的效用在时间上仅仅是有限的。这一学说是彻底辩证的,它自身包含着自己灭亡的确凿无疑的萌芽。

如果我们撇开马克思学说的不朽的部分即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谈,那么可以最简要地把它概括为对于这样一条历史道路的认识,这条道路从最后一个“对抗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通向以全体成员利益一致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

它首先是(过去国民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也是如此)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过渡的时期在思想上的反映。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种反映。要知道,如果马克思的这种认识不成为社会的认识、不成为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认识,那么被马克思认识到的这一历史过渡是绝对不会实现的。这种由马克思的理论阐述的历史变革需要以下列条件为前提:马克思的理论成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成为历史本身的要素。

于是，马克思的学说随着每个新的肩负起阶级斗争的无产者的出现而不断得到证实。所以它同时又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因而它本身也是过程，社会革命将成为共产主义宣言的最后一个篇章。

因此，马克思学说就其对于现存社会制度最危险的部分来说，无疑迟早将被“克服”。但只是同现存社会制度一起被克服。

发表于1903年3月14日《前进报》第62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369—377页。

（周家碧译 殷叙彝校）

# 破灭了的希望

(1903年10月)

整个资产阶级新闻界对我们党内的事件<sup>①</sup>的态度再次证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确实战胜了他们各党派之间的一切对外分歧。他们——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皮鞭-厄特尔<sup>②</sup>和福斯报的继承人再度一致地对社会民主党内的区区小事高兴得热泪盈眶，并且狂呼乱叫地欢庆胜利。一些人为终于开始的“互相残杀”感到高兴，因为这使美好的希望开始得到了实现——资产阶级无法对付的社会民主党终究有一天自己互相“撕咬”起来了。另一些人则为社会民主党内几位学者的失败而欢呼，认为这种失败证明了在“有教养的人”同“群氓”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谁想跳过它就会“折断脖子”。第三种人欢呼，社会民主党今后将再也不能够用傲慢的眼光去看待资产阶级世界了，因为它自己家里也出现了腐化的鬼影——*tout comme chez nous*（彼此彼此）。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唱一个调子，社会民主党的威望、诱惑力全都完了！永远完了！

这种喜悦表现得多么逼真，一家党报甚至十分认真地把这理

---

① 指1903年9月13—20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同机会主义分子的争论达到了高潮。——编者注

② 指保守派的《德意志日报》的主编和帝国议会会员格奥尔格·厄特尔。——编者注

解成发自内心的“欢乐”，它感叹地认为必须向党指出这一情况，希望党保持警惕和清醒。

不过只要耳朵稍微灵敏一点，就可以从这场表示快乐和欢庆胜利的刺耳的音乐会中听出由于失望而咬牙切齿的声音和压抑下来的愤怒。正是资产阶级新闻界对于所谓受到嚎叫的野蛮人虐待的几位“有教养的人”的普遍的同感和同情，对于“群氓”和这些群氓“对学者的反叛”的诽谤清楚地表明了党现在无情地指出的那些弊端的所在。

社会民主党内为“无谓的琐事”发生激烈的争吵，这在当今的资产阶级人士看来固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可笑和野蛮，因为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里，对这种琐事都会心照不宣，默不作声地耸耸肩膀就放过去的。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形象：一个拥有三百万成熟的拥护者的党竟由于几件“不诚实行为”表现得如此激动并且兴师动众，大做文章，而这些不诚实的行为同一个主张保护关税的多数派英雄在一次帝国议会中或者一个保守党人在一次竞选演说中编造的大量谎言相比，就象一缕微弱的烛光放在正午耀眼的日光之下那样微不足道。

现在连同修正主义进行争论自然也成了纯粹私人的，不光彩的“私人的”事情了。我们也不得不带着悔恨的心情承认这一点。我们正是不能象民族自由党或者中央党、容克或者自由思想党那样依靠对群众进行政治贿赂和欺骗来建立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处在这样舒适的情况下，任何丢脸的行为都会象一滴水在大海中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此外，如果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群众起来反抗“学者”中的个别腐化现象因而使资产阶级如此愤慨，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他们承认，他们凭着可靠的本能在我们当前的事件中觉察到了现代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在本世纪下半叶已成为对资产阶级极

其不幸的事了，这就是由社会民主党促成的“群众”同“领袖”的关系中的根本变化。

歌德曾经说过“令人讨厌的多数”这句话。这种多数是由少数几个强有力的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骗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随在他们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群”<sup>①</sup>组成的。这句话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用来描绘“多数”的经典公式而已，资产阶级文人却想用它来描绘**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在一切至今为**少数人**的利益进行的阶级斗争中，或者如马克思所说，在全部历史发展是同伟大的人民群众相对立而进行的地方，人民对于历史行动的真正目的、物质内容和限度是不清楚的，这本身就是这种行动的先决条件。这种误解也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方面的“领袖集团”的特定的历史基础，群众是附和这些领袖、“尾随在他们后面”的。

然而马克思在1845年就曾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②</sup>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迄今一切历史活动中“最深入的”活动，它包括全部下层人民，它是阶级社会形成以来**首先符合群众自身利益**的活动。

因此，**群众自身**对于自己的任务和道路的认识在这里也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先决条件，正象从前他们缺乏认识是统治阶级的行动的先决条件一样。

但是这样便消除了“领袖集团”同“尾随在他们后面”的多数之间的对立，把群众同领袖的关系颠倒过来了。社会民主党的所谓“领袖”的唯一作用在于启发群众认识他们的历史任务。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威信和影响的**增长**只能是同他们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的启蒙工作的量成比例的，也就是说正好同他们破坏至今一切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65页并参看《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10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



袖集团的基础即群众的盲目性的程度成比例的，一句话，是同他们放弃自身的领袖作用，使群众成为领袖，使自己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的执行人和工具的程度成比例的。一个倍倍尔的“专政”，即他的巨大威望和他的影响，不过是建立在他所进行的启发群众使他们在政治上达到成熟这一巨大事业的基础上。今天，他的这一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只要他象当前这样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思想，群众就满怀激情地追随他。如果说，造就清醒的、有觉悟的、最具有聪明才智的领袖——群众，促成拉萨尔所主张的那种使科学同工人的结合只是而且始终只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从工人和其他阶层中源源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和同路人涌来），那么，社会民主党运动的主导趋势现在是而且始终是取消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和“被领导”的群众，取消这个一切阶级统治的历史基础。

如果有人要把资产阶级的老自由斗士同今天资产阶级的“领袖”相提并论，这当然等于侮辱前者的亡灵。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也对处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外的、即在资产阶级本身的群众同“领袖”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阶级运动不仅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对于自己那时的行为目标认识不清的基础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领袖本身认识不清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在人民群众自身的阶级利益已被揭示以后，资产阶级只能依靠有意掩饰自己的阶级意图和人民同这些意图相对立的利益来使人民群众继续追随他。资产阶级的革命先驱是一些以历史的自我欺骗为基础的人民领袖，而巴赫姆<sup>①</sup>、巴塞尔曼<sup>②</sup>、李希特

---

① 卡尔·约瑟夫·艾米尔·巴赫姆(1858—1945)——德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中央党国会议员(1889—1906)。——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1811—1855)——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巴登邦议会议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编者注

尔<sup>①</sup>——他们的御用文人正在咒骂倍倍尔的“专政”——却是以政治欺骗为基础的人民代表。

而如果在这些以欺骗群众为职业而建立的派别之中，当前在咒骂社会民主党的“群氓”和“长了老茧的拳头”对“教育的神圣精神”的“反叛”方面恰恰是自由主义走在所有其他派别之前，那么，这不过是以露骨的方式表明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场景和这些先生们的“精神”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在他拒绝参加自由主义运动以后，在四十年代初同“自由主义的群众代言人”进行了一场论争，要使他们懂得，恰恰应当“到群众中，而不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精神的真正敌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那时恰恰还不是到认真对待他们自由主义空话的“群众”中而是到“别的什么地方”，也就是到反动的普鲁士国家中去寻找“精神的真正敌人”的。今天，在“自由主义的代言人”早已同普鲁士国家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反对“群众”以后，他们自己当然就把群众视为“精神的真正敌人”了。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样一些群众，他们鄙视地离开这些代言人，凭自己的力量去同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斗争，并于6月16日<sup>②</sup>才又使他们的自由主义“代言人”大大地靠近坟墓一步。

这就同那个关于酸葡萄的古老寓言所说的一样。在资产阶级在广大的人民阶层中日益失去自己的拥护者，而这些拥护者又日益转向社会民主党以后，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至少通过修正主义的中介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推上资产阶级政治的轨道，折断无产

---

① 欧根·李希特尔(1838—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思想党的创始人之一，国会议员。——编者注

② 1903年6月16日德意志帝国议会举行了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以3010771票获胜(这比1898年的选票多98000票)，从而获得81个议席(比1898年多25个议席)。《前进报》把这次选举称为是对整个统治制度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编者注

阶级斗争的支柱，从而通过迂回的道路为自己在历史赌博中的损失作一次软弱无力的报复。

只要还存在这种希望，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似乎就表示出对于“文化”和“教育”的极大兴趣，并有希望逐渐成为一支“文明”力量。现在，在他们在德累斯顿如此野蛮地以如此仇视文化的态度用无产阶级的皮靴把资产阶级小心翼翼地放在他们窝里的杜鹃蛋统统踩碎以后，他们就不过是可以受他们的领袖和专制者的煽动而采取如此不文明行动的群氓了，这是不言而喻的，无可怀疑的。

这幅景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滑稽可笑的，不过可以承认，自欺欺人的骗子这次感到痛苦是有特别确实的理由的。如果说从前历次党代表大会谴责了修正主义实践的个别表现和修正主义的理论，那么党在德累斯顿和在德累斯顿以后不仅更加尖锐地重复那一判决，并且还对修正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即它的政治伦理学和与此相联的个人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进行了声讨。

毫无疑问，对于每一个从内在的联系去总结最近一系列事件的人来说，那篇已为大家谈论得很多的关于《党的道德》<sup>①</sup>的文章，不管它的出现多么偶然，它对于所有修正主义党员的实际行动方式描述得多么少，但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对修正主义伦理学的适当的表述，因为修正主义伦理学是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同它的思路相吻合的。对群众，必须象教育儿童那样去教育他们，对他们不是什么都说，甚至可以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说些谎话去哄骗他们。而“领袖”则作为深谋远虑的国务活动家用这种软绵绵的语气按照自己庞大的计划去刻画未来神殿的形象，这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学，尽管二者在这样做时所追求的目的有些地方还很不相同。

---

<sup>①</sup> 格奥尔格·伯恩哈特《党的道德》，见柏林《未来》杂志第11年卷（1903）第15期第79—81页。——编者注

我们在法国的饶勒斯主义和意大利的屠拉梯派的初期活动中看到这种群众同领袖的关系通过实际运用为自己开辟了道路。饶勒斯派党<sup>①</sup>的“自治的”、相互间无联系的、五花八门的联合会，屠拉梯在伊莫拉取消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提案，都不外是对严密组织起来的党员群众进行分化瓦解，从而使他们从独立的领导者蜕变成自己的国会议员的软弱无力的工具，蜕变成必须“尾随在他们后面”的“群氓”罢了，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即使知道，也不能使人们服从他们的意志，就象在波尔多代表大会<sup>②</sup>上那样。这种意图同饶勒斯派议员甚至想摆脱把他们派到议会中去的各地党组织的影响和监督、并越过党组织而直接号召无组织的、涣散的选民的意图，都是《未来》杂志的那篇文章所说明的领袖同群众的那种关系在组织上的先决条件，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任何群众运动在心理上的必需和标准。

在下面抹煞目标明确的无产阶级核心队伍同无组织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界限，在上面抹煞党的“领导集团”同资产阶级人士之间的界限，——社会党国会议员在“全人类的教育”这一基础上靠拢资产阶级文人，二者是配合得很和谐的。

在教育 and “全人类的文化”的卵翼下，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在美好的冬夜同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相聚在一起，以便在“职业的辛劳”之余略事休息并且摆脱“埋头政治，不问事”的状态，就象在古希腊全盛时期的末日国务活动家、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聚集在伯利克里<sup>③</sup>周围，通过自由交换见解的方式攀登人类精神的最高

---

① 指法国的独立社会党人。——编者注

② 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03年4月12日至14日在波尔多召开。——编者注

③ 伯利克里(公元前499—429)古雅典国务活动家，他当时对雅典的社会生活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古雅典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艺生活达到了全盛时期。——编者注

峰并仔细品尝精巧的、优美的文化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国务活动家在柏林的一家小酒馆里聚集在伯利克里—哈登<sup>①</sup>周围，避开粗野混乱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汗臭，在一群和蔼可亲的女士和才华横溢的记者中间闲谈政治和艺术、高尚的、令人愉快的事情。尽管这些聚会者的头上没有戴希腊的玫瑰花环，尽管普通的普绍尔酒也许应当换成高贵的特萨利亚葡萄汁，但是，古老友谊和最良好教育的真正精神毕竟在大家头上搏动着，并且，按照思想高尚的人们之间的真诚宽容，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见解相互得到了交流和比较——偶尔也打听一些令人讨厌的同志们的情况。海涅同志说：“就象在有教养的人中间那样。”

而现在，对于良好的教育和伯利克里时代一无所知的野蛮的、无产阶级的拳头伸过来了，它无情地摧毁了所有这些“自由人性的温情脉脉的纽带”。从资产阶级社会一直伸进我们阵营里来的触角痛苦地抽搞起来并缩了回去。亚斯特罗夫先生那愤恨的态度、《福斯报》那种疯狂的咒骂、莫瑟—自由思想党的诽谤就是破灭了的希望的证明。修正主义的乌云已经消散。在资产阶级充满仇恨的怒视下，无产阶级堡垒陡峭的铮铮铁壁岿然屹立，和过去一样无法逼近，和过去一样无法攀登。而在这座堡垒同资产阶级世界之间又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资产阶级的散兵游勇看来本来只要游游逛逛就可以走过去的地方，现在，转瞬之间却需要跳跃了，“在这种跳跃中”即使人们无需拿自己的整个生命去冒险，也要“折断脖子”。

最近出现的伦理方面的许多现象同修正主义方法之间的联系现在清楚了。正是在把无产阶级的战斗阵营和资产阶级敌人分开来的壕沟上这样快乐的你来我往（这是修正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批

---

<sup>①</sup> 马克西米利安·哈登(1861—1927)德国政论性文学家，批评家。——编者注

评”、“自由发表意见”以及为资产阶级报刊“自由撰稿”造成的)成了培育那些现象的土壤。那些现象的最精彩的成果是反对梅林的阴谋。<sup>①</sup>在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世界之间发生了一种思想渗透,资产阶级的腐败产生的毒素可以通过这种渗透畅行无阻地侵入无产阶级政党机体的血液循环中去。

*Hinc illae lacrimae*(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sup>②</sup>于是资产阶级报刊做出一副鬼脸并吓唬我们说,我们由于轻率而失去了自己的同路人并堵塞了“学者”的来源。一家自由思想党的报纸认为,现在在党勒同志认为自己有必要放弃委托书之后,他将会认识到,在他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他犯了怎样的错误”。<sup>③</sup>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美好心灵的这种天真的自白表明,那个阵营里的人是怎样考虑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党员身份的。高贵的自由思想党人把加入社会民主党看作“一种错误”,就象有人根据营业情况经营咖啡买卖而不经营棉花买卖时所“犯”的错误一样。他在这样做时丝毫没有料到,他在对社会民主党内的事件作出行家式的评价时已把自己家里的政治贬低到卖淫的水平。

从这种立场出发的学者现在再不会到我们这边来了,或者现在会离开我们了,我们让他们尽管去享受自由主义求爱的拥抱吧!

*Similia similibus*,——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只耽心,这

---

① 弗兰茨·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以前在几篇文章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同他们的党员身份不相容,因此,修正主义分子便开始对他采取了挑衅行动。沃尔夫冈·海涅在1903年9月30日的《前进报》上《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先生和我》一文中表明海涅参与了攻击梅林的准备工作并起了决定性作用。——编者注

② 出自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1幕第1场。——编者注

③ 保罗·党勒民族社会同盟创建人之一,至1899年为止是该同盟的第二主席,1900年转入社会民主党,他在社会民主党内持修正主义的立场。1903年10月1日,他在事先没有通知党的执行委员会或他的选民的情况下放弃了他1903年6月获得的帝国议会中的议席。——编者注

位可怜的自由思想党人在预期的对“竞争”的部分结算中也不会捞到好处，因为正是那些同他思想相似的“学者”无疑不会犯到一个已经破产的商号去就聘的“错误”。

至于谈到我们的文化使命，——在“长了老茧的拳头奋起反抗学者”以后，容克显得尤其为此而担忧——那么，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文化之友也一定很快就会痛苦地了解到，社会民主党反对容克反动势力而拯救文化的活动在清算修正主义以后只会显示出更大的威力。因为社会民主党同精神文化的密切关系也不是以资产阶级转到我们这边来的那些人为基础，而是以处于上升时期的无产阶级大众为基础的。这种联系不是来自我们的运动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相似之处，而是来自它同这个社会的**对立**。它的源泉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这一最终目的意味着把整个人类文化交还给全体人类。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它的最终目的在运动中越是鲜明地突出表现出来，人们就能更加可靠地防止德国的精神文化受它在易北河以东的朋友们的破坏，并防止德国本身陷入中国式的保守状态。

但是清除党的腐败现象（这是党的最近五年的历史发展的后果）因此就更加迫切了。因为“随着”这种哪怕是在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活动”的“深入”，“群众的队伍”也将扩大，而这些群众是满怀信心地加入我们阵营的，他们把这里看作唯一的旗帜鲜明地捍卫他们真正的阶级利益的政治阵营。

发表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1904）第1册第33—39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394—402页。

（周家碧译 殷叙彝校）

##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1904年7月)

落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运动必须向先进国家的老的运动学习，这是一个历来受人尊敬的真理。我们可以大胆地用相反的一句话加以补充：老的、先进的社会民主党同样能够而且必须从同它们年青的兄弟党的亲密交往中进行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同庸俗经济学相区别——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前的一切经济阶段，同造物的顶峰即资本主义相比，不是一种简单的“不发达”形态，而是在历史上享有同样权利的不同的经济类型。同样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各种发展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一定的历史的个体本身。我们越是了解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就越是能认识本质的东西，基本的东西即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原则，就越是能减少为任何地方主义所限制的眼界。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际的旋律如此强烈，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民族孤立状态中不断发出的机会主义思想方式的音响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应俄

---

\* 本文1904年7月10日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第69号上，同年7月13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转载。《新时代》杂志编者转载时加了一个说明，其中说：“本文谈论的是俄国的情况，但是文中所谈的组织问题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俄国的兄弟党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意义，而且也因为我们自己党内也忙于热烈地探讨类似的组织问题”。——编者注



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的要求而写的下面这篇文章应该引起德国公众的一些兴趣。

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了一项特殊的、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任务，这就是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制定一个适合于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把俄国当前的情况一般地比做德国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情况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种对比是从警察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看俄国的情况。由于缺乏民主自由而给群众运动造成的障碍比较地说是次要的。群众运动在俄国已经冲破专制主义“宪法”的围墙而建立起自己的“街头暴动”的“宪法”，尽管这种“宪法”是靠不住的。这一运动将会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取得对专制制度的彻底胜利。俄国社会民主党斗争中的主要困难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被专制主义的暴力统治所掩盖，这就必然使真正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具有抽象宣传的性质，使直接的政治鼓动多半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反社会党人法企图干脆把工人阶级置于宪法之外，而这种事情又发生在一个阶级对立已经充分暴露并且在议会中展开了的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俾斯麦措施的荒谬绝伦恰恰就在这里。俄国应该进行相反的试验，即在资产阶级没有直接进行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建立社会民主党。

这不仅仅是把社会主义学说搬到俄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鼓动工作的问题，而且也是采取完全特殊的组织形式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中，组织问题同先前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试验不同，它也不是宣传工作的人为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产物，而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把政治觉悟灌输到其中而已。在正常的条件

下，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阶级统治的出现早于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地方，工人最初的政治团结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实现的。《共产党宣言》说：“在这个阶段上”，“……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sup>①</sup>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用自觉的干预来代替历史过程的一个时期，把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目的的斗争阶级直接从政治上的极端分散状态（这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中去。因此，组织问题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特别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组织必须在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形式上的手段的条件下建立起来，而首先是因为这个组织有点象上帝一样，必须在缺乏通常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准备好的政治原料的条件下，“在虚无缥缈之中”，在真空中建立起来。

俄国社会民主党几年来所从事研究的问题，正是在于把各个分散的完全独立的小组和地方组织形式（这是同运动的准备阶段即主要是宣传工作阶段相适应的）变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群众统一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组织。但是，旧的组织形式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地方组织的分散性和完全自治即独立性，既然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变得难以忍受并且在政治上已经过时，那么新阶段的口号，进行巨大组织建设的口号很自然地就是**集中主义**。强调集中主义的思想是《火星报》为准备上一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党的成立大会）而进行的三年大规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年青一代的近卫军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在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以后很快就证明，集中主义是一个远远没有概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的历史内容和特点的口号，它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不论在什么领域，包括组织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9页。——编者注

问题的领域在内，都不能成为固定不变的僵硬的公式。

我们面前摆着的列宁同志——《火星报》为召开党代表大会而进行的准备运动中的杰出领导人和战士——的一本书<sup>①</sup>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作了系统的说明。这本书详尽而透彻地表达的观点正是无情的集中主义。它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把态度明确的和活跃的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例如中央委员会按照这个观点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也有权确定从日内瓦到列日，从托木斯克到伊尔库茨克的俄国每个地方组织的人员组成，给它们提供准备好了的规章制度，通过一纸命令就可以完全解散它们并重新加以建立，最后还运用这种方式间接影响党的最高机关即党代表大会的组成。可见，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

列宁正是认为把组织中的严格集中主义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是一个特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并且能够举出一大堆事实来维护他的观点。但是我们倒要比较仔细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社会民主党是在倾向于集中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斗争必须在巨大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框框内进行，因此，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社会民主党所担负的使命就是要在该国范围内代表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反对无产阶级的一

---

<sup>①</sup> 指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编者注

切局部的和集团的利益。因此，它处处都自然要努力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民族的、宗教的和职业的集团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党，只有在特殊的非正常的情况下，例如在奥地利，它才不得不破例赞同联邦主义原则。

在这方面，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毫无疑问的是，它不能建立一个由许许多多民族的和省份的独立组织联合起来的联邦团体，而必须在俄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至于在团结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的更准确的性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从实现社会民主党这个战斗的党的形式上的任务的角度来看，组织上的集中主义乍一看来似乎是直接决定党的战斗力和力量的一个条件。但是在这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特殊历史条件要比每个战斗组织从形式上的要求着眼的观点重要得多。

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阶级社会历史上在其各个时期和全部过程中都要依靠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直接的独立行动的第一个运动。

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所要建立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于先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例如雅各宾和布朗基运动的组织形式。

看来，列宁低估了这一点，他在他的书中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非是“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sup>①</sup>。在列宁看来，社会民主党同布朗基主义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是同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对立的。他忘记了他这样就完全修改了组织的概念，赋予集中主义概念以崭新的内容，提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和斗争的相互关系的崭新的观点。

---

<sup>①</sup> 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478页。——编者注

布朗基主义既然不依靠工人群众的直接的阶级行动，也就不需要群众性的组织。相反地，既然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在革命时刻才出现于斗争场所，而预先准备革命袭击的行动是少数人的事，那么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把受委托进行这种一定行动的人同人民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就是直接需要的。而这也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因为布朗基组织的密谋活动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毫无内在联系的。

同时，布朗基主义的策略和具体任务是同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基础没有联系的，都是随意制定的，预先编制固定的计划，连细节也都作了规定。这样，组织里的普通成员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外执行预定的意志的纯粹的执行机器，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工具。因此就产生了密谋主义的集中主义的第二个要素：党的各级组织对中央机关的绝对的盲目的服从和中央机关的决定大权一直扩展到最边远地区的党组织。

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的条件完全不同。它在历史上是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补充自己的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斗争任务。组织、觉悟和斗争在这里不象布朗基主义运动那样，是可以机械地和暂时地分割开来的不同的因素，而仅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一方面，除了一般的斗争原则以外，根本不存在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象训练新兵那样教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去付诸实现的那种现成的、预先制定好了的详细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建立组织的斗争过程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变化不定的。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

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而且列宁在说明他的观点的时候也许要比他的任何一个政敌所可能做的都更加机智灵活，因为他给他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下的定义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但是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有联系，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同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在性质上必须有本质的区别。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

从对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的这种真正内容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今天的俄国，建立这种集中制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可能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就是：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在政治斗争中受过训练的无产者阶层；他们有用直接施加影响（对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和在党的报刊中等等）的办法来表现自己的活动能力的可能性。

显然，后一个条件只有在俄国拥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头一个条件——形成一个有阶级觉悟和有判断能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只是处于产生过程之中，并且应该被看作是最近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相反，列宁却坚信，俄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广大的、极端集中化

的工人政党的一切先决条件，这就更加令人吃惊了。列宁乐观地宣称，现在“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sup>①</sup>，他称赞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说工厂本身使无产阶级成熟到实行“纪律和组织”，这再一次表明他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上有许多十分机械的观点。列宁认为，培养无产阶级“纪律”的东西决不仅仅是工厂，而且还有军营和现代官僚制度，一句话，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全部机器。一方面是一个有无数手和腿的肉体在没有意志和思想的情况下随着指挥棒机械地做动作，另一方面是一个社会阶层自觉的政治活动自愿地互相配合；一方面是一个被统治阶级的盲目服从，另一方面是一个为自己解放而斗争的阶级的有组织的起义，——所有这些都是两种对立的观念。如果人们把这两种概念都一概称作“纪律”，那只不过是滥用口号罢了。无产阶级要培养新的纪律，即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觉纪律，不能受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培植起来的纪律的束缚，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

其次，根据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所说的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运动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实现的绝对概念，而不如把它了解为一种倾向，它随着工人阶级在其斗争过程中觉悟和政治训练的增长而逐步得到实现。

当然，完全实现集中制的重要先决条件尚未具备，这在目前的俄国运动中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是，在我们看来，如果认为觉悟的工人在党组织内部还没有实现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可以“暂时”由党的中央机关“受委托行使的”单独统治来代替，工人群众还没有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1卷第484页。——编者注

做到的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

俄国运动的历史本身提供了很多证据,表明上述意义上的集中制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中央机关把自己的权力仅仅限于党的活动的纯粹技术性方面,限于调整鼓动工作方面的一些辅助性手段,例如运送党的文件,适当地分配鼓动力量和财政力量,那么象列宁所设想的那种几乎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的、大权在握的中央机关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只有在中央机关运用它的力量来制定统一的斗争策略,解决俄国的重大政治行动的情况下,它才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俄国运动的变化中看到了什么呢?俄国运动近几十年来的最重要最有成效的策略上的变化不是由运动的某些领导人“发明”的,更不用说是由领导机构“发明”的,而它们每次都是已经爆发起来的运动本身的自发产物。俄国的真正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阶段开始于1896年彼得堡爆发的自发的大罢工,并且开辟了俄国无产阶级群众经济行动的时代。第二阶段即街头政治游行示威阶段,也是这样。这一阶段完全自发地开始于1901年3月间彼得堡学生的行动。使他们大开眼界的下一个策略上的重大转折点是顿河岸罗斯托夫“自然而然”爆发的群众罢工,以及同这种罢工相联系的临时想起的街头鼓动、露天群众集会和公开演说,这些事在一年以前对社会民主党勇敢的突击手来说,还只是当作一种幻想而不敢大胆去设想的。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行动”总是先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首创性和自觉领导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不是由于这种专门组织对它应起的作用缺乏准备(尽管这一因素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发生了影响),更不是由于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缺少一个象列宁所设计的掌握大权的中央机关。相反,这样一个机关很可能只会使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不坚定性有增



无已，并且加深奋起进攻的群众和踌躇不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矛盾。在制定策略时，党的领导的自觉首创性所起的作用很小，这种现象在德国可以看到，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一般说来，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在这里基本上带有**保守的性质**，因为它凭经验把每次新赢得的斗争领域开发到尽头，就立刻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反对更大规模的革新。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由于它的引人注意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稳定性而普遍受到赞扬。但是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党在当前的斗争中出色地适应了目前的议会制的条件（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是如此），意味着我们党懂得利用议会制所提供的全部斗争领域并且能够恰当地掌握原则。但是与此同时，这种特殊形态的策略已经遮住了我们宽阔的视线，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直截了当把议会策略看作是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的永久不变的策略的倾向。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这种情绪：**帕尔乌斯**多年来一直想在党的报刊上引起关于一旦普选权取消是否有可能改变策略的争论，但是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尽管对于这种可能性党的领导人是完全认真看待的。这种懒惰态度主要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解释：很难在抽象的冥思苦想的真空中为一种还不存在的、因而是虚构的政治形势提供轮廓和可以捉摸的形式。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重要的不是每次替未来的策略预先设想或预先制定出一个现成的方案，而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的立场出发在党内对当时的主要斗争形式鲜明地保持正确的历史的估价，对于一定的斗争阶段的相对性和对革命因素增长的必然性具有敏锐的感觉。

但是，如果人们象列宁所作的那样想把具有消极性质的独断专行的全权赋予党的领导机关，那么这恰恰是把每个党的领导机关的保守主义（这是从这些机关的本质中必然产生的）人为地强化到危险的程度。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全党，更确切些说，是由整个运动制定的，那么党的各级组织显然就需要有行动自由，以便单独促使充分利用当时的形势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加强斗争和发挥革命的首创精神。但是我们觉得，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

这种试验恰恰在目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双倍的冒险。它现在正处于推翻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前夕，它已经面临，或者更确切些说，已经进入在策略方面进行有力的创造性活动的时期（这在革命时代是不言而喻的），进入迫切用跃进方式扩大和推进自己的影响范围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企图束缚党的思想的首创精神，并且把党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用铁丝网圈起来，这就就会使社会民主党不能胜利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

当然，从上述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的特殊内容的一般考虑中，还不能推论出俄国党的具体的组织章程方案来。这种方案归根结蒂取决于党在这个时期进行活动的具体条件。既然这里谈的是俄国破天荒第一次试图建立巨大的无产阶级党组织的问题，那就不能预先要求这个方案完美无缺，无论如何都必须经过实际生活的烈火的考验。但是从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的一般观点中可以推论出的东西是组织的主要特点，是组织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主要是决定社会民主党集中制的协调配合和团结一致的性质，而不是决定它的监督约束和孤独排他的性质，在群众运动开

始的时候尤其如此。但是如果在党内树立了这种在政治上拥有活动自由的精神，并且能把这种精神同对运动的坚持原则精神和它的团结精神所持的敏锐观察结合起来，那么任何一个哪怕是制定得很不好的组织章程的粗糙之处都可以很快通过实践得到切实纠正。组织形式的价值不决定于章程的条文，而决定于进行实际活动的战士赋予这种条文的意义和精神。

## 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社会民主党的一般原则和部分地也从俄国当前的条件着眼考察了集中主义问题。但是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看守精神对他来说并不是偶入迷途的产物，而是同他在组织问题上采取的、甚至深入到细枝末节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态度相联系的。

列宁说：“问题……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炼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根源愈深，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sup>①</sup>

列宁把赋予中央委员会以绝对的权力和依靠章程为党设置严格的樊篱看作是阻挡机会主义潮流的坚固大堤。他认为机会主义潮流的特殊标志就是知识分子生来就喜欢自治制和组织涣散状态，害怕党的生活中的严格“纪律”和任何“官僚主义”。在列宁看来，只有那些生来就具有散漫心理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著作家”，才会抵制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无限的权力。相反，真正的无产阶级出于他们的革命的阶级本能，必然对自己党的最高机关的非常严格、坚定和大胆的精神表现出一种欢天喜地的心情，他们会眯

---

<sup>①</sup> 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470页。——编者注

着眼睛满意地接受一切粗暴执行的“党的纪律”。列宁说：“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也就是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组织原则对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sup>①</sup>。他强调说，在革命倾向同改良主义或修正主义倾向处于对抗的所有国家里，将会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在集中制和自治制观点上的这种对立。他还专门拿德国党内最近发生的事件和在选区自治问题上的争论做例子。从这一点出发来考察一下列宁的类比是不无裨益的。

首先应该指出，极力强调无产阶级具有接受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天赋能力而“知识”分子却是怀疑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毫无“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气味，倒不如说恰恰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它同机会主义观点是相近的。说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同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是对立的，这正是一种共同的思想盾牌，在它的保护之下，法国的半无政府主义的纯工团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旧口号：谨防政客！英国的工联主义对法国的“幻想家”的不信任；最后，如果我们判断得正确的话，先前彼得堡的《工人思想报》的纯“经济主义”以及他们把工联主义的狭隘观点搬到专制的俄国，——所有这些都可以携起手来，亲密无间。

当然，从西欧社会民主党迄今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之间、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非集中化倾向之间肯定是存在着联系的。但是，把在一种具体的历史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现象同这种联系割裂开来，把它变成具有普遍的绝对的意义的抽象公式，这就犯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灵魂”，即反对它的历史的辩证的思想方法的极大罪过。

抽象地说，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的出身和无产阶级不同，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的阶级感情，而是克服自己

---

<sup>①</sup> 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491—492页。——编者注

的阶级感情通过思想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的。因此，他们比觉悟的无产阶级更加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而无产阶级如果同他们的社会基础，即同无产阶级群众不失去活生生的联系，他们直接的阶级本能就会给他们提供可靠的革命支柱。但是，知识分子的这种机会主义倾向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组织倾向上采取什么样的明显形式，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该社会的具体社会状况决定的。

列宁所谈到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生活中的这种现象，是在完全确定的社会基础即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般说来，既然这种议会政治是当前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潮流的特殊的肥沃土壤，那么机会主义组织涣散的特殊倾向也正是来源于议会政治。

议会政治不仅仅支持象我们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所看到的现代机会主义的一切众所周知的幻想，如过高估计改良工作、阶级合作和党的合作、和平发展等。议会政治也是这种幻想实际上能够进行活动的基础。同时，它把社会民主党内担任议员的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群众隔离开来，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凌驾于无产阶级群众之上。最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这种议会政治把工人运动变成政治上进行钻营的阶梯，从而使它很容易成为沽名钓誉的和倒霉失败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避难所。

西欧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无组织性和无纪律性的某种倾向也就是从所有这些因素中产生的。造成现代机会主义潮流的第二个确定不移的前提是已经有了一个处于高度发展阶段的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也就是有了一个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后者成了革命的阶级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倾向的堡垒，如果想使无产阶级的坚强的积极的的核心重新溶化在无组织的选民群众之中，就必须破坏和瓦解这个堡垒。这样就产生了在历

史上有充分根据的、能够很好地适应一定政治目的的现代机会主义的“自治的”和分权制倾向。这种倾向之所以产生，不象列宁所设想的那样，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先天的散漫性和懦弱，而是因为资产阶级议会活动家的需要，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而是因为机会主义的政策。

但是，在专制制度的俄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般说来，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巨大发展的产物，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解体的产物，相反，是它政治上落后的产物。

俄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来源）的阶级性显然是不固定得多，它失去阶级性（就这个词的确切意义来说）的程度比西欧的知识分子要大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处于青年时代，一般说来就为理论上的不坚定性和机会主义的动摇性造成了更多更大的活动余地。一会儿完全否定工人运动的政治方面，一会儿又反过来相信恐怖手段可以拯救一切，最后在政治上陷入自由主义的泥潭，“在哲学上”陶醉于康德的唯心主义。

在我们看来，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来说，产生特殊的积极的地方分权倾向不仅缺乏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种积极的支撑点，而且还缺乏相应的社会心理环境。目前西欧的知识分子崇拜所谓“自我”并把这种“贵族道德”也带进社会主义的斗争场所和思想界，他们不是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类型，而是它的发展中的某个阶段，也就是说，他们是衰退的、腐朽的、已经停滞在其阶级统治的最坏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产物。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空想主义和机会主义幻想，却自然而然地宁可倾向于采取截然相反的理论形式——自我牺牲，自我悔恨。如果说过去的“到民间去”，也就是知识分子被迫化装成农民在旧“民粹派”的时代恰恰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值得怀疑的发明，那么不久以前的纯“经济主义”

的信徒愚蠢地崇拜“长了茧子的手”也是一样。

如果人们试图解决组织形式问题的方法不是把固定的方案从西欧机械地搬到俄国，而是研究俄国当前的具体情况，那就会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列宁硬说机会主义一般醉心于某种组织形式，例如地方分权形式，这是根本不了解机会主义的本性。既然是机会主义，它在组织问题上也会有自己唯一的原则——缺乏原则性。它总是根据情况来选择自己的手段，只要这些手段能适合于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象列宁那样，把机会主义说成是麻痹独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并且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欲望服务的一种意向，那么在工人运动的**开始阶段**，最容易达到这种目的的组织形式不是地方分权制，而恰恰是严格的**集中制**。恰恰是这种集中制可以给还不够觉醒的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一小批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德国的情况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在还缺乏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坚强核心和经过考验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情况下，那里在组织上就存在着两种倾向，即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极端集中制和爱森纳赫派的“自治制”。尽管爱森纳赫派的策略在原则上非常不明确，但是同拉萨尔派比较起来，这种策略使无产阶级分子更加积极地参加了党的精神生活，在工人阶级中培养了更大的首创精神（别的不说，这个派别的各地方报刊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明）。总之，这种策略使健康趋向向**横广**方面大大发展了。而拉萨尔派由于有一个“独裁者”，他们获得的经验必然是很可怜的。

一般说来，在革命的工人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运动还处于摸索过程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类似俄国目前所处的条件下，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喜爱的组织倾向恰恰是严格的专制的集中制。这是很容易得到证明的。在以后的阶段，在有了议会制度和拥有强大的团结一致的党的情况下，**地方分权制**就会成为机会主义知识分

子相应的倾向。

恰恰从列宁害怕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危险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列宁的组织观念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危险。

事实上，除了把运动驱入将正在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降低为“委员会”执行工具的官僚集中制<sup>①</sup>以外，没有更容易更肯定地使还很年青的工人运动受知识分子的统治欲望摆布的东西了。反之，除了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和加强他们的政治责任感以外，没有更能可靠地保证工人运动排除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的一切弊病的東西了。

被列宁今天看作是怪影的东西，恰恰明天会更容易地变成现实。

不能忘记，俄国目前面临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必将大大改变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整个局面的资产阶级革命。到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也将很快受到资产阶级的阶级思想的强大影响。如果社会民主党今天充当俄国工人群众的唯一领导者，那么明天，在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首先是它的知识分子，就必然想把群众变成他们的议会统治的垫脚石。在当前的斗争时期，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部分的主动性、自由首创精神和政治思想愈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对他们的妨碍和训练愈多，资产阶级政客在复兴的俄国起作用就会愈容易，社会民主党今天辛勤劳动的收获，明天就会愈来愈多地落入资产阶级的仓库。

但是重要的是，极端集中制观念的基本思想即主要通过组织章程把机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隔离开来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近发生的事件的直接影响下，俄国社会民主党显然也倾向于认为机会主义一般说来仅仅是资产阶

---

<sup>①</sup> 在英国，恰恰是费边派，特别是维伯夫妇最熟中于维护官僚主义的集中化而反对民主的组织形式。——《新时代》杂志编者注



级的民主分子从外面带进工人运动而同无产阶级运动格格不入的一种混合物。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用组织章程本身的限制来防止机会主义分子的渗入是毫无效果的。只要非无产阶级分子冲向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性的潮流是从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迅速崩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更加迅速崩溃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破产这种深刻的社会根源中产生的，那么设想通过制定某种党章条文就能够阻挡这种浪潮，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用章程只能限制小组织或私人团体的生活，但是历史的潮流总是能够冲破最狡猾的章程的。其次，认为防止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断瓦解过程中分化出来的人们大批流入就一定符合工人运动的利益，这也是完全错误的。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同时也是社会所有进步利益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一切被压迫的人们的代表，这个原理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所有这些利益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都理想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原理将以历史发展过程的形态变为现实，由于这一发展过程，社会民主党也作为**政党**逐步成为各种不满分子的庇护所，真正成为反对一小撮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人民党。问题仅仅在于，社会民主党要使这些形形色色的同路人目前的痛苦能够始终服从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把非无产阶级的反对派精神纳入革命无产阶级的行动轨道，一句话，要懂得同化这些渗入分子，消化他们。但是只有象德国迄今那样，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经过训练的无产阶级核心部队在社会民主党内居于领导地位，并且很明确地意识到要对失去阶级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实行革命的推动，那时实现这一点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制定组织章程时更加严格地应用集中制思想和规定更加严格的党的纪律条文来当作反对机会主义潮流的大堤，也是非常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组织章程可以成为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手段，例如它实际上就曾经成为法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饶勒

斯主义混乱思想的进攻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德国党的章程必须加以修改。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章程本身也不能成为防止机会主义的武器，它仅仅是党内实际上存在的革命无产阶级大多数用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形式上的手段。如果这样的大多数还不存在，那么任何严格的书面条文也不可能代替它。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资产阶级分子的渗入决不是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潮流的唯一泉源。另一个泉源倒不如说是社会民主党斗争本身的性质和它的内部矛盾。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直到取得胜利要有一个过程。它的特点是，在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违背一切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但是要实现这种意志，就必须到达现存社会的彼岸，必须超出它的范围。另一方面，群众只能在同现存制度进行日常的斗争中，也就是说，只能在现存制度的框框内培养这种意志。广大人民群众同摆脱整个现存制度的目的相结合，日常的斗争同革命变革相结合，这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而这个运动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两个暗礁之间，即在放弃群众性和放弃最终目的之间，在倒退到宗派状态和变成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间合理地向前迈进。

因此，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可以一劳永逸地预先加以规定，工人运动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受机会主义动摇的侵袭，这种想法完全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幻想。固然，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反对各种主要类型的机会主义思想的毁灭性的武器。但是，既然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威胁它的暗礁不是从人们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那么预先防止机会主义错误就不可能做到。只有当这些错误在实践中获得了具体形式之后，才能通过运动本身克服它们，当然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武器。从这一角度来看，机会主义也是工人运动本身的产物，是工人运动的

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因素。在俄国，由于工人运动还很年青，工人运动的政治条件还很不正常，看来机会主义暂时在很大程度上必定产生于这一泉源，产生于对策略进行必不可免的摸索和试验的事实，产生于必须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史无前例的条件下进行当前的斗争而又要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情况。

但是，如果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在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想通过某种方式制定组织章程来禁止机会主义潮流的出现，就更加令人奇怪了。企图通过这种纸上的手段来防止机会主义，事实上受害的不会是机会主义，而会是社会民主党自己。因为这一企图阻碍了社会民主党健康生命的脉搏跳动，削弱了社会民主党不仅在反对机会主义潮流，而且在反对现存社会制度（这一点毕竟也同样具有某些重要意义的）的斗争中的抵抗能力。也就是用手段反对目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部分人力图使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来防止失策，我们觉得这已经是一种一再跟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了。的确，疯狂的跳跃会引人发笑，历史上的人的高贵的主体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有时喜欢作这种跳跃。被俄国的专制制度压倒并碾得粉碎的我，通过以下方式得到了报复的机会：它借助于革命的思想界人士登上了宝座，并且作为密谋委员会以根本不存在的“人民意志”的名义宣布自己是万能的。但是“客体”表明自己更强大些，鞭子很快就获得了胜利，因为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阶段的“合法”表现。最后，历史发展过程的更加合法的孩子——俄国工人运动登上了舞台，它已经有了一个最美好的开端，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创造了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现在俄国革命家的“我”又以最快的速度把事情颠倒过来，并且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历史的万能的舵手，而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

中央委员会的皇帝陛下的身分出现。在这里，胆大艺高的杂技演员没有看到，承担舵手所起的这个作用的唯一客体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的我**，它坚决要求应有自己犯错误的权利，自己向历史辩证法学习的权利。最后，我们还要在我们中间坦率地说：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

发表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1904)第2册第484—492、529—535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422—444页。

(李宗禹译)

## 人名索引

### A

- 阿尔诺德, 威廉(Arnold, Wilhelm)。——第 374 页。  
埃尔哈特, 弗兰茨·约瑟夫(Ehrhart, Franz Josef)。——第 208 页。  
埃斯特哈济(Esterhazy)。——第 306 页。  
艾尔姆, 阿道夫(Elm, Adolf)。——第 265 页。  
艾斯纳, 库尔特(Eisner, Kurt)。——第 362 页。  
安得列, 路易(André, Louis)。——第 297 页。  
安塞尔, 爱德华(Anseele, Eduard)。——第 284 页。  
昂利(Henry)。——第 306 页。  
奥艾尔, 伊格纳茨(Auer, Ignaz)。——第 195、208—209 页。  
奥本海默, 弗兰茨(Oppenheimer, Franz)。——第 120、140 页。  
奥皮费修斯, 威廉(Opificius, Wilhelm)。——第 359 页。  
奥索夫斯基, 米哈乌(Ossowski, Michał)。——第 413 页。

### B

- 巴贝夫, 弗朗斯瓦·诺埃尔(Babeuf, François-Noël)。——第 435 页。  
巴尔道夫斯基, 彼得(Bardowski, Piotr)。——第 413 页。  
巴尔图, 路易(Barthou, Louis)。——第 291 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第 420 页。  
巴赫姆, 卡尔·约瑟夫·艾米尔(Bachem, Karl Joseph Emil)。——第 491 页。  
巴罗, 奥迪隆(Barrot, Odilon)。——第 396 页。  
巴塞曼,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第 491 页。  
巴赞, 弗朗斯瓦·阿希尔(Bazaine, François Achille)。——第 389 页。  
白尔尼, 卡尔·路德维希(Börne, Karl Ludwig)。——第 187、232 页。

- 白里安, 阿里斯蒂德(Briand, Aristide)。——第 384 页。
- 鲍威尔, 埃德加尔(Bauer, Edgar)。——第 400 页。
- 鲍威尔, 布鲁诺(Bauer, Bruno)。——第 367, 371, 400, 492 页。
- 倍倍尔, 奥古斯特(Bebel, August)。——第 195—198, 201, 202, 207—210, 217, 221, 222, 264, 265, 271, 286 页。
- 彼得鲁辛斯基, 杨(Pietrusinski, Jan)。——第 413 页。
- 俾斯麦, 奥托(Bismarck, Otto)。——第 196, 265, 346 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Bürgers, Heinrich)。——第 401 页。
- 波尔施, 布鲁诺(Poersch, Bruno)。——第 265 页。
- 波扎多夫斯基—魏纳, 阿尔图(Posadowsky-Wehner, Arthur)。——第 74, 142 页。
-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第 400 页。
- 伯恩斯坦, 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第 42, 44, 49—51, 70—79, 82, 87—90, 93, 96, 100—103, 105—125, 127—129, 131, 133—135, 137—145, 148, 149, 158, 160, 163, 169, 171, 172, 180, 182, 183, 189, 192, 194—198, 202, 204, 206, 207, 209, 212, 213, 215—221, 232, 279, 361, 362, 439, 464 页。
- 伯勒普什, 汉斯·海尔曼(Berlepsch, Hans Hermann)。——第 142 页。
- 伯利克里(Périkles)。——第 494, 495 页。
- 柏姆-巴维克, 欧根·冯(Böhm-Bawerk, Eugen von)。——第 116, 141, 190, 191 页。
- 布尔采肯斯基(Brzezinski)。——第 422 页。
- 布赫, 列奥·冯(Buch, Leo von)。——第 140 页。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第 436, 440 页。
- 布雷东(Breton)。——第 345 页。
- 布雷, 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第 236 页。
- 布里松, 昂利(Brisson, Henry)。——第 316 页。
- 布伦坦诺, 路德维希·约瑟夫(Brentano, Ludwig Joseph)。——第 104, 141, 190, 267 页。
- 布瓦代弗尔, 拉乌尔·弗朗索瓦·沙尔(Boisdeffre, Raoul-François-Charles)。——第 306 页。

## D

-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第 188 页。

德申斯基, 费利克斯(Dzierżyński, Feliks)。——第 429 页。  
大卫, 爱德华(David, Eduard)。——第 171、217—219 页。  
戴鲁累德, 保尔(Déroulède, Paul)。——第 295、296 页。  
德布林, 艾米尔(Döblin, Emil)。——第 265 页。  
德朗克, 恩斯特(Dronke, Ernst)。——第 401 页。  
德累福斯, 阿尔弗勒德(Dreyfus, Alfred)。——第 302、304、306、307、348 页。

德累斯巴哈, 奥古斯特(Dreesbach, August)。——第 359 页。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第 365 页。  
德让特, 维克多(Dejeante, Victor)。——第 298、345 页。  
德夏内尔, 保尔(Deschanel, Paul)。——第 316 页。  
迪帕蒂·德·克拉姆(Du Paty de Clam)。——第 306 页。  
蒂拉尔, 比埃尔·艾曼努埃尔(Tirard, Pierre Emanuel)。——第 300 页。  
蒂姆, 约翰奈斯(Timm, Johannes)。——第 265 页。  
杜林, 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第 251 页。  
杜能, 约翰·亨利希(Thünen, Johann Heinrich)。——第 236 页。  
杜威, 格奥尔格(Dewey, George)。——第 53 页。  
多克通, 维涅(d'Octon, Vigné)。——第 298、312 页。

## E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第 43、86、134、135、157、158、213、218、220、221、262、265、267、343、363—365、371、399—406、409—411、416、433、435、436、438、439、443、444、447、448、457、464、472—474、479、480 页。  
厄特尔, 格奥尔格(Oertel, Georg)。——第 488 页。  
厄特尔, 卡尔(Oertel, Carl)。——第 207、209 页。

## F

菲利浦, 路易(Philippe, Louis)。——第 125 页。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F Feuerbach, Ludwig)。——第 190、370、375 页。  
费里, 茹尔(Ferry, Jules)。——第 300 页。  
费利, 恩利科(Ferri, Enrico)。——第 284 页。  
费舍, 弗兰茨(Fischer, Franz)。——第 194、204、382 页。  
芬德里希, 安东(Fendrich, Anton)。——第 220、270、351、353—360 页。

福尔马尔, 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第 43、45、  
48—50、143、194—199、201、202、206—211、213、223、279—286 页。  
弗里德里希大帝(der Grosse Friedrich)。——第 367 页。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第 101、471 页。

## G

盖得, 茹尔(Guesde, Jules)。——第 284、302、343、345、346、348 页。  
盖兰(Guérin)。——第 295、296 页。  
盖奇, 莱曼·尤德逊(Gage, Lyman Judson)。——第 57 页。  
甘必大, 莱昂(Gambetta, Leon)。——第 300 页。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Goether, Johan Wolfgang)。——第 490 页。  
戈伊埃, 于尔班(Gohier, Urbain)。——第 343 页。  
格腊德纳乌厄, 格奥尔格(Gradnauer, Georg)。——第 194 页。  
格雷, 约翰(Gray, John)。——第 236 页。  
格律恩, 卡尔(Grün, Karl)。——第 401、402、471 页。  
格鲁西埃, 阿尔蒂尔(Groussier, Arthur)。——第 345 页。  
格奈泽瑙,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第 234 页。  
贡瑟(Gonse)。——第 306 页。

## H

哈登堡, 卡尔·奥古斯特(Hardenberg, Karl August)。——第 234 页。  
哈登, 马克西米利安(Harden, Maximilian)。——第 495 页。  
哈勒, 卡尔·路德维希(Haller, Carl Ludwig)。——第 232、238 页。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Myers)。——第 473 页。  
海涅, 沃尔夫冈(Heine Wolfgang)。——第 41、42、45、50、143、159、163、  
194、197、206、223、361—363、495 页。  
海尔斯泽尔, 弗兰齐泽克(Helszer, Franciszek)。——第 457 页。  
海依尔男爵, 考尔纳留斯·威廉(Heyl, Cornelius Wilhelm Freiherr von)。  
——第 169 页。  
海因岑, 卡尔(Heinzen, Karl)。——第 402 页。  
赫克纳, 亨利希(Herkner, Heinrich)。——第 140 页。  
赫斯, 莫泽斯(Hess, Moses)。——第 401、402 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第 190、370—372、374、402 页。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Hecker, Friedrich, Karl)。——第 406 页。

胡登, 乌尔利希·冯(Hutten, Ulrich von)。——第 264 页。

霍亨洛埃-席林格菲尔斯特公爵, 克洛德维希(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Chlodwig, Fürst zu)。——第 142 页。

## J

基尔希曼, 尤利乌斯·赫尔曼(Kirchmann, Julius Hermann)。——第 166 页。

济格尔, 约瑟夫(Sigl, Jaseph)。——第 356 页。

加尔文约克, 让·巴蒂斯特(Calvingac, Jean-Baptiste)。——第 383 页。

加利费, 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古斯特(Gallifet, Gaston-Alexandre-Auguste)。——第 282 页。

杰文斯, 威廉·斯坦利(Jevons, Willian Stanley)。——第 116、141、190 页。

觉勒, 保尔(Göhre, Paul)。——第 496 页。

## K

卡贝, 埃蒂耶纳(Gabet, Étienne)。——第 400 页。

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第 479 页。

卡莱尔(Carlisle)。——第 56 页。

卡普里维, 列奥(Caprivi, Leo)。——第 142 页。

卡托(Cato)。——第 45 页。

康德, 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第 140、190、241、512 页。

康普夫麦尔, 保尔(Kampffmeyer, Paul)。——第 189 页。

考茨基, 卡尔(Kautsky, Karl)。——第 50、51、128、150、213、279、280、283—286、348、361、362、397 页。

科本, 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Friedrich)。——第 367 页。

科斯塔, 安得列阿(Costa, Anderea)。——第 284 页。

科兹米安, 卡耶坦(Koźmian, Kaetan)。——第 60 页。

科扎克, 泰奥菲尔(Kozak, Theophil)。——第 369 页。

克恩, 弗里德里希·冯(Cölln, Friedrich)。——第 234 页。

克利夫兰, 格罗弗(Cleveland, Grover)。——第 54、56 页。

克利盖, 海尔曼(Kriege, Hermann)。——第 401 页。

克虏伯, 弗里德里希·阿尔弗勒德(Krupp, Friedlich Alfred)。——第 156

页。

克尼斯, 卡尔(Knies, Karl)。——第 236 页。

孔斯坦, 让·安都昂·厄内斯特(Constans, Jean-Antoine-Ernest)。——第 300 页。

库尼茨基, 斯坦尼斯瓦夫(Kunicki, Stanisław)。——第 413 页。

## L

拉法格, 保尔(Lafargue, Paul)。——第 345、346 页。

拉埃尔(Kahel)。——第 233 页。

拉马丁, 阿道夫·德(Lamartine, Adolphe de)。——第 396 页。

拉萨尔, 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第 44、72、140、244、246、254、263、264、267、364、399、491 页。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第 140 页。

劳, 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第 236 页。

勒维, 古斯塔夫(Lévy, Gustav)。——第 263 页。

勒文施坦, 加布里尔(Löwenstein, Gabriel)。——第 207 页。

李嘉图, 大卫(Ricardo, David)。——第 117、189、190、235、238—241、370 页。

李卜克内西, 威廉(Liebkecht, Wilhelm)。——第 208、213、264、286、337、339、386 页。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第 153、233 页。

李希特尔, 欧根(Richter, Eugen)。——第 491—492 页。

里廷豪森, 摩里茨(Rittinghausen, Moritz)。——第 404 页。

利鲍, 亚历山大(Ribot, Alexandre)。——第 291 页。

列奥波特(Leopold II)。——第 380 页。

列金, 卡尔(Legien, Karl)。——第 265、384 页。

列宁, 伊里奇·弗拉基米尔(Ленин, Ильч Владимир)。——第 501、502、504—506、509—514 页。

卢登, 亨利希(Luden, Heinrich)。——第 234 页。

卢格, 阿尔诺德(Ruge, Arnold)。——第 366、400、402 页。

罗日(Roget)。——第 295 页。

罗雪尔,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第 191、235—237、264 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翰·卡尔(Ro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第 166, 236, 369 页。

## M

马尔波罗公爵, 约翰·邱吉尔(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第 277 页。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第 167 页。

马尔维茨,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Marwitz, Friedrich August Ludwig)。——第 233 页。

马赫列夫斯基, 尤利安(Marchlewski, Julian)。——第 429 页。

马克思, 爱琳娜(Marx, Eleanor)。——第 383 页。

马克思, 卡尔(Marx, Karl)。——第 43, 82, 84—87, 96, 97, 105, 110—114, 116—118, 121, 122, 135, 139—141, 145, 146, 167, 187—193, 217, 218, 221, 226, 236, 239—242, 244, 246, 247, 254—256, 261, 262, 267, 322, 340, 343, 344, 362, 364—376, 399—407, 409—411, 415, 416, 433, 435, 436, 438, 439, 445, 457, 459, 472—474, 476, 478—480, 482—487, 490 页。

马拉, 让·保尔(Marat, Jean-Paul)。——第 412 页。

迈耶尔, 鲁道夫·海尔曼(Meyer, Rudolph Hermann)。——第 370 页。

麦克马洪, 莫里斯(Mac-Mahon, Maurice)。——第 300 页。

梅利纳, 茹尔(Méline, Jules)。——第 291, 316, 338 页。

梅林, 弗兰茨(Mehring, Franz)。——第 263, 364—372, 376, 399—401, 403—405, 408, 412, 496 页。

梅特涅, 克雷门斯(Metternich, Clemens)。——第 232, 235, 238 页。

门格尔, 卡尔(Menger, Karl)。——第 116 页。

弥勒, 亚当·亨利希(Müller, Adam Heinrich)。——第 232, 234, 238 页。

米凯尔, 约翰奈斯·冯(Miquel, Johannes von)。——第 150 页。

米拉尔格(Millarg)。——第 265 页。

米勒兰, 亚历山大·埃蒂耶纳(Millerand, Alexandre-Etienne)。——第 183, 186, 279—286, 296, 301, 302, 304, 309—313, 317, 320—334, 338, 339, 342, 346, 348, 349, 396 页。

密茨凯维支, 亚当(Mickiewicz, Adam)。——第 59, 62—65 页。

莫瑟, 鲁道夫(Mosse, Rudolf)。——第 381, 495 页。

穆拉维约夫,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Муравьев,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第 64 页。

## N

- 拿破仑第三(Napoléon III)。——第125、333页。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第125、234、288页。  
纳乌曼, 弗里德里希(Naumann, Friedrich)。——第159、204、381页。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第11页。  
尼库尔斯基(Nikulski)。——第13、32页。  
纽包威尔, 利特尔·冯(Neupauer, Ritter von)。——第140页。  
纽文胡斯, 斐迪南·多梅拉(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第383—386、389页。

## O

-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第174页。

## P

- 帕德列夫斯基, 斯坦尼斯瓦夫(Padlewski, Stanisław)。——第422页。  
帕尔乌斯(格尔方德), 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Парвус[Гельфанд], Александр Лазаревич)。——第507页。  
帕热斯, 加尔涅(Pagès, Garmier)。——第396页。  
帕斯特尔(Pastre)。——第297页。  
佩尔坦, 沙尔·卡米耶(Pelletan, Charles Camille)。——第312页。  
佩利厄(Pellieux)。——第306页。  
皮卡尔, 厄内斯特(Picquart, Ernest)。——第305、306页。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第140、400、402页。  
普凡库赫, 威廉(Pfannkuch, Wilhelm)。——第270页。  
普莱斯, 弗兰西斯(Placc, Francis)。——第174页。  
普罗柯波维奇(Прокопович)。——第140页。  
普特卡默, 奥伊根(Puttkamer, Eugen)。——第261页。

## R

- 饶勒斯, 让(Jaurès, Jean)。——第226、227、279、280、284、286、301—314、316、317、320、321、332、333、335—337、339—343、345—349、390、396、

411页。

惹罗·里夏尔,阿尔弗勒德·莱昂(Gérault-Richard, Alfred-Leon)。——第306, 307, 333页。

荣克,格奥尔格(Jung, Georg)。——第401页。

## S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第141, 166, 236页。

塞尔维拉(Cervera)。——第53页。

桑巴,马塞尔(Sambat, Marcel)。——第281, 282, 345页。

桑巴特,威纳尔(Sombart, Werner)。——第243—251, 253, 254, 256—267页。

沙恩霍斯特,格尔哈德·约翰·大卫(Scharnhorst, Gerhard John David)。——第234页。

谢夫莱,阿尔伯特(Schäffle, Albert)。——第261页。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第471页。

施杜姆,卡尔(Stumm, Karl)。——第151, 156, 157, 165, 174页。

施米特,尤利安(Schmidt, Julian)。——第264页。

施米特,康拉德(Schmidt, Konrad)。——第42, 45, 90—96, 100, 101, 103, 189页。

施穆勒,古斯塔夫(Schmoller, Gustav)。——第104, 191, 261页。

施泰因,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卡尔(Stein, Heinrich Friedrich Karl)。——第234页。

施塔姆勒,鲁道夫(Stammler, Rudolf)。——第188, 190, 191, 485页。

施特格弥勒(Stegmüller)。——第205页。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ss, David Friedrich)。——第371页。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 Hermann)。——第264页。

舒尔采-格弗尼茨,格尔哈特·冯(Schulze-Gävernitz, Gerhart von)。——第140, 264页。

朔登伯爵,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海因里希(Soden, Friedrich Julius Heinrich Graf von)。——第234页。

斯克雪茨兹斯基(Skrzypczyński)。——第457页。

斯雷姆斯基(Sremski)。——第457页。

斯密,亚当(Smith, Adam)。——第117, 189, 190, 233, 234, 238页。

## T

- 汤普逊, 威廉(Thompson, William)。——第 236 页。  
特卡乔夫, 彼得·尼基提奇(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第 443, 444 页。  
屠拉梯, 菲力浦(Turati, Filippo)。——第 494 页。

## W

- 瓦尔德克-卢梭, 勒奈(Waldeck-Rousseau, René)。——第 183, 186, 281, 297, 298, 304, 312, 313, 319, 320 页。  
瓦格纳, 阿道夫(Wagner, Adolph)。——第 105, 369 页。  
瓦棱斯基, 路德维希(Waryński, Ludwik)。——第 418, 420, 422, 423, 426, 427, 429—432, 434, 435, 437, 440, 441, 450, 467—469 页。  
瓦扬, 爱德华·玛丽(Vaillant, Edouard Marie)。——第 281, 283, 284, 302, 343, 345—348, 458 页。  
瓦泽伊, 古斯塔夫(Vazeille, Gustave)。——第 312 页。  
王德威尔得, 埃米尔(Vandervelde, Emile)。——第 283, 378—381 页。  
威尔逊, 威廉·利内(Wilson, William Lyne)。——第 294 页。  
威廉四世, 弗里德里希(Wilhelm IV, Friedrich)。——第 238, 366 页。  
威纳尔, 威廉(Werner, Wilhelm)。——第 48 页。  
韦斯特, 查理(Woeste, Charles)。——第 380 页。  
维伯, 比阿特里萨·波特(Webb, Beatrice Potter)。——第 119, 180 页。  
维伯, 悉尼·詹姆斯(Webb, Sidney James)。——第 180 页。  
维茨莱本, 约布·威廉·卡尔·恩斯特(Witzleben, Job Wilhelm Karl Ernst)。——第 234 页。  
维尔特, 格奥尔格(Weerth, Georg)。——第 401, 404 页。  
维尔特, 摩里茨(Wirth, Moritz)。——第 370 页。  
维维安尼, 勒奈(Viviani, René)。——第 311 页。  
魏德迈, 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第 401 页。  
魏特林, 威廉(Weitling, Wilhelm)。——第 113, 123, 401, 402 页。  
文克施特恩, 奥托(Wenckstern, Otto)。——第 260, 263 页。  
沃尔弗, 尤利乌斯(Wolf, Julius)。——第 140, 141, 150 页。  
沃尔弗, 威廉(Wolff, Wilhelm)。——第 401 页。  
沃尔特曼, 路德维希(Woltmann, Ludwig)。——第 171, 218 页。  
乌斯宾斯基(Успенский)。——第 131 页。

## X

- 希尔德布兰德, 布鲁诺(Hildebrand, Bruno)。——第 235、236 页。  
西姆克霍维奇(Simkhowitsch)。——第 187—189、192 页。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第 236 页。  
席佩尔, 麦克斯(Schippel, Max)。——第 143、145、149—170、194、195、197、201、203、205、206、209、213、222、361、362、404 页。  
肖伯纳, 乔治(Shaw, George Bernard)。——第 473、474 页。  
辛格尔, 保尔(Singel, Paul)。——第 48、208、270、286 页。  
休恩朗克, 布鲁诺(Schönlank, Bruno)。——第 164、196 页。  
许列尔, 理查(Schüller, Richard)。——第 232、233、237、238、241 页。

## Y

- 雅布汪斯基(Jabłonski)。——第 422 页。  
雅尔克, 卡尔·恩斯特(Jarcke, Karl Ernst)。——第 232 页。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第 456 页。  
亚斯特罗夫, 伊格纳茨(Jastrow, Ignaz)。——第 495 页。  
伊壁鸠鲁(Epikouros)。——第 365 页。

## Z

- 载勒尔, 塞巴斯提安(Seiler, Sebastian)。——第 401 页。  
泽吉茨, 马丁(Segitz, Martin)。——第 265 页。  
泽瓦埃斯, 亚历山大(Zévaès, Alexandre)。——第 345、347 页。  
左拉, 埃米尔(Zola, Emile)。——第 305 页。